



法西斯主义

—过去 现在 未来

【美】沃尔特·拉克尔 著

张峰译
北京出版社



法西斯主义

—过去 现在 未来—

[美] 沃尔特·拉克尔 著

张峰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西斯主义: 过去、现在、未来 / (美) 拉克尔 (Laqueur, W.) 著; 张峰译.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12

ISBN 7-200-04019-3

I. 法… II. ①拉… ②张… III. 法西斯主义 - 研究
IV. D5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004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1999-1479 号

©1999 年中文简体字版, 经由 Walter Laqueur 授权北京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FASCISM: past, present, future, by Walter Laqueur copyright ©1996 by Walter Laqueur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他者文库·审视纳粹

法西斯主义

——过去、现在、未来

FAXISI ZHUYI

[美] 沃尔特·拉克尔 著

张峰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25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0-04019-3

K·413 定价: 17.00 元

目 录

导 言..... (1)

上 篇 法 西 斯 主 义

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15)
法西斯主义学说..... (27)
领 袖..... (36)
国家与党..... (46)
法西斯主义与教会..... (54)
工人和农民..... (60)
恐 怖..... (67)
宣 传..... (76)
法西斯主义文化..... (80)
成 就..... (88)
日常生活的乐趣..... (97)
清理法西斯主义..... (103)
法西斯主义的教训..... (113)

中 篇 新法西斯主义

新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123)
法西斯主义与极右派：一些案例研究·····	(152)
右翼极端主义：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	(161)
光头党人·····	(166)
对移民的恐惧·····	(174)
反犹主义和否认大屠杀·····	(181)
国际法西斯主义·····	(189)

下 篇 后法西斯主义

教权法西斯主义与第三世界·····	(195)
政治宗教·····	(217)
在俄罗斯·····	(222)
在东欧·····	(245)
在波兰·····	(247)
在匈牙利·····	(250)
在罗马尼亚·····	(254)
在前南斯拉夫·····	(260)
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	(263)
在东德和保加利亚·····	(266)
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	(269)
结论：法西斯主义的前景·····	(274)

导 言

在导言中，作者应该说明他的主题是什么，也许还应说明他为什么认为这个主题是重要的。就本书而言，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要比回答第一个方面更容易。尽管法西斯主义看起来已经寿终正寝，但它还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如果说文艺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复兴的历史的话，那么，除了细节上稍有不同，政治的历史亦是如此。

1976年，在我编的《法西斯主义：读者指南》的序言中，我写道：

“法西斯主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在日常的用法上，它是攻击政敌的咒语。在传媒中也经常捡起它；在大学中，它吸引的历史和政治科学的学生几乎比其他任何话题都多；在其最玄虚的层次上，它成了形而上学思辨的论题。它还将继续成为争论的题目，这既是因为它和许多先入之见的意识形态观念相冲突，也是因为存在着不是一种法西斯主义而是几种法西斯主义，因而难以对其进行概括。”

今天人们不能就此止步。东欧出现了极右派的造反；欧洲之外的事件不仅影响着我们对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解释，也影响着法西斯主义后继者的运动的前景。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它的意识形态，它的特点，它得到数百万人支持的原因，以及它是如何掌权的。这一部分还简要地叙述各个民族在轴心国失败以后同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过去进行斗争的方式。

第二部分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西斯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右翼极端分子的以及激进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的运动的出现。可以对这些运动进行多方面的描述。我力图挑出这些运动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共有的特点，同时也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尽管这些集团 15 年前还是边缘性的，但今天却不能把其中一些当作微不足道的东西打除掉。

第三部分研究教权法西斯主义——即激进的伊斯兰和其他宗教中的类似思潮，以及在前苏联和东欧极端主义集团的出现。尽管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有很大不同，但它们和法西斯主义也是有许多共同之处。

本书在结论部分概括事实和作出解释，并简要讨论这些运动的前景。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轴心国的失败，人们普遍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这种信念自 1945 年以来流行了几十年。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没有理由改变这一判断。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 20 年代和 30 年代以它们为榜样形成的其他运动，是在现已不存在的某些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小集团继续极力复活旧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接受它们的标志和

口号，当然也接受它们的观念和政治纲领。但是，即使这些僵尸能够复活，它们也是同今天的世界不相干的，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也不会重演。

这是否意味着法西斯主义之类的东西不复存在，不再有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冲动，法西斯主义的传统不再适宜呢？很少有人能做出绝对的回答。我们如何鉴别在前苏联和中东这些法西斯主义未曾有过立足之地的地区出现的运动和政权呢？这些运动很少自称是**新法西斯主义的**，而是乐于自我标榜为“国民阵线”、“共和派”甚至是“自由主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现在称他们是右翼极端分子、右翼民粹主义者、民族革命派或其他类似的名称。

这些运动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且都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运动的意识形态上的反自由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因素，连同它们当中的对外国人的仇恨，便具有了头等重要的地位。这些集团的拥护者认为议会制度正在垮台，所以他们拥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法律秩序。此外，他们相信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一些经验是积极的，应该运用于现代条件。

这些 80 年代在欧洲内部和外部聚集起力量的运动，属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这种传统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更早。对这些运动的出现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没有它们，政治系统就会是不完整的。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正常的病理。

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段时期中把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看作是对革命工人阶级运动的软弱性、无能和政治错误的惩罚，这种看法曾是很时髦的。但恰恰是极左派的革命主义（经常只是词句上的）引起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对抗，使得法西斯主义获得了群众基础。的确，有更多的理由认为，法西斯主

义的增强曾是民主制度未能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的结果。民主制度的垮台——民主精神的失败——打开了通向法西斯主义的大门。然而，这种一般说法不应走得太远，因为尽管它适用于欧洲大部分国家，但它却不适用于从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国家。

在法国、俄罗斯、意大利和奥地利，极右政党是最强大的。通过采用当代青年文化的某种方面，新法西斯主义能够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欧洲之外找到立足点。此外，数百万外籍工人（和外籍失业者）的存在和由此造成的紧张关系，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排外情绪已经成了新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法西斯主义的幽灵还以新的伪装出现在那些过去不大可能出现的不地方。

在中东，激进的伊斯兰是一种新兴的力量，同法西斯主义有惊人的重合。但这种教权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新现象，因为这个词早在 1921 年就曾在意大利使用过，当时是指天主教主义和由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精悍的新政治运动的共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权法西斯主义政权统治着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也许曾是较保守的，但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①按任何标准看都是激进的。今天教权法西斯主义这一现象比过去具有更大的政治重要性。

教权法西斯主义是第三世界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年里曾讨论过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和北美之外出现的可能性和相似性。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是一种“假法西斯主义”。这种评价在当时是正确的，但现在似乎不正确

^① 乌斯塔莎，流亡的南斯拉夫右翼分子的组织，曾于 1941 年至 1944 年依靠德国势力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对非克罗地亚居民实施恐怖统治——译者注。

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现代群众运动，只有当一个国家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时，才会有法西斯主义。30年代的情况不是这样，但它适用于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第三世界的法西斯主义主要之点是第三世界，而不是法西斯主义，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这可能是对的。因此，必须考察法西斯主义综合物的构成，这种构成在每一种情况下也许都是不同的。

关于法西斯主义理论，已经有了数百部书籍和数千篇文章，它们澄清了一些问题，但模糊了其他一些问题。例如，最近一本关于右翼极端主义的研究著作对其目前状况进行了考察，做出结论说我们刚刚处在找到一种理论的开端。^① 有理由假定我们将处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漫长时代的开端。一种理论的目的不是去寻找最广泛的一般共同特性，而是去澄清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理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即使它也许在抽象层次上是有益的，但无视它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普遍存在的一种误解是，如果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和一个好的理论，人们就不能开始研究一个主题。然而，不幸的是，现实世界是很复杂的，即使不能借助于一种理论，人们通常也必须研究并描述事件。无论如何，理论的产生应该在事件结束之时而不是开始之时。

法西斯主义类似于色情文学，也就是说，很难——也许不可能——以一种法律上有效的操作方式去定义它，但有所体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它。这样一种主观的、“印象主义的”方式是否打开了通向各种武断的判断和不正确的解释的大门呢？不一定。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一度被某些共产党人叫做法西斯

^① W. 科瓦斯基和 W. 施罗德：《右翼极端主义》（奥普拉登 1994 年），第 7 页。

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也曾被斯大林叫做法西斯主义者，甚至斯大林也曾被反共主义者叫做法西斯主义者。但罗斯福、斯大林和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没有什么可靠的理由要严肃地对待这些奇谈怪论。

在语言纯正癖者看来，即使对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使用**法西斯主义者**这个一般名称也是有问题的。我多少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法西斯主义**一词有忽略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重要差别的倾向。希特勒会断然否认自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就像墨索里尼会拒绝纳粹这个名称一样。莫斯科的一个最好战的新法西斯主义集团的领导人阿列克山德·巴卡晓夫是日本柔道武术的教练，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在一次谈话中声称他是一个纳粹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是有道理的。

然而，**法西斯主义**这个一般名称仍被继续使用，主要出于实践的目的：如果一个词能概括就不需要用几段话。但对纳粹德国系统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许多左派人士对把（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个词用于纳粹党^①这样可恶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恐怖。但把**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用于纳粹德国，也会模糊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这两种政权之间的重要差别。研究这一主题的权威人士，如 K.D. 布拉彻和伦佐·德·费利斯，属于最明确地反对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的人，这一事实至少给人以某些启示。

新法西斯主义一词的使用更成问题。**新**是表明它和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不是等同的，但**法西斯主义**却是这个定义更突出的部分。法西斯主义使人想起了成千上万穿黑褐衫的人在欧洲

^① 纳粹 (Nazi) 是“国家社会主义的” (National Socialist) 的简称——译者注。

大街上列队行进，以及邪恶暴力和侵略战争、恐怖和无情的宣传、数百万牺牲者的场面。就战后时期来说，肯定就 90 年代来说，当然不再有这种情况。而且这个词由于在政治论战中被滥用和误用，从而失去了信誉。它曾被用作种族主义、排外情绪、性别歧视、右翼保守的和反动的观点等等的同义语。但并非每一个反对移民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并非每一个反犹太主义者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并非每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法西斯主义者。有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最低尺度”存在着，那些没有当法西斯主义者资格的人仍可以同情法西斯主义的某些方面，甚至信奉法西斯主义某些基本的信条，但他们不是正式的法西斯主义者或新法西斯主义者。

目前欧洲的现实，特别是欧洲在世界舞台上被削弱的地位，都对那些着迷于 30 年代专制的人施加了限制。30 年代的口号“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战争”，在今天肯定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一些新法西斯主义者也许想要战争，但除非是在高加索或南斯拉夫，它不再是可能的。没有暴力，没有灭绝敌人的威胁，这是什么样的法西斯主义呢？如果新法西斯主义者遵守比赛的民主规则，为什么还要突出地使用新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呢？但是，把他们信奉民主视为理所当然的，为时尚早。在西欧之外，在俄罗斯和中东，这种民主的要求甚至没有提出过。眼下西欧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是相对较弱的，还不得不谨慎行事。然而，没有人知道，如果他们掌权的话，他们的行动是如何民主的。

更重要的是，舍此之外，我们能够使用什么样的替代词呢？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有人提出过几种名称，如右翼极端主义、右翼激进主义、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民族民粹主义和民族革命派。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名称也是不令人满意的。

对某些人，而不是对其他人，它们也许或多或少是合适的。根据公认的信念，右派是有特权的保守的、信奉反社会主义观点的政党。但对“极右派”的政治支持现在主要来自下层阶级，他们并不特别渴望维护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许多人偏爱某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

只有当人们假定有两种以上的右派共同存在，一个是保守的而另一个是激进的，使用极端的或激进的右派名称才是有意义的。但这产生了一种新的混淆的因素。法律和秩序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适用于法国和德国也许还有意大利的右派。然而，激进的右派中的新来者，如光头党（几乎完全是一种工人阶级现象）、日里诺夫斯基运动、伊朗的毛拉^①专制和一般的原教旨主义，却使左翼-右翼类型学不敷效用了。

在30年代，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都为参加各自的运动感到自豪。然而，今天却不会是这样，不仅仅是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或法西斯主义在某些国家是不合法的。民粹主义者的标签也不能大量使用。尽管它似乎可以提供一条摆脱分类学困难的出路，但它的代价却是严重失真。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导致要找出亚类型，如奉行不同的甚至冲突着的政策的左派或右派（或激进的和温和的）民粹主义者。一位作家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有产的中产阶级的运动，它以激进的言辞动员下层阶级特别是城市穷人，直接反对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政治当局。”^②

① 毛拉，是一些穆斯林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伊斯兰宗教法律教师和解释者以及有学问的人的尊称——译者注。

② 埃尔万德·亚伯拉罕米安：《霍梅尼主义》（伯克利1993年），第17页。关于对最近的定义法西斯主义、人民党主义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的尝试的批判性评论，见斯坦利·佩恩：《法西斯主义：历史与解释》（麦迪逊1995年）。

霍梅尼主义，伊朗的一个极端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次宗教改革运动，而且还是社会经济的困境的表现。但把复杂的政治运动（如法西斯主义或民粹主义）归结为它们的“阶级特点”的尝试，从来不是完全成功的，而且经常是误导的。即使它们是成功的，它们至多也只能解释这些运动起初为什么得到群众的支持并且成为强有力的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运动总要脱离它们的社会经济基础，即使再一次祈求于神灵，“有产的中产阶级”也不会再支持它们。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党总会变化的。即使是意大利的 MSI 也不是它 80 年代的样子，它的名称的改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鲁里坦尼亚王国^①的共和党既包含有保守的反革命派，也包含有新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它的一些领袖和追随者是坚定的反资本主义者，而其他人则采取某种形式的模糊的社会主义观。政党通常在一两年内会分裂或同另一个政党合并，这会影响着它们的政治倾向。总之，本书提到的政党很少是纯粹的没有掺杂的新法西斯主义或右翼极端主义，但它们都包含有某些这样的因素，只是有些多些、有些少些而已。

我自己选择的名称和定义是不满意的，但我还看不出还有更好的。我是否应集中注意基本的动机、社会的和心理的根源，而不过多注意目的呢？有人提出，极端的右翼政党和新法西斯主义政党是由“现代性的丧失者”构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人由于现代化的结果而受苦，或者说这些人尚未受到影响便害怕这种命运降临到他们头上。对某些国家的某些运动来说这也许是真实的，但它解释不了法国的勒蓬或意大利的新法西斯

^① 又称浪漫国，是安东尼·霍普所著小说《珍达的囚徒》（1894 年）中虚构的一个中欧王国——译者注。

主义，也解释不了过去的希特勒或墨索里尼。

随着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离开了 19 世纪的欧洲，右派和左派的名称即使不是完全无用的，也是很成问题的。它们仍可以谨慎地用于西欧和北美，但在其他地方它们就成了相当错误的。投票支持日里诺夫斯基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极右派或左派；同样，激进的伊斯兰（或者伊斯兰民族^①）既不是左派分子，也不是右派分子。

尽管人们可以无休止地争论名称和定义，但这种语言纯正癖不仅无济于事，甚至是危险的。它之所以无济于事，是因为涵盖现象的每一方面的理想的一般定义是不存在的。根据最近的定义，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尽管有各种排列，但其神话般的核心却是流行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重演。”（罗杰·格里芬）“重演”指的是民族精神的复兴。尽管对这一说法很难再有所改进，但它仍包括了许多并不是真正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并且忽视了许多属于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历史和政治学研究者面临的窘境，类似于医生在对付他们并不十分了解的疾病时所面临的窘境。每一个病例都有些不同，没有什么病例完全符合教科书。但所有这些并不能阻止医生做出哪怕是不完善的诊断，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有别于抽象和理论建造的世界，绝对的正确永远是没有的。这一结论不令人满意，但在实践中通常不是很重要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靠它生活。

当代观察家面临的窘境，类似于托克奎维利在 150 年前谈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时所面临的窘境：

^① 美国一黑人右翼政党名称——译者注。

“我认为……威胁民主国家的那些压迫，不同于以前世界上存在的压迫。我们当代人将在记忆中找不到它的任何原型。我徒劳地寻找一种表达，想准确地表明我已经形成的关于它的整个观念。过去的词如专制主义和暴虐都是不合适的；这件事情本身是新的，既然我不能命名它，我就必须试图定义它。”

寻找定义和公式，是后法西斯主义时代的事情。那些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生活的人骨子里知道（而且现在也知道）这种政权在什么方面不同于其他政权。然而，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实际体验是很难遗传的。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专注也是如此。

同时，那些并不专注于分类学的人——即绝大多数人——认真地注视着欧洲之外法西斯主义新类型的出现。这些新来者没有任何内疚感，没有任何道歉的愿望。有些人公开而大胆地谈论他们的学说和政治，而其他的人甚至意识不到他们继承的遗产：他们是本能的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起源于本世纪的最初年代。随着这个世纪行将结束，这些强有力的冲动依然存在，但它们周围的景色已经变化了。

卡尔·迪特里希·布拉彻谈到过极权主义诱惑的持久影响。他在几年前注意到，现在技术的发展使得监视和操纵的技术得以完善，大众传媒和信息技术对自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如果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手段合理，如果这些运动传播这样一种信念，即有一把解决地球上所有问题的钥匙，那么，一切具有绝对的单一目的的观念和运动，在今天都潜在地是极权主义的。”^①

① K.D. 布拉彻：《现代的转折点》（麻省坎布里奇 1995 年），第 149~150 页。

布拉彻在写下这些话时，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的新威胁还存在。我将在本书中讨论这些威胁。一句话，噩梦并没有过去。

上 篇

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关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但经常发出的是热，而不是光。它曾强烈地吸引政治科学家们，寻找一种“一般的模式”来涵盖所有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对广大观众来说，对这些做法不会有大的兴趣。人们可以无休止地讨论纳粹主义是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最高的、最完整的形式，墨索里尼的政权是不是纯粹的中间站，或者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也许由于它最早登台——是否应成为衡量其他一切法西斯主义的尺度。如果是的话，那么，纳粹主义似乎就是一种无情地追求自己逻辑结论的新观念的极度激进的夸大的形态。人们可以一直争论，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图上是不是现代化的运动，或者不管其意图如何，不管它们是不是反动的，都是现代化的运动。法西斯主义并不属于极左派，但把它定义为极右派也不是很有说服力。在许多方面，法西斯主义在精神上都不是保守的，而是打算建立一个有一种新人类的新社会。

人们也许希望，用不着再去定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但这种定义是必需的，因为按流行的说法，过去是完全不加区别地使用法西斯主义一词的。作家和演讲家喜欢把他们的政敌说成是法西斯主义者（或至少是准法西斯主义者或类法西斯主义

者)。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成了十几种现象的同义词，一般都具有否定性的特点。因此，定义什么不是法西斯主义更容易些。20世纪的专制也许是可恶的，但它们不一定是法西斯主义的。30年代的日本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基马尔^①的土耳其不是，毕苏斯基^②统治下的波兰不是，佛朗哥^③统治下的西班牙也不是。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军事专制，如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和上校们统治下的希腊，也不是法西斯主义的。

当法西斯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出现时，应该清楚它包含着某些本质上是新的因素，即它属于一个新的种类，但当时没有普遍认识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同意，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倾向上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它们是反民主的。然而，除此之外，它们没有任何一致性。既然根据旧现象来解释新现象是很自然的事情，某些分析家也就提到了波拿巴主义的模式（伟大的拿破仑以及他的后代拿破仑三世）。其他分析家则按照19世纪后期极端右翼的反自由的集团的传统来看待法西斯主义。给法西斯主义下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只有两个国家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轴心国监护下的维希式的政权不能被真正当作十足的法西斯主义，即使一些政权，如克罗地亚，极力向这个方面发展。

① 基马尔（1881—1938年），又译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第一任总统（1923—1938年），创建人民党（1923年），后改称人民共和党，发展民族经济，实行社会改革，废除哈里发制度，被授予“土耳其之父”的称号——译者注。

② 毕苏斯基（1867—1935年），波兰共和国元首（1918—1921年）、总理（1926—1928年，193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统率“波兰军团”对俄国作战，发动军事政变（1926年），建立独裁统治——译者注。

③ 佛朗哥（1892—1975年），西班牙独裁者，长枪党首领，1936年发动反政府的叛乱，1939年夺取政权后任元首兼大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德、意法西斯侵略战争——译者注。

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静态的现象。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初期在倾向上是激进的，但一旦它掌握了政权，它在基本方面就成了较温和的。后来在它的后期阶段，它又回到了它激进的开端。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城市和在乡村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从纳粹政权掌权之时到它发动战争使国内的一切兴趣都服从于战争努力，只用了6年。我们不妨思索，如果德国赢得了这场战争，纳粹的政策会是怎样的？例如，经济制度会不会有所改变，它会不会转而反对教会，那些被认为是低等民族的人会不会被杀害或驱逐，这个政权会不会使它的政策温和一些，或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常规化或正常化会不会出现。

当时为数不多的意见一致的一个问题是，承认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欧洲的现象。即使现在就“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而言，这也是真实的。当时在非常落后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在技术上是不可可能的，因为群众不能被动员起来，宣传和恐怖也不是十分有效的。在今天是不是还是这样，尚不能那么肯定，因为随着现代技术的扩展，非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变种的前提条件现在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都是存在的。

使法西斯主义有别于以前的专制的地方在于存在着一个群众政党，这个政党通过它的保安机构和军队来垄断权力，清除所有其他政党，并在这一过程中使用相当大的暴力。这种新式的政党是由一个领袖领导的，这个领袖实际上具有无限的权力，受到他的追随者奉承，并且是宗教式崇拜的核心。这个政党的学说不仅对其成员来说，而且对所有其他公民来说，都是强制性的信条，并且不断靠一种有力的宣传机器而加以灌输。这样的政党——和后来的国家机器——以前在历史上是行不通的，因为不可能推行此类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控制，不可

能如此深入地影响人民群众。

什么条件有利于这些新式的群众政党的兴起，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法西斯主义才感觉到不可能有所进展呢？尽管“条件”只是这个等式的因素之一，但却是一种重要的因素。然而，只有“条件”不会带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胜利。缺乏有利的政治格局，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不会有所进展。

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掌权都是由旧秩序的领袖人物大力促成的：在德国是由保守党人和兴登堡的随从促成的，在意大利是由保守党人和君主政体促成的。希特勒是最强大的议会党派的领袖，根据宪法，能够形成一种有利于他当选为下一任总理的局势。保守党人如果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有可能给纳粹分子套上缰绳，使其举止“有理性”。多年前在意大利导致法西斯主义者掌权的压力也是相似的。

甚至借助于事后的认识，也不能够肯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否敢于不靠这种法律的认可而夺取政权。即使他们有这样的胆子，也不能断定他们会成功。在其他地方，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政变都失败了。但这不是结论性的证据，因为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比那些失败者更强大，受到的抵抗更微弱。

为什么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展起来，是什么东西吸引了男男女女，引起了比民主国家更多的人们的同情呢？30年代访问德国和意大利的英国和法国观察家，在报导法西斯主义政权新的乐观主义精神时，表达了赞许甚至妒忌之情。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国家，旧的秩序似乎不再起作用，民主没有深深扎下根来，民族主义的不满浪潮不断高涨，人们感受到了经济崩溃和政治无序的威胁。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危机，法西斯主义即便出现，也不过是

一个小宗派。因此，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愿意支持这样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同于其他政党，声称不追求任何狭隘的政党的或阶级的利益，而是宣布自己代表整个社会的价值，争取统一和秩序，而且这是使国家摆脱混乱的惟一方式。

这些解释可能会遭到出于各种理由的反驳。例如，有人会认为，意大利的战后危机在 1920 年要比 1921 年更尖锐，在 1921 年要比发生进军罗马事件的 1922 年更尖锐。到 1922 年，眼前的危机正在过去，革命的挑战已经失败。无论如何，1921 年 7 月 2 日《意大利民报》发表的墨索里尼的评价是清楚明白的：“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危险在意大利仍然存在，就是对现实不必要的担心”。

还有人会论证，德国 1923 年的经济危机像 1933 年的危机一样严重，但在 1923 年纳粹主义仅仅是一种容易击败的地方现象。德国的危机在 1932 年达到了它的最低点，如果中右政府能够再掌握一年多的政权，形势就有所改观。的确，“凡尔赛条约的枷锁”（指受到憎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条约）甚至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前就已经断裂了。但经济的复苏和同盟国的让步来得太迟了：这场危机具有累积的效应，许多德国人都失去了希望。然而，尽管纳粹分子和共产党人一直认为这个制度是腐败的，但这个制度实际上并不腐败。如果说有腐败的话，那就是说这个政权太诚实了——而且太缺乏想象力了。德国人民非常清楚地看出，政府陷入严重的危机而难以自拔，它管理的机器失灵了。政府本身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已经山穷水尽，它不知道如何应付。面对一个已经决定下台的总理，这样的政府必定垮台。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惨败，而意大利却是胜利者。但意大利没有获得它希望得到的战利品。此外，民族主义

激情就像在德国一样不断高涨——自民族统一以来只经历了两代人，人民还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国家是安全的，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

经济危机的深度不是导致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出现的惟一线索。美国和英国像德国一样，都深受这场经济大崩溃的影响。的确，仅仅是由于美国人对于这场灾难几乎没有准备，经济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或许更大；美国人把不断进步视为天经地义的。而德国却已经有了一些创伤性的体验。尽管英国也有严重的失业和经济衰退，但英国的法西斯主义却一直是一种边缘性现象，即使它的领袖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至少像大陆的法西斯主义领袖一样有很大的民众号召力。在美国也有各种法西斯主义组织和类法西斯主义组织，但它们从来没能取得政治上的突破。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有颇具吸引力的民众领袖。共产党人雅克·多利奥特在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之前曾是法国的一个最深得民意的人物。但不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在法国，个人的名望都不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

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是一种道德的和文化的危机。在1914年之前，欧洲社会在许多方面远不是民主的。但尽管有这些不完善之处，这些社会却比以前更文明。人权越来越受到尊重，很少有人敢于蔑视它们毫无意义。甚至对一位不知名的有犹太人血统的法国军官的诬告，竟成了欧洲的一个重大丑闻。^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连同它对牺牲者的大屠杀和严重的破坏，改变了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持久的后果。沙文主义的狂欢

^① 指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对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的诬告案，此案最终酿成法国的一次社会危机——译者注。

导致公共生活残忍化。在数百万人被杀掉后，对人的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就不再顾忌了。虽然在 1914 年之前世界上也有一些政治谋杀的案件，但在文明国家里为之辩护或证明其合理却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为成群的人建立死亡集中营了。沙皇主义的俄国曾是欧洲最落后、最残忍的政权，但它杀掉的牺牲品同它的后继者政权处死的数百万人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道德崩溃甚至比经济危机更严重。

与文化危机相一致的是国家政权黯然失色，统治阶层越来越缺乏信心，不愿意以武力对付法西斯主义的街头暴力。秩序的力量原本可以扑灭武装攻击（如同 1923 年在慕尼黑所做的那样），但它们只是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措施，太少而且太迟。由于这种犹豫和软弱，法西斯主义的准军事组织获得了新鲜的动力。它们成了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旦它们的数目膨胀起来，处理它们也就有了更大的风险。

历史的记载表明，法西斯主义（像恐怖主义一样）只有在一种自由的民主制度里才能成功。只有在它能自由煽动的地方，它才有机会。如果同一种军事专制（罗马尼亚或西班牙）相竞争，自由的民主制度总要遭到失败。甚至在像奥地利这样的适度的权威主义政权下，它在 1934 年也失败了。法西斯主义者蔑视而不是仇恨民主制度：他们把议会看作是清谈馆，一种进行无休止、无结论的争论的地方，是政治家由于他们的软弱而遭到轻视的地方。这种情绪不仅在极端的左派和右派那里能找到，而且也能在许多并不自认为是激进分子的人中间找到。说到底，民主的垮台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民主主义者愿意维护它。

法西斯主义吸引的是哪部分人呢？它吸引的人因国家的不同

同而不同，因政治传统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一般说来，中下层阶级同法西斯主义有最多的共鸣，特别是那些因经济大崩溃而受苦最深的人。纳粹分子深入到了遭到严重打击的农民中间，也深入到了中产阶级中间，因为中产阶级在通货膨胀期间失去了他们的储蓄，后来又面临进一步损失。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那些不能纳入文明生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中得到了支持，在那些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中得到了支持。

更认真的考察表明，在阶级、年龄和性别方面没有严格的亲纳粹的类型。在 1933 年以前，德国的男性选民和女性选民之间没有重大的区别，不同年龄组的选民之间也没有重大区别。尽管纳粹领导人比他们的对手更年轻，但他们的选民却不是这样。在 1931 年以前，纳粹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下层阶级的一部分。但在 1931 年之后，他们从社会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中都得到了支持。

能够肯定地指出的是，纳粹分子在新教教区要比在天主教教区更强大，他们并没有对天主教核心党的地位构成重大的威胁。法西斯主义在其他国家面临同样的困难，但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是例外，因为那里的教会支持本地的法西斯主义者。

在大城市的选票和小城镇的选票之间有一种有趣的差别。纳粹获得的选票平均为 37%。在全国范围内，在 1932 年 7 月的选举中，小城镇的选票是 42%，而在像柏林和汉堡这样的大城市，纳粹的选票接近 33%。工人阶级不是不受纳粹高涨影响的。事实上，1932 年有更多的工人和失业者投票支持纳粹分子，而不是支持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人。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都动员了以前并不活跃的几部分人。

由于法西斯最初出现在意大利北方，后来才逐渐扩展到南方，这使得意大利的情况有所不同。然而，最终南方成了比北

方更强大的法西斯主义的堡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法西斯主义来说也是这样。农民的法西斯主义也是意大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波瓦利地区的大地主的反应，以及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小地主对无地农工日渐强盛的力量反应。在西欧，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荷兰，法西斯主义在农村没有找到立足之地，而且在英国的伦敦之外它也很难找到。

但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法西斯主义者在乡村得到了支持。芬兰的拉普阿运动^①主要是农民的组织。在大多数法西斯主义运动中白领工人有非常强烈的表现，而工人阶级的表现却大不相同：起初在法国它是强烈的，在西班牙是相对强烈的，但在除匈牙利之外的东欧却不怎么强烈。原因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有名望的地方领袖加入法西斯主义组织，往往会带去他的追随者。

在西班牙和罗马尼亚，学生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有力支持者，所以在这些国家里，法西斯主义初期是一种主要限于个别大学的现象。同样，纳粹分子在成为一种全国性的重要政治因素之前，在德国的大学选举中取得了胜利。然而，纳粹党的高层却很少有大学毕业生。戈培尔、汉斯·弗兰克和罗伯特·利是少有的例外。最后的魏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由职业的成员构成的，而在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政府中却很少有这样的人。纳粹的省党部头目中只有5人是大学或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帝国领导人中的17位有较浓厚的精英主义背景。小学教师在纳粹的精英中有强烈的表现。但在各种场合希特勒表达了对脑力劳动职业的蔑视，声称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会干这种职

^① “拉普阿”，30年代末芬兰资产阶级制造的运动，曾镇压共产党人和破坏左翼工人组织——译者注。

业。

纳粹和法西斯主义领导层的普遍情绪是反知识分子的。对待大学生是不信任，怀疑他们高傲自负，高人一等，在纳粹社会没有为其留下任何地盘。在第三帝国，毕业的大学生的数目明显减少。作为一项原则，希特勒拒绝接受名誉博士的头衔。

法西斯主义者信奉等级结构，但又打算超越阶级分化。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扬，阶级斗争已经被民族团结所取代，理想和价值比物质上的占有更重要，元首、党和国家是最高的主宰。这种说法是很有影响的，在法西斯主义获得的同情中得到了反映。甚至希特勒的敌人也承认他的个人名望。在纳粹分子掌权后，他们在真正的选举中得分很高。的确，希特勒曾发出指示，不要干预投票，迄今为止还找不到任何文件证据能证明这些选举结果是伪造的。纳粹领导人确信他们有民众的支持。

尽管在纳粹分子掌权后，法西斯主义垄断了传媒，但在1933年以前却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掌握广播，而且在1930年取得选举突破之前，他们掌握的报纸也比其他政党少。图书在1930年到1933年纳粹分子的崛起中起的作用很小，很难相信有人是因为读了《我的奋斗》而成为纳粹分子的。意大利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墨索里尼是一个有成就的记者，掌握着一份有影响的报纸。

纳粹分子信赖他们的关键领导人的和许多第二流、第三流的演说家的演讲。但这并没有为他们的掌权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只有希特勒和戈培尔（以及墨索里尼）是天才的演说家。既然这两个人不是无处不在的，就不免要得出一个结论，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是信息而不是传媒。纳粹的宣传总是充满激情的，尽管它太粗鲁以致不能在知识分子中得到很

大的尊重，但在掌权后它却被逐渐接受了。甚至早在 1933 年前就有了纳粹律师和医生的联合会，尽管它们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像马丁·海德格尔这样的主要思想家和法官卡尔·施密特都表示了赞赏，而吉奥万尼·金泰尔则成为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个支柱。这些亲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理由是，政治上的天才和成功是不能用通常的伦理的（和美学的）标准来衡量的。正如他们看到的，希特勒比起以前的软弱无能的领导人来有很大的改进。在其他人士失败的地方，纳粹分子成功了。不管他们有什么缺陷——被认为是暂时的——他们都是德国伟大的惟一的希望。这种肯定性的评价经常也是德国之外的其他作家和思想家所共有的。甚至大多数外国的主要国务活动家在早期也对墨索里尼有一些赞许之词，但希特勒在他的国家之外却从没有得到同样的喝彩。

西方的知识分子很少成为十足的法西斯主义者。然而，许多人认为，虽然法西斯主义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不合适的，但也许对德国和意大利是合适的。他们甚至不时地论证，在法国或英国有像墨索里尼这样的有活力的领导人也是不错的，可以清除过分的议会主义，干些实事。

对不同的民众来说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同样法西斯主义也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吸引他们的。然而，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会得出一个既模糊又无益的定义。在法西斯主义灭亡 50 年后回过头来看，很值得推荐一种最早的解释：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道德和文化危机的表现。在这种危机中，传统的价值，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人道主义的，都不再有太大的意义。法西斯主义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谵妄状态中，从不安全和政治不成熟中，从反理性的造反和对社会的原子化的反应中产生出来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情绪在战前的所有国家中都已经存在：民族主义正在变成帝国主义的、合作主义的和激进主义的理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反理性的造反和青年的崇拜。然而，需要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剧变来打开闸门。对极端民族主义、“生命”与“权力”（同理性与和平形成对照）的鼓吹者来说，为了获得群众的支持，仅在精神上彻底改造人们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彻底改造他们。像致病的细菌一样，法西斯主义在每一个有机体中都是可以找到的。但只有当有机体虚弱或以其他某种方式易于感染时，它才能蔓延开来。

法西斯主义学说

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并迅速扩散，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蹂躏和这些蹂躏留下的政治的和精神的虚空。欧洲大陆已经被强烈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灾变所动摇。在半个欧洲，旧的保守的秩序已经消失，而新的秩序尚未被接受。昨天的世界的道德确定性已经烟消云散，中产阶级开始穷困化。对某些人来说，最后的文明遗迹似乎受到一种新的神秘的很有传染性的现象——布尔什维克——所威胁。有些人认为需要一种强有力的领导和一种新的秩序，但又觉得共产主义因其国际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观点（初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而不可接受，于是渴望一种政治上的替代品。

法西斯主义的许多基本的信条并不是新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可以追溯出它们的先例。对法西斯主义的严肃研究是不能忽略它们的，但研究它们的先驱也不是没有危险的。这种研究不应忽视或轻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鼓吹者宣扬反自由的反民主的福音思想，同战后法西斯主义内在的新因素之间的重要差别。研究尼采或索列尔，对理解法西斯主义政治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就像19世纪90年代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不足以解释1917年之后苏联发生的事件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著作表达了一种文化上的不适以及一种政治上的不适，表达了对启蒙遗产的不满意，它们都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表现。

然而，从 19 世纪的思想家到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在一切时代，各种观念——好的、坏的、无动于衷的、敏感的和疯狂的——都起源于教授们的书斋和文学咖啡屋。例如，许多人都谈到过从路德到 19 世纪后期的沙文主义的和激进主义的思想家的德国知识界的反动传统。不可否认，这种传统是存在的，它促成了一种舆论氛围，而纳粹主义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产生并兴盛起来的。甚至在英国和法国也有这样的思想遗产，它的政治影响却始终边缘性的。在意大利，反自由的、反民主的冲动在世纪之交之后是相当强大的，也正是在这里法西斯主义最早兴旺起来。

法西斯主义首先是民族主义的、精英主义的和反自由的。它是军国主义的，不管它统治的国家是否非常强大，它都主张帝国主义和领土扩张。然而，在 1914 年以前民族主义是许多国家的一种支配性力量，而且它的出现决不限于右派和中派。精英主义也不是一个新发明。虽然所有政党都实践它，却很少有政党公开赞成它。反自由主义是在天主教教会和右翼中间猖獗起来的。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中都是可以找到的。

法西斯主义同它的前辈之间的差别，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普遍激进化的后果。在 1914 年以前，政党是被小集团支配的，但不同于法西斯主义运动，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是依据于元首原则。在 1914 年以前传播激进主义的是德国保守分子和法国行动派。但也许除了某些得意洋洋的文学家和其他关系不大的局外人的

著作而外，这并不是—种极端的激进主义。许多保守分子对左派日渐增强的影响感到不愉快，不停抱怨没有采取防止这种危险的坚定行动。意大利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谈到了无产阶级民族为获得原材料并减轻人口的压力而得到新领土的权利。但事实上在 1890 年到 1914 年间没有任何军事政变，也很少有扩张。

然而，法西斯主义和战前的右翼政党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法西斯主义主张持久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革，而保守党人——尽管也批评议会的民主——却接受权力分享的原则。法西斯主义者想要绝对的权力，他们知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非议会的方式。而保守党人却是保护现状和秩序的政党。法西斯主义想要一种新的秩序，并为此理由而破坏旧的秩序。墨索里尼肯定熟悉法国行动派的著作，并受到过它们的影响。但对他影响更大的是索列尔，而索列尔却不是—个保守分子。希特勒同德国旧的保守的、反民主的传统的决裂甚至是更公开的，这不单是采取新的策略方式的事情。纳粹的学说同“1914 年的观念”有联系，而“1914 年的观念”是 19 世纪 80 年代的某些观念的稍加现代化的形态。但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仅仅是由于世界大战、政治的不稳定和经济的危机，这些观念——被简单化并流行起来——就得到了它们以前不曾拥有的权力。

这些情感和观念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都起源于对总的事态感到不满，起源于在 19 世纪最后 1/4 年代广泛蔓延的文化悲观主义。在法国和意大利，敌人是“自由主义”。而在威廉大帝的德国，矛头首先针对的是“破坏性的理性主义”和过分的个人主义。

德国的批评家们抱怨既作为—种哲学也作为—种生活方式

的唯物主义的~~增长~~，抱怨精神价值的衰退，抱怨工业化的影响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影响，抱怨社会的分崩离析和旧的社会纽带的瓦解。他们悲哀地注意到文化越来越贫乏，预言如果没有民族共同体的复兴，已见端倪的普遍堕落就会无情地继续下去，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大毁灭。

这些悲观的预言是夸大其词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所有这些邪恶事实上是存在的。左派作家也注意到了这些东西，他们将其解释为资本主义的破产不可避免的后果，认为一旦推翻了旧的社会秩序，也就能够克服它们。他们还指出了文化的衰退，指出了社会的分化和异化。但他们的药方——革命——却不被资本主义的右翼批评家所接受。正如右翼分子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没有任何更高的理想，完全专注于重新组织经济。他们不抱这样的希望，即社会主义能通向一个更好的社会。

民族社会主义的右翼前辈所设想的文化革命，不得不立足于**民族共同体**的更生，回归于传统的价值，恢复存在着自然等级的共同体，即预言家和武士的贵族政治。德国的共同体概念同西方的社会观念被并列在一起：高级的德国文化同低级的西方文明形成对照。在法国和意大利，强调的是民族，而不是**民族共同体**。尽管在法国的右翼思想中不是没有激进主义，但正是在德国，激进主义找到了更肥沃的土壤。

根据这种学说，德国民族虽然天生地比其他民族优越，但却面临解体的致命危险。因此，必须保护民族血缘的纯洁性，这首先意味着清除犹太人的影响，清除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清除所有超民族的力量。它还意味着，德国种族为了实现它的历史使命，还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这些思想是由各种各样的思想家提出并传播开来的，其中一些思

思想家起初是左派人士（威廉·马尔和欧根·杜林），而其他人却范围广泛（胡斯顿·施德瓦特·钱伯林）。并非每一个人都相信德国种族的优越性能够得到科学的证明。但说到底，这个结论是根据伪科学的推理还是根据极端民族主义的信条得出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民族共同体的神话和对激进主义的强调，在德国特别强烈。在其他地方，如在意大利，强调民族，但更强调国家的作用。坦农齐诺写道，他感到自豪的是自己是一个拉丁人。他把每一个非拉丁人都看作是野蛮人。但坦农齐诺不是主流法西斯主义的代表。在墨索里尼看来，产生国家的不是民族；毋宁说，民族是一个为 19 世纪的民族主义提供根据的过了时的“自然主义的概念”。相反，正是国家创造了民族，把意志因而也把真正的生命赋予一个民族，产生了道德统一意识。或如英国的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墨索里尼的崇拜者所说：“种族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幻想，违背了自然规律并破坏了文明，它真正合逻辑的应用将是滑稽的和不实际的。”

因此，在哲学的层次上，纳粹的意识形态同法西斯主义的学说之间是尖锐冲突的，但在现实中却不那么明显。**民族共同体的神话**决不排除帝国的神话。无论如何，纳粹分子至少像意大利人一样强烈地坚持复兴强大的国家权力，同软弱无力的自由国家形成对比。正如纳粹分子所设想的，国家的任务不是保卫最大多数人的更大的幸福。恰恰相反，国家的利益总是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国家的权力应依赖于领导层，人民追随领袖这一事实为这个领导层提供了合法性。据此看来，领袖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法西斯主义倒成了真正民主的。

根据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学说，至高无上的目的和价值是伟大，而不是平等和入道主义这些启蒙时代的虚假偶像。根据

《我的奋斗》的说法，一个民族是其他民族的天敌，那些有着最大的权力意志、最狂热和最残忍的民族将兴旺发达。在每一个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种族的等级。更高级的统治民族应运实行统治，低等民族要服从，人类的进步将通过保护纯洁的血缘（种族）来实现的。德意志帝国的领导满足了一种普遍的需要，这是万物的自然秩序。因此，德国领导的任何战争在定义上就是正义的战争。德国和法国是永久的敌人，斯拉夫人是一个低等的种族。在德国内部，权力应交给一个领袖和一个从血土中产生的新贵族手中。但如果元首和新贵族不胜任他们的工作，有无办法解除他们的权力呢？在纳粹的学说里，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民族于万物自然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确意识到了民族是一种神话，而不是一种现实。正如墨索里尼在向罗马进军之前不久所说的：“我们创造了我们的神话。神话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激情，民族就是我们的神话，我们其他一切都服从这个神话，这种崇高。”这种学说没有为民主的优美留下任何余地。博爱主义是一种纯粹不相干的东西，主要的目的是为民族的伟大而工作。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就是国家，国家应该支配所有政治的、道德的和经济的力量。

国家不是一种纯粹的仲裁人，为解决冲突着的利益而工作。毋宁说，它有自己的意志；在国家之外，没有任何人的或精神的价值。所以，这就是理想。从哲学的观点看，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并不真正符合法西斯主义的学说，这并不重要。

在很大程度上，法西斯主义根基于1914年以前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是反自由的、反民主的和反启蒙的，远非官方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可及。这种意识形态的气氛也为法西斯主

义提供了温床。它既是资产阶级的，同时又是反资产阶级的；它反对自由社会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保守主义的自我满足。它的最高价值不是追求幸福，而是战斗和冒险。它的口号后来成了：“危险地生活”。法西斯主义赞美自然（按它的理解）、肉体力量、残忍和野蛮。这是青年对市侩作风的反叛，是对平庸、谨慎、宽容、大城市生活的造反。它想创造一种新的人类和一种新的文明（或如德国人所说，一种新的文化）。有些法西斯主义不过是一些希望通过极端的言论赢得广大听众的无名哲学家或一些转向行动者的颓废作家——如巴雷斯或坦农齐诺——的故作姿态和感情抒发。但普遍的不满和厌烦的感觉也是存在着。旧秩序多少起了几年作用，但它几乎提供不了什么精神的指导，不太令人满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个国家的年轻作家都描述了一种窒息感和战争爆发时的一种解放感：积蓄已久，一切都必定要变！

如果不是带来了一场大灾变的话，这种情绪也许不过是思想史上有趣的一章，像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一样。但在战争时期的不确定的情况下，需要一种明确的信念，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来对付意大利和德国这样的国家所面临的许多危险。自由的民主经常是——过去的确是——软弱的和优柔寡断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越来越乐意支持一些政治运动，不管这些运动是不是反民主的，只要它们能够对付危机就行。此外，人们在心理上也乐意接受暴力，而这是战前不曾有的。

有两个问题有待探讨：从对新的紧密结合的群体的渴望，对伟大和英雄主义的梦想，到法西斯主义犯下的罪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19世纪后期的文化批判家的观念和法西斯主义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就像希特勒、戈培尔或施特赖歇尔之流和北欧日耳曼种族的美学理想之间的距离一样大。扩张主义

的和军国主义的学说必定导致冲突。但不能肯定地说，法西斯主义的特有的激进主义是预先注定了的，它的垮台也是预先注定了的。

法西斯主义的哲学鼓吹者的观念并非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错误的。他们既诉诸于基本的本能，也诉诸于强烈的理想主义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崇高的梦想和眼界基础上的。为此理由，法西斯主义吸引了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而不单是野心家、冒险家和社会的渣滓。但在什么程度上法西斯主义领导人是真正相信自己的学说，还是玩世不恭地用它来操纵人民以便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呢？甚至希特勒也并不完全相信早期激进主义思想家关于血土的全部蒙昧主义的胡说，他经常蔑视他们的幻想。他从没有读过罗森伯格的《20世纪的神话》，甚至在一次谈话中竟说：“只有我们的敌人才读这本书。”掌权的法西斯主义者不得不妥协：他们既没有实现他们许诺的完全的社会革命，甚至也没有实现在纳粹思想中突出勾画的“回归于土壤”。纳粹的“实用主义”还同样明显地表现在它同意大利和日本这样的非北欧民族的联盟中，因为这种联盟是很难根据纳粹的种族学说来证明的。

在其他方面，法西斯主义领导人忠实于他们的原则：他们按照民族主义的“神圣的唯我主义”来行事，他们实践元首的原则，他们肯定不会皈依宽容和人道主义。正如有人以为的，他们不是虚无主义者。除非人们承认法西斯主义领导人有一种不管多么违背常情都坚信不移信仰的事业，否则便无法理解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政策。他们的神话，既是一种宣传的计谋，而且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种必定实现的更高的现实秩序的一部分。正如一个种族主义思想家一次温和地所说的那样：“也许我们一直向往的更高级的种族并不真的存在。但我们无论如何

要创造它。”真正信仰者的狂热在德国纳粹主义那里要比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那里更惊人，但它的确在每一个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只有建立在真正信仰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领 袖

没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不会盛行。无论如何，比如在格林领导下的一种纳粹政权和由格兰迪或巴尔博领导的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或许会奉行一条不怎么激进的路线。这样的政权似乎不大可能故意发动战争。德国的右派和意大利的极端派是修正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他们主张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但他们也许不愿冒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这场战争的代价可能太高，而结果太不确定。

在 1922 年的意大利，在 10 年后的德国，出现了对右派专制的有力支持。反民主的政权是在意大利战后的社会危机和德国的经济政治危机的推动下出现的。然而，如果不是出现了一些领袖，这些领袖对自己的使命和给群众注入自己的雄心与情感的能力深信不疑，这个机会也许就会被错过。这种有魅力的人物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因此，惟一地或主要地根据“客观的环境”来理解纳粹现象是徒劳的。不言而喻，如果世界的经济衰退和大量的失业不曾在德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纳粹也就不会有自己的机遇。但这只说明了群众为什么在心理上乐意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和纳粹的观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柏

林-罗马轴心在1941年到1942年近乎取得胜利。当时许多预言家都提出了类似的民族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观点，但只有一个希特勒和一个墨索里尼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机遇。

希特勒在他刚开始政治生涯时被大大低估了，墨索里尼也没有受到严肃地对待。希特勒被看作是一个地方魔王，一个啤酒屋传统的小丑，一个缺乏教育、持久性和合理思想的煽动者。在早年，希特勒的思想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右派的思想。随着他在20年代变得更激进，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思想是牵强附会的和胡说八道的，这些思想没有机会赢得群众的支持。甚至希特勒的右派盟友也说他是一个可以帮助动员群众的“旅行推销员”；一旦既有的右派不再需要他时，就会把他抛弃掉。“我们将把他丢到角落”，希特勒的前辈弗兰兹·冯·帕彭解释说。左派人士认为他是兴登堡的机器人，也就是说，是保守派和反动派的工具。

这些错误判断希特勒的人是一些不承认他的群众号召力的自由知识分子，或一些不像他那样能够理解20世纪群众心理和群众政治的传统政治家。希特勒对群众的号召力根源于民族主义的忿恨、狂热情绪，当然还有他发出的要解决迫切的经济和政治问题、领导德国走向一个安全幸福的未来的诺言。

在第三帝国结束以后，各种关于希特勒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的神话都浮出水面。一种最持久而且最错误的说法，涉及到希特勒的所谓的压倒一切的激情——反共主义——和他对苏联的畏惧。他关于这一主题的反复唠叨，触及了中产阶级心灵和头脑里的某根弦，但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吗？

希特勒厌恶共产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同样肯定的是，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东西。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吗？在希特勒的杰作（《我的奋斗》）中，马克思只出现

一次，列宁根本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希特勒写道“东方的庞大帝国崩溃的时机成熟了”——他对布尔什维克莫名其妙的畏惧仅此而已。诚然，希特勒在他的讲演中无休止地提到“马克思主义”，但他说明他指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指社会民主党人和非社会主义的中间政党。在大多数场合，他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11月罪行”的同义词，是指那些在1933年以前组成联合政府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些政党实际上反共色彩并不比希特勒少。

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大衰退的震撼，使人们感觉到这种制度不管用了，面对前所未有的内部和外部敌人，德国如不恢复强有力的目的明确的领导，就会受制于人。为此目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宁愿牺牲不可爱的魏玛共和国，连同它的人权和民主制度，因为这种民主制度无论如何不是深深根基于德国政治传统中的。

希特勒充分满足了这种对救世主的渴望。他给政治比赛带来了一种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简单的民族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口号，以及要求给他几年时间来实施他的纲领。除墨索里尼之外，他是欧洲第一个使用群众交流新手段的领袖，并且在戈培尔等人的协助下，他的确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活力这样做了。魏玛共和国的领袖是一些幼稚的谨慎的人，缺乏自信心和说服力，而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袖则象征着精力充沛的新一代的出现。

纳粹主义，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一样，表现为青年运动——附带说，意大利的国歌就是“青年歌”。大多数纳粹领导人都在20多岁和30岁。戈培尔28岁成为柏林的纳粹组织首领，成为宣传部长时是36岁。希姆莱成为冲锋队的头子时是29岁。纳粹领导层的其他关键人物同样也很年轻。在意大利，

巴尔博 33 岁当上部长，格兰迪是 34 岁。

人们曾投入很多精力从心理学上研究希特勒的个性，但并没有产生多么新的深刻的见解。施虐-受虐性格在他的思想成塑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他有一个睾丸还是两个睾丸，似乎对他的政治决策没有什么影响。希特勒肯定不是他的早期敌人把他说成的“平庸之辈”，他的行动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性的。他的决策——至少到战争初期的几年——在追求他的无理性的目的过程中完全是有理性的。他是一个赌徒，愿意进行不被认可的冒险，他通常总是匆匆忙忙。他的力量在于他的激进主义、他的残忍、他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不愿意做出妥协。这种极端主义、缺乏常识和一发而不可止，注定导致他的垮台。缺乏一种现实感以及深信权力意志能得到一切，在他的早期生涯对他是很很有用的。但后来它们把他拖入了一场想统治欧洲战争，这也许是而且实际上也是德国力所不及的。对于不属于他的信仰的核心问题，希特勒会进行搪塞，甚至每天都在改变立场。但他并没有背离他的根本信仰。如果他的伟大设计最终完全失败的话，这并不是（他说）由于他犯了错误或好高骛远，而是因为德国人民不配有他这样的伟大领袖。

慕尼黑和柏林政治舞台上的大多数早期观察家都低估了希特勒，而且在希特勒死后几十年，希特勒也同样是被低估的。一个新的历史家学派认为，全面考虑，希特勒是一个“软弱的独裁者”。希特勒经常形不成自己的思想。他支配着一种官僚的混乱，把主动权交给他的走卒们，让他们互相攻击。一些历史学家较温和地认为，官僚和旧精英分子的作用要比以前所假定的大得多，德国的局势出现了某种自主倾向，接二连三，最终使得希特勒不再能够控制局势，成了他启动的过程的囚徒。

历史事实也提供不了论据。一个人是强还是弱（或者是高

还是矮，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是一种相对的表述，因为它取决于使用的尺度。同奥威尔^①的《1984年》相比较，纳粹德国确实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但同历史上的其他制度相比较，它又是一种有效的领导。希特勒不是万能的。他对特殊的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兴趣，的确把主动权留给其他人，特别是在战争爆发以后。有时他表现为一种不情愿的独裁者，也有时他根本不愿被烦扰。全面考虑，仍然令人惊奇的是，他还是进行了大量的干预。随便浏览一下发自他的办公室的指示，便可看到：他命令著名的乐队指挥威廉·弗特万格勒不要参与1938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为准许慕尼黑的居民喝“烈性啤酒”，因而反对有计划地减少啤酒的酒精含量；莱茵河畔的公共场所夜里应当照明；慕尼黑一家博物馆窗户上的铁栏杆不应漆成黑色，而应漆成金黄色；他的助手应穿橡胶鞋；在传媒上不应提到画家格哈丁格；不应让杰出的外国来访者吃罐装蘑菇，因为有中毒的危险（这是在1942年5月！）；不应允许外国人钓鱼；在全德国一间汽车库每月的最高租金应是7马克。此外，他想知道维也纳交响乐团有多少把小提琴（1942年），在德国生产多少人造蜂蜜。他命令不要再上演席勒的《威廉·退尔》（1941年6月），男人不得在餐馆从事服务。除了许多其他的决定而外，他还决定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茨不应成为“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人”，未来应使用“千赫”一词，等等。

也许希特勒关于“不允许外国人钓鱼”的指示在地方上偶尔会被无视，在某些地方汽车库的租金会高于7马克。当然，

^① 奥威尔（1903—1950年），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曾一度信仰马克思主义，后鼓吹社会民主主义，主要作品有反乌托邦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年》。

在很多问题上他的确从没有发布什么指示。然而，有压倒一切的证据表明，在属于他的核心的问题上，例如，毁掉他国内的政敌、杀害犹太人、制定外交政策以及进行战争等，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而且没有人能够长期偏离他制定的路线。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于一个缺少温暖的贵族家庭，两人都没有研究工艺或成为工匠大师，两人都经历了一段流浪时期。在其生命的一个阶段，墨索里尼（像日里诺夫斯基一样）考虑迁移到外国。不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他们都感到肚子不舒服。他们不进行私谈，也都没有亲密的朋友。在他们30岁以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经常改变自己的意见，但很早以来，他们都爱进行激烈的谈话并热衷于暴力，以此作为他们主要的政治武器。两人都祈求神灵，又都是反教会的。两人都是第一流的演说家，但在写作方面希特勒要比墨索里尼逊色得多。

墨索里尼在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以前，曾是一个显赫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他后来逐渐转向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早期的许诺给所有人以自由的法西斯主义纲领，仍表露出社会主义的影响：应给农民土地，工厂应国有化，参议院应被废除，妇女应有选举权，地方应有更大的自主性。反教会的情绪也充斥于早期的党纲中。一旦掌握权力，法西斯主义也就失去了它大部分激进的冲动，但墨索里尼在统治意大利北部（萨洛共和国）的最后一年，公开声明要返回到他激进的开端。

对墨索里尼的崇拜甚至比对希特勒的崇拜更无孔不入。他的称号（领袖）必须用大写字母书写。一段时期，他在政府的13个部长职位中竟兼任了8个。

希特勒曾被德国的媒体欢呼为建筑学上的最伟大的权威，当时以及后来又被欢呼为最伟大的军事领袖和外交家。德国的

致敬语“希特勒万岁”竟成了官方的称呼语，取代了“早上好”和“您忠实的”。墨索里尼的地位是命中注定的，是由神和历史选择的。他是尘世上最伟大的人，是意大利种族的最高化身。他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个巨人，一个大力神，一个神人，一个伟人——不能也不应该用日常的标准来衡量他。他是无限的，像天空或海洋，因此无法形容他或定义他。墨索里尼是尘世上最伟大的记者，甚至是更伟大的演说家。他的演说不仅是伟大的，也是优美的，意大利的青年最起码都要用心学习他的一些演说。他是最伟大的诗人、音乐家（他拉过小提琴）和艺术家。像大力神海格立斯和半人半马神一样，他有无限的工作能力。他是无所不在的和无所不能的，实际上从不睡觉。他的历史使命不限于意大利：他是本世纪的发动机，是给整个欧洲指引道路的历史的声音。群众爱戴他，是因为他完全等于民族。他是不会失败的，比恺撒、奥古斯特和拿破仑更伟大。在几年之内越来越多的神的品质赋予了他。他的出生地普雷达皮奥成了朝觐的圣地。连孕妇都会注视墨索里尼的画像，希望自己的儿子像他一样。这位领袖拥抱盲人，盲人就会重见光明，那些吻他的手的人去世时会很平静。意大利，作为戏剧（和歌剧）之国，在他出现时，便产生出一种浓厚的戏剧性的伪装因素，歌剧式的效果。墨索里尼故意助长这样一种印象，即他是一个优秀的骑手、拳击手、击剑手，甚至是一个飞行员，他也并不掩盖自己经常有的敏感的色情事。希特勒不关心体育，除非体育能提高德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如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对女人的兴趣是非常有限的，他同爱娃·布劳恩的私情一直是对公众保密的。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苦于不断丧失现实感。在墨索里尼那里，这主要是由他周围的人的奉承造成的。他比希特勒更爱虚

荣。希特勒不喜欢花哨的制服，并且不像墨索里尼，他不害怕年龄增长。希特勒过 50 岁生日不是什么秘密，而墨索里尼却不允许意大利新闻界提到他的生日。在希特勒那里，丧失现实感更多地是由于狂热造成的。他天生就不能倾听他不喜欢的消息，他使自己陷入了事实上的孤独之中。不管是纳粹领袖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最高领袖，似乎都对积累金钱没有兴趣；政治权力给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希特勒的口味是俭朴的，墨索里尼也没有什么奢侈享乐。格林在蹲纽伦堡监狱时评论说：“至少我体面地生活了 12 年。”这不会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反应。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民众欢迎呢？这是一个不容易准确确定的事情。法西斯主义政权不允许进行舆论调查，至少所有关于领袖的民情的舆论调查是不允许的。在德国取得了对法国的胜利之后，希特勒达到了民众拥护的最高点。甚至那些对他的国内政策感到不舒服的人和那些害怕引起战争的人，当时也开始相信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的领袖的本能是正确的：毕竟这些胜利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结果证明了希特勒的胆略和政治天才。他是一个能克服一切障碍的领袖，他使德国强大起来，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也会使德国繁荣。

尽管在宣传上大树特树，墨索里尼并没有享受到同样程度的谄媚。他在国内的演说是不怎么引人注意的，他在海外的经历也遇到了困难。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从来没有完全接受他，农民是无动于衷的，工人也不怎么同情他。领袖在国内和海外的全盛期是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初期。那些断言领袖总是正确的人的数目在 30 年代就不再增多了。随着军事遭到挫折，对他的支持也就退潮了。400 种关于墨索里尼的偶像化传记在他有生之年得以出版，有些是诗歌，其中许多是给儿

童来读的。但它们是否对墨索里尼的形象有决定性影响，是很值得怀疑的。然而，在走到终点之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比他们领导的政党更得民意。

这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现象的充分理解，对当代人来说是很难以解释的；在他们死后，对历史学家来说就更不容易了。企图把希特勒描述成歹徒（如在布莱希特的一个剧本里），把墨索里尼描述成一个二流演员，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他们不曾选择政治作为他们的职业，他们或许会作为或多或少守法的公民默默无闻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但他们把自己摆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可以不受道德的约束而推行自己的罪行，从而导致数百万人丧生，最终也使得他们自己的国家毁灭。

企图把他们描述成德国和意大利传统的稍微不正常的政治家，也是不令人信服的。他们没有偷盗、强奸，也没有用自己的手去杀人。毋宁说，他们是大规模的纵火犯，放火不是烧了一所房子，而是烧了整个欧洲——以前有过许多侵略战争，其他政权也犯过大规模的罪行，这并不能为他们开脱。

他们是不是不平凡的人呢？在某些方面，他们是不平凡的人，但他们的才能被熟练的宣传夸大了。即使条件合适，现代的宣传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人兜售给大众。然而，处在危机时期的一些国家具有比其他国家更强烈的选择一个救世主的倾向。这种本能就像人类一样古老，但只有在大众政治和大众交流的时代，它才可能充分起作用。

在分析希特勒的历史记录时，学院的历史学家和德国的爱国者都很难承认他罪大恶极，虽然几乎没有人表现出对纳粹政策的完全支持。有人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充当法官。然而，如果事关一个人杀了其他一个、两个或三个人时，是不难做出判决的。如果一个人对杀害成千上万或数百万人负有责

任，显然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行事的，他便是一个被存在的理由驱使的历史人物，则应该用其他标准来衡量他。有些思想学派在传统上不强调个人的作用：如果第三帝国有罪行，那么，德国社会或至少统治阶级应当承担罪责，而不是领袖。然而，也有人认为，应把希特勒的全部记录都考虑在内，不能否认希特勒是某种现代化者，墨索里尼命令整治了庞廷的沼泽，并且使火车正点运行。

使德国爱国者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他们如何解释一个头号罪犯在个人谈话和演讲中竟能发挥如此之大的说服力？回答是，希特勒在他的演讲中并不讨论他的滔天罪行。如果他在1932年至1933年就宣布他想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制造几百万牺牲品和难言的苦难，他就不可能当选。另一方面，大量的德国人也愿意把他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交给一个其目的至少是可疑的冒险家。因此，解释希特勒现象的尝试，必须不仅考虑到个人，也要考虑到那些支持他的人，考虑到发生这一切的特殊形势，以及以前没有的新的宣传和控制手段。这些考虑也适用于墨索里尼，尽管他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

领袖的原则是不是所有法西斯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呢？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或一种政权是由一个委员会领导的，这个委员会中的一个成员是同类中的居首位者。但没有一个这样的先例：在所有迄今为止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领袖的个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非所有领导人都具有同等强有力的和有魅力的个性，如果需要的话，其中一些人是可以置换的。但是同以前的专制形式如军事统治相比较，作为一种制度和作为一种象征的领袖，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本质部分，是它的特点之一。

国家与党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掌权后，清洗掉了所有其他政党，他们的运动垄断了政权。但希特勒的和墨索里尼的政党的作用一点也不像普遍认为的那么重要。进行统治的不是党，而是元首和领袖，他们的助手，所有官僚。最终有 800 万德国人加入了纳粹党，但由于这个数目太大，党员也就不是很有意义的。那些人入党的人获得了某种职业的优势，但一般说来党的作用是充当自上而下传达命令的传送带。

在意大利，党就更不重要了：1932 年法西斯党有 100 万党员；1939 年有 260 万党员；在 1932 年，几乎在通过法律后，使得公务员入党成了强制性的。在 1932 年，几乎所有老的法西斯战斗团，都从实权的岗位被清洗掉了，墨索里尼作为国家的首脑而不是作为法西斯主义领袖（这是他的第二个称号）统治了国家。的确，群众被“动员起来”，不是为了积极地参与政治，不是为了街头战斗，而是为了参加偶尔的示威游行，为了不时地倾听教诲，参加类似的盛大集会。掌权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为充满着战斗精神和不妥协意志的狂热追随者的好战运动的自我形象，同现实的状态之间出现了奇怪的裂隙。到 1942 年，法西斯主义党有 470 万党员，2500 万意大利人都加入了某种法

西斯主义组织，但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统计。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掌权，不是通过一种武装斗争，而是实行政治阴谋诡计的结果：“民族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神话。并没有什么“向罗马进军”^①。墨索里尼是乘坐铁路卧车到意大利首都的。希特勒是在弗兰兹·冯·帕彭、他的儿子奥斯卡及其他身居高位者的干预下，应兴登堡之邀来组织政府的。由于希特勒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政党的领袖，也就形成邀请他的事实。墨索里尼的第一届政府是一种联盟，除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参加了；希特勒也和保守党人结成了一种联盟。

除了这一点而外，这两种制度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就谈不上了：在4个星期之内纳粹分子接管了警察局，通过了紧急法案，掌握了全部权力。共产党领导人立即遭到逮捕，社会民主党尽管是在1933年7月正式被禁止的，但在4月就不存在了。在6月和7月，所有其他政党都消失了。保守党的头子阿尔弗雷德·胡根伯格在6月也离开了内阁。尽管一些非纳粹的“技术人员”继续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府，但他们没有任何实权。纳粹的接管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国会通过了法律，使得这种专制成了符合宪法的；其他政党并没有同这种专制斗争，而是顷刻溃散；国会放弃了它以前拥有的任何权力。

在意大利清除对立面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在1922年10月“向罗马进军”之后的几年，这个国家仍然有相对自由的新闻界。因此，在社会党领袖吉亚科莫·马特奥迪被法西斯主义

^① 1922年10月27日，墨索里尼在金融资本集团、王室和教会的支持下，下令“向罗马进军”。第二天武装的法西斯匪徒开进罗马，并没有遇到军队和警察的任何抵抗。国王遂即任命墨索里尼组织政府。作者此处的意思是说，“向罗马进军”不同于流血的军事政变——译者注。

暴徒杀害之后，意大利的报纸仍能写道：“我们的这个首相要对普遍的罪行负责。”只是在这次谋杀之后，对立面才实际上被压下去了。意大利社会党人是在1925年10月被禁止的，其他政党一年后继一次行刺墨索里尼之后被清除掉。这些政党已经被骚扰很长时间了，官方的禁止只是使存在一段时间的事态有了一个正式的法令而已。然而，纳粹分子却是一下子粉碎他们的敌人的，而墨索里尼则是用计谋挫败并逐渐清除对手。他的方式更类似于1945年到1948年东欧共产党人实行的色拉米香肠策略，而不怎么类似于希特勒的策略。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他们统治的初期，都感觉到了来自他们的运动内部的“极端主义”因素的威胁。对希特勒来说，“民族革命”是通过解决其他政党来完成的。对墨索里尼来说，它结束得甚至更早。但对恩斯特·罗姆和冲锋队的其他领袖来说，“第二次革命”使伟大的社会转变即将到来。冲锋队战士打算以非常广泛的民兵形式把冲锋队并入军队中，使他们成为第三帝国的统治力量。希特勒面对这种对他的权力的挑战——1933年到1944年间惟一一次严峻的挑战——1934年6月30日杀掉了冲锋队的头子（以及其他与这件事无关的人）。几周之后，1934年8月2日，在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除了已是总理和元首之外又成了德国的总统，他的权力成了绝对的权力。

虽然冲锋队继续存在，但它已不再是纳粹体制中的一支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力量。随着冲锋队的影响开始衰落，党卫军开始兴起，这是由兼任警务部长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的一个精英组织。党卫军的领导及其大多数成员是中产阶级，这同冲锋队的“平民”特点形成了对照。党卫军除了建立它的情报机构而外，还管理着警察和各种企业。在战争期间，它有自己的军事组织，由德国人和非德国人组成。最终党卫军成了一个国

中之国，负责集中营和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党卫军尽管大权在握，却从不梦想反对希特勒的决策。它是他的禁卫军，甚至随着希姆莱部长的责任增多——在战争期间他还是内务部长——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周，他仍自认是希特勒最忠实的追随者。

意大利没有任何组织可以同党卫军相媲美。法西斯主义党内部的清洗是非常平静地进行的，没有流血。在法西斯主义的初期，地方上的法西斯主义首领在政治生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的活动和党中央的领导之间几乎不协调。他们还老是彼此争吵。甚至在向罗马进军之后，这些地方首领还在继续争论谁应当负责组织和教育青年一代、企业的角色、文化生活的控制和其他许多问题。墨索里尼深信党不再是一个合适的政治控制工具，认为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腐败的。从20年代后期开始，权力从党的手中交给了国家机关，通常是地方长官和警察局长手中。有一年，党员都去找地方书记，改变自己的党证，他们都会参与群众游行。但一般说来，党员身份不再是特殊的要求。在意大利的几个地区，特别是南方，法西斯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在其他地方，党仍然具有某种授予官职的权力，但许多成了国家机关官员的法西斯主义者，是和国家而不是和党保持一致的。

在纳粹德国，党的作用是更关键的，因为党的领导人的作用在中央和地方的层次上都是重要的。希特勒周围的人，除极少数例外，都是坚定的老党员。希特勒仇恨官僚，他只使用专家从事具体的任务。正如希特勒有一次所说的：纳粹党深入到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车间、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城镇和乡村。很少有德国人不积极参加党建立起来的这个或那个卫星组织，如劳工服务组织、妇女联盟、摩托化飞行队、希特勒青年团以及律师、教师、医生、学生的联盟和其他许多组织。德国

党比 PNF（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党）组织的好得多。纳粹党的党员是根据其居住地分区组织起来的。纳粹党的作用是动员群众，确保“领袖的意志深入到社会的所有成员”，另外如罗伯特·利一次所说，党要成为“从不失误的地震仪”，“记录哪怕最弱小的运动、激动、不满或赞成。”

事实上，元首的意志并没有深入到每一个德国人，而且最高领导层也没有大量使用它的“地震仪”。毋宁说，纳粹德国在秩序、调停和一致的表面背后有大量的混乱和冲突。有时希特勒对自己的决定不坚定，各个层次上的党的领导人争论不休。有时官僚和党之间出现公开冲突，来自高层的命令被无视甚至破坏。但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这种混乱和反叛很少发生。如果元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不服从就要冒很大风险。希特勒对军队的掌握要比墨索里尼有力得多。德国不会有巴多格利奥^①。

如果说有对希特勒的权力的某些限制的话，这也只是证明了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东西，即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控制一个大国，他总是要依赖于他选择的助手。如果他放权，甚至那些以同样的热情信奉同样的意识形态的人中间也肯定会磨擦并且关系紧张。因此，戈培尔的野心同格林的野心相碰撞，甚至这些党的最高级领导人也害怕希姆莱和博尔曼。有些曾在运动初期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由于无能而靠边站，或出于其他理由而成为障碍（施特赖歇尔、罗森伯格、赫斯）。

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在意大利，法西斯党从一开

^① 巴多格利奥（1871—1956年），意大利首相（1943—1944年）。1919年任陆军参谋长，1926年升为元帅，在法西斯党执政期间曾两任参谋总长。1943年7月继墨索里尼组阁，9月与盟军签订停战协定并对德宣战，执行亲英、美的政策——译者注。

始就是两大集团——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民粹主义者——的联盟，这两大集团为向领袖争宠而争斗。激进的领导人如斯科扎和法里纳西一直是法西斯主义党的首要分子，即使多年来他们不再有任何影响。

纳粹和法西斯主义专制掌权时间越长，它们就越来越成为一个人的专制。很少以公民投票的形式进行选举，而且在选举中惟一的选择就是说“是”还是“否”。1933年11月有95%的投票者支持德国退出国际联盟^①，1934年8月有90%的人投票支持总统和总理职位合一。1938年，在德国并吞奥地利之后，99%的人投票支持纳粹分子，而且参加这次选举的人口比例高达99.6%。在意大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1924年法西斯主义选举团在535议席中得到374席。这些是或多或少规范的选举，后来就只是公民投票了。

德国的国会和意大利的国会很少开会。1934年德国国会召开了3次会议：1935年2次，1936年1次；从1936年到战争结束总共11次，通常都是听元首关于德国并吞奥地利的宣告和各种战争宣言。内阁会议的次数也急剧减少（1933年70次，1935年11次，1936年1次，此后没有）。在希特勒看来，这些会议都是浪费时间。设立各种部长的职位是为了执行领袖的意志。但是由于不召开任何会议或进行商量，元首的意志就成了一件任意解释和思索的事情，结果经常是官僚的混淆、不确定和重叠的弊病。于是到了1940年，一切和保卫德国无关的新法律都被暂时搁置了。

这种下放权力的失控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一个强有力的

^① 国际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根据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建立的国际组织，旨在促进国际和平与维护世界和平，总部设在日内瓦，于1946年解散，其某些职能由联合国取代——译者注。

部长会议扩张他的权力，从而引出新的管理问题。因此，格林的职责是制定“4年计划”的首领，至少在理论上成了经济的主宰。但他还是空军的最高指挥官，涉猎外交事务，有他私人的情报机构，监视无线和有线通讯。当格林的影响衰落后，阿尔伯特·斯佩尔负责了战时生产。戈培尔起初是宣传部长，后来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和行政权力。

从20年代后期开始，意大利的国会就没有再起重大的作用，在1939年就彻底解散了。“伟大的法西斯主义国务会议”由12个成员组成，是墨索里尼在一些场合利用的，如1938年宣布他的反犹太人的措施，但在其他场合又不利用，如意大利介入战争。只是到了意大利在战争中失败后，国务会议才突然宣布自己的权威，在1943年的一次著名会议上罢免了墨索里尼。这是国务会议4年中的第一次会议。

在德国根本没有纳粹最高国务会议，只有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年度大会。这些大会是希特勒进行炫耀和冗长讲演的场合，无意进行任何政治讨论。在纳粹党的初期，地方领导人偶尔聚会，但从1934年开始他们就成了彼此完全孤立的，甚至禁止两个以上的人聚会。

在理论上是由一个无所不知的和无所不能的元首实行绝对的统治，但既然元首和领袖不可能是无所不在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多头政治的”。由于官僚的出现，这种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官僚尽管遭到党的领导层很大怨恨，但却是统治这个国家的根本。虽然许多官僚分子加入了纳粹党，但官僚却有它自己的生命，所以那些加入党的人首先是适应自己的新职责。意大利从没有成为极权主义的国家，因为教会保持着自己的权力，君主制度也没有被清除掉。

在法西斯主义盛行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权力范围被估

计过大，原因仅仅是承认在这样的社会中有冲突和分歧。最近有一种倾向，夸大这种专制中政治无序的程度。即便法西斯主义政权根据自己的标准也是非常不完善的，它们仍然非常平稳地发挥职能。它们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如果它们不是在军事上失败的话，或许它们会继续掌权更长时间。

法西斯主义与教会

法西斯主义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态度经历了从紧密合作到反对和迫害的转变。一些集团，如比利时的保皇主义者和罗马尼亚的铁卫军，从教会中得到鼓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统治着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政党一样。德、意两个大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却不怎么平稳，为了使一种复杂的形势更混乱，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政党队伍内部在对教会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别，有宽容的，也有近乎完全拒绝的。

在早年，墨索里尼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有他的反天主教的小册子《胡斯的生活》和《红衣主教的主妇》为证。在许多场合他还指出，天主教不仅从知识的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他起草的法西斯党的最早纲领（1919年）提出要没收教会的财产。然而，后来墨索里尼最终认识到教会对意大利生活的巨大影响，他逐渐转向同教会妥协。

墨索里尼的和解政策在1929年的拉特兰教堂条约中达到了顶点，按这个条约解决了烦扰着它的“罗马问题”，承认梵蒂冈的治外法权地位。而天主教会也表示愿意同法西斯主义政权合作，这进而又承认了天主教是“统治性信仰”。尽管不时出现过冲突，但总的说来，这种布局是起作用的。天主教徒抱

怨，他们对教育的兴趣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天主教行动（一个世俗的天主教徒组织）尽管“在政治之外并超越政治”，仍然偶尔受到骚扰。法西斯主义者指责这个组织干预政治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按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政治不仅指严格的政治活动，而且也指所有社会的和文化的联系。

所有这些活动都应受到国家的控制，而不是教会机构的控制，最终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妥协：天主教行动按地区而不是在全国进行重新组织，它许诺除非出于纯粹宗教的目的，不从事任何活动。尽管在墨索里尼看来走得不是太远，但这对教会来说是一次挫折。从法西斯主义的观点看，这种妥协仍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加强了天主教组织对政权的支持，天主教组织既为国王也为领袖祈祷。教皇本人一再称墨索里尼是神圣的天意派来的人，对墨索里尼对外的政治冒险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甚至在30年代的冲突中，教会的抱怨也不是针对法西斯主义本身的，而仅仅是反对它企图剥夺教会的特权。

一些法西斯主义领导人物采取了比墨索里尼本人更强烈的反教会路线。例如，像罗伯托·法里纳西这样的前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吉奥万尼·金泰尔。金泰尔是墨索里尼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他的著作被梵蒂冈列入了禁书目录。像纳粹德国的更极端的反教会的意识形态家一样，这些人出于政治的理由而弱化了他们的反教会的路线。不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个人持什么观点，他们本能地知道，不成熟地发起文化战斗是愚蠢的。尽管长远看来这种冲突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两人都有更迫切的重要事情要做。

比起墨索里尼来，希特勒更少反教会的情绪。尽管希特勒不是一个实际上的天主教徒，但他经常表现出对某种“积极的基督教精神”的偏爱。尽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只提到上

帝两次，但他从不提同教会的对立。的确，他最初的一次重大的对外政治行动，是1933年7月同天主教会缔结条约。

然而，纳粹党后来同教会的关系却不如意大利那么平稳。原因既有学说上的，也有实践上的。关于德国种族的符合上帝意志的至上性的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所有观念，同教会主张的不管是什么种族都保佑所有人的愿望是不相容的。尽管教会并没有一直实践它的爱和怜悯的戒律，但它肯定不会完全否定这些东西。此外，天主教教会具有它的国际性的意义，这在纳粹眼中是十分讨厌的。德国的主教可以是德国的爱国者，但教会本身却不可能成为德国的。而且纳粹分子把自己的作用看作是一种政治教会，一种世俗的宗教，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严肃得多，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必定导致碰撞。

从纳粹的观点看，新教几乎没有什么麻烦，因为它是德国的，在1933年以前曾给予纳粹主义大量的支持。在1933年后，德国的新教分裂成几个宗派，其中亲纳粹的“德国基督教徒”和忏悔教会是最重要的。其他新教徒抵制像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那样的激进的反基督教徒的学说，因为这些人忽视旧约全书并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北欧宗教。这些新教徒也反对所谓的基督教纳粹分子，因为他们想用阿道夫·希特勒的启示来取代《圣经》中上帝的启示。根据纳粹的学说，国家宗教凌驾于各宗派，独立于一切宗教教条。据此看来，基督教教会应毫无问题地接受党和国家的权威，因为它惟一关心的是拯救灵魂。然而，纳粹主义的长远目的不仅仅是毁灭教会，而且还要消灭任何意义上的基督教宗教。

因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尽管纳粹德国的教会领袖支持希特勒的政策，并且抓住任何机会表达对新国家的忠诚，但教会在1933年到1939年间还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然而，在

更激进的纳粹新闻机关，教会领袖经常被指控为叛逆和破坏。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垮掉了，它的社会组织解散了，个别教士遭到逮捕。

尽管教会支持希特勒及其政策，但这种支持是有限的。例如，教会可以支持纳粹的对外政策，但它不能容忍纳粹的优生学的从强制性绝育到无痛苦死亡的政策。虽然教会在犹太人问题上保持沉默，即使教会显然提供不了太大的帮助，但它还是为犹太出身的基督教徒感到担忧。

甚至在1939年后教会和纳粹领导层之间也没有出现公开的对抗，这也不是因为希特勒改变了对教会的看法。毋宁说，希特勒服从于名誉上的政治迫切要求：在战争期间一切都要服从于民族的团结。戈培尔一直是纳粹激进派的领导人，但他一再重申在继续进行战斗时不应开辟第二个（国内的）前线。在纳粹最终胜利后，对教会最后清算的时机才会到来。结果，教会在纳粹的统治下做出了重大的让步，这在后来对所有基督教信徒都是一个痛苦的话题。但毫无疑问，长远看来，即使做出这些妥协也是不够的，因为在纳粹的未来国家，教会不完全退位是不行的。

然而，纳粹的例子不是法西斯主义和教会之间关系的惟一类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独立的”斯洛伐尼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德烈·希林卡和他的后继者约西普·蒂索是教士，然而这个国家却同纳粹德国密切合作。斯洛伐尼亚的精神几乎惟一是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精神。它的最高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民族自主，而不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在当时国际格局中斯洛伐尼亚亲近德国，是为了在纳粹的保护下达到这一目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另一种不同的环境里，斯洛伐尼亚会成为一个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

西班牙和克罗地亚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教会在佛朗哥的西西班牙占据着相当有势力的地位。西班牙政权是保守的军事专制的政权，而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尽管教会是反动的，但它只是这个政权的几种政治因素之一。在独立的克罗地亚，先于法西斯主义出现的一种分裂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做出很大努力模仿法西斯主义建立国家。宗教是官方的乌斯达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为它曾是克罗地亚民族复兴的一个根本部分。教会由于把罗马天主教徒同正统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分离开来，从而成为更重要的力量。尽管梵蒂冈不时地抗议乌斯达莎政权强迫皈依和屠杀非天主教徒的政策，但地方教士却支持这些政策。安特·帕维里克并不依附于教会，但他和他的同事在整个统治时期仍极力同教会保持良好关系。然而，克罗地亚同教会的关系却不如在斯洛伐尼亚那样亲密。

铁卫军在罗马尼亚的地位不是那么简单。宗教动机在它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上起了首要的作用。它从罗马尼亚的下层教士中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然而，同时人们有理由认为，铁卫军的神秘主义和宗教仪式只是类似宗教的。也就是说，它们有宗教的根源，却用于不同的目的。可以把铁卫军看作是一种宗教复活运动，但它的实质却一直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宗教的形式多于内容。此外，它的高尚的唯心主义信条和它的政治实践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它的政治实践类似于强盗行径，而不是宗教的怜悯。

总之，法西斯主义者尽可能避免同教会发生冲突。这在教会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些国家里，同教会的合作是平稳的，但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迟早要同教会碰撞，因为它的思想同教会学说有根本的区别，因为法西斯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救世主使命感的世俗宗教。由于法西斯主义想统治

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它便不能容忍一个敌对组织的活动。假如法西斯主义持续得更久并且在更多的国家里掌权，这种冲突就会更明显。

这是关于我们应听命于上帝还是应听命于恺撒的古老问题，这一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在过去通过调和和妥协能够实现共存，而在大规模极权主义运动的新时代，这成了一个很难解决而且只能短时期解决的问题。既然在极权主义时代，恺撒想让那些过去按传统权利不属于他的东西也屈从于他，长久的调停也许就不可能了。

工人和农民

在某些国家取得成功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对数百万农民和工人的吸引力是什么？它未能深入其他地方的原因是什么呢？在 30 年代，对阶级分化的宣扬比 90 年代更强烈。在 30 年代，体力产业工人要比 60 年后更多，农场主或农民的数目也比今天多许多倍。

纳粹党是以拯救农民为借口掌权的。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表现却很暧昧。他们维护地主，但又依靠难驾驭的无地农工从事惩罚性的冒险。农业在意大利的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比在德国大得多。在 1936 年，差不多一半雇工从事农业劳动（在南方占 60%），农业是意大利经济最重要的部门，占全部出口的 44%。因此，很难想象法西斯主义不实行一种广泛的农业政策。

起初，纳粹的农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甚至是靠情感驱动的。农民应该受到更好的对待，他们还应得到新的地位。对纳粹分子来说，农民体现着德国传统中的一切健康的东西——他们是民族的生命源泉，他们的力量是北欧种族之所以纯洁的根本。然而在后来几年，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就没有太大差别了。

在其初期阶段，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许诺要分解大农场，会有更好的市场和更高的价格。虽然大农场没有被分解，但高价格肯定流行开来了，大多是以消费者的损失为代价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都极力提高国内粮食生产——意大利搞了“粮食战斗”，德国搞了生产战斗。这两个国家都力图自给自足，主要是为战争做准备；这两个国家都有极为复杂的控制和定价制度。要告诉农民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交到哪里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意大利的农业政策是一种计划经济。农业公共部门成长起来，在制定粮食价格的原则上没有什么特别“法西斯主义”的东西。纳粹对农业的惟一特殊的贡献是引入租地保障制度。这两个国家制定和重新制定的以及东欧在战后制定的宏伟的长远计划，当然都没有得到实现。

在纳粹的农业政策中，农民民俗学的提倡者瓦尔特·达莱的浪漫同情感和右翼绿党的鼓舞，已经让位于赫伯特·贝克更实用的方式。J.E. 法夸尔森写道：“在希特勒看来，出于实际的原因，农业公社是重要的。它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产出了粮食和军事物资。从1937年开始，随着这些考虑开始优先于‘血土’政策，达莱开始失去他以前所具有的影响。”希特勒需要飞机、坦克和枪炮，不管他对德国血缘的种族健康有什么样的感情，农业都生产不出战争物质。因此，尽管希特勒起初误认为工业化和大城市生活导致民族死亡，但当战争就在眼前之时，他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了工业上。只有一个强大的重工业，才能为世界权力创造基础。据此看来，农业的作用必然是第二位的。它应提供足够的粮食，这样国家才不至于依赖从外国进口。

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确成功地提高了农业产量，平均收入也增加了，当然比官方宣传鼓吹的要少得多。同50年代

德国和意大利的农业相比较，纳粹统治下的农业进步是非常缓慢的。不管墨索里尼怎样吹嘘，意大利农民的悲惨命运并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意大利农民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德国人或许更积极一些，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是压倒一切的支持。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得到农民的有力支持，法西斯主义者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动员农民。在一些国家，如奥地利、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在农村的追随者不多，但它略逊色于基督教——社会党或传统的农民政党。只有一个政党主要从农村得到了支持，这就是芬兰拉普阿党，它的全盛期是1929年到1933年。但芬兰显然是一个例外，因为多年来对芬兰共产党的大部分支持也来自北部的农业（和林业）地区。拉普阿党想寻找一个芬兰的希特勒，拼命反对议会民主。它不是一个保守的党。它进行了武装反叛。它主张建立一个更大的芬兰。总而言之，拉普阿党是一个不典型的例子。所以，研究这一运动，也许更有益于理解现代芬兰的倾向和重点，而不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动力。

北欧的其他一些法西斯主义政党，如挪威的维德昆·吉斯林^①的国民议会和丹麦的党，也得到了一些农民的支持——在有负债农场主的挪威东部，在北部的石勒苏益格。但其数目无论用什么标准看都不大，主要是充当一种反对票。简言之，30年代在欧洲的农业中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但在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没有起重大的作用。

关于法西斯主义对产业工人阶级的态度，曾有过各种不同

^① 吉斯林（1887—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挪威傀儡政府首相，1945年5月挪威解放时被捕，10月被处死——译者注。

的解释。有人认为，一切法西斯主义运动本质上都是反对工人阶级的，这种反革命的职业就是它们惟一的存在理由。它们破坏了工会。它们建立（或者维护）一种剥削制度，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工人阶级的地位并没有改善，只是靠虚假的宣传加上残忍的恐怖才使得工人保持平静。这种说法有一些真实的东西：独立的工会被解散了，工资被冻结了，许多纳粹的宣传都是欺骗性的，包括这个党的名称^①。

法西斯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就是反对阶级斗争。德国和意大利的“左翼”法西斯主义因素或迟或早都被压制下去了。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人中间几乎没有出现公开的挑战，也没有太多的直接抵抗。如果人们认为纳粹的许诺一个也没有兑现，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只不过是空无内容的蛊惑性口号，那就很难解释这种现象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军事工团主义传统。尽管他们把国际无产者的团结的概念当作一种纯粹的虚构而拒斥，但他们也反对工头主义，并从事罢工活动。这导致坚持自己自主性的法西斯主义工人社团同法西斯党的冲突，因为法西斯党想把这些社团变成政府的纯粹的行政工具。这一冲突的解决至少在理论上要靠建立一种共同国家，连同其关于禁止罢工和关闭工厂的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在德国，劳工阵线及其劳动法规的形成，依据的是元首的原则，并且结束了工人阶级的独立行动。

纳粹主义幸运的是，它是在德国大规模失业达到高峰之后掌权的。在接下来的4年里，通过一种关于公共劳动、充实军备和工业复苏的纲领，所有失业工人都重新就业了，而且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快。这个政权欢呼这一成就是极大的成功。

^① 德国纳粹党的全称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译者注。

即使实际工资的增长不大——在有些产业比其他产业更突出——新的安全感也的确产生了实质性的政治影响：在包括左派领袖在内的民主领袖失败的地方，希特勒却成功了。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工人福利方面的成就更少一些。事实上更引人注意的是，官方的工资指数停留在 20 年代后期公布的水平，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掌权 6 年里的实际工资比西欧的任何地方都低。1936 年墨索里尼声称，繁荣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人类（意指意大利人民）将有更低的生活水平。为了补偿这种难以捉摸的繁荣，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在给群众的小恩小惠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就像纳粹德国做的那样。

每一个德国工人都被许诺有一辆轿车，但到第三帝国跨台时大众汽车公司也没有准备好。相反，从 1933 年到战争爆发，假日加班的次数成倍增加。游乐健体对那些从没有到国外度假的工人来说，意味着乘坐锃亮的新轮船去海外旅行，以及去德国胜地短途旅行和参加各种文化活动。雇主并不欢迎这些小恩小惠的代价，他们总是同纳粹党及其像劳工阵线这样的作为调停者的机构发生冲突。不管是雇主还是工人，对这些新安排都不高兴，其结果在工厂的早期选举中表现出来，纳粹候选人有时遭遇很惨。由于 1933 年后相对衰退，产业工人从没有积极参加纳粹党。然而，在工人阶级中很少表现主动的不满情绪。某些关键产业（如采煤）的产量在 1933 年到 1939 年间增长了一倍，工业做出的大量的战争努力——尽管快到战争结束时有空袭和其他混乱——表明，从纳粹的观点看，工人为祖国尽了自己的义务。

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经济表现比纳粹德国更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20 年代工业产量增长一倍，但它的起点却是很低的。在 30 年代，工业只有了微不足道的进步。在 1937 年，工业产

值第一次高于农业产值，但从 1929 年至 1939 年间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当然在战争时期也不会有任何进展。在 1935 年实行了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这不是出于关心工人阶级的健康，而是为了对付失业。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还引入了适度家庭津贴和医疗保险制度。尽管法西斯主义工会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劳动和平”，但这仅仅意味着保护他们协商并不利于工人的契约的权利。因此，法西斯主义者在工人阶级中间的成就是混合性的：工人不断抱怨法西斯主义的家长式统治和它经济政策上的普遍无能。他们进行骚乱甚至罢工，在战争期间意大利北部中心的罢工占了很大比例。同时工人阶级的不安定构成了对政权的严重威胁。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缺点，法西斯主义工会都像这个政权一样尽职尽责。

欧洲的一些较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得到了工人阶级相当大的支持：工人在匈牙利的箭十字党的成员中占 40% 至 50%，他们还积极参加了法国法西斯主义。各种情况的理由是不难找到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主要限于熟练工人。由于非熟练工人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家园，箭十字党便在他们中间获益匪浅。在法国，主要是巴黎工人中追随雅克·多利奥特的人使法国法西斯主义有了无产阶级的基础。西班牙的长枪党在其初期也表现为左派，它的早期支持者中有 50% 是工人。

这种“工人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像农业法西斯主义一样，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尽管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许多工人阶级党员和支持者，但它们的力量却在于它们对所有阶级的号召力。然而，一旦掌权，法西斯主义者就破坏工会，使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利益服从于更高的民族野心，主要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法西斯主义的最高目的是把工人阶级“重新纳入”民族主体，从而结束阶级战争。只靠宣传口号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

的。即使法西斯主义者不愿意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更不用说社会革命，他们也应该改善产业工人的命运，以使产业工人感觉到同过去相比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已有所改善并继续改善。尽管工人在法西斯主义未来的国家里不起领导作用，但他们仍然是社会的一个根本部分，所以应当受到重视。只有这样，法西斯主义政权才或多或少取得成功。也就是说，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工人并没有积极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恐 怖

法西斯主义运动作为反对党时利用来自下层的恐怖主义，掌权后实行了来自上层的恐怖主义。在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中，暴力一直起着核心的作用。如果不使用暴力，法西斯主义就得不到权力，或者说即使夺取了权力，也不能保持住它。正如墨索里尼一次写道：“社会党人问我们的纲领是什么？我们的纲领就是砸碎社会党人的脑壳。”很少有像罗马尼亚那样的例外，法西斯主义集团在他们夺权的斗争中使用的是群众的暴力，而不是个人的恐怖。墨索里尼还偶尔利用恐怖主义进行暗杀。群众暴力意味着街头的统治、惩罚性的远征，以及破坏和摧垮敌人的集会。反对者遭到殴打，一些人被杀害。法西斯主义者还把强迫他们的政敌喝蓖麻油作为一项发明，使政敌丢脸，以此取乐。特别是，存在着大量的武力威胁：一旦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掌了权，人头就要落地。

武力的威胁像暴力的使用一样是重要的。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党有法律范围内的行动自由，而在法西斯主义政权下却没有任何这样的自由：惟一允许的活动是国家赞成的活动，也就是符合纳粹利益和法西斯主义秩序的活动。没有任何反对国家的事情，没有任何脱离国家的事情，没有任何国家之外的事

情，就是墨索里尼定义的极权主义。但现实落后于学说，比起德国来，在意大利尤其是这样。

在法西斯主义政权下没有任何独立的司法。相反，如希特勒在 1934 年宣布的，党统治着国家。如果盖世太保不满意法庭表现出的宽厚——在最初几年有这样的情况——就把受害者打发到集中营去。前苏联的劳改营的犯人同德国的犯人之间的基本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被判决的，而后者却是无限期地被“保护性监禁”。根据 1936 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法庭不再能控制盖世太保，这事实上是自 1933 年 3 月以来没有过的。

在初期，集中营是混乱之地。人们进进出出，一些人被杀害，另有人关了几周后被释放。1932 年德国监狱有 3.7 万名犯人；但到 1935 年竟有 17 万名犯人，其中 5 万人是政治犯。这些人并不包括关在集中营的人。集中营是在混乱开张之后加固的。一个有 1100 人的特殊单位，党卫军的骷髅头分部，负责 KZ 群岛，这是标志集中营的缩略语。犯人的数目有起伏。在 1936 年至 1937 年冬季，数字减少到不足一万人。但在打砸抢之夜后，数万犹太人被集拢起来，但大多数在一两个月后被释放。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有些人能够迁移走，而其他则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死掉了。

当战争开始时，集中营大约有 3 万犯人，在战争期间人数急剧上升，塞进来许多外国人。1945 年 1 月，20 个主要的集中营里有 71.4 万犯人，有 500 个分支。德国主要集中营的名称——达豪、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奥拉宁堡、拉文斯布吕克、茅特豪森——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尽管这些集中营的首要目的不是杀人，但实际上被杀掉的人比例很高：达豪杀掉 3.4 万人，布痕瓦尔德杀掉 5.6 万人，茅特豪森杀掉 10 万人以上。此外，灭绝集中营或死亡工厂——奥斯威辛、马伊达内

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都位于德国境外，在那里几百万人被消灭掉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最终既是一个劳动集中营，也是一个灭绝集中营。

这个数目并没有算上特别行动队主要在东欧杀掉的几百万平民，以及被杀害或饿死的几百万战俘和苦工。其中包括 330 万前苏联战俘。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进行过几次战争，但纳粹对平民的屠杀却是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的。

谁是国家的被迫屈服或肉体上被消灭的敌人呢？首先，是反对纳粹掌权的政治活动家，那些在 1933 年后极力继续进行活动的人受到了特殊残酷的对待。此外，纳粹有各种各样的不可取的宗教人士——特别是犹太教徒、一些天主教徒和一些新教徒。同性恋者（不是女同性恋者）和“种族上低等的人”，如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也成了靶子。此外，纳粹在战争期间还力图毁灭被占领的斯拉夫国家的民族。对德国的那些被发现有罪或被怀疑破坏士气的人，纳粹也给予他们残酷的惩罚：在战时说一个反纳粹的笑话或收听外国电台广播，都足以被处死。

恐怖不仅表现在肉体的暴力上。被占领国受到全面劫掠：它们必须给驻扎的德军支付养护费。它们必须为德国工业和农业提供人力，提供食物、原料和成品。纳粹从没有许诺给被占领的东欧国家付钱，但在西欧，纳粹的政策至少抽象地说是更抚慰的。贸易条款由德国当局确定下来，德国当局的确许诺付钱——在战后——或提供商品交换。在战争结束时德国欠了法国 85 亿马克，欠荷兰和比利时大约各为 60 亿马克，丹麦稍微少一些。

在使用警察方面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差别：在德国政治警察是由纳粹精英管理的，而在意大利则是被训练有素的官僚控制的。意大利政治警察的头子是阿

图罗·博奇尼，波洛尼亚的一个前长官和旧学校的一个官僚。博奇尼不像他 30 年代的纳粹同事，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预防而不是迫害。意大利政治警察的行动比起盖世太保的行动来，是更可预知的，而且更少个人的，嫌疑人有时得到了谨慎的警告。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实行的强制居住，同纳粹的集中营相比还是宜人的。在意大利因政治原因被杀害或被处死的人数，根本无法同纳粹政权的牺牲品的数目相比较。诚然，墨索里尼最终有了第二种想法。他写道：“我们必须有一支法西斯主义的警察队伍，不是作为法西斯主义者的警察，而是作为警察的法西斯主义者。它将使许多人重新考虑。”但只是到了 1943 年他才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他垮台的前几周。

基本上这两个国家没有什么差别：意大利像德国一样处于永久的紧急状态。像希特勒一样，墨索里尼既不受成文法也不受自然法限制；警察可以无视法律程序；公民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补偿。如果说德国有它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1933 年 2 月），那么意大利则有它的**公共安全法**（1926 年），根据这项法令，公共安全的职能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实施不能受荒谬的偏见——意指个人自由和应有的法律程序——所妨碍。希特勒在各种场合说过同样的话，甚至更予以强调。

这里不可能详细描述纳粹恐怖机器的复杂结构，它的指挥官们的阴谋以及他们的争权斗争。SD（安全机关）是党的一个情报中心，甚至在它 1933 年前建立起来时就专门从事搜集德国国内和国外的情报。纳粹党，甚至最高级官员，都在它的视野之内。的确，正如一个省党部头目抱怨的：“我们不应被 SD 所钉梢；毕竟我们不是在俄国，我们不需要一个 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但 SD 没有任何执行的权力，所以它不能逮捕任何人，更不用说处死了。这是旧政治警察的继承人盖

盖世太保的特权。在第三帝国，盖世太保是国家安全署的一个部门。

根据 1936 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盖世太保的义务是在整个德国调查“所有敌视国家的力量”，但它并没有把它的活动限于调查那些猖狂敌视国家的人。它还被指派调查所有“危害国家的意图”，这最终成了它的主要任务。许多为盖世太保工作的人都是老警官，他们新的主子手下继续服务。甚至其头子海因里希·缪勒多少不重视入党，只是在战争开始后才成为党员。盖世太保在德国各地有 57 个办事处，到战争结束时有 3.5 万到 4 万名全职官员。在 1939 年它的数目要少得多，但在战争期间迅速扩张，因为它最终要覆盖大部分欧洲。相比之下，SD 只有 3000 人左右。还有其他一些政治警察单位，但规模不如通常认为的那么大。如后来东德的安全部门，有 9 万雇员，但它只覆盖了相当于大德意志 1/4 人口的一个国家。

纳粹的保安力量足以应付它们的任务，“完全掌握所有德国人”。事实上，它们用一个规模只相当于现有的一半机器就能够履行它们的职能。在纳粹掌权后的几个月内，所有政党都不再存在，甚至共产党人——惟一准备非法活动的政党——也从没有在基层得以恢复。无须说，个别共产党人活了下来，但当他们企图恢复活动时，他们就被逮捕了。甚至在战争期间，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时地从前苏联空投到德国，然而无一例外地在几天或几周之内都被抓住了。（惟一例外是，一个波兰籍的共产党人在德国登陆后一直活到战争结束，因为他避免从事任何活动，并且被一位波兰朋友掩藏起来）对希特勒的暗杀只有一次几乎得手（1939 年 11 月）。因为这是一次单个人的行动，再得力的政治警察也对这种行动没有办法。

纳粹在德国境内的情报是灵通的，但纳粹在其他国家的间

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却不很成功。希特勒的闪电战产生了关于无所不能的第五纵队在每个地方都起作用的传说。但战后证明这是一种想象力的虚构。惟一算得上成功的密谋（1944年7月的秘密计划）是在战争结束前不到一年发生的，那时普遍的混乱已经开始，士气低落使得盖世太保很难工作。在此之前，纳粹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所谓的1934年6月的冲锋队的秘密计划根本不是一次密谋，而是对一些领导人的清洗，因为希特勒认为这些领导人在将来某一天会挡他的道。

使人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有如此之少的抵抗？德国是一个组织健全的国家，这使得警察控制相对容易些。而且盖世太保有许多帮助者，既有意识形态的告密者，也有“恶意告密者”。但主要的威慑因素是盖世太保作为政权的残忍而有效的工具的名声。人们认为它是无处不在的，在每一个家庭和办公室都有密探，当然这不是很真实的。盖世太保的工作之所以容易，还因为它不同于民主政权的警察。它能够不受法律惩罚地渗透进所有真正的或猜测的密谋中。它不必对被指控人进行公开审判。此外，它可以使使用酷刑或其他在民主制度里属于非法的手段。对盖世太保的畏惧是如此之强烈，以致多半不需要运用酷刑逼供，那些被捕人就愿意坦白交待。

因此，那些反对这个政权的人感到了孤立。正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渗透而不能组织起来，他们不知道在德国有多少持同样见解的人。只要纳粹还能够继续获胜，他们就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直到1942年，怀疑甚至失败论才开始蔓延起来。

在占领国，盖世太保的手伸得却没有这么长。在西欧一些国家，盖世太保得到了通敌者的支持，并且对效果好的给予高额奖励。但在其他地方，它未能渗透进去，获得一个立足之

地，要么是因为民族的（反德国的）团结，要么是因为更害怕的是敌后游击队员而不是盖世太保。尽管盖世太保的行动非常残忍，但这不是自发的残忍（施虐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官僚的残忍：上面下来的命令，盖世太保服从命令。

由于多种原因，在 1933 年到 1945 年德国因反对（或怀疑反对）纳粹政权而被杀害的人数是难以估计的。如果人们把军队的逃兵算在内，数目估计有几万人。如果纳粹的惟一目的是保持权力，使用这样的暴力是不是过分呢？意大利的例子似乎表明，以很少的恐怖就能维持着权力。纳粹领导人并非由于夸大了反对派的规模而杀害了这么多的反对者。在战后他们承认，他们知道他们一直能够进行全面控制的。因此，可靠的解释应当是，他们认为需要“先发制人的暴力”。

纳粹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是，不仅要打败敌人，而且要毁灭敌人。现在看来，提倡过分的恐怖主义的人可能会寻找根据说，希特勒不像墨索里尼，他并没有被他最亲密的同事所推翻。但这些比较不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因为从一开始德国的局势就很不同于意大利的局势。盖世太保像官僚一样，对扩大它的人数和经费有很大的兴趣。因此，为了证明它的存在，它就必须夸大反纳粹的威胁的严重程度。总的说来，保安机构并不积极参与政治。它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没有任何政治愿望，没有它们自己的态度。它们并不参与内部争权斗争，而仅仅是一个执行机关而已。

意大利的政治警察（大约在 1930 年第一次使用 OVRA 名称，但机构建立更早一些）人数较少而且组织得不太好，它的作用未曾引起太多的注意。当希姆莱和海因里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时，却只有专业人士熟悉阿图罗·博齐尼、卡门·塞尼瑟和伦佐·奇里希这些名字。这三个人从意大利政治警察创立时

就是其头子，直到墨索里尼垮台。

按民主的标准看，意大利政治警察的活动是残暴的：不加审判而拘留“社会上危险的人”，对其他人则进行专门的监视。嫌疑人一年被逮捕 10 次甚至 20 次，一两天就释放，并非不常见。政权的政治反对者被关押在利帕里或乌斯蒂卡岛上。维护国家的特别法庭竟判处他们高达几千年的徒刑。但同纳粹的做法相比较，OVRA 还算是一个温和的和人道主义的范例。只有 6000 个“敌人”被送到海岛上，其他人则被强制居住。OVRA 的第一任首领博齐尼，完全阻止了法西斯主义党渗透或控制警察的企图。他死于 1940 年。他的继任者塞尼瑟，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气质上是 1922 年前的君主主义者，倾向上缺乏任何基本的忠诚。”塞尼瑟同军队和皇家法庭密谋，甚至在 1943 年 4 月被解职后，他仍然在导致墨索里尼垮台的阴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意大利（除了细节上稍有不同，还有德国），警察头子、各个部门和其他保安机构中间有大量的阴谋和内讧。当然，这并没有逃避墨索里尼的注意。然而，他并不干预，因为他不想让太大的权力集中在保安机构的任何一个部门手里。

快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政权结束时，政治警察似乎失去了控制，结果米兰和都灵出现了大规模的罢工，反对党的主要成员或多或少公开集会。可以有各种理由推测，警察意识到了这些活动，并且是能够阻止它们的。无论如何，墨索里尼的灭亡不是他的对手行动的结果，而是法西斯主义领导层不满的结果。在墨索里尼完全依靠纳粹分子在 1943 年底复兴后，他彻底重组了布法里尼 - 吉迪领导下的政治警察。政治警察后来更符合德国的模式，也就是说它的活动非常残忍了。

总而言之，恐怖在纳粹主义、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掌权

问题上起了核心的作用。在这两个政权的运作上，它是根本的，但总是和政治宣传相结合的。通过回顾可以看出，尽管法西斯主义如果不经常使用或威胁使用恐怖就不能继续下去，但宣传或许也是同等重要的。盖世太保表面看来是非常强有力的，但它的权力实际上是受限制的——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保安机构，它们彼此勾心斗角，但主要是因为盖世太保仅仅是一个执行机构。它的机动的自由仅限于执行命令的方式。它并没有垄断秘密情报。即便在个别情况下盖世太保掌握生死大权，但不论是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对外事务上，它都没有任何“路线”。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德国的约瑟夫·富歇^①。意大利的情况是不同的，仅仅是由于意大利不像纳粹德国那样极权，OVRA 就具有比盖世太保更大的行动自由。

^① 富歇（1759—1820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雅各宾专政时期，作为特派员巡视里昂等地，鼓吹“彻底革命”和对基督教宣战，肆行杀戮，以残忍著称；后投靠拿破仑，领导警务部，百日王朝时期任警务大臣——译者注。

宣 传

早在无法追忆的时代，人们就使用恐怖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法西斯主义的恐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专制，不仅是因为它大规模地使用恐怖，而且是因为它把恐怖的使用同广泛的无孔不入的宣传结合起来。当然，希特勒和戈培尔不是最早利用宣传的人。关于这一主题（和群众心理学）的基本著作在本世纪以前就出版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他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诺思克利夫子爵）中，从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政党相比较，在其政治活动中大规模地使用了鼓动。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上使用宣传的，20世纪大众交流手段的技术发展使得这种宣传成为可能。

希特勒正确地分析了1918年以前德国官方宣传失败的原因：权力当局低估了它的重要性，并且未能认识到有效的宣传是群众消费而非知识分子消费的手段。正如希特勒所设想的，宣传只在于对群众提出一些要点，并且无休止地重复它们。正如希特勒和他最有“天才”的助手戈培尔所看到的：群众是迟缓的和懒散的，他们的记忆是脆弱的，只对上千次重复的最简单的观念有反应。他们在活动和思维上是“女性气的”，是靠

情感而不是靠理性来驱动的。琐细或烦琐解释没有地盘：宣传必须是肯定的或否定的，根基于爱或恨，只能是要么正确，要么错误。所以，辩证地看问题的能力是宣传的对立面。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一个人在自己的宣传中承认敌对者有正确的影子，也就为怀疑自己本身的正确提供了根据。群众不能够区别敌对者的正确终止在什么地方和自己的正确开始于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糊涂，就会误信……想赢得群众的人必须知道打开他们心灵大门的钥匙是什么。它不是客观性——客观性是一个弱点，而是意志和权力……人们在不停地无情攻击敌对者过程中寻找自己正确的证据。照此看来，犹豫导致糊涂、软弱，并且最终失败。

如果我们除此以外还承认宣传必须在形式上响亮和内容上极端，我们也就列出了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的所有本质的东西。

纳粹分子在争权的斗争中，极力尽可能地制造喧嚣，以便引起注意。一旦他们掌了权，他们就建立起对宣传的垄断，消灭所有潜在的对手。法西斯主义者宣传的重点总是更多地放在口头语言上而不是书面语言上，他们认定只有极少数人才阅读报纸的政治栏目和社论栏目。纳粹党的核心机关刊物《人民观察家》1932年有12万订户；也就是说，只有1/10的党员读它，它在纳粹党之外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戈培尔和墨索尼尼来说，只要他们的党掌了权，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监视和指导新闻界上。他们也写一些文章发表，但这些文章本质上是指导性的，陈述成千个地方演讲家和鼓动家口头上一再重复的党的路线的主要论点。

纳粹宣传和法西斯主义宣传共同的东西是：极端主义的口号，树立元首神话（“领袖永远正确”），侵略性的好战的方式，

以及对所有敌人不共戴天地敌视。戈培尔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都发现了广播作为宣传载体的重要性：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同时触及几百万人，而不是至多千把人。广播的使用在纳粹德国更为普遍，因为在意大利无线装置的价值只是到 1938 年才超过 100 万马克。此外，墨索里尼喜欢在他罗马的阳台上直接接触群众，而不太喜欢使用不见人的麦克风。

戈培尔和墨索里尼都给予了作为一种宣传手段的电影以很大的重要性。墨索里尼建立了电影院，从而为 1945 年后意大利电影的大复兴铺平了道路。戈培尔使制片人和演员有了比其他大众媒体更大的自由。德国和意大利的主要差别在于，德国比意大利更系统、更彻底地使用宣传武器。

德国的宣传部负责所有大的和小的传媒，非常详细地提供日常指导。的确，到 1937 年它的预算超过了外交部的预算，这显示出这些活动被看得多么重要。在意大利，这些指导是零星的，并且主要是否定性的（即审查）。在 1933 年，德国出现了对记者和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的全盘清洗，而在 1923 年后，意大利大多数记者都没有被解职，而是继续从事自己的老本行。因此，清洗在德国比在意大利广泛得多。德国的惟一差别是有数目稍少但更为激进的期刊，如《前锋》或党卫军的机关刊物《黑军》。

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控制下的宣传技术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宣传一直是一种工具，但它不是制定政策的一个自主的因素。孤立看来，它可能一事无成；它的成功取决于物质力量。它是权力宣传，可以多少粗略地说，在进展较好时——如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的德国——甚至不怎么完善的和不怎么有说服力的宣传也会成功。然而，在战争的趋势转向之后，除了有助于拖延战争而外，宣传不会使战争的结果有大的不同：宣传的

主要功能是为权力提供合法性，宣扬权力的成就和胜利者。因此，它有助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盛行多年。德国和意大利之外的纳粹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从来不曾有强大的影响，主要因为它无法进行垄断。法西斯主义政权之所以能找到拥护者，主要不是出于官方宣传的原因。

其他现代政权也使用宣传，要么是大规模地，要么是更巧妙地。但把法西斯主义使用的宣传同民主政权使用的宣传相比较是无用的，因为一个民主国家在定义上不能对传播信息进行垄断。

不应仅仅把法西斯主义的宣传看作是对大众交流手段的利用，还应在更广泛的框架内看作是政治神话的宣传，通过学校和业余活动进行的灌输宣传。在战争的最后期间，口号同现实之间的差距一旦明显起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开始沉默了。尽管宣传机器继续穷凶极恶地运作，但它的用处却急剧下降。经验还表明，宣传的效果和吸引力是不断衰落的。即使它进一步加强了它的重复，但这种重复致使它丧失了它的影响力和信誉。当广大听众没有兴趣之时，他们可以任凭“自发的欢呼”的驱动继续向前走，但他们的真实信仰和同情却变得暗淡起来。法西斯主义掌权的时间，还没有长到能享受它的宣传方面正常化的充分结果的程度，显然这种宣传在临近终点时是不断减弱的。

法西斯主义文化

法西斯主义者自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文化革命运动，是一种并非完全错误的斗争。纳粹分子想要一种“健康的”文化生活，恢复德国从前的价值，清洗所有异化的、颓废的和犹太人的东西——因此反对“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事实上，纳粹分子非常讨厌的大多数文化倾向（如文学、艺术和音乐的现代主义，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决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因为它们同样也是前苏联不喜欢的。纳粹分子认定它们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于是就焚书，从博物馆清除“颓废的艺术品”，把它们卖到海外，不再演出现代音乐。当然，也不再允许犹太人参与德国的文化生活。

尽管纳粹分子显然不喜欢其他文化，但对他们自己的文化的本质和目的也是不容易确定的。对于教育，他们认为把重点应该放在性格和理想上——如希特勒所认为的，现在是知识过多。所有这些他都在《我的奋斗》中相当详细地论述过，在此后几年追求的东西本质上是同一论点的变种。文化必须是德国的，但这种“德国性”如何表现出来呢？有时希特勒求助于理查德·瓦格纳（“做一个德国人就要为德国做一件事情”），在其他场合他又认为做一个德国人就要是“清楚的、合逻辑的和真

实的”。如果说有一种纳粹的文化理想的话，那么这种文化就是由健康男女的画像或雕塑来象征的。作家和作曲家应该以19世纪伟大的古典为榜样。

并非19世纪伟大的人物都是蹩脚的抄袭大师，同样也并非现代的思潮都是值得追随的。但在1935年，按歌德的风格写诗，以贝多芬为榜样谱交响曲，没有太大的意义。毋宁说，所需要的文化要表达第三帝国的精神，而在这一方面纳粹主义的美学是没有用的。此外，伟大的大师都是人道主义者，歌德的爱国主义一直是值得怀疑的，贝多芬（立足于席勒之上）是热爱全人类的。

纳粹分子的伟大偶像是理查德·瓦格纳。在战争爆发前，希特勒几乎次次出席拜罗伊特音乐节，一直尊重瓦格纳的后代。但是，甚至瓦格纳的《指环》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尽管该剧的主人公西格弗里德是一个理想的英雄，但同时他又被诡计、自相残杀、普遍堕落所包围，最终是一个悲剧性的下场。《帕西法尔》不是一个基督教徒，《飞翔的德国人》充满太多的恐怖故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是太颓废的，最终只有《歌唱家大师》保留下来。

按一个非常狂热的纳粹物理学家的建议，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文化中引入了“德国的物理学”，但它从来没有受到严肃地对待。还有一种“德国的社会学”，但仅仅是一个计谋，旨在保护一个已经受到新主人怀疑的学科。个别纳粹分子出版了关于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的书籍，但数量不多，而且也不可能指定在这些领域的哪一个特殊的纳粹学校来使用，就像没有纳粹的歌剧或交响乐一样。魏玛时代曾有一种文化的实验，从而引起世界其他地区很大的兴趣。但纳粹分子统治下的德国文化不再会引起普遍的兴趣。这种文化从纳粹的观点看是优美的，因

为他们厌恶魏玛精神。

这种文化上的不适，可在文学和视觉艺术上最强烈地感受到。它在科学上却不怎么明显，因为科学界很少有审查。在电影上也不明显，因为电影享受到比其他艺术类型更多的自由。如果说在自然科学里出现了衰退的话——德国在物理学、数学和医学上失去了它的领先地位，那么，这主要不是纳粹领导人进行意识形态干预的结果，而是大多数重要的犹太科学家和非犹太科学家被迫移民的结果。当著名的格廷根数学学院的负责人戴维·希尔伯特被纳粹的教育部长问及他的学院是否因清洗而受损时，他回答说：“它没受什么损失，它已经不存在了。”除了对犹太人和其他不可取的人的清洗外，纳粹主义的影响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么大。

纳粹领导人的文化兴趣是非常有限的。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的优先权的天平上，文化的分量不是很大。尽管“老战士”在重要的场合也到音乐厅、博物馆或图书馆去，但他们在那里总觉得不舒服。他们的享受观念很接近啤酒屋的气氛，一种完全男性的社会，高谈阔论，放声大笑，斗乐取闹，用好斗的手演奏流行音乐。希特勒对建筑学感兴趣，视察过许多公司。戈培尔也看电影并且给有教养的观众讲话。格林是艺术家的保护人，并且通过他的妻子与演艺界的人合作。但值得怀疑的是，格林是否用大部分时间欣赏为他而从整个欧洲偷来的许多画和艺术品。希特勒和戈培尔不去指导德国科学和艺术家如何表现。然而，他们也没有用过分的温和来挽留这些科学家和艺术家，而是使人觉得这不是他们的事，他们最好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如政治。

纳粹党的路线既不是明确的，也不是一贯的。有时一个特殊的作家或艺术家受到一个党的部门的温和称赞和提拔，只是

为了避免受到别人的攻击。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文化事务在纳粹的政策上没有什么优先权的话，那么在 1939 年后它们就更不被注意了。在战争期间有了某种程度的文化自由，只是为了慰问军队和国内人民。这只是为支持战争而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管这些艺术品是否服务于德国更高的理想，甚至不管它们是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品。

总的说来，文化上的政治灌输服从于禁令。同“社会党人的现实主义”相比，没有什么纳粹的文学风格。因此，作家和艺术家如果想出版、展示或表演的话，他们就必须使自己“符合”新精神，所以也就避免了任何对纳粹学说和实践的直接批评。不一定要写作关于党和元首的东西或引用他的话，有许多著作的确这样做了，但有教养的人瞧不起它们。而且它们对民众也没有什么号召力。

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灌输基本上限于讲授种族学说和符合纳粹世界观的新课。德国大学生的人数从 1933 年的 12.8 万人减少到 1939 年的 5.8 万人，这也许是实行强制性兵役制的结果，而不是采取减少学生数目的特殊措施的结果。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政策比纳粹德国更宽容一些。法西斯主义较少崇拜它的反民族主义的人物。它的精神动力主要来自法国行动派，而不是来自德国朦胧的种族神话。它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包括墨索里尼）比起纳粹分子来有更好的阅读能力，并且更有教养。他们并不反对现代艺术。证据是，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未来派人士就属于法西斯主义的先锋，坦农齐诺就是这样。象征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精神的绘画在纳粹德国实际上被视为堕落的，不能在那里展示。在纳粹德国非常明显的树碑立传的潮流，在意大利很晚才出现，并且从来没有那么过分。

因此，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化交流是有限的。对意大利人来说，拉丁精神是伟大的偶像。古罗马曾是文明世界的中心，那时德国的部落正在黑暗的森林里艰难地生存。德国的中世纪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根本没法比。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者对德国的文化没有什么大的兴趣，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者也偏爱自己的传统，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也是如此。各种法西斯主义不管在政治上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文化上却很少有共同性，惟一的例外是都鄙弃先锋派。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那些已知对这个政权有保留意见的知识分子更宽容一些。的确，教育部长朱塞普·博塔，偶尔还有墨索里尼本人，保护他们免遭更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攻击。当1938年通过种族法时，犹太学者被迫离开了意大利，尽管有这样的例外，但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移民：像克罗齐这样的哲学家，德·桑蒂斯和萨拉瓦托莱利这样的历史学家和国际法专家，在声称谈哲学、古希腊社会或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时可以批评法西斯主义。意大利首要的哲学杂志是由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主编的，这位教授在1931年拒绝宣誓效忠墨索里尼。这种“自由的”宽容自然是不能同真正的极权主义精神相容的。每一个人，甚至检查官都知道这些批评家在做什么，但权力机构——也许从它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并没有太严肃地对待他们。

如果文化权力机构总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那么知识分子——尽管不是没有牢骚——就会合作。不能认为所有主要的作家、音乐家（除托斯卡尼尼之外）、画家、制片人或科学家，在抗议这个政权时都停止了工作。这包括1945年之后的一个时期杰出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莫拉维亚、维托里尼、普拉托里尼、帕维塞和古图索在墨索里尼统治下都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

活。意大利的电影产业，从德·西卡、罗斯里尼、维斯康迪和索尔达迪到安娜·马格那尼，也都是如此。

在德国新的开端是在 1945 年，而在意大利却没有大的中断，相反，却有很大的连续性。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知识界的气氛，在初期的同情和抱有期望之后，主要是一种麻木不仁和无动于衷的气氛。抽象地说，存在着一种赞美英雄主义和类似品质的法西斯主义风格，但实际上却很难找到什么证据。

关于欧洲其他法西斯主义政党的文化政策，几乎不需要说什么。有些人除了极端的和原始的沙文主义的信仰，没有任何特殊的文化兴趣。其他人把法西斯主义首先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和道德的）复兴运动，如德里埃·拉·罗切勒、罗伯特·布拉西拉赫和何塞·安东尼奥。这些人的观念不是没有趣的。如德里埃·拉·罗切勒一次写道，他们经常极力把相反的观念结合起来：“民族与欧洲，社会主义与贵族政治，思想自由与权威，神秘主义与反教会主义”。但讨论这些观念和态度属于对现代欧洲思想史的研究。它们并不构成一种党纲，更不用说一种一贯的政策了。的确，大多数法国的或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甚至没有在纯粹的超政治的层次上意识到这些思索。

在法国的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那里，有一种奇怪的施虐—受虐狂成分。一方面，他们同堕落的法国相比较，称赞纳粹德国的男子气概的活力。但另一方面，关于德国的文化优越的断言及其对传统法国的蔑视又触怒了他们，德国灵魂深处对他们来说是永远看不透的和可怕的。

如果法西斯主义的确吸引了欧洲的某些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这些知识分子是哪些人呢？在主要的作家、作曲家和艺术

家中间，在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中间，1922年或1933年以前分别都有为数不多的人自称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但没有人自称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知识分子很少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任何政党。然而，有一些对纳粹主义这样的精英主义运动长期的潜在的同情者，并且决不限于意大利或德国。T.S. 埃利奥特、威廉·巴特勒·耶茨和 D.H. 劳伦斯就同情法西斯主义的某些方面。吸引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一些西方知识分子被向“枯燥的唯理智论”的造反所吸引，其他人被许诺建立一种贵族统治的文明所吸引，还有一些人被对异教世界的怀旧所吸引。一些人从法西斯主义中看出了对新的机器时代及其平庸的回答，因为许多人相信文化必须献身于大众的统治，有时这是自发膨胀的对无政府状态的畏惧。正如迪安·英格 1933 年所指出的：暴虐是无法无天的神经病，法西斯主义防止文明被大城市的贫民窟和一些被误导的知识分子所毁灭。

法西斯主义吸引了抵制唯物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者，它也激励了法国行动派的反浪漫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主张回归于古典理性主义的法国传统，回归于和谐、理性、精确。法西斯主义诉诸于批评现代社会缺乏传统、等级和宗教价值的保守分子。它还造就了年轻的反资产阶级的造反者，这些造反者相信法西斯主义是摧毁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阶段。

所有这些都共同认为，自由民主破产了，法西斯主义不管有什么缺点，都是有坚定信仰并行动起来的不妥协的人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愿意接受对自己的自由的限制，因为这似乎是为文化复兴而付出的很小的代价，文化复兴将导致民族复兴，也许带来一种新文明的诞生。

一些知识分子真正相信，艺术家—英雄是法西斯主义创造的这个新社会的统治者。甚至那些没有这些幻想的人也希望能

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横扫整个欧洲。正如 H.C. 韦尔斯写道，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坏的好东西”；它有目的，坚守纪律和公众事业。乔治·肖伯纳预言，墨索里尼将比英国工党更朝社会主义方向迈进一步。

现在看来，所有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荒唐地误解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更不用说误解纳粹主义了。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并不比其他凡人有更特别的能力或智慧，许多当时同情法西斯主义的人基本上都是不关心政治的人。他们都相信某种专制形式是未来的潮流。

在法西斯主义政权下知识分子过得并不好：他们在德国比在意大利更糟糕。然而，一般说来，他们认可了他们的命运，绝大多数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同现行制度合作。在工人阶级中，在贵族政治论者中，甚至在军队中，都有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很难想象，德国和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去或为自己信仰而被处死。那些移居国外的人大多数是犹太知识分子，那些作为“内心深处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或“见异思迁”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要顺从。在战争期间开始问世的戈培尔的周刊《帝国》的撰稿人的名单，或者文化报纸《晚邮报》的撰稿人名单，读起来就像是“见异思迁”成员的名单。关于德国占领下的法国知识分子，还是少说为佳。当然，总是有一些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坚定的甚至勇于牺牲的光辉榜样。但他们在法国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很少的，可谓凤毛麟角。

成 就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权连一点值得信任的成就都没有，法西斯主义也不例外。如果它汇集的只是失败和罪行，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大规模的恐怖来维持它的权力，显然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法西斯主义的确满足了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某些需要和渴望，至少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支持、敬重甚至同情。可以肯定，大多数法西斯主义运动都没有掌权，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向掌权的运动挑战。甚至纳粹许诺的至福千年也不过持续了12年，其中一半是在战争中渡过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记录延续了20年多一点。

意大利像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了经济大崩溃的很大影响。即使在1929年至1939年间国民收入上升了，人均收入却停滞不前。然而，墨索里尼发起了几次壮观的运动，如“小麦战役”和排干庞廷沼泽。他的保护主义政策使得意大利汽车和电影工业的战后发展成为可能。但即便如此，意大利人在1940年也并不比10年或20年前过得真正更好一些。虽然墨索里尼主张自给自足和合作主义，但他似乎对经济学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很大的兴趣。总之，他想使意大利成为一个强国，全人类的一个范例。在他看来，经济政策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有意义。

法西斯主义者的确对工人的休闲组织有积极的兴趣。工余活动不像它的德国对应物 KdF（娱乐健体）那样广泛，但它的确有助于通过社会俱乐部、低廉的戏剧和音乐会票价、有组织的旅游和其他此类活动来增强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由于意大利当时工业化程度不如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它遭受的城市失业的灾难要轻一些，而乡村的形势又不大可能为公众所注意。诸如卡罗·列维的《停在埃博利的基督》和伊格纳齐奥·西罗内^①的《丰塔玛拉》以及《面包和葡萄酒》之类的小说——非常现实主义地说明了乡村的形势——只是到战后才出版或为公众所知。

海外的一般印象是，在墨索里尼领导下火车是正点到达和出发的，黑手党都被剿灭了。尤其是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条约中“被它的盟友所背叛”，但又重新成为一支重要的受尊敬的国际力量。因此，1932年墨索里尼能够宣布，在10年之内欧洲要么是法西斯主义的，要么被“法西斯主义化”。在理论上，甚至在最早的侵略（1935年埃塞俄比亚，1937年西班牙）之前，意大利就处在一种长期的战争状态，领土收复主义的宣传声称，地中海是属于一国领海，不仅在北非而且也在科西嘉和尼斯都提出了领土要求。所有这些都深刻影响了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早就声称，意大利是一个“无产者国家”，在瓜分战利品时意大利被歧视了。

简言之，法西斯主义在国内是相当受欢迎的。在20年代后期的一次公民投票中，99%的参加投票者——这些结果显然

^① 西罗内（1900—1978年），意大利作家，以其反法西斯小说而闻名，曾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后又脱党，被迫流亡瑞士（1930年）——译者注。

不是假造的——投票支持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然而，有理由相信，在 30 年代后期，特别是在意大利进入战争之后，支持这个政权的民众大幅度减少了。

德国纳粹分子在掌权后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要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面临的问题尖锐得多：有 600 万失业工人，自 1929 年以来工业生产下降了差不多 50%。希特勒许诺推动德国经济重新前进。由于他实现了他的诺言，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和他的党的民意。不能说这种成功是重新军备的结果：大规模的重新军备只是在 1936 年才开始的，那时失业已经减少到了 270 万人，也就是说减少了 60% 以上（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只减少了 20%）。在这一时期，德国的工业产量几乎增长了 1/3。

纳粹分子的队伍里没有任何经济天才，经济领域的大部分关键岗位给了那些并不是党员的专家。但纳粹本能地选择了正确的解决办法，一种原始的凯恩斯的战略：意在诱导自力发展经济的政府投资，赤字开支，加强重要的公共工作。起初纳粹做出的某些决策（及其结果）实际上是由以前的政府首创的，如 1933 年前设想高速公路，并建了第一段。即使纳粹分子表现为反对大型百货公司，维护小零售商，但这些连锁商店实际上是被布吕宁政府阻止才未能出现的。然而，纳粹分子以更有力的方式解决了这些问题。例如，公共投资在 30 年代增长了 13 倍多。公共开支 1938 年占国民收入的 35%（相比之下，英国占 23%，美国占 10%）。经济中的国家股份比其他国家都大得多，关于工资和物价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官员做出的。其结果，德国的恢复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快。新主人极力减少德国经济对世界贸易的依赖性，把进口减少到过去的 1/3，使生意交易立足于易货贸易基础上。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是有用

的，但在1936年后就引起了短缺和失衡。的确，如果不是在战争初期有德国的这些成绩的话，这整个制度也许早就崩溃了。

纳粹分子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创造就业机会，包括强制性的劳动服务。其基本思想也不是纳粹分子提出来的，而是20年代的青年运动提出来的。一旦重新军备大规模地开始，失业就完全消失了，劳动力成了一种稀缺的商品。短缺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女工回到工厂来解决的；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她们曾被排挤出工厂。外籍工人越来越多地被雇用，起初是自愿的，后来则是强制性的。

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德国工人和雇员的收入不太好。在1932年到1938年间产业工人的小时工资下降了，而基本食物如肉和牛奶的价格却上涨了，出现了尖锐的短缺，但令人沮丧的失业者长队却从德国的大街上消失了，乐观主义的感觉有了根据，危机被克服了。工会已经垮掉了，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罢工。在纳粹德国，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相比较，法律不禁止罢工。德国农业也得益于农业进口的减少。富有者过得好，但不鼓励赚取过多的利润和进行奢侈的开销。大地主即容克，虽然土地没有被剥夺，但他们的收入也受到了控制。

纳粹政权获得了真正关心普通人的命运的名望。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搜集金钱和衣物给穷人，在1933年11月开始的娱乐健体活动很快有了广泛的覆盖面。微不足道的50分钱就能买到剧院和音乐厅的票，人们用7马克就能在摩泽尔河上短途旅行——总共有900万德国人利用这种机会进行了这种廉价的短途旅行，到国外旅行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这是一个节日的时代。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年度大会，都是人海如潮。此外还有收获的节日，以及为

庆祝某个历史事件或当时的政治事件而举行的各种游行。

德国的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一度是世界重量级冠军，鲁道夫·哈比希打破了8000米跑世界纪录。人民收音机是一种廉价但很管用的收音机，是大规模生产的。后来设计出了大众汽车，这是每一个人都能买得起的轿车。电影和广播散发出乐观主义和普遍的满意情绪。

确实，德国生活的阴暗面不是普遍的特点：大部分人从经济高涨中获益不多（例如国内服务机构的工资冻结），某些地区如西里西亚、萨克森和黑森落在了其他地区后面，就像意大利南部赶不上意大利北部一样。但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立法并没有被修改，在某些方面，第三帝国的社会服务机构是优于早年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的。德国劳工阵线的首领罗伯特·利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声称，新政权主张社会公平，所有人在第三帝国都有平等的机会。工人和农民进入经济或政治的关键岗位的事例不是很多。但领导层支持这些向上的流动性，声称取消继承的财富和特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法西斯主义是不是“现代的”，它是不是打算建立一个与新的社会发展和技术发展相一致的社会呢？后来有些作者强调这些方面，但这种强调是不是有道理呢？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很有限，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法西斯主义对同代人的吸引力，不是它对后来的几代人如何。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在某些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力量，尽管这经常是间接的并且有违于它们的初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着迷于现代技术，并尽可能地利用它们。例如，希特勒是第一个在竞选运动期间每天都坐飞机到许多城市的政治家。

但纳粹的意识形态是向后看的，法西斯主义的学说也是这样，分别把罗马帝国和德国的中世纪看作是理想的存在形式。

同中世纪乡村、小城镇或音乐大师的纽伦堡的平静悠闲的生活相比较，纳粹主义描绘了一幅城市化和工业化可怕后果的昏暗画面。尽管希姆莱是第三帝国的权倾一时的人物，是它的精英部队的指挥官，但他的生活观却是由关于各种问题的各种深奥的和滑稽的观念塑造的。同样，纳粹的学说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强调血统、情感和本能，而不强调理性。

法西斯主义事件过后许多年，观察者发现了（工业和农业的）现代主义的计划和合理化的有利因素，但当时的人很少意识到这种现代主义。如果法西斯主义在它的实践中被迫偏离它的反动的观念的话，这是出于非常实用的理由。不管纳粹分子多么经常谴责大城市生活的丑陋性，绝大多数德国人却继续在大城市生活；不管他们对工业社会进行什么样的批判，对一个有 7000 万人的民族来说，需要一个比农业所能提供的更广泛的经济基础。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想用轰炸机和坦克，而不想用剑和戟装备他们的武装力量的话，他们就需要有强大的重工业。

起初的反现代主义思想的因素，越来越多地被抛弃了。某些纳粹领导人，包括戈培尔和格林，并不需要很多劝说，因为他们一直怀疑中世纪偶像的效力。如果法西斯主义是现代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具有反动方式的现代主义。它想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来实现它的非理性的目的。归根到底，纳粹主义仍旧拒绝现代的（西方的）文明。这样的结合并不是不可能的——野蛮行为并不是不发达国家和前科学时代的专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并不因为现代高级炸药是最早在堕落的西方制造的就拒绝使用它们。

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现代化措施持续下来，如在德国清除忏悔学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动荡，社会变革到来了：一

些人的灾难是另一些人的好运，大规模屠杀是为了向上爬。但如果认为几百万追随者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社会的革命变革，那就错了。30年代的绝大多数人都想要秩序和稳定，希特勒完全意识到了他们的愿望。在他掌权后不久，他就宣布民族革命已经结束，一千年都不会再有一次民族革命。

法西斯主义最令人惊奇的成就是在对外政策上，使人们感觉到德国和意大利已经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尽管大多数人都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操心和艰难，但深刻的民族怨恨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这种怨恨首先针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是他们阻止德国和意大利在各民族中得到自己应有的地盘。因此，墨索里尼关于修改边界和吞并别国的要求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当1935年萨尔重新与德国统一时，当德国军队1936年进入莱茵兰——破坏凡尔赛条约——时，当德国1938年进入奥地利时，德国人就有了一种自豪感。

每当希特勒入侵一个国家时，他都宣称这是他“最后的领土要求”。大多数奥地利人和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多数德国人，当时的确想同第三帝国重新统一。但随着最后（1939年3月）占领残余的捷克斯洛伐克，最终人们就明白了希特勒的野心已经超出了民族统一的要求。他的野心事实上能走多远呢？他仅仅是想征服欧洲，还是想最终统治全世界？或许连他本人都不知道。他的干将的评论没有提供很多线索。通常他们是追随元首的，元首的视野无限广阔，就像一个掌握命运的人。

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一度创造了一个强大的伟大的德国后而停下来，情况如何呢？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他的国家就可以继续存在。有些人甚至提出，希特勒原本可以作为一个伟大而明智的领袖而写进历史。前英国首相戴

维·劳埃德·乔治 1934 年声称，希特勒是“自俾斯麦以来，甚至自腓特烈二世以来德国最好的家伙”。这种说法是当时外国人获得的典型的印象，但却是建立在极大的错误判断之上的。俾斯麦是一个国务活动家，他理智地和本能地知道在什么地方停下来。而希特勒却是一个鬼迷心窍停不下来的人，即使他知道必须这样做，他也停不下来。他是一个没有现实感的赌徒，他在初期越是成功，他就越深信他永远战无不胜。既然德国的资源有限，他该怎样面对全世界呢？大胆越来越变成了鲁莽。当在俄罗斯的战役 1941 年 12 月受阻时，希特勒的反应是向联合国宣战，这是一个完全无理性的决定，是违背德国的利益的，肯定遭到失败。这不仅仅是一个像墨索里尼入侵希腊那样的错误估计的问题，它还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且这不是惟一的一次。

因此，纳粹在 30 年代取得的使希特勒深得民意的对外政策上的胜利，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得希特勒陷入了世界大战，并遭到惨败。但在什么程度上这个契机是纳粹和希特勒特有的呢？决不是其他牌子的法西斯主义不能或不愿意发动世界大战。就其自身情况来看，墨索里尼会实施在非洲的某种殖民地扩张，但也许除非在内战的范围内，他没有胆量涉足其他地方。

但是，甚至较小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也是好战的、极权主义的，是尽其有限能力进行侵略的。不妨可以思索一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英国同法国，或纳粹德国同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法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的利益会冲突。它们不会和平共存。

在 30 年代出现了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希特勒意味着战争”。这是一个简单的口号，但本质上是正确的。纳粹主

野心排除了形成和平的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平等的关系了。惟一的选择是当主人还是当奴仆。根据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战争不是一场灾难，而是民族编年史上一个必然的事件，有各种治疗的作用。既然如此，战争就不是可以避免、可以克服的事情。希特勒后来的一些辩护士声称，希特勒真的不想要战争，只想要战争的战利品。但不知多少次，希特勒所说的恰恰相反。他甚至后悔地说：1938年10月的慕尼黑条约骗走了他想要的一场战争。

有史以来就有战争。有些战争是计划好的，有些战争是偶然爆发的。但在最近的历史上，没有哪一场战争不是在或多或少的文明的民族之间如此无情地策划好的。纳粹领导人根本不在意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欧洲的一场战争，不论对战败国还是对战胜国，都必定带来一场巨大灾难。他们从不严肃考虑战争的代价，这和“斯拉夫精神”是同类的。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拔剑之人必定死于剑下。

墨索里尼使火车运行正点，希特勒建立了给人印象深刻的高速公路网，如果这些交通干线连接的城市都被毁灭了，这些成就还有什么意义呢？不难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早期成就深刻影响了许多人。这有助于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它使得许多人直到很晚才想到，这是一种要不了多久就必须付出的高昂的代价。

日常生活的乐趣

纳粹德国的绝大多数人，就像在斯大林的俄国一样，并没有生活在剧烈的使人瘫痪的畏惧之中，而是尽情享受。他们陷入爱河；去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看展览；去登山旅游；去海里游泳；去喝酒；去欢度节日和纪念日；去观看足球比赛和其他比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参加体育运动。他们去跳舞，玩牌，享受歌剧表演、芭蕾舞和音乐；买小汽车或至少买新收音机；对新时尚感兴趣。去看电影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30年代的一些流行歌曲持续很久，甚至今天还在唱或哼。像俄罗斯的鲁博夫·奥萝拉、德国的汉斯·阿尔伯斯、海因里希·乔治或扎拉·利安德这样的电影明星，直到今天还使人缅怀不忘。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没有一个人生活在恐怖状态中，并非只有一些人获益于这个政权，很多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它或至少容忍它，极力利用它。尽管政治生活被普遍化了，但有一些界线是统治者不想超越的，或者如果超越就会被认为不明智的。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人罗伯特·利1937年声称，在第三帝国惟一沉睡的是私人事务。但没有别的哪一个纳粹分子会作出这样的愚蠢的声明，而且罗伯特·利也没有再

重复它。一个人对公共事务越不感兴趣，越忽视政治，他就越觉得在自己的个人世界里是自由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权力机构在史无前例的程度上利用了宣传，但仍然没有要求人们进行什么比赛，观看什么电影，吃什么冰淇淋或到哪里去度假。权力机构或许怀疑这样做不利于生产。

极权主义政权发出了成千上万的指示。尽管纳粹分子庄重地许诺让妇女离开工厂，但 1939 年在工厂里工作的妇女还是比 1933 年多 200 万。如果指示与政权的核心政治问题无关，许多指示都会被束之高阁或仅停留在口头上。当希特勒 1933 年掌权时，中学只有 5% 的教师加入了纳粹党。5 年后，实际上每一个人都至少隶属于纳粹监视的一个职业组织。但这对学校的生活有多大影响呢？它对生物学（种族理论）、历史学（近代）和德国文学（20 世纪）有某种影响，并且更突出强调体力训练。但由于当代文学和历史在学校里涵盖面不大，全部课程也就不会同以前有什么根本不同。律师、医生、退伍军人、养蜂人、保龄球手和猎手的职业组织处于纳粹的控制之下。但在晚上的娱乐时间，他们一般是做他们在 1933 年以前做的事，并且在 1945 年以后又会重新去做。

这种指示对于工厂的美观和工厂与工厂之间的竞赛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这些命令多半被简单地置之不理。按照纳粹的女性的美丽和举止的理想要求，德国妇女应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和追逐时髦的。她们不应该抽烟或使用香水，除非是科隆香水。但只有一些狂热者或古怪之人重视这些规定。妇女仍然穿皮衣。她们继续抽烟。她们的性生活，就现在所知，同 1933 年以前没有根本不同。

对复杂的各种水平的娱乐的研究表明，德国或意大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确，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文献，人们普遍带在

身上，并作为礼物赠送，但是否被普遍阅读过，实难确定。许多人翻过《我的奋斗》，但极少人逐字逐句地阅读它。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百科全书》是当时最好的参考书之一，如果人们抛弃掉墨索里尼本人写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条目的话，显然这部著作还是客观的。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读什么书呢？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是相当流行的，但纳粹分子认为作者是不可信的，因为这些作者不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如赫尔曼·赫斯、恩斯特·维歇特和汉斯·法拉达——或因为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作家，但这些作家有更广泛的读者。甚至那些尖锐批评纳粹分子的艺术家的艺术家只要不是犹太人或共产党人，也能在新主子手下找到工作。埃里希·克斯特纳就是一例，他以假名写过电影。直到战争爆发前，弗兰茨·卡夫卡、赫尔曼·布洛赫、伊莱亚斯·卡内迪和罗伯特·缪西尔的著作在德国几乎都能买到。实际上整个当代美国的、英国的和法国的文献在德国都是可以阅读的，许多作品还翻译成德文。这些作品包括安德烈·莫里斯、保罗·克劳德尔、保罗·瓦莱利、弗吉尼亚·伍尔夫、伊夫林·沃、T. S. 埃利奥特、D. H. 劳伦斯、威廉·福克纳、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威廉·萨罗扬、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甚至还有约翰·斯坦伯格、恩斯特·海明威和詹姆士·乔伊斯早期的作品。甚至在战争期间，有些人的作品未被翻译成德文，但至少在德国得到了评论，如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卡缪、让·阿诺伊尔和让·科克蒂欧的作品。纳粹普遍禁止公开展示所谓的“堕落的艺术”，但这种画作仍能出示并购买，只是需要偷偷摸摸。无调性音乐不能公开表演，而实际上其他一切都可以。“犹太人的”精神分析学被禁止，但某种与之非常类似的东西却以不同的名字用于实践。据说 1945 年后的 95% 的德国作者在第三帝国都发表过作

品。在意大利，这个数字接近 99%，包括大多数杰出的左派作家，如著名的电影导演阿尔伯特·莫拉维亚和罗伯托·罗塞里尼。它还包括萨尔瓦多·夸西莫多和凯萨莱·帕维塞，以及实际上算得上人物的人。

适用于先锋派的东西甚至更多地应用于大众文化。在战争爆发前，德国的广播杂志公布外国电台的节目。西方的最畅销书《飘》和《不友好的安东尼》与赛珍珠的书在德国就像在美国一样被广泛阅读。托马斯·沃尔夫或许在德国比在他自己的祖国有更广泛更有同感的读者。

1937 年的歌曲单表明，德国青年梦想着夏威夷、南海群岛、阿根廷的松树、古巴和旧金山。一首最流行的歌曲唱道：巴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而不是柏林、汉堡或慕尼黑；还有一首歌曲叫做《是，先生——不，先生》（扎拉·利安德）和《谢谢，我的朋友》。1938 年的大英雄是莫帕森特的贝尔-阿米，女士们的亲爱者。没有什么赞美黑森林、吕内堡荒地或莱茵河谷的流行歌曲，尽管经常推荐这些地区。也没有提到手纺车旁的甘泪卿^①的爱情歌曲。除了极少数例外，德国的电影都是非政治的。上映的外国电影中几乎有好莱坞的所有电影，从《碰巧一天晚上》到《百老汇美妙音乐》再到《飘》和《旧金山》。

纳粹文化政策的不一致也许最明显地体现在舞蹈音乐上。爵士音乐由于它种族上的低等根源（美国黑人）而基本上被禁止。但纳粹分子用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本尼·古德曼^②不是雅利安人，他们情愿忽视达简戈·莱因哈特是一个吉卜赛人。恰

① 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人物——译者注。

② 古德曼（1909—1986 年），美国单簧管演奏家和乐队指挥，创造节奏快速、即兴演奏的爵士摇滚乐，被称为“摇滚乐之王”——译者注。

恰在战争爆发前，英国主要的爵士乐团和美国的一些爵士乐团访问了柏林和汉堡。他们不是正规地表演爵士乐，而是在“摇摆”，但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通过了审查。在战争期间舞蹈班子继续演出，因为把好的“德国音乐”和坏的“外国音乐”区别开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能够从事自己的爱好，只要他们不对政治表现出不健康的兴趣，在日常生活中不同党及其代表发生冲突。如果是那样的话，宽容也就消失了，偏邪的行为导致很快被拘押，甚至出现不幸的后果。如果一个人批评党及其领导人，公开不赞成官方对教会的政策或元首的建筑设计，公开怀疑对外国的入侵或对待外国人的方式，就更要遭到迫害了。如果一个年轻小伙子（或姑娘）拒绝加入与党密切的组织，他可以继续在工厂工作或者当兵，或许不能进大学学习。如果他打招呼时（或回招呼时）不说“希特勒万岁”，他就会受到怀疑。如果他抱怨一些缺点（如缺少蔬菜或肉食）或明显败坏一个纳粹分子的尊严和他的家庭，这就会被记为非难甚至散布敌意性宣传的案子。这不一定会把他关进监狱或集中营，但这会被地方秘密的党代表黑衫党记录在案，并且或迟或早会给他带来不愉快。

加入一个庞大的组织，如有 2300 万成员的德国劳工阵线或有 1500 万成员的农民组织（帝国农业阶级），实际上没有太大意思。但不加入就总会被看作是一种蔑视行为，就会倒霉。人们能很快表达他们的意愿，就会有和平，但必须符合希特勒制定的条件。

恐怖和宣传并没有扩及到每一个领域。如果人们同意政权的政策或至少不谈它的失败和罪行，如果他们有怀疑也默不作

声，他们就能自己享乐。在德国有广泛的私人领域，这既是因为纳粹分子很少有时间把他们的制度强加给德国人，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制度的广泛性有更大的自信心，所以认为完全控制是不必要的。这种个人自由的领域在意大利甚至更广泛，但前提必须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在基本事情上人人都必须一致，任何会给政权带来危险的行动都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惩罚。

清理法西斯主义

摧毁法西斯主义政权用了一次世界大战。为对付法西斯主义的遗物，几百万人用了很多年时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没有恶战到底就崩溃了；如果没有来自德国的大量帮助，墨索里尼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 1943 年建立他的萨洛共和国。

纳粹德国使世界两次感到惊奇：第一次是在它显然不能赢得战争之后又继续战斗了两年。是它的狂热、害怕敌人的报复起了作用，还是靠垂死挣扎的盖世太保防止了一次崩溃？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作用。除非用来说明一些死硬的纳粹分子的行为，狂热或许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对普通士兵来说，更重要的是十足的惯性和军队里的忠诚，拒不让自己的战友投降。第二次惊奇是全盘崩溃。同许多人假定的相反，一旦纳粹分子不再掌权，德国人就不再进行任何抵抗。他们的战斗精神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最多不过一帮人还再维护旧政权。群众深刻的责任感被估计过低了。

当盟军 1945 年占领德国时，他们对再教育、清洗、惩罚只有模糊的观念。他们最突出的问题显然不是对付作为一种学说的法西斯主义。无论如何，法西斯主义从前的磁石般的吸引力消失了。直到很多年后，德国才重新出现了在某些方面可被

视为纳粹运动后继者的政治集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在 1919 年，德国只有一小部分被占领，而在 1945 年后德国整个国家都处在盟军的直接控制下。由于盟军是在不确定的时期到来的，多年中都没有德国中央政府。如果不是为了冷战，德国就会在很长的时间之后才能重新得到完全的主权。意大利和奥地利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对法西斯主义者的清理，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地方权力机关，而地方权力机关出于各种理由表现出的热情要比盟国小得多。

当盟军进入德国时，他们列了一个有 15 万纳粹分子的名单，这些纳粹分子被怀疑犯有各种特别的罪行。最终有 20 万德国人被扣留在西方占领区，有 12 万人被关进前苏联占领区的集中营里。起初这 12 万人中大多数是纳粹分子，但后来非纳粹分子的数目更多。美国人最初有意调查了几百万人，要求许多人必须详细填写关于他们个人参加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问卷。一个国际军事法庭建立起来，准备进行纽伦堡审判。这次审判要对法西斯主义做出最终裁决，正如同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宣布的，要毁灭法西斯主义。

纽伦堡审判指控的不是法西斯主义本身（尽管几个纳粹组织被判有罪），而是准备侵略战争罪、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这些人包括第三帝国的主要人物（除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其他一些已经自杀的人以外），但还有经济学家霍拉希·格里利·加尔马·沙赫特——一个机会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和出色的广播评论家汉斯·弗里茨施。

在后来的几年，纽伦堡审判出于政治和法律的理受到了批评。但综合考虑，它做得还算公正，尽管是大致的公正。当时，同盟国的绝大多数人（和德国 80% 的人）认为裁决是

公正的。既然独立的德国司法机构并不存在，就没有别的现实的选择，而且也不能肯定德国的法庭会做出更公正的裁决。

盟军起初设想的对纳粹分子的清洗太模糊了，而且太不加区别了。它没有把同路人与那些犯重罪的人区别开。因此，实际上每一个公务员和每一个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上出色的人都被剥夺了职位，而纳粹教师却继续教书，屠杀队的指挥官却获准回到他们过去的警察岗位上。同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意图是清除德国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精英。但这是做不到的，并且导致了德国人民的消极反对。到1951年，支持纽伦堡审判（和后来的12次审判）的德国人下降到了10%。同盟国逐渐认识到，应该尽快使德国人有一个权力机构。此外，同盟国懂得，如果想让公共服务、教育、警察和其他行政力量发挥作用，他们就不得不雇用有一些经验的人，即使这些人一度参加过纳粹组织。从道理上说，他们应当宽厚地对待那些出于害怕失去职位而较晚或被迫加入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人。但成千上万的人被牵涉进去了，占领军当局经常缺乏区别对待真正的恶棍和纯粹顺从者的信息，结果犯了许多错误。

在1946年到1947年的一年内，严厉的盟军警察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大多数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刑的人都被释放了，或者他们的定罪大幅度减轻了。特别可恶的是恢复了德国法官的地位：那些在纳粹分子手下进行政治审判的人又重新几乎毫无例外地得到了他们过去的职位。当一组主要罪犯1950年在兰茨贝格（巴伐利亚州）被审判以及其中5个被判处死刑时，德国竟出现了愤慨风暴，而这些被判决的人每一个的确都曾下令屠杀几千平民，其罪行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没有过的。但到这时，关于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的观念在德国流行起来——每一个罪犯，不管居什么样的高位，都仅仅是服从命令（“我只

是一个战场元帅——我能做什么呢?”)。根据这种逻辑，只有希特勒有罪，既然他已经死掉了，指控他的下属就没有什么意义，几下子就清洗得干干净净。因此，在 1947 年以后，对纳粹罪行的追究就逐渐不再继续下去了，到 1957 年实际上就结束了。在法占区，曾立案 66.9 万件，只有 13 人被发现具有重要罪行，958 人被认为有牵连。

在苏占区，清洗从一开始就仅仅针对主要的纳粹分子。据估计只有 1/10 的纳粹党员受到影响。如果一个教师或警员早年曾加入过社会统一党（共产党），他们的过失也就被原谅了。然而，高级官员受到了更彻底的清洗，因为共产党人想清除旧的机构，安排他们自己的年轻干部取代以前的重要官员。因此，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共产化的副产品，在东德对纳粹分子的清算要比西方更彻底。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强调这一点：他们的国家是真正反法西斯主义的。

事实上西德的情况是混合性的。50 年代同盟国不再搜查战犯，德国当局也尚未准备这样做。在这一阵间歇过去后，一场新的审判浪潮开始了。主要审判的是集中营和死亡营的前指挥官和刽子手。这些调查持续了几年，有些是几十年。一些主要的罪犯被处以死刑，也有些逃到了国外。但正义的车轮无情地滚滚向前，甚至 40 年后还在行进。

这些审判达到了一个有益的目的，它们使得人们永远不忘纳粹分子的滔天罪恶。但对这种永远要记住而许多德国人想忘掉的事情，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心理上的抵制。许多人怜悯在马伊达内克审判中被审判的老人以及其他此类案子：在事件过去几十年后，记忆已经模糊，而且证人也不再可信，开始的审判程序肯定是没有意义的。德国对那些曾积极抵抗希特勒主义的人的态度是复杂的：许多人认为，这种抵抗特别是在战

争期间无异于叛国。甚至那些拼命反对希特勒的人也面临着一种良心的冲突，因为他们不仅担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活，也担心自己的国家，那些不抵抗的人反倒得到了同情。

总之，对纳粹主义的清洗既不是彻底的，也不是一贯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许多问题是复杂的，胜利者缺乏准备，许多德国人不愿参加对自己同胞的审判，尽管这样，清洗仍然像合理地期望的那样进行下去。

对德国人来说，对付纳粹的过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痛苦的过程。明显的心理倾向是搁置这些穷凶极恶的罪行：的确，这些罪行是过分的，但这是在战争期间发生的，胜利者也不是一点没有战争罪行。此外，在战后最初的几年，所有德国人惟一关心的是为自己的家庭找到食物或栖身之所，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面对过去。只有在条件更正常时，在50年代后期，他们才更愿意面对过去。但父母仍然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公开谈论他们过去在纳粹分子手下做的（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用了20年，一些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到这时，德国正在繁荣，新一代已经走到了前台。没有人否认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曾犯下过可怕的罪行。但这不能是集体的罪恶，为什么要让想享受生活的年轻人为他们不曾做过的行为负责呢？极右派很少谈甚至完全否认纳粹的战争罪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谎言”）。左派不怀疑这些事实，但把罪责归于资本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总而言之，结论是：过于纠缠纳粹的过去是不可取的。

然而，确实在战后的几十年，民主制度在德国日益扎下根来，所以纳粹的复活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不愿意面对过去的话，这也不得不关系到这样一种信念，即新一代德国人向往着自由的（和可能统一的）欧洲中有一个民主的德国。


~~~~~  
**奥 地 利**  
~~~~~

奥地利登记在册的纳粹分子有 50 万人，包括 1938 年的 8 万名党员，那时该党还是非法的。党的官员大约有 6 万名。其中 1.8 万人在 1945 年被盟军逮捕。但奥地利的状况不同于德国，因为它被视为纳粹的第一个牺牲品，因此是一个“被解放的国家”。奥地利的清洗比德国更不彻底。这里没有纽伦堡审判，被逮捕的人数只是被扣留在荷兰的人数的 1/4。43 人被判处死刑，其中 30 人被执行死刑（相比之下法国是 750 人），这些人全都和具体的战争罪行有关联。不管曾居于什么高位，没有一个人因为是纳粹分子而被处死或服长期徒刑。在两次大赦（1948 年和 1957 年）之后，那些曾被判处长期徒刑的人也都被释放。

尽管纳粹分子在 1938 年的确入侵了奥地利，但认为它是“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的说法仍然是一种托词。在纳粹主义得意之时，在奥地利对纳粹主义的同情至少像在德国一样普遍。奥地利所有政党都主张仁慈，恰恰是因为他们许多奥地利同胞曾是纳粹分子，他们不想对抗选民，而是想尽快地同以前的纳粹分子重新整合。因此，在奥地利身居高位的纳粹分子甚至战犯逃脱惩罚的机会比德国大得多。根据半官方的学说，纳粹主义是外来的被输入到奥地利的东西。不能肯定地说，大多数在纳粹时代生活过的奥地利人都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说法肯定有利于压抑不愉快的回忆。这种不敢面对过去的做法，也为 70 年代和 80 年代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复活铺平了道路。

意大利

奥地利的清洗具有一种闹剧的色彩，意大利也是这样。历史学家把它叫做“没有发生的清洗”。可以肯定，意大利人首先迈出了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借助于同盟国而把自己从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第一步，1943年靠最高法西斯主义委员会推翻了墨索里尼。自由的意大利政府194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提出严厉惩罚主要的法西斯主义分子。最终有1万人被送上法庭，500~1000人被判处死刑，其中40~50人被执行死刑，数目要比法国少得多。几千人被判处长期徒刑，但在1946年大赦后，除极少数人外都被释放了。墨索里尼和其他一些主要法西斯主义者，如阿契勒·斯塔拉希和罗伯托·法里纳西，被私刑处死，有1~1.5万人在战争结束时和战后不久由于政党、暴民和个人的暴力而被杀掉。被杀者首先是军事法西斯主义者或提供情报者，但还有一些是因为清理个人的账而被杀掉的。

像在奥地利一样，意大利所有主要的政党，包括——在初期一阵摇摆之后的——共产党，都拥护早在1944年的大赦。法西斯主义者太多了，以致无法惩罚相对较少的人。因此，在人事问题上，法西斯主义时代和后法西斯主义时代有很大的连续性，在1945年后人们并没有真正正视法西斯主义。除了在省级层次上在右翼和中间政党的框架里，主要的法西斯主义者在战后意大利的政治上都没有起重大作用，其中大多数认真地解脱了同墨索里尼学说的联系。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战后急剧转向左派，但他们也没有追究个人或集体的过错的特殊欲望。法西斯主义时代既没有受到赞扬，也没有受到强烈谴责，

多半只是把它从记忆中抹去。

欧洲其他国家

欧洲其他国家的清洗首先针对的是德国人的合作者，而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许多法西斯主义领导人都死掉了（雅克·多里奥特在一次空袭中丧生，菲利普·亨里奥特遭暗杀），或者逃跑藏匿起来（马塞尔·迪特和里昂·德格莱尔），有些人被判处长期徒刑（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一些人被处死（维德昆·吉斯林和安顿·穆塞特）。在法国，1万情报人员、维希政权军事人员和其他通敌者在解放时不加审判而被杀掉。尽管大多数人都是罪有应得，但几百人是因为弄错或由于清理政治的或个人的私账而被杀掉。

12万多法国人被判通敌罪，其中3万人被处以徒刑，750多人被处死。到50年代初，清洗或多或少结束了，到1960年经过几次大赦，只有9人仍在服刑。然而，一些特别重大的案子却拖延下来，部分地是因为官僚的烦琐，部分地是因为罪犯藏了起来。几乎用了50年，才最终在1993年把保罗·托维叶送上法庭。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清洗的严厉程度在法国的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有时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因此，有影响的亲法西斯主义作家罗伯特·布拉西拉赫被处死。如果他能躲藏几个月，肯定他在短期关押后就会被释放。那些明显被从轻处理的人有电影工业的制片人和明星以及一般从事娱乐业的人，他们曾同德国人密切合作，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帮助招待德国军队的。

挪威的清洗特别严厉。矛头指向地方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每一个成员，大约有5.5万人，还有4万人被怀疑是通敌者。挪

威人的态度是严苛的：他们不区别对待追随者和军事人员，但许多人是只缴纳了罚金就得以解脱。大约有 1.5 万人被投入监狱，72 人被终身监禁，25 人被判处死刑。挪威人并不打算让通敌者重新融入挪威社会，结果其中大多数人一直持对抗态度：25 年后，90% 的人并不感到后悔，但其中很少人居于高位。他们在挪威战后的历史上不起任何作用。

同样激烈的是荷兰的逮捕，解放后有 12 万人被扣押。甚至在 1946 年 6 月，监狱里仍关着 7 万人。最终 154 人被判处死刑，其中 40 人被执行死刑。大约有 1.4 万人去服刑，4 万人暂时被剥夺公民权利。大多数受到最严厉判决的人是间谍和提供情报者，曾积极参与了对荷兰公民的屠杀。在两次大赦后，政治囚犯的数目到 1950 年下降到 3000 人，1964 年又下降到 4 人。然而，尽管有这些宽大政策，仍很难想象哪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能在荷兰战后政治中起很大作用。

东欧的清洗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某些国家，如波兰和今天的捷克，根本没有法西斯主义政党，除了在最基层外，通敌并不普遍。在匈牙利、克罗地亚和今天的斯洛伐克，法西斯主义政党曾掌权。但克罗地亚的主要法西斯主义分子都逃到了国外。东欧的共产党人，起初人数不多，采取了一种自由的路线，特别是对法西斯主义普通成员和青年。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几千名前纳粹分子只要不曾担任过重要职务，都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一些主要的法西斯主义分子被处以死刑，但人数不多于欧洲其他国家。从 1946 年到 1948 年，随着共产党人准备清除所有其他政党，反法西斯主义的清洗开始消失，或用于不同的目的。例如，除掉了一些政敌，这些政敌以前不是法西斯主义分子，但现在却被涂上法西斯主义的色彩。

尽管在东欧，反法西斯主义成了一个主要的政纲条目和口号，但几乎没有真正正视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除东德之外，很少出版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电视也不谈论这个话题。的确，它成了一个被禁止的问题，因为新旧政权共有的特点都是一党专政。

现在看来，对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处理不是很妥的。许多应该被绳之以法的罪犯却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逃避了审判，也有些人受到了不应有的惩处。没有做出一致的努力向人民解释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坏，它为什么造成如此可怕的后果。但重新教育几百万人没有先例，无论如何这种再教育也许不利于生产力，于是不得不让个人来回答这些麻烦的问题。今天，人们发现这些国家的人民很少知道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以，法西斯观念和法西斯主义政党能不被人注意地从后门重新登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西斯主义的教训

我们关于掌权的法西斯主义的经验是有限的。如果法西斯主义运动在更多的国家盛行并且掌权更长时间，我们的判断是不是就会根本不同呢？我们不得而知。在法西斯主义政党不是同自由的或左翼的力量竞争，而是同权力主义右翼政府竞争的地方，它们失败了。对西班牙和罗马尼亚来说尤其是这样，但对奥地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来说也是这样。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长枪党）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倾向于教会的领导人和有革命词句的上层阶级之间的分裂。其他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分子起初都来自左派或工会，倾向于采取更激进的（工联主义的）立场。随着何塞·安东尼奥被共和党人处死，他们也就失去了最天才的领袖。

在内战期间，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被迫使自己的活动服从于民族主义的事业。掌舵的是一些军事领导人，如弗兰西斯科·佛朗哥，他在所有本质方面都是保守分子。在内战结束时，佛朗哥已经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以致长枪党没有任何机会。在这个强大的权威主义的（但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权里，没有为政治反对派留下任何地盘。法西斯主义分子成了政府里的小伙计，这样他们就必须为这个政权的政策承担责任，

但又不能左右它。因此，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失去了起初具有的任何冲动，当佛朗哥政权解体时，他们没有能力成为继位的主要竞争者。

科奈留·科德莱努手下的罗马尼亚铁卫军是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最激进的，近乎提倡一场社会革命。他们不仅同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斗争，而且也同（“世界主义的”）君主制度和统治阶级斗争。在 1937 年的选举中，铁卫军成了第三大党。甚至政府人物对科德莱努的暗杀，都没有阻止他们的进展。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个国家却被一个军事独裁者（扬·安东尼斯库）所接管。尽管铁卫军向他进行挑战，但他们在 1941 年的造反还是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者较为幸运：他们未能推翻南斯拉夫的君主制度，但 1941 年当他们的国家被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所入侵时，乌斯塔莎分子在地方教会显贵的帮助下—举成为新的统治者。

奥地利的情况甚至更复杂，因为德国纳粹分子在这里有大量的支持者，但右翼亲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派从墨索里尼那里得到启发，支持当时的基督教—保守派政府，拼命反对同德国合并。只是到了德国坦克在 1938 年开进奥地利时，卫国派才被击败。的确，纳粹主义起源于奥地利，希特勒甚至在 1932 年以前还不是德国人，但天主教会在奥地利的影 响是强大的。他们宁要奥地利的独立，也不愿同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合并，所以更多的是支持墨索里尼而不是支持希特勒。

匈牙利的法西斯主义是惊人地强大的。在 1939 年的选举中，箭十字党几乎赢得 1/3 的选票。但像所论述的其他国家一样，匈牙利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独裁者米克罗斯·霍尔蒂海军上将根本不愿同这些极端分子分掌权力。箭十字党的辉煌之时是 1944 年，那时霍尔蒂承认战争已经失败，同俄国和同盟

国开始和平谈判。德国人迫使他辞职，并在此后几个月占领了匈牙利，箭十字党成了新的统治者。

西欧的法西斯主义，同东欧形成对照，是从已有的政党中产生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曾是英国工党的很大希望（在他成为一个保守分子之前），雅克·多利奥特曾经是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马塞尔·迪特曾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党人，维德昆·吉斯林曾是一个保守分子，比利时的雷克斯主义者起初是比利时天主教主义的青年运动的代表。

雷克斯主义者同他们的佛兰芒盟友一起，在1936年的选举中赢得了19%的选票，显示出他们当时是西欧法西斯主义政党中最强大的。不管是比利时的法西斯主义者还是荷兰的法西斯主义者都没有把种族主义作为他们基本政纲的一部分。像西班牙和英国的法西斯主义一样，比利时法西斯主义者的领袖里昂·德格莱尔把他的运动首先看作是年轻人对破产的老一代的造反。比利时法西斯主义者在1936年后开始衰退。荷兰的纳粹分子也是这样，他们的成员缩减了1/3。这两个政党在30年代后期都是更激进的，在德国占领下吸引了新的支持者。

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分裂成几个集团，但在德国占领期间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占领军管理国家。尽管这使得他们得到了许多有影响的职位，但合作主义使得他们的主张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族的运动。甚至右派的爱国者——尽管他们非常仇恨英国和讨厌犹太人——也不会同通敌者保持一致。

还值得一提的是拉丁美洲的法西斯主义或像阿根廷的唐·庇隆^①

^① 庇隆（1895—1974年），阿根廷总统。1943年军官团政变成功后，历任劳工部长、陆军部长和副总统；1945年在亲美政变中被迫辞职；1946年当选为总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庇隆主义党”，宣传民族主义——译者注。

或巴西的格图里奥·瓦加斯^①的“新国家”（1938—1945年）这样的政权。虽然这些运动包含有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因素，但它们在最重要的方面是与之很不相同的：拉丁美洲的政治条件非常不同于欧洲的政治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灾难性的后果并没有触及到这里，没有任何“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此外，在拉丁美洲根深蒂固的政治天主教主义中有对法西斯主义的抗衡。不论是在巴西还是在阿根廷，都没有建立一个可怕的国家政党，没有任何精心阐述的学说，宣传不是无孔不入的，没有集中营，没有强大的军国主义，没有领土扩张。这些政权是反自由的、反民主的，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瓦加斯从葡萄牙的合作国家中得到启示。像安东尼奥·萨拉查^②一样，他拒绝纳粹的“异教的恺撒主义”。庇隆主义是土生土长的民粹主义，在倾向上更激进，而且更能动员群众，但在性质上不是法西斯主义的。

哪怕对这些较小的或不成功的法西斯主义分支进行粗略的考察，都会看出，经济大崩溃和自由国家削弱之后，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专制或至少是权威主义统治的倾向。这种“一体化主义”倾向并没有导致十足的法西斯主义。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是因为这些地方法西斯主义者所处的条件不如1922年的意大利和1933年的德国那么顺利，也有时是因为他们内部分

^① 瓦加斯（1883—1954年），巴西总统。1930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出任总统；任内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宣布一切政党为非法，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实行独裁统治；1945年被军事政变所推翻；1951年复任总统；1954年8月因其统治被军人政变推翻而自杀身亡——译者注。

^② 萨拉查（1889—1970年），葡萄牙独裁者。1926年军事政变后，任财政部长，逐渐掌握政府实权；1930年创立法西斯政党“国民同盟”，自任首领；1932年起任总理。执政期间，对内制定1933年宪法，搞法西斯式的所谓“合作和权威国家”——译者注。

裂或缺乏领袖，或因为他们在政治论坛自己一方出现了难以对付的竞争。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法西斯主义国际”。1934年和1937年曾有过某些使国际法西斯主义制度化的半心半意的创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各种场合表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打算输出”，他们也许是言不由衷的。但他们还是说出了真谛，因为以极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为世界观的政权不可能有世界性的号召力。尽管一些法西斯主义分子梦想一个统一的路西法的欧洲，但这些都是幻想，而不是实际政治。

此外，不能错误地认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像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一样是预先注定的。更勇敢的和不怎么懒散的民主领导人本可以阻止某些（或者所有）法西斯主义领导人，采取有力措施对付其追随者的任何违法行为。如果他们及时地采取行动，他们能够防止冲锋队在街头上横行霸道。我们不能断定这些措施会非常充分，问题是他们从没有努力去这样做。如果纳粹分子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分子掌握了议会的多数，该如何办呢？即使在危机的顶点这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只有得到盟友的支持才能掌权。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或至多一小撮领导人的出现。清除了这些领导人，他们的党就不会是那种一直崇尚暴力的东西。一旦他们面临坚定的抵抗，他们就会士气低落。由于这种运动离开了持久的推动和成功便难以继，他们的影响就会消失。但他们从来没有用武力来抵抗法西斯主义，按当时德国和意大利统治集团的世界观和心理学，进行这种尝试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保守派中间，在教会，甚至在普通的不关心政治的人民

中间，有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普通的不关心政治的人民本能地知道更复杂的人所不能把握的东西——法西斯主义是邪恶的，必定导致一场大灾难。但是，一旦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大多数人——现有机构、保守派、中产阶级和教会——愿意接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这些大多数人对法西斯主义经常不抱赞同感——因为法西斯主义看起来是太不可捉摸的，它的方法太粗俗——但在还过得去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的财富和成就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就抵消了它的否定性方面。一旦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掌权，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也就为时已晚。新主人的成功获得了许多以前无责任感的人的同情。法西斯主义国家垄断了传媒，从而使得反对者不可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恐怖机器首先使得任何有组织的抵抗都成了不可能的。在法西斯主义掌权之前，才有抵制法西斯主义的机会。

为什么没有提出更大声的警告呢？一个原因是，当时没有广泛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后果；也许一些人，特别是独立的观察家、极少数政治家及其政党是例外。

现在考察当时的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是令人迷惑的。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了解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点和动力。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自由主义教会史学家留吉·萨尔瓦托莱利，他在墨索里尼掌权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民族法西斯主义》）中，敏锐地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它起源于1915年“干预危机”，它的民族主义特点是理解它的钥匙，它早期的基础主要在下中层阶级。萨尔瓦托莱利的文章是为一家报纸写的，在它们首次发表70年后又得以出版。一个重要的前共产党人安格罗·塔斯卡的著作也是如此。他的著作最早出版于1938年，由于不听命于任何党的路线而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评价。塔斯

卡的著作现在仍是值得一读的，但应该记住他是在“向罗马进军”15年后写的。

在德国，许多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尽管反感纳粹主义，但都低估了希特勒和他的运动。他们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庸人，一个蛊惑民心的地方政客，一个对社会渣滓有号召力的夸夸其谈的人。他们还错误判断了纳粹主义的爆发性特点，直到很晚才明白这一点。一些最敏锐的评论家不是来自政治家或职业政治观察家，而是来自在自己的领域里地位不确定的文学家。维利·施拉姆是其中一个，当时他是一个左派人士，1933年初进行写作。他看出了纳粹主义的可能的深刻影响和持久性，当时这样的悲观主义的评价是凤毛麟角的。

一种最有激情的谴责声来自极右派的一位作家，他的日记只是在战后才得以发表。如同左派所看到的，弗里茨·莱克·马莱切文出于各种不正确的理由反对希特勒：希特勒是下贱的人格化，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恶魔式的革命者，他想推翻一切既定的秩序。正是由于强烈的信仰道德价值——一种在当时并不时髦的态度——莱克·马莱切文开始把希特勒主义看作是德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他死在了集中营，是右派中遭此命运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德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观察家从未对法西斯主义抱有任何幻想。然而，大多数人又的确没有看出它的真正面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政治的盲目性，但一般说来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在基本方面是一种新现象。把同以前的政权进行比较，经常容易犯错误。甚至20年代意大利的经验也对理解几年后的纳粹主义没有太大帮助。这两个国家的差别是相当大的，领袖的意识形态动机和野心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另一种极端的右翼政党，或军事专制。在某些方面，法西斯主义是转变成种族帝国主义的传统民族主义，是用极权主义的国家或至少用一种力图接近这一理想的政权取代旧式的专制。

对法西斯主义的错误解释并没有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垮台而消失。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在承认法西斯主义者罪大恶极方面极力把法西斯主义“历史化”，以便回避它的特点。在他们看来，这种特点在道德判断和谴责的彼岸是合适的观点。研究一般法西斯主义的各种模式的政治科学家，选择了新的方面和修正主义的方式。

这些为法西斯主义下定义或至少寻找一个公分母的企图，总会碰到一个我们多次提到的障碍：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法西斯主义，它们是彼此有别的。在各种环境下，所能合理地期望的一切只是“法西斯主义的最低限度”，如共同信仰民族主义、等级结构和“领袖原则”。一切法西斯主义都是反自由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们也是反保守的，因为它们不想服从任何旧的机关，而是想用新的精英来取而代之。法西斯主义依赖于一个国家政党的存在，而且程度不同地都依赖于对宣传的垄断以及威胁并使用暴力对付反对者。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最低限度”是很不完整的，但它对于大部分目的来说是足够的。任何超越它的企图在过去都失败了，而且在未来也不可能成功。

中 篇

新法西斯主义



新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新法西斯主义在哪个方面不同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呢？它仅仅是 30 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新的更脆弱的形态吗？做出一个不含糊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法西斯主义都有许多变种。有些属于极右派的传统，还有一些忠诚地按照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来塑造自己。所有这些形态都共有某些重要的特点，如狂暴的民族主义，信仰国家的权力和民族的纯洁，仇视自由议会的秩序，一方面反对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

新法西斯主义只有适应变化了的条件，才能聚集起力量。对元首和领袖的崇拜已经不时髦了，类似的领袖已经不出现在阳台上了。如 1993 年至 1994 年意大利的西尔维奥·伯鲁斯科尼政府所证明的，传媒（宣传）的影响是强大的。一种新的选举已经出现，至少短时期能创造奇迹。尽管民族主义的号召力仍是强大的，但在欧洲它是一种防卫的力量，而不是一种侵略性的力量，战争似乎被排除了。极右派并没有垄断民族主义。在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左派和右派同样都是民族主义的。

新法西斯主义已经认识到军事侵略和征服不再是可行的，从而选择了维护欧洲。这决不意味着一种革命性的转折，因为

希特勒在战争开始失败后，也会表现为欧洲的维护者。但这种姿态主要是出自挫折，而不是出自真诚的信念。

维护欧洲是寻求一种使命的运动的某种逻辑，甚至随着来自东方的直接危险已经消失，欧洲经济的和人口统计的（而且最终也是政治的）压力也在不断增长。但对欧洲的有效维护必须建立在更紧密的一体化上，而不是建立在大多数新法西斯主义者的设想上，它是同他们的固有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相冲突的。

新法西斯主义者赞美欧洲伟大的过去和未来。他们并不关心现在，现实的欧洲，欧洲联盟（他们其中许多人都反对）。他们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洲货币。他们着迷于尚不存在的“某种欧洲观念”，但他们断言这种观念将在他们领导下最终被创造出来。一些新法西斯主义者，主要是东欧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出于各种理由并不急于同西欧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密切联合。

新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随着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减少，也许除了在精神文化的层次上，美国的威胁也在衰退。欧洲的、中东的极右派，一直是反美的。甚至在冷战风行时，新法西斯主义一般也支持某种形式的中立主义（经常被叫做“第三条道路”）。一些人勉强地接受北约，其他人则参加反核示威。关于欧洲是一个“被占领的大陆”的观念决不是出自表面的。

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已成为历史。于是，极右派尽管缺乏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经济纲领，但反资本主义肯定在他们中间摆到了突出位置。他们一贯反对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跨国公司 and “华尔街”，但他们从没有说清楚他们想提出什么目标。在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者一般都提倡自给自足，但现在

这不再是可行的，而且新法西斯主义者也没有打算消灭股票交易或增强国有制。他们没有澄清他们对国家福利和税收的立场。他们许诺保护“民族的中产阶级”，反对外国资本家。但这种概念不能应用于 20 世纪后期的条件。某些（但不是全部）新法西斯主义者主张，国家应比美国的做法更多地干预经济。这是他们和其他许多政党，特别是左派政党共有的观念。

新法西斯主义者打算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反对吸毒者和色情文学作家，恢复家庭价值。这些“价值保守派”还主张需要为保护环境做更多的事情。的确，生态学的关心已经成了他们 90 年代宣传的一个核心问题。但他们不是这个领域捷足先登的人，所以任何把纳粹分子连同他们的“血土”信条解释为不成熟的和被误解的绿色行动的企图，是没有说服力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提到了森林的毁灭、空气中臭氧层的破坏、污染的危险。他们表达了对当代女权主义的非难。但这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尽管他们嘲笑同性恋亚文化，但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如德国的迈克尔·库南（死于艾滋病），却是同性恋者。

关于宗教，新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党的路线。一些新法西斯主义者实际上是基督教徒。他们支持同教会密切合作，如在俄罗斯，但又不过分依赖教会。更偏执的人支持一种新异教，但他们新异教的神决不是一致的。一些极端的右派人物，出于真诚的信仰或出于机会主义，声称他们依赖于传统的基督教，但其他人则选择了赫勒那·布拉瓦斯基和艾利斯·贝莱的神智学传统。这些各种各样的深奥的信条，在 60 年代作为嬉皮士的良心升华崇拜的一部分而重新出现。这些深奥的教义虽然不是民族主义的，甚至也不是狭义上的政治的，但它们在深层上是反理性的，倾向于混淆善与恶的区别。道德性被生态伦理学所

取代，善就是对这个星球好。然而，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庸医宣扬的神秘的观念在纳粹主义的诞生中起了作用，但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那里要少一些。这些观念经常和一种设想大陆人口灭绝的新的（绿色的）乌托邦主义（或“生态法西斯主义”）一起出现。新时代和新法西斯主义观念之间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如果善就是对我好的，各种反对别人的极端措施都能证明是合理的。照此看来，新法西斯主义可以解释为一种极力填补由宗教衰落造成的精神空虚的运动的一部分。

现在真正新的政治观念已经死亡。主张法西斯主义的专政几乎是不可能的，其结果新法西斯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但意识形态的模糊性还有某些优势。新法西斯主义者的主要希望是成为旧的自由民主制度崩溃的清白替代物（如在意大利），或者是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后的混乱状况的清白替代物。在这些环境下，如果法西斯主义者不太认真地确定自己的目的，是太好不过了，因为这可以避免同他们想吸引的一些人相对抗。

对新法西斯主义者来说，成为秩序的政党、民族复兴的政党、维护自己的国家（和欧洲）反对贪婪的或寄生的外籍人的政党，就足够了。得到尊重比建立一个详细的一致的学说论坛更重要。70年前，纳粹分子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纲领都非常简短，几乎不被人们所注意。但缺乏纲领并没有严重妨碍他们取得政治进展。可以肯定，新法西斯主义的确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和精神导师，但必须以适当的眼光来看待它们的功能：它们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新法西斯主义的基本信条是很少的并是简单的，对当前的政治行动来说是足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是可以留给知识分子去做的事情。新法西斯主义斗士胜任的事情是，本能地知道他们代表什么，即使他们在政治

哲学上没有达到发达的程度。

法西斯主义在传统上立足于神话、直觉、本能（如权力意志和血腥发言权）和非理性，而不是立足于在详细分析历史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趋势的基础上认真论证的体系。现在这些也没有改变。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一直是边缘性的人物，如著名的《20世纪的神话》的作者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但一个德国人是否由于读了罗森伯格的杰作而皈依纳粹主义，是很值得怀疑的，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也是如此。这些思想家肯定是边缘性人物，因为他们仅仅是解释者：元首和领袖是先知，掌握了全部智慧。然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很少有意识形态的野心。他们的野心是创造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他们想成为行动者，而不是思想家。法西斯主义的基本信条过去是（现在也是）不证自明的：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对领袖、新贵族政治和服从的需要，否定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理想。

没有一个光头党人、“法西斯流氓”、“街头恶棍”读朱里奥·埃奥拉或阿兰·德·本诺伊斯特的著作，对让-马里·勒蓬的党、德国或英国的极右派、奥地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极右集团的大多数选民来说也是这样。毋宁说，这些集团是在事后考虑才有了意识形态，因为他们会觉得没有一种理论就不完整。

这些思想家对极右派的政治领导人、对斗士中间的有文化的分子起某种影响，但他们在这个圈子之外大多是无名气的。他们中间有朱里奥·埃奥拉（1898—1974年）。他最初作为一个公开的反教会作家出现在意大利舞台上，属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派。在这一方面，人们在他和罗森伯格之间可以找到某种相似性。惟一不同的也许是，在纽伦堡被吊死的罗森伯格在有生之年是相当知名的，但死后完全被遗忘了。而埃奥拉

在法西斯主义失败后却有了影响，但他不属于墨索里尼手下的高层领导。墨索里尼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多少被拔高的知识分子（在法西斯主义的词汇里这决不是赞扬），因为法西斯主义很少有能够著书立说的真正信徒。埃奥拉是一个固执的反犹太主义者，甚至是共济会教徒更猖狂的敌人。在战争结束前的空袭中他受了重伤，成了跛子。但由于他不是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战犯，在被判处短期徒刑后得以解脱，继续出书。他所影响的人有皮诺·劳迪，继吉安弗兰克·费尼之后成为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者的领袖。吉奥吉诺·阿尔米兰特吹捧埃奥拉是“我们的马尔库塞，只会更好”。埃奥拉的一些著作在法国和德国也出版了，还专门为他在索邦大学召开了一次大会。在1988年后，俄罗斯极右派的一些思想家也拥戴他为新的精神指南。

埃奥拉的思想是什么呢？我们曾提到过他的异教。他宣称，基督教造成了罗马帝国的垮台，这是他和德·本诺伊斯特共有的论点，但最迟自吉本以来都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自己的反天主教著作，埃奥拉承担了未来的保罗六世教皇吉奥万尼·蒙迪尼所说的任务：“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主张精神的激动。也就是说，稀奇古怪的理智主义和神经质，有意培植不可理解的东西，伪神秘的矫揉造作，着迷于从东方喷发的精致药物中提炼出来的希伯来神秘主义。”^①对26岁的埃奥拉的这种描述，就像后来的评论一样准确。这位未来的教皇还应指出埃奥拉包含有达达主义，因为埃奥拉开始自己的生涯时是一个达达主义的诗人和画家（他这一时期的一些画作在罗马一家博物馆仍能找到），而且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也有纯粹胡说八道的因素。

^① 《研究》1928年6月，第324~328页，引自理查德·德拉克：《朱里奥·埃奥拉，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和拉特兰的记录》，载《天主教历史评论》1988年7月，第411页。另见托马斯·舍恩豪斯：《神话与暴力》，载《社会研究》1981年春。

他认为自己既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也是一个首屈一指的革命者，一个反历史的形而上学家，一个反平等主义者，一个反人道主义者，提倡直觉高于理性，信奉等级制度和“精神的男子汉气概”。他反对现代文明和自由，认为现代自由人仅仅是被解放的奴隶，被美化的贱民。

然而，诸如此类的观念决不是新东西，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思想史上是可以找到的。它们有一点尼采的东西和一点索列尔的东西，从荣格那里借来了“政治战士”的概念，还有本格森和威宁格以及德国右翼文化悲观主义的痕迹，一点莫斯卡和帕累托的东西。当年意大利的一些青年造反者在埃奥拉那里，假如不是得到一种首创的精神的话，也会找到一种血缘关系。

我们如何解释 1945 年后的一些圈子里对埃奥拉的持久兴趣呢？他的风格是放肆的，不熟悉埃奥拉著作的人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他的机智的炫耀和故意的模糊是独创性、智慧和深刻的表现。此外，埃奥拉利用了加以修正的斯宾格勒历史循环理论，经常涉及到东方的主要是印度的哲学。这些做法是有意制造一种才华横溢的印象。

尽管埃奥拉声称从事纯哲学思维（“元政治学”），但他却忍不住要评论近代历史和眼前事态。他的判断通常是灾难性的。在 60 年代，他选择了恐怖主义，而不是去为新法西斯主义争得好名声。他的伟大英雄不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是罗马尼亚神秘的恐怖主义者科德莱努，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最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尽管埃奥拉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但在观念上他也同样反对西方。美国代表着民主，但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和民主没有根本区别，他一般都称之为“精神的梅毒”。埃奥拉对超议会的意大利右派，如新秩序有相当大的影响。当

他被送上法庭时，他的门徒声称他们的革命主义不是暴力的，只是为了自卫。实际上，意大利的极右派还没有强大到能从事全面的暴力斗争的程度。他们会被国家所粉碎，所以明智地不去进行这样的对抗。埃奥拉死后，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就衰退了，复兴的希望很渺茫。90年代当它又获得一种新的动力时，却不是靠得埃奥拉的智慧。

歌德就克洛普施托克^①说的话，肯定也适用于埃奥拉。每一个人（右派的）都欢呼埃奥拉，但很少人读他的书。埃奥拉根基于的时代，已经随领袖墨索里尼而结束了。也许除了关于衰退和堕落、唯物主义和大众民主、吸毒和反常的泛泛哀伤而外，他的著作是同当代世界格格不入的。但这些抱怨不是极右派的专利。埃奥拉是一个有学问的庸医，一个折衷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创新者。

提供一种更现代的学说的尝试是由法国新右派来做的。法国新右派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集团，其最知名的人物是阿兰·德·本诺伊斯特，本诺伊斯特的著作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大量的读者。对他们学说的兴趣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达到了最高潮，此后他们就不怎么被注意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内部分裂，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主要是因为他们仅仅是重复而已。

新右派故意同传统的右派形成对照。虽然他们认为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大多是正确的和健康的，但他们也认识到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同当代世界不再有什么关系。所以，对传统的右派，新右派只是表示轻视。他们把极权主义（对不起墨索里尼

^① 克洛普施托克（1724—1803年），德国诗人，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创作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先声——译者注。

和希特勒了) 视为一种重大危险, 是一种仅仅同要吞没欧洲的美国生活方式相等的威胁。他们并不宣扬领土扩张和侵略战争——由于他们浸透着法国爱国主义, 在他们的学说中也就极为强调欧洲的地位。德·本诺伊斯特和他的同伙也不拥护庸俗的生物学种族主义。他们认为, 每一个种族和民族集团都有自我表现和自决的权利 (“种族多元主义”)。但他们的种族等级的概念又被认为是 “真正科学的”, 是建立在人种学 (康拉德·劳伦兹) 和行为心理学的发现上的, 以及现代遗传学上的。在思想上, 新右派愿意借用左翼思想家的思想, 如安东尼奥·葛兰西。出于害怕法国的思想正统派, 德·本诺伊斯特在欧洲议会的一次选举前夕宣布他投票支持共产党人。但由于不存在共产党人靠本诺伊斯特的选票而赢得选举的重大危险, 这种威胁也就没有受到严肃对待。

在起初的一段犹豫之后, 新右派的学说开始被视为严肃的, 也被视为缺乏新颖性的。但由于它的主要发言人是有所谓的大学的毕业生, 起初对他们也并非不太重视。诚然, 它的思想家有广泛的读者面, 有各种各样的来源: 法国行动派和德国保守的革命分子 (1920—1932 年), 尼采、卡尔·施密特、埃奥拉和反美主义。从埃奥拉那里, 新右派得到的是新异教和这样一种信念, 即犹太—基督教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要对近两千年西方历史上经历的所有错误负责任。这些观点不仅必定冒犯一些德国的极右派, 而且还是使法国产生争论的一个原因——在法国, 勒蓬和极右派的其他主要人物要么力行天主教, 要么至少不想同教会有麻烦。

新右派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学术界盛行的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的一种反动。然而, 每当新右派成为时髦之时, 法国左派的亲苏主义实际上就消失了。德·本诺伊斯特攻击的

主要目标指向了“美国主义”（还以“可口可乐文化”和“麦当劳主义”而知名）、自由主义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他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替代目标，而是泛泛提到需要新的精英，以及算术式民主的有害后果。新右派总是对自己专注于长期的文化革命感到自豪。在它的出版物中，电影评论要比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多得多。的确，考察新右派的意识形态，就像是去一家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超级市场（或公墓），就像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综合而挑选出来的。

新右派及相关的集团极力寻找一种反左派的意识形态替代品。但不像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他们不得不从政治上脆弱的地位出发。在核时代，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能奢望大国的地位；统一的欧洲充其量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战争不再被当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然而，在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那里，权力和（军事）炫耀、牺牲和英雄主义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的后继者必须寻找不同的观念和偶像。

新法西斯主义者指责新右派以新左派为榜样在毫无结果的理论讨论上浪费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新法西斯主义者恰恰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政治舞台的规模大大缩小了，为光荣的梦想留下的地盘很小，法西斯主义要适应小人国的状况。新右派的意识形态装备非常类似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装备，也就是说，意味着非生物学的种族主义，欧洲社会和文化（堕落）被美国化的危险，精英至上，政治机构的等级结构，抛弃议会制度。求助于一种“向往东方的倾向”，是对20年代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怀旧。

新右派和法西斯主义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承认只有动员群众才能影响政治变化。而新右派想回到19世纪初的精英治国论观念，也就是说，使普通人民处在政治之外。失去了侵略性

的沙文主义、军事力量和战争的法西斯主义，充其量是防卫的法西斯主义，打算把欧洲从外国人的入侵下解放出来。福利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在精神领域仍然是一种激进的力量，但政治现实紧紧地限制了它在欧洲的行动自由。它根基于不满的抗议和感情，而不是对即将到来的民族复兴和政治救世主义的信仰。极右派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复活，是同普遍的不满、犯罪、移民和政治体制的失灵有关的。它同埃奥拉、德·本诺伊斯特及其推广者的“英雄的悲观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意 大 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最早登上舞台，而且在 1994 年它还第一次暂时地在右翼—民粹主义联盟中掌了权。MSI（意大利社会运动）是在 1946 年以前的半法西斯主义集团“普通人民运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初期和从 1969 年到 1987 年，它的主要发言人和总书记是吉奥吉诺·阿尔米兰特。他曾是墨索里尼手下的《维护种族》这一出版物的主编，曾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更激进的组织形式萨洛共和国（1943—1945 年）宣传部任高官。

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近 50 年的历史是一个起伏不定的历史。它在 1948 年仅仅赢得 1% 的选票，在 1972 年吸引了 270 万张选票，在议会中有 56 席（占 8.7%），只是在此后的 20 年里才下降。它后来在 1994 年达到了新的高潮，吸引了 13% 的选票，成为意大利的第三大党，伯鲁斯科尼政府的关键成分。

由于意大利战后的宪法禁止法西斯主义，MSI 不能公开宣称它信奉墨索里尼的理论和做法。但它把萨洛共和国（到 1990 年大多数意大利人几乎都把这个共和国忘记了）当作自

己的偶像，这却不是什么秘密。MSI 并不主张废除议会民主，而是主张直接选举总统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及限制政党的影响。

MSI 从一开始就奉行双重战略，声称它信奉价值和墨索里尼的好政府，同时断言 MSI 是“后法西斯主义的”，并非一切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东西都得到赞许。无论如何，政治形势不再是 1922 年或 1943 年的形势。在提倡街头暴力的同时，MSI 又想作为意大利民主的一个支柱受人尊敬。诚然，现在看来这些喜欢双排纽扣服装甚于喜欢恐怖主义炸弹的实用主义者，比起那些公开主张暴力的人更有利于这个政党。如果意大利政治制度最终崩溃了，这是由于它自身的失败，而不是因为被放置在火车站上的炸弹所动摇。

MSI 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从萨洛共和国的精神——非常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精神——皈依到民主的比赛规则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对不同的民族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向罗马进军”之前法西斯主义作为反对派，肯定比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墨索里尼政权更激进，萨洛共和国是复归于法西斯主义的开端。MSI 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政党。它一直有一个右翼、一个左翼和一个中间派。它的历史是多次分化与合并的历史。

初期的 MSI 在它的第一任主席朱里奥·伯格塞王子（潜水艇指挥官和反党派的战士）领导下，在它的声明中显示出是激进的。但在 1950 年后，温和派占了主导地位。反美的、反西方的、反北约的倾向蛰伏了几年，70 年代复活，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到今天。对国内战线，MSI 从 50 年代开始加以关注。

它帮助天主教民主党^①选举了共和国总统。然而，到了60年代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主教民主党不得不接受“向左派开放”政策，也就是说，同社会党人合作。在这种环境下，不再需要MSI了，MSI成了一种使人感到麻烦的东西。

对MSI中主张议会方式的保守力量（同时君主主义者加入进来）来说，这是一次冲击。MSI的“左派”尖锐批评他们的领导人“背叛”过去的法西斯主义理想，始终拥护一种超议会的战略。这意味着暴力和“紧张的战略”。MSI的右派则受到反对议会的左派集团如红色旅的影响。MSI的“革命”一翼以党的青年和学生宗派为先锋，产生了分别由皮诺·劳迪和斯蒂法诺·德拉·查伊领导的新秩序和民族先锋队。他们的导师是朱里奥·埃奥拉。同时他们敬重切·格瓦拉——他们给予了他很高的赞美。

阿尔米兰特起初是激进路线的支持者，1970年重新就职，极力把受社会尊敬的方式与同情非法或半合法地竭力仿效红色旅的青年集团结合起来。在米兰以及后来在布雷西亚和波洛尼亚发生了重大的恐怖主义攻击，同时制定业余秘密计划，借助于军队和秘密机构进行希腊或智利式的政变。在1972年的选举中，MSI取得了它最大的成功，但不是因为偶然的爆炸或密谋活动，而是因为民众害怕左翼一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急躁地支持一种相反的力量。

红色旅运动的气力正在枯竭，社会不仅没有不稳定，反而增强了——至少暂时地——民主力量之间的团结。国家平静下来，继反恐怖主义战役之后，右派的崇尚暴力者像左派的暴力

^① 照字面应译为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但据文中所谈，实际上是指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故按通常用法，改为天主教民主党——译者注。

主义者一样受到严重打击。他们的组织被粉碎了。他们的领导人和好斗分子逃到了国外，或者被逮捕了。到 70 年代后期，MSI 放弃了它的革命立场，返回到“好天主教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更安全的基地。它在反堕胎、反离婚和支持实行死刑的运动中起了领导性作用。80 年代社会党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会见了 MSI 领导人。此前他曾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极右派不要处于在野党的地位，而要重新结合进政坛。尽管有这样的姿态，MSI 仍然是孤立的，它的议会党团被无视。它对政府机构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反对，它的选票停滞，甚至下降。

阿尔米兰特 1987 年辞职后，由革命派领袖劳迪继任一段时期，最后是他选定的继承人费尼接任。费尼是一个青年领袖，不容忍那种曾使 MSI 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战略，主张“后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领导他的党在 1995 年取得胜利。相应地在 1995 年 1 月的菲乌吉大会上，MSI 决定把自己改造成一种更广泛的政治运动，并把它的名称改为民族联盟。

前 MSI 的候选人和成员的构成是可以确切知道的。它主要是一个南方的政党，在罗马和罗马南部有自己的堡垒。甚至在它的运气最不佳时，它仍能指望在罗马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城市有大约 10% 的候选人，在卡塔尼亚和西西里的其他城镇高达 20%。在北方工业区，MSI 一直是相当虚弱的，因为它的对立面是左派，在后来几年，还有伦巴第联盟。在罗马，MSI 的大部分支持者来自以前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受益者——失去了职位的国家和政党的雇员（在东德解体后，共产党在东柏林仍有选票也是基于这种现象）。

MSI 是一个非宗教的右派政党，它的激进的甚至革命的口号使天主教会感到害怕，天主教会尽可能地支持天主教民主党人。MSI 是一个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政党，而不是中年人的政

党。它在传统上对男人比对女人更有吸引力。被右派吸引的妇女在 1994 年的选举中更可能会支持伯鲁斯科尼。然而，这个党还吸引了一些知识分子和其他职位高的人。1994 年伯鲁斯科尼政府中的两位部长不是它的党员，却是它的追随者。

然而，总的说来，费尼从阿尔米兰诺继承下来的遗产是没有希望的。该党仍然没有任何进步。恰恰相反，在 1989 年欧洲选举中它丢了分，其他政党占了上风。如果说有不断增长的对外国人的愤恨的话，那也不是 MSI 的专利了。此外，伦巴第联盟（和其他联盟）吮吸了以前也许会给予新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这些联盟认为，繁荣的北方受到了落后腐败的南方的全面剥削和破坏。

MSI 没有利用这种论点，因为它主张意大利的统一。它不可能背弃作为它传统的力量基础的南方。如果 MSI 的运气在 1992 年后戏剧般地有所改善的话，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费尼的领导，因为他甚至比阿尔米兰特更强烈地认识到党不得不抛弃它的暴力分子，或至少使他们保持沉默。但同时费尼又不能不容忍核心的法西斯主义分子，所以不得不在“不放弃——不恢复”的口号下认真地进行平衡。

费尼声称墨索里尼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但同时他又去纳粹分子在战争结束前进行大屠杀的阿尔戴丁洞献花圈。他发出了一个好欧洲人应该有的大部分声音，同时又声明把安亚得里亚海看作意大利的领海。他肯定，意大利有理由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提出领土要求。费尼还改变了党的名称，以致墨索里尼的孙女竟宣布她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而是一个“墨索里尼主义者”。当费尼被问及法西斯主义是不是一种错误时，他回答说，它曾是一个历史阶段，是一种有着真诚和良好管理传统的社会进步的力量，所以不应被丑化为恶

魔。

然而，单是敏锐机智不会把后法西斯主义者推进到强大的地位。如果当初不是出于危机和旧政权的最终垮台，法西斯主义分子也就不会有所突破。天主教民主党人——单独地或同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合作——自 1945 年以来没有中断地统治着这个国家。对旧面孔的不满意和普遍的厌烦表现为越来越多的选票反对当局和对民主制度的冷漠。这种“一党制度”值得维护吗？

进而，随着一支新的独立审判的队伍调查政治家的活动，对腐败的揭露——长时期都有怀疑但很少有证据——动摇了这个国家。这导致朱里奥·安德雷奥蒂、德·米切里斯和旧政权的其他支柱，以及主要的国家官员和商人被逮捕，引起了一场政治地震。只有两个主要的政党没有实质性地被卷入腐败，前共产党人和 MSI。但共产党人——尽管他们也改变了名称并在 1993 年至 1994 年和其他左派力量从事共同的事业——为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的挫折所阻碍。在这些环境下，“后法西斯主义者”注定成为主要的受益者。然而，有理由假定，他们也曾同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黑手党合作，但同北方交易的数额相比，这些算不上大买卖。

1993 年秋季的地方选举，继而 1994 年的大选预示着 MSI 的崛起。费尼得到 47% 的选票，亚历山德拉·墨索里尼以微弱之差落选罗马和那不勒斯市长。他们是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城市里为联盟赢得的选票分别是 25% 和 19%。在大选中，民族联盟票数增长一倍。它成了第三大党，它有有利的机会进一步改善它的地位。但前景实难确定，因为意大利一直有大批的流动的选民，几乎任何方向的潮流都能左右他们。

法 国

法国极右派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但在何种程度上它是新法西斯主义的呢？对德国的新纳粹分子和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分子来说，30年代轴心国的强大是值得怀恋的榜样。然而，对法国来说，只有维希政府^①，甚至菲利普·贝当元帅的坚定维护者也不认为他的政权能成为值得仿效的榜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过几次变形，法国右翼极端主义的潜力已经耗尽。在1945年后的最初几年，它的主要支柱是后继的君主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法国行动派，即介于战前传统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东西。他们的队伍靠战后清洗的牺牲品而膨胀——维希政权的受益者和30年代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头目，其中许多逃避了惩罚。但这些集团不论在议会中还是在街头，都势单力薄：对德国占领记忆犹新，以致法西斯主义不可能有大的复活。可以看到极少数同情者在星期天早晨在教会门前出售他们的刊物，但购买者不多。

1953年当皮埃尔·波杰德的商人和手艺人保卫联盟登上政治舞台时，一次新的复兴到来了。在1956年的选举中，差不多是突然间他们赢得了12.5%选票，也就是250万张选票。波杰德主义者利用了反自由的、反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的和普遍排外的口号。但这一运动本质就是其名称所标明的，即一个农场主和小商人反对高税率的大游说集团。它的基础是地方性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因设立在法国中南部城市维希而得名，贝当元帅是其首脑——译者注。

的，它的大多数支持者居住在较落后的法国南部和西部。波尔德主义者持续了几年，后来随着经济现代化加速进行和其他问题突出起来，他们也就消失了。

取代这一运动的是出生于北非的法国人的行动集团，他们想让法国保持住阿尔及利亚，反对那些打算放弃法国立场的巴黎“卖国贼”。但这些以地下武装组织 OAS 为首的极端分子，进行的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继法国在越南失败后，法国病倒了，并且对殖民地战争厌倦了。每一个人都想保住北非，但很少人愿意为之进行战斗。

北非危机使得查理·戴高乐掌了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极右派面临的是不景气的年月。由于他主张大法国的观点，右派不可能向他发起进攻。

右派在戴高乐政权下失败后，对自己的基本立场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反思，努力形成一种新的学说。这种新右派在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它的前辈：它不是君主主义的或天主教的，它也不把德国当作头号敌人。它并不梦想重新占领北非，而是仅仅想让北非人离开法国。尽管新右派的思想影响了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甚至德国的新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但它们在国内的影响却是不大的。在新右派发表文章谈论“生物学的现实主义”或介于前苏联和美国之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欧洲“第三条道路”时，法国的极右派却继续破裂。在 1967 年到 1982 年间的议会选举中，它的各派总共得票不超过 1.4%。相比之下，这个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因为甚至他们 1965 年的总统候选人泰克西尔—维格南科特同戴高乐竞争曾得过 5% 的选票，1962 年右派同戴高乐竞争曾得过 9% 的选票。

在 1972 年的公民投票中，又进行了一次把四分五裂的集团统一起来的努力，于是出现了以让—马里·勒蓬为头子的国

民阵线。勒蓬来自布列塔尼，最初在波杰德主义者中间当学徒，他后来在议会中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代表波杰德主义者。这个新党用了 10 年多的时间才成为法国政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勒蓬这位善于雄辩的有影响的演说家和总是充满活力的人物，一定感觉到长远的前景并不坏，各种倾向都有利于极右派的复活。

国民阵线不是铁板一块的政党，而是六个集团的联盟，这些集团知道单靠自身都没有任何机会，于是开始进行合作。勒蓬是其中一个叫做“新秩序”的集团的领袖。尽管经常有妒忌，但他的领导地位还是被认可了，因为他被看作是最有影响的得票者。只是到了 80 年代，在该党取得了选举上的重大突破后，勒蓬的支配地位才得以巩固。

随着戴高乐从政坛上消失，国民阵线在政治上的任务就更容易了。不论是乔治·蓬皮杜还是瓦勒利·吉斯卡尔·德斯坦，不管有多么大的才能，都不是有同等竞争力的人物，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反对戴高乐的极端民族主义。同时，法国共产党开始衰落，为国民阵线准备了有潜在选民的蓄水池。在几年之内，马赛这个堡垒——起初是社会党人的，后来是共产党人的——成了国民阵线的要塞。

各种社会的和经济的思潮有利于极右派的兴起。北非的丢失导致法国人被逐出这些地区，他们不再同情左派或中间派。更重要的是，在北非战争之后，许多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以及一些非洲黑人定居于法国。尽管 70 年代初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限制移民，但移民还是成倍增长，并且构成了人口的相当大一部分，首先是在法国南部和巴黎，后来是在法国的其他地区。尽管北非人希望在法国有更好的生活，但其中许多人并不愿意采纳法国的方式。的确，他们渴望保存自己的宗教、

语言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和当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因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发展特有的结构性失业而加剧。勒蓬的口号是“100万人（后来是300万）失业，意味着多了100万（300万）外籍人”。

最终，对掌权的政党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不满——欧洲的一种常见现象。在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经济奇迹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曾相信迅速的繁荣昌盛会无限地继续下去。后来，当经济出现停滞、生活质量没有改善时，就出现了一种总会使执政党感到痛苦的不利反应。像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法国人还觉得，政府没有足够重视日渐攀升的犯罪率。既然共产党不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品，那么极右派就能够从这种抗议声中获益。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解释，一个在1982年法国政界无足轻重、仅有几百名党员的政党是如何在一年之内成为一支重要力量的。当时并没有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大动荡。1981年，自戴高乐掌权以来一直统治法国的右翼联盟被一个社会党政府所取代，这个政府起初包括有一些共产党员部长。有些人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向左转，才把传统上反共产党的选民赶到了国民阵线一边，而合法的右派在失败之后则一蹶不振，分崩离析。这种解释也许有一点道理，但既然法国共产党在衰落，既然此后不久共产党的部长被弗朗索瓦·密特朗清除出去了，这便可以说明这种向极右派的急剧转向。

其他因素包括勒蓬的将士们在建立全国性的政治网方面显示出来的组织能力。尤其是勒蓬突然间赢得了大量的民意。在1983年以前，国民阵线在它的为数不多的堡垒之外是很不知名的。但后来它在省级选举中第一次获得胜利，特别是在1984年的欧洲选举中得了11%的选票，使得它前所未有的引

人注目。当时，媒体认为国民阵线的成就是法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勒蓬和他的助手不停地接受媒体采访，更多的人涌向他的会议，观看他技术娴熟的电视亮相。在1986年的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得到了9.9%的选票，在1988年的选举中有14.4%（440万张）选票给了国民阵线。在1985年的选举中，它的成绩更好，得了15%多的选票。

国民阵线成了一个在全国都有追随者的政党，在法国政治体制多极化的格局中，它不止一次地成了优势力量之间的仲裁人。它现在在法国各个地区和各个年龄层都有支持者。国民阵线特别强大的地方是大巴黎和南部地区，包括马赛、图伦和尼斯、阿尔卑斯沿海地区以及瓦尔、罗纳河口地区。但它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民意测验中也有14%多的拥护者。该党在因地方烟囱工业的衰退而遭受损失的城市米卢兹势力特别强大，但在没有任何重要重工业的斯特拉斯堡和科尔马也很有势力。它在有许多外籍人的地方特别成功，但在外籍人相对很少而又对外籍人的出现感到害怕的地方也有进展。国民阵线在工人中间比在知识分子和大资产阶级中间表现得更好。它在法国所有地区都能得到同情者。

国民阵线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这么多不同的人呢？我们可以指出的是它的繁杂的民粹主义的口号，同时还有它成功地制造出一种可靠的、负责的和非极端主义的政党的形象。尽管国民阵线是反犹太人的，但勒蓬的声明却从不极端，该党也不把犹太人问题作为它的政治论坛的主要政纲。它以对私有企业的支持来安抚企业家和大资本家。它称赞罗纳德·里根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经济政策是人民资本主义和私有化。但同时勒蓬又是工人的朋友，并许诺要帮助小商人和手艺人反对国内和来自国外的竞争。国民阵线表现为一个遵纪守法的政

党，一个具有安全力量的最好的朋友。勒蓬吸引了早期右派，“一体化主义者”，并且宣扬天主教，但他还在他的运动中为新右派的反基督教者找到了地盘。尽管他攻击政府的官僚，这一直是一个流行的话题，但他又向官僚们保证，如果他勒蓬掌了权，不会发生对他们和他们的职位不利的事情。他是“欧洲人”，是反美的，但这早已是法国舆论的一部分。国民阵线许诺在减少税赋的同时保持现行福利，只是外籍人除外，应把外籍人赶出去。

国民阵线努力制造并维持一种温和的形象，这些努力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偶尔它们也让位于一些表白，许多局外人认为这些表白是它的真面目。例如，1991年勒蓬去巴格达和萨达姆·侯赛因握手，表达他的团结。无疑，勒蓬的政治本能告诉他，这种姿态不可能有任何好处，然而他一定感觉到有一种压倒性的内在冲动去鉴别一种类似的精神。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国民阵线有另一副面孔，这就是专制和恐怖主义。在该党现在还没有掌握政权——也许地方性掌权除外——之时，它将保留它的外表的民主的特点。但它对民主规则的真正服从似乎只是表面的，一旦该党掌握政权，这种微薄的面膜也就会很快地戏剧般地挥发掉。

国民阵线得益于法国重要权力集团的削弱，起初是戴高乐主义者和温和右派，后来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但它的进展是有限的：在1994年欧洲选举中，国民阵线只得到10%的选票。大多数法国人不可能支持一个仍然被认为是激进的和不可捉摸的运动，当然除非发生某种重大的政治灾难或经济灾难。

国民阵线的大部分成就是一个人的作用，尽管没有人是不可以替换的，但也许要有几年时间才会出现一个有同样影响的新领袖。在这一过程中，国民阵线的过去的裂隙就会重新出

现，并且削弱它。

无论如何，显然该党基本上是一种很少有积极内容的抗议运动。的确，它的目标是得民意的——减少移民的数目或至少防止进一步增长，恢复法律和秩序，反对政府的过分干预和税赋。但大多数人也知道，国民阵线并不比其他政党有更多的灵丹妙药。如果说有对政治领袖和政党的不信任的话，国民阵线和勒蓬也概莫能外。根据几次民意测验，国民阵线的绝大多数选民之所以选择该党，只是为了抗议政治体制；有相当比例的成员并不奢望他们的党掌权。尤其是，国民阵线缺乏同情心，甚至缺乏一度渗透进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各成分之中的理想主义。它的支持者可以从事孤立的暴力活动，但归根到底他们是愤慨的利益集团，而不是狂热分子。他们不愿意为这种政治运动牺牲自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用说他们的财产和生命了）。他们不是为一个新法西斯主义的法国造就战士的材料。

~~~~~

## 德 国

~~~~~

德国的新纳粹主义并不像它的支持者所希望的和它的敌人所担心的那样有成就。阻止新纳粹主义成长的原因就像导致它扩展的原因一样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以前的几百万名党员仍然工作和生活在他们的祖国。不是所有人都出于机会主义才入党的，失败后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纳粹政权是邪恶的。有 1/3 以上的德国人继续认为纳粹主义曾有过各种积极的特点。甚至在 1989 年只有刚过一半的德国人认为纳粹主义“主要是否定的东西”而拒斥它，差不多有 40% 的德国人认为希特勒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主要国务活

动家。根据各种调查，有 10% 至 15% 的人认同极右派的价值和理想，既有青年人也有成年人。在其他方面，如法律和秩序、对生活在德国的外籍人的态度，这些调查显示出右翼极端主义感情的很大容量。

然而，在德国战后 50 年的历史中，这种容量并没有转化成政治行动，转化成拥护右翼极端主义政党的选票。只有两次，极右派在地方的层次上成功地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这指的是 60 年代的民族民主党（NPD）和 80 年代的共和党。但在这两例中，它们的成功并不持久，而且这些政党也不能被列为新纳粹党。无疑，它们的大多数成员在 1933 年是欢迎希特勒的。但时代已经变了，老式的纳粹主义不再是德国政治舞台上的演员。

纳粹主义在战后德国的滋长，出于多种原因受到了限制。首先是经济奇迹——在战争结束 10 年后开始的繁荣。同时，甚至那些怀恋第三帝国的德国人并不都反对已经出现的新的政治秩序和制度。纳粹主义已经失败了，它导致了国家的毁灭，这一事实对纳粹主义的民众形象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卖国贼”因为“从背后给国家捅了一刀”而受到谴责。但 1945 年后，没有人能够指责反对派，因为在希特勒掌权时就不曾有过反对派。纳粹分子战斗到底的事实（不像 1918 年的皇帝和他的将军们）只是加快了德国的民主化。最终，纳粹的活动按宪法说是违法的，尽管这并没有吓唬住死硬分子，但它吓唬住了追随者。

最早主张极端右翼立场的集团，是那些在 1946 年至 1947 年被同盟国重新承认的政党。它们是德意志帝国党，1949 年继它之后的社会主义帝国党，后者在 1949 年有 5 名代表（后来是 22 名代表）参加了第一届联邦议会（德国议会）。

这一最早繁荣的极右派的主要英雄之一是奥托·莱默少校（后来是将军）。这位军官阻止了1944年7月的军官起义，从而挽救了纳粹政权。该党的支持者主要是纳粹分子和战争老兵。他们因失败后的社会衰退而受到损害，并且没有从战后的繁荣中得到好处。其他成员虽不是主要的纳粹分子，但从来不喜欢新秩序。帝国党在其鼎盛时有8万名党员，但只有2万至3万人是年轻追随者。它在德国北方的一些地区，如下萨克森和不来梅，取得了某种成功，但吸引到能够充当领导人的有能力的职业人士不多。极右派成立了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组织，编辑了宣扬它的福音的期刊（如《欧洲民族》）。但它是对已经皈依的人做宣传，在劝服政治独立的人方面并不成功。

1962年，帝国党被德国最高法院所禁止，因为它没有完全掩盖它的亲纳粹的情绪。事实上，甚至在下达这个判决之前，该党已决定解散。但如果不是出于觉得没有任何真正的机会同主要政党竞争，它也不会这么做：时机尚不成熟。

在此后的12年，新的新纳粹派别都出现过，但其中没有一个能活下来。极端主义的情绪表现为污辱犹太人的墓地和出版回忆纳粹分子政治和军事成就的怀旧作品。然而，在政治上这些新纳粹分子本身一直是无足轻重的。

1964年底出现了又一次机会。在阿道夫·冯·泰登的领导下，属于极右派的大多数派别在民族民主党（NPD）的屋顶下统一起来。同它的前辈相比较，民族民主党有了更强大的工人阶级支持，它不仅能在德国北方而且也能在南方（如巴登—符腾堡）找到追随者。但它在议会建立一个立足点的企图却没有成功，没有突破宪法规定的5%选票的障碍。后来它因内部的保守派和倾向于非议会行动的激进派之间的内讧而分裂。该党在1969年大选失败后，更为激进。它的内部分歧也更加激烈。

冯·泰登 1971 年辞职，尽管该党继续存在，但不再是政治上重要的党派。1972 年它在地方议会还有 500 名代表，10 年后只剩下 12 名了。

民族民主党认真强调它信奉保守的价值和“民族的观念”。它给自己的定义是：一些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生活的热爱自由的德国爱国者的集合体。事实上，作为适应法律和秩序的党，它在每一个场合都强调应服从法治国家（法律及其应用）。民族民主党肯定从帝国党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要成为德国极右派的一名斗士，必然要求进行大量的掩饰，但还有其他的考虑：民族民主党的一些支持者不是激进分子，而是反动分子。他们害怕承担新纳粹狂热分子的革命任务，因为这些狂热分子想要彻底变革，号召采取暴力行动。

在早期合法的右派的边缘，一直有一些超议会的集团。他们搜集武器，对自己的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在 70 年代后期，随着民族民主党衰落，右翼恐怖主义更为常见。在现在记忆犹新的事件中，有 1980 年慕尼黑十月节的爆炸案，导致 13 人丧生。但归根到底，右翼恐怖主义不如左翼巴德—梅因霍夫一帮有影响。

民族民主党不愿意因为这种暴力而冒险招致国家采取行动。格哈特·弗莱的以慕尼黑为基地的出版帝国也是这样。从这个出版帝国产生了另一个党 DVU（德国人民联盟）。该党的出版工作是成功的——周刊《德国民族报》销售 12 万份，比社会民主党的《前进》还多。但读者并没有变成选票：躲在最极端的右翼集团宣传运动背后的弗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律师，但却不是一个有魅力的政治领袖。

然而，坚持合法性不得不付出代价。如果民族民主党和其他极右派的政党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只是严格的保守分子，为什

么他们不同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右翼进行共同的事业，而要把他们的选票浪费在没有现实前景的努力上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回答。诚实的回答将会是，实际上他们同保守分子有根本的差别，但这些差别是不能明说的，因为这会导致损失选票，并且按宪法第 9 条或第 21 条可能会使该党被查禁。

1933 年前的纳粹分子也曾面临过合法性的问题，但在魏玛共和国，它蔑视宪法的风险不大。无论如何，驱使民族民主党的成员的动力不是类似的狂热主义。无论是冯·泰登还是弗莱，都不会像迈克尔·库南一样冒被判 4 年徒刑的风险。库南以前是联邦边防军的一名中尉，80 年代是一个公开的新纳粹集团的头子。其结果，弗莱的期刊集中注意的是相对安全的论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同盟国而不是希特勒发动的，毒气室是世界犹太人的一个大骗局，德国属于德国人，应当把外国人赶出去。

然而，随着民众对民族民主党支持率下降，外籍工人问题成了更尖锐的。1981 年，第一次出现了让外籍工人回到他们的祖国的要求，但民族民主党缺乏活力来利用这种情绪。极右派政治论坛上存在的空缺，1983 年由新成立的共和党来填补了。共和党是巴伐利亚 CSU（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激进后代。它的领导人是弗兰兹·舍恩胡伯，他年轻时曾在党卫军服务，职业是慕尼黑的电视制片人，加入过社会民主党，后来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成员。舍恩胡伯 1994 年被一个更年轻的人罗尔夫·施利莱所取代。施利莱的偶像是奥地利的尤尔根·海德尔。海德尔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物，曾比德国早期右派领导人的做法得到了更大的共鸣。

在 1989 年的地方选举中，共和党人在柏林、莱茵兰、巴

登—符腾堡和其他一些州的情况不错，所以他们进入了地方议会。当年他们也成功地被选上了欧洲议会的几个议员，但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又未能突破5%选票的界线。在1993年黑森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它赢得了8%的选票，在法兰克福赢得10%的选票。尽管以暴力行动表现出来的（有时是自发的，有时是老右派煽动的）排外情绪日渐增长，但在全国他们的选票是下降的。

很难说明极右派命运多变的特殊原因。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是缺乏创见的人，这些人没有产生引人瞩目的影响。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获取薪水和开支（以及重新当选），而不是促进他们党的事业。在共和党和继续存在的民族民主党之间几乎没有有什么学说上的差别。在选举区域上，他们也没有什么差别：共和党人最强大的地区15年前曾是民族民主党的堡垒。但一个重要的差别是，80年代以前在极端的右翼政党中有很大大比例的前纳粹分子，但他们逐渐死掉了，年轻的选民取而代之。一些德国分析家断言，共和党是失败者即现代化进程的牺牲品的党。的确，在大城市中较贫困地区，共和党人的日子相对好些。但他们在抗议情绪最强烈的东德的情况却不好。他们在西德的一些繁荣的地区得分高于平均数。几乎毫无例外，民族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男人那里要比在女人那里情况更好。德国的整个政坛在80年代多少倾向于右派，就像在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情况一样。但这对共和党人没有什么帮助。恰恰相反，它使得他们成了多余的。

综合考虑，战后德国的新纳粹主义的历史是失败的历史。老的纳粹分子消失之后，希特勒思想的年轻崇拜者保持着这一传统。但他们人数不是很多：大多数派别都不到1000人，甚至共和党也不过1.2万人到2.4万人（前一个数字是根据外人的估计，后一个数字是他们自己的数字）。尽管存在着大量的

对法律和秩序口号的要求和反移民的情绪，就像在英国——但在不是法国、意大利或俄罗斯——一样，但这并没有转化成一种群众运动。

新纳粹分子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新民主秩序的经济成就和政治成就。此外，并非每一个要求法律和秩序或愤恨移民的人都是新纳粹分子。甚至那些对现行事态很不满的人，也不愿意像 1932 年的许多纳粹分子那样，逾越障碍。德国已经重新统一，但不是由于民族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努力。他们对德国的好战传统感到自豪，包括侵略战争。但他们不愿意进行新的战争，甚至不愿意增加军费开支。存在着对外国人包括美国人的愤恨，但在极右派中并不讨厌英国人和法国人。即使波兰人和捷克人不讨人喜欢，也很少有人认为德国应当发动战争去收复 1945 年丢失的领土。

德国极右派的一个主要的不利条件，是内部不断地分化。不像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他们从来没有统一成一个党，集合在一面旗帜下，追随一个领袖。这种缺乏团结或许不是偶然的：它反映着他们内在的意见分歧。假如他们联合起来，他们是否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呢？在 80 年代，德国的确面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像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出现了对现有大党越来越多的厌恶。但很少德国人认为，民族民主党和共和党能比社会民主党更有效地解决失业之类的问题。因此，极右派所能指望的一切就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总危机，而不是某种小的暂时的倒退或停滞——需要来一场政治地震使德国民主制度受到真正的考验。

法西斯主义与极右派： 一些案例研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现过军事专制，其中一些是残忍的和血腥的，也出现过左派或右派的民粹主义运动。在这些政权和政党内，从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到上校们统治的希腊，可以辨别出某些法西斯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都被叫做“法西斯主义的”。但这种标签既不是正确的，也不是有用的。人们会无休止地争论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是左翼还是右翼，或者什么都不是。有人认为，假如皮诺切特、希腊的上校们及其同类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就会继续掌权。这种观点也许过分简单化，但这种观点有点真理的东西：这些政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极权主义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控制全部生活领域的国家党，不存在任何包罗一切的学说，不存在任何宣传机器。毋宁说，它们是传统军事专制过了时的变种，是应受谴责的和反动的，但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因此，它们要么放弃权力，如在智利；要么很容易被推翻，如在希腊。

1945年后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继续存在着权威主义政权。但不管是萨拉查的“新国家”还是佛朗哥的民族天主教主义，都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如果它们是极权主义的，这些国家在

60年代向民主秩序的转变就要用更长得多的时间。因此，在伊比利亚半岛轻而易举地完成这一任务，比任何理论的争论更能证明，权威主义政权和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在弗朗哥死后，随着向民主转变，西班牙仍然有一个老右派，它始于长枪党及其领袖何塞·安东尼·普里诺·德里瓦拉，里瓦拉在1936年内战爆发时被杀害。这个右派政党就是“新力量”，它的首领是布拉斯·皮那，弗朗哥后期政权的一个领导性人物（他的党后来更名为“民族阵线”）。它在70年代取得了某种成功，但在80年代实际上就消失了。它的一些口号——谴责放纵的社会（和吸毒），推进法律和秩序——是得人心的。新力量虔诚地相信神灵启示，谴责居支配地位的天主教士，认为他们太自由而不利新的民主秩序。尽管西班牙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紧张（失业率居高不下，主要是在南部和青年人中），新力量仍未能取得重大的进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党人太得人心并且有很多特权。后来，当社会党人失策时，出现了一个在何塞·玛丽亚·阿兹娜领导下的有影响的保守的替代品。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同无效率并令人讨厌的弗朗哥政权密切联系的政党都没有什么地位。此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战后西班牙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西班牙没有任何领土的争议，各党在巴斯克问题是普遍一致的。

西班牙的外籍人数量相对少一些，不是什么关键性问题。如果说西班牙隐藏着民众的不满的话，那是针对北非人的——也就是说，针对西班牙老右派觉得与之有某种姻亲关系的政权——所以他们不愿利用这一问题做文章。但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并不特别主张种族主义；的确，它或许是欧洲惟一种不攻击吉卜赛人而是欢迎吉卜赛人加入到他们行列中的法西斯主义。它对弗朗哥政权的体验还不陌生，总的说来，很不利于法西斯

主义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甚至那些支持佛朗哥政权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最近几十年西班牙发生了一场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革命，佛朗哥政权是不可能复活的。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错误地断言，佛朗哥政权曾是（它拒绝承认的）旧秩序的一部分，不是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是恢复旧的长枪党的口号。即使新法西斯主义者更有事业心，但他们并不清楚自己会产生什么样的现代替代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进展。

极右派在比利时和奥地利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原因不是经济危机或社会冲突。事实上，在最近几年奥地利的经济比欧洲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好。事实上，比利时传统的重工业和采矿业的衰退对瓦龙人的影响要比对佛兰芒人的影响大得多。但正是在相对繁荣的佛兰芒人中间，极右派取得了进展。

极右派在奥地利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的原因。奥地利从没有被妥当地非纳粹化，前纳粹分子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不同于德国，这里不认罪，并且拒绝为纳粹时代承担责任。有人声称，奥地利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因此是一个“纳粹的牺牲品”，而不是同情的合作者。根据战后的“奥地利意识形态”，在奥地利出生的希特勒实际上是一个德国人，而30岁时在奥地利定居下来的德国人贝多芬才真正是奥地利人。一句话，纳粹主义和奥地利没有什么关系，把这段插曲越快地忘掉越好。

1945年以来，奥地利的政治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通常以联盟形式来统治的。第三个政党“自由党”（FPO）要小得多，即使它几乎从一开始就充当前纳粹分子的避难所，赢得的选票也不超过6%（像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者一样，FPO在1994年决定更名）。后来在1984年，一系列的丑闻拆了两个大党的台，经济出现停滞。两个居统治地位的政党不再能

给它们的成员提供直接和间接的好处。同时，尤尔根·海德尔接管了 FPO 的领导权。他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和有影响的演说家，提出了大部分得民心的怨言和全盘否定论，众所周知这是奥地利学生的特点。海德尔证明纳粹主义合理——直到现在。他声称，毕竟纳粹分子有一个有效的就业政策。海德尔反对斯拉夫人，反对移民，尽管他加入了世界自由党联盟，他还是主张反对自由主义的政策。1994 年海德尔的党在海德尔的家乡卡林西亚获得 33% 的选票，甚至在世界主义的维也纳也获得 22% 的选票，这清楚地表明一种新的力量已经出现，它正在颠倒过去的奥地利民主政治的模式。在 1994 年的大选中，他在全国赢得了 22% 的选票。

FPO 是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呢？尽管海德尔在他的会议上欢迎老纳粹分子，反常地去给党卫军老兵致词，但该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政党。由于奥地利共产党员的人数很少，对 FPO 来说反共也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海德尔想剥夺生活在奥地利的斯洛文尼亚人的文化自主权，让移民离开这个国家，但他的党并不主张推翻民主秩序或使用暴力。它不是复仇主义的或军国主义的：由于奥地利的地缘政治地位，海德尔不打算重建奥匈帝国，因此不存在专制或侵略战争的危险。相反，FPO 集中注意的是国内事务。它想和德国重新统一，但它也认识到德国很少有人渴望这种情况。

同时，仅仅由于这种奥地利现象并不构成对外部世界的危险，就把它当作无结果的事情打发掉，也是错误的。诚然，由于 50 年内不存在真正的危险，旧的政治制度失去了信誉。这一事实促成了一场政治地震，就像在意大利一样。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FPO 的选民在道德上比奥地利其他公民更敏感。由于海德尔的进展是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较低而人均收入继续上

升的时期取得的，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说：FPO 所代表的东西是和奥地利现代历史中根深蒂固的倾向——民族主义、排外的民粹主义、权威主义——非常一致的，不是纯粹的法西斯主义的。它更多地表现着 19 世纪维也纳市长留格的传统，而不是希特勒的传统。但同样真实的是，纳粹主义在奥地利至少像在德国一样流行，而且很可能更流行。

尽管在邻近法国边界的地区有经济上的不佳和对勒蓬的国民阵线的支持，但比利时的极右派在瓦龙人中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极右派在佛兰芒多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57%）中较为成功。在安特卫普这样的城市里可以说明佛兰芒集团的选举多么成功（1989 年选举中得票 20%，1994 年甚至更多一些）。佛兰芒人坚持自己的地区有更多的自主权。例如，声称瓦龙人不成比例地从国家福利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但这些要求是所有佛兰芒政党共有的。通过宪法上的改革，这个国家已经朝着更多的自治方面走得很远了。

佛兰芒集团在安特卫普的外国人非常集中（而且犯罪率上升）的地区是强大的。比利时常规的这些例外仅仅是证明，种族紧张关系不是惟一有关的因素。卡莱尔·迪伦是该集团无可争议的领袖，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欧洲议会中的“技术派”。鉴于他一生都站在极右派的立场上，这一举动是不奇怪的。

因此，很难把该集团定义为一个种族集团，或者预言比利时法西斯主义的成功。纳粹对比利时的占领，损害了极右派和通敌者事业的声誉。民主在这个国家根深蒂固，所以民族的紧张关系和外籍人的存在不可能破坏这种政治制度。

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邻近的荷兰。早期右派政治集团如农民党，在 80 年代有了一次高潮。农民党不管其名称如何，却主要在城市中得到了支持。但民意测验表明它得票从未超过

3%。该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后来它被其他集团——70年代被 NVU，1986 年被两个都以中间党为名称的政党——所取代。NVU 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把它攻击矛头指向移民，但未能在议会中谋得一个席位。两个中间党在国内散布移民太多的舆论方面多少更成功一些。1994 年在主要城市，他们吸引了足够的选票进入地方议会，但遭到了民主政党的排斥。如同比利时的情况，中间党的选票主要集中在一些居住有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的较贫穷的城市白人地区。

荷兰的极右派甚至比比利时人更急于强调自己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既不左也不右”），但对他们的真正意图的怀疑仍然存在。该党自视为“大荷兰”的先锋，这个大荷兰不仅包括比利时和卢森堡，而且还包括法国北部地区。该党曾同德国民族民主党、英国民族党和巴尔干的极右派合作。像佛兰芒集团一样，它是反美的，并且对欧洲统一有保留意见。作为回应，荷兰政府把限制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结合起来，使外籍人获得了选举权。这些政策也许并不足以改变绝大多数人认为国家的外籍人太多的看法，但似乎又足以遏制它。

在比利时和荷兰，支持极右派的选票代表着抗议，不仅是针对着外籍人的存在，也是针对着这种“制度”的。由于极左派至少已经暂时地黯然失色，这些抗议就转给了右派。制度的弱点表现为政党的多样化，政府的经常变更，长时期没有政府。这种弱点，加上对容忍政策（犯罪、吸毒、娼妓）的不满，产生了一种反冲力。由于这种反冲力，后来的政府就放弃了70年代采取的容忍立场。由于这种普遍的不满，极右派取得非常有限的成就也不足为奇了，但事实上它并不是特别成功的。

我们没有提到英国的新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不很强

大或者在任何方面都不是独创性的。在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者有了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其领导人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被当作不爱国的东西遭到反对：莫斯利被拘留了，该集团被查禁了。

50 年代和 60 年代，残渣余孽企图重新集合起来，利用因来自北非和加勒比海的大量移民而增长起来的排外情绪。但国民阵线和其他极右派集团，除了偶尔在地方市政议会的层次上之外，是无法利用这种不满的。国民阵线甚至在国会没有得到一个席位。尽管保守党的一小撮成员表示出某种同情，但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下并没有为托利党的右党派留下任何地盘，就像在德国没有为弗兰兹·约瑟夫·斯特劳斯的右派运动留下任何地盘一样。英国对新法西斯主义的惟一贡献是光头党文化，这种文化最终在英国之外得到了支持，但在它的起源地却渐渐消失了。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极右派的主要宣传家、最明目张胆的修正主义者和大屠杀的否认者戴维·欧文要把他的事业搬到大陆去。

在欧洲其他国家，尽管对不加控制的移民有强烈的抵制情绪，但新法西斯主义集团却不过是小宗派。因此，挪威的自由党以它的主要政纲“现在就停止移民”，在 1989 年的选举中获得了 13% 的选票，是令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的。它的支持者后来减少了一半，而且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丹麦的进步党也是这种情况。该党成立于 1972 年，一度是丹麦的第二大党。它起初采取自由主义立场——一般地反对税收和国家干预，在寻求诸如禁止移民之类的得民意的建议中逐渐地转向右派。在瑞典，新纳粹活动仅限于小宗派和光头党集团，其中没有一个组织的人数超过几百人。

新法西斯主义在战后欧洲的活动，显示出某些可预言成败

的因素。我们已经引用了移民问题，这个问题有利于极右派的增长。其他可预言的因素是民主制度的危机，意大利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阻止新法西斯主义增长的因素是同样明显的。1945年后纳粹主义的名誉扫地，提供了某种免疫力。随着欧洲变得更为繁荣，甚至失业者的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得多。然而，每一个国家仍然有极右派的选民后备军，甚至有更大的抗议的潜力。但即使怨气冲天，狂热现象还是正在消失。战前的法西斯主义曾是一种侵略性的好战的运动，而新法西斯主义者则认识到，在欧洲进行一场战争是不可能的，他们甚至加入了其他大多数努力削减防御开支的政党。事实上，大多数站在右派立场上的人是反对内战和恐怖主义的——因为太多的人会失去太多的东西。新法西斯主义经常是一种专注单一问题的运动，所以总会有这样的危险：随着政府采取行动（如限制或停止移民），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甚至在1993年至1994年选举之前，在上阿迪杰（南蒂罗尔）得分较高，在波尔萨诺（博岑）得到25%的选票。原因是明显的：这些地方的意大利人认为，罗马在蒂罗尔人身上开支太多。但既然意大利人也从普遍繁荣中得到了好处，他们的愤慨也就仅仅限于登记一张抗议票。在被群山和森林所环抱的可爱的胜地，从没有内战。

在战后时期，新法西斯主义者中间没有杰出的领袖。尽管勒蓬和海德尔是有能力的政治家，但他们不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些新法西斯主义者仅仅是马戏主持人或小丑，不成气候，日里诺夫斯基是一个当代的例子。相反，在30年代，对于科德莱努或何塞·安东尼的任何疯狂举止，没有人怀疑他们说到做到，他们将为之献出生命。的确，一些战前的法西斯主

义集团鼓励牺牲和献身，这是战后的法西斯主义集团不可能奢望的。30年代的思想家，如罗森伯格，是真正的信仰者，而战后的宗教领袖如埃奥拉和戴维·欧文是真正的信仰者还仅仅是想出风头，是不明确的。

因此，以驯服极左派的方式，把新法西斯主义一笔勾销或把它当作驯服了的体制的一部分，是有诱惑力的。但是，即使新法西斯主义不像它60年前那样危险，把它当作无结果的东西打发掉也是不审慎的。在不同的环境中，不能排除它再度复活的可能性，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法西斯主义者会永远接受民主的比赛规则。即使他们出于弱小而已经这样做了，但在他们处于强大的地位时是否会这样做，却是难以确定的，所以经常有“狼来了”的呼喊。诚然，自1945年以来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经常是被夸大的，一些被叫做新法西斯主义者的集团实际上只是模糊地类似的东西。然而，同样危险的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反民主的运动和政权仍然有着肥沃的土壤。

右翼极端主义： 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

新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党，而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它的支持者过去和现在都被告诫要拒斥大众文化，不要去看电影，除非极右派在媒体中有强大的立足之地，要尽量少看电视。期望他们阅读自己国家的爱国作家的作品，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堕落的文学艺术上。规定的爱国口味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内容，这便消除了 20 世纪的大部分文化、所有现代主义思潮、精神分析学和其他颠覆性的影响。新法西斯主义者不应阅读现有机关的日报——也许除了体育节目和娱乐节目之外——而要订阅他们自己出版的期刊。他们庆祝希特勒的生日、鲁道夫·赫斯的逝世日以及德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伟大军事胜利。俄罗斯的极右派庆祝库利科沃战役等俄国的胜利。德国人搜集纳粹的纪念物、铁十字勋章、雷神之锤的粗糙复制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武器。俄罗斯人寻找末代君主和白军的遗物，以及硬币、哥萨克人制服和圣乔治的十字架。

有宗教信仰的新法西斯主义者集会敬拜北欧的神，如沃坦和弗莱娅（他们的宗派叫做阿曼斯、戈登、吉尔费利兹和“沃

坦的亲人”），他们有自己的像巫师一样的男女祭司。有些俄罗斯人自称是吠陀派，信奉印度的传统；其他人则崇拜达斯·博格和基督教之前的斯拉夫人的神。在他们看来，基督教的《圣经》是起源于外国的文献，所以不应忽视它的危害。他们庆祝夏至和冬至、收获节，研究古老的北欧和德国的符号，参观埋葬着两次世界大战士兵的公墓。冲浪和开摩托艇是对现代生活的让步。

信徒之间的联姻受到鼓励，尽可能多生孩子是一个新法西斯主义者的爱国义务。有些人是主张禁欲的狂热斗士，因为他们认为酗酒是民族健康状况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俄罗斯。但反酗酒的事业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因为右派人士对啤酒、杜松子酒（在德国）和伏特加酒的消费和其他政治派别消费得一样多。光头党人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啤酒。在极右派中，各种各样的神秘崇拜都有其狂热的追随者，在俄罗斯也许比其他国家更多。民族主义的占星术是特别流行的，就像爱国的奇迹以及各种神智的和神秘的崇拜一样，有些是在国内增长起来的，许多是从西方和东方传进来的。在路易斯·法拉汉的伊斯兰民族中，数字占卦术是很发达的。

尤其是，新法西斯主义者相信有一种世界性的反对雅利安人（或斯拉夫人、高卢人、罗马人）的密谋，如不将其挫败，将导致一切积极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这种最大的密谋涉及到恶魔、犹太人、玫瑰十字会员、共济会成员，以及所有以统治世界和破坏民族国家为目的的国际性的（“全球的”）或“世界性的”组织。这种密谋是无所不能的和无所不在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个人（除了新法西斯主义者而外）都是被黑暗势力操纵的。这种妄想狂大部分都能追溯到俄国革命前和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前。它的更深的根源是

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甚至更远。这种担心在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者和法国老右派那里不常见，但对密谋的相信在意大利和地中海就像在北欧和东欧一样普遍。

现代技术被用来传播过去的观念：例如，关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讲演以及驳斥“奥斯威辛谎言”的录像带，指导儿童如何管理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的计算机游戏，新法西斯主义的计算机网。

在70年代和80年代，极右派对生态学问题显示出了兴趣。他们的一些领导人甚至声称，未来这些问题会具有核心重要的地位，要把握极右派的政治前途。在俄罗斯，“绿浪”起始于“乡村作家”对俄罗斯乡村的重新发现。同时举行地方会议和游行，抗议对气候、森林、河流和湖泊（包括贝尔加湖、咸海和黑海）的全面污染以及重新挖掘西伯利亚河流、散发有毒气体和其他有害物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给了这种运动额外的推动力。尽管这些倡议最早不是极右派发起的，但作为得民心的事业它们帮助极右派找到了新的支持者，并在更广泛的民众中被接受。

在德国，极右派认识到环境的政治潜能相对晚一些。它增强了它在德国北部的运动，使人想起纳粹主义曾在这些地区得到了它最初的大部分支持。但在后来的70年中，农场主的数量已大大减少了。既得的农业利益在法国仍有某种政治影响，但比在德国小得多。农场主因不生产非竞争性价格的粮食而得到国家的大量补贴。支持这些环境下的农业游说集团会不得人心。其结果，极右派表现出对“健康的农场主”的纯粹“精神上的”支持，因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正是起源于乡村。有些极端的右派人士还号召在乡村建立新的定居点，远离大城市不健康的生活。但这些建议在各个地区得到落实至少需要100年，响

应不很强烈。

民族革命派和死硬的纳粹分子已经渗透进现存的绿党或已成立的新党中。民族革命派更真诚地赞同与自然的新的和谐。但他们不是争取其他绿党人士参加他们的事业，而是转向生态学家，跑向老右派。新纳粹分子有时选择一个乡村作为他们的指挥部，但他们并没有选择农业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仍然着迷于制造他们的小册子，宣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党卫军的英雄行为——《天国长老的礼仪》，恶毒的英国人和波兰人，这些宣传和农村的环境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一段时间俄罗斯的纪念党在莫斯科的郊外建立了一个农场，但它的主要目的是赚钱资助党的活动。德国和法国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有时表现出对生态学运动的同情，但这些运动和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没有什么联系。这些声明主要是基于选举上的考虑：绿党是有用的，因为它削弱了现有的大党，因而也削弱了新法西斯主义者想推翻的整个制度。

极右派传统上在文化问题上有强大的立足之地。它的口味很少是由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和前苏联的雄伟风格塑造的，更多地是由古典主义的、保守的传统塑造的，特别是在德国、奥地利、东欧和俄罗斯。法国和意大利的新右派在世界观上更复杂，多少更自由一些，不像德国人和俄罗斯人。他们在诽谤现代艺术上不像纳粹分子谴责“堕落的艺术”那样极端。

极右派的意识形态研究者正在进入可以提出某种承诺的领域：他们唤醒的文化危机不是他们想象力的虚构。先锋派艺术家——在雕塑艺术和音乐方面比在文学方面更多——已经远远领先于公众的口味，经常碰到不理解或者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极右派的思想领袖就使自己成了那些要求公共基金不支持冒犯公众的绘画（或摄影和音乐）者的代言人。

伟大的艺术应是大众的艺术，这种观念是普遍的，不论是在左派、中间派还是在右派那里都可以大量找到。德国和俄罗斯的保守分子抱怨艺术和生活都丧失了美，混乱取代了美。正如北欧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所主张的，雕塑艺术应当描绘农民或小城镇的风景、自然风光和漂亮的青年男女，同动物的照片和绘画混合起来。大多数政治家并不热衷于 12 音体系或电声音乐和抽象艺术，但同新纳粹分子相比较，他们认为国家应当在文化之外。而极右派则想发动反对现代性和支持爱国主义的战斗。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专利：是法国政府而不是法国国民阵线要求法国电视台和电台至少播放的一半歌曲是法国歌曲，而不是外国歌曲。

极右派主张发起自下而上的反对普遍堕落和自由容忍倾向的文化斗争。它反现代的和反理性的方式，不是一点不类似于后现代主义者的信仰。但他们一致的地方只在于他们反对共同的东西。他们并没有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或者一种能把他们的理想和价值同目前的人类状况结合起来的文化。这种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斗争，成了新法西斯主义者的一个核心的似乎最有前途的一致叫嚣。但它是一种奇怪的文化斗争，因为这一斗争的双方都对文化没有强烈的兴趣或责任感。新时代和其他世纪末的思潮有一些有趣的联系，如假定西方自由主义，连同它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和自由政治制度，注定灭亡。因此，反对启蒙运动的传统和一般的理性主义，宣扬各种非理性的崇拜，重新出现像尼采和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领袖。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等于十足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它的政治影响在不远的将来是极其有限的。但它呼唤着一种以前的世纪末的情绪，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精神先驱最早就是在这种情绪中出现的。

光头党人

70年代和80年代，成群结队的青少年（通常男性多于女性）身着奇装异服，以诸如光头、捣乱鬼、小流氓、街头队、精神变态者、丑孩和怪兄弟的名称，在英国、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大街上引起了人们的惊奇甚至震惊。他们的头剃得光光的，穿着T恤衫、风雨衣（姑娘是健身衣）；脚穿大皮鞋、摩托车鞋、和尚鞋或有铁钉和刀链的道克·马丁鞋；披着克龙比大衣和哈林顿大衣；束有金属薄片的皮带；佩戴显示出蛇、蝎、骷髅和各种其他奇怪符号的指环。纳粹徽章，偶尔也有铁十字画贴在他们衣衫上。有些光头党人身上刺有大量的花纹。他们都叫喊着“必定胜利”、“希特勒万岁”（以及“不要政府”和“把犹太人赶出去”）。在他们的歌曲中，他们主张杀掉土耳其人和其他外籍人，以及同性恋者、嬉皮士、流浪汉和弱智人。他们对敌对的街头匪帮的态度明显是不温和的。不同于崩克，光头党人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成群结党地游荡。^①

这种新的青年亚文化起始于英国足球场和迪斯科舞厅。这

^① 乔治·马歇尔的《69精神：光头党的圣经》（杜农1991年），详细地描述了这种情况。

种运动开始时是自发的，主要是工人人们的。在其他大部分国家，包括西德和东德、西班牙和匈牙利，足球迷和光头党之间的联系是同样明显的。在西班牙，光头党起源于真正马德里的球迷俱乐部和两个巴塞罗那足球队。^①例外的起源之地是英式足球并不流行的美国。在美国，光头党出现在极右派的各种组织的边缘，如三 K 党和雅利安白种人抵抗组织。欧洲的光头党主要起源于工人，而美国的光头党似乎在中产阶级中更强大，有着一种公然的犯罪因素。在他们的支持者中起初有疯狂车手，后来光头党被叫做血与荣誉、恶化者、攻击者、无情者和决心争取荣耀者。

光头党杂志的名称甚至更引人注目：《阳光的生命》《白色造反》《进攻》《觉醒》《骷髅》《钢铁前线》《帝国》《B 旋风》和《彻底解决》。需要补充说一下，这些杂志的大多数只发行几百册。他们的音乐起初是按照雷盖和斯卡曲调（是从加勒比海传进来的）塑造成的，但后来偏向奥伊（“街头之音”），歌唱“奥斯威辛的长夜”和 B 旋风。

奥伊是一个叫做伦敦佬被抛弃者的集团的发明，并且取代了以前介绍一首新歌的“一、二、三、四”。它以填写新纳粹分子主要以新的样式构造的诸如“有人今晚死去”和“我们头脑里的暴力”之类的歌词，成为暴力的象征；第二批奥伊歌曲选的标题是《奥伊的力量》。

① 出于并不明确的理由，某些杰出的欧洲俱乐部一段时期获得了“犹太人的俱乐部”的名声，即使它们同犹太人运动员、教练、经理或支持者之间很少或不存在联系。它们中间有奥地利维也纳、布达佩斯 MTK、阿姆斯特丹的阿加克斯和托特纳姆的霍兹波尔等俱乐部。其他俱乐部——一段时期包括切尔西和利兹联盟——不能确切地肯定是否出于其球迷的种族主义。几百名外籍运动员包括黑人运动员最初向欧洲联盟的流动，加剧了这种状况。但最终由于每一方都有许多外籍运动员，这个问题就不再那么强烈了。球迷的攻击性不得不寻找其他靶子。

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不容易区别开各种帮派，或者各种团队。有些帮派极力造成一种男子汉的形象，向他们的女性同伴炫耀，而其他帮派则故意把性别之间的差别缩小到最低限度。他们的杂志（叫做《爱好者》）并没有提供许多关于他们的思想的线索，因为他们是通过音乐而不是通过书面文字来交流的。英国的光头党在 70 年代后期以“打击巴基斯坦人”开始了他们的生涯，德国光头党是以打击土耳其人和黑人开始的。只是到了 80 年代后期，德国光头党才政治化了。以前他们是在各种球迷俱乐部的边缘活动的，极力通过攻击街上的行人、砸商店的窗户和普遍发泄他们的攻击性而制造伤害罪。

在东德，光头党是在共产党政权执政时出现的。后来，国家安全机构不得不派出 2000 人的队伍去足球场维持秩序。光头党（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对警察不再有任何尊敬。即使这样，东德警察也逮捕了这一舞台上的一些主要人物，一段时期光头党的活动明显地减弱下来。

这些集团的大多数政治倾向是不确定的：西德的早期光头党人在支持巴德—梅因霍夫的恐怖主义者的示威者中间能够被找到。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激怒和震动老一代人。他们没用多长时间就认识到，纳粹的党徽和“希特勒万岁”比支持任何左翼事业或偶然的暴力更可能惹怒人们，并引起注意。

在 80 年代，英国和德国的一些右翼极端主义集团决定在足球场上和迪斯科舞厅试验一下“进入主义”战略（也就是渗透进去进行动员）。他们的做法在德国和东欧比在英国更为成功。对之有利的一方面是日益增多的青年失业，另一方面是厌烦的情绪。一个叫做“特殊人物”的英国帮最近的一支歌曲《幽灵城》，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情绪。一些德国青年（以及后来的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反应是类似的：无所事事。

强调自主性和向父母一代造反的青年亚文化，在欧洲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最盛行的地方是古典青年运动的故乡德国，这种古典青年运动后来随着希特勒的掌权而告终。但在关键的方面，光头党、捣乱鬼和小流氓是他们先辈的反题：以前的青年运动的成员来自中产阶级，而新的运动则起源于更底层的阶级。以前的青年集团是有教养的、理想主义的和浪漫的，主张“生活改革”、健康的生活方式。它想依靠自我改进的文化革命来改变人类状况。新的青年文化却没有这样的雄心，是幼稚的。它的本能是暴力。它的观念是不连贯的。它的理想不是和谐与内在或外在的美，而是通过他们性格、口号和歌曲中的故意丑陋来震动别人。尽管欧洲的光头党不像美国街头的匪帮那样经常携带武器，但他们不和谐的音调和残忍性是有意图的。1987年到1993年间，美国有28起光头党凶杀案，要高于欧洲，但美国光头党的总数——也许3500人——要比欧洲的光头党少。

这种光头党的亚文化为在德国和英国招募新纳粹分子提供了源泉。老一代的新纳粹分子指责光头党人的“混乱音乐”是低等人因素的堕落表现。年轻一代的新纳粹分子却没有这样的担忧，而是积极地地从伦敦到布达佩斯动员光头党人参加他们的事业。相比之下，在地中海国家，新法西斯主义者把光头党视为一种消极的因素。在法国和意大利，光头党被看作是英国和美国堕落的表现。

除其他人而外，意大利伯鲁斯科尼政府中的文化部长多梅尼科·费斯切拉也持这种观点。MSI的领袖费尼，把意大利的光头党叫做“空头党”。他说：“我会把他们都送到矿井里干活。”波兰的极右派，反复谈论大众文化的邪恶，也采取了一条类似的路线。俄罗斯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对摇滚乐和摇滚文化

的看法同样是一种不妥协的敌意态度。他们把它看作是俄罗斯民族最邪恶的敌人（恶魔、西方人、犹太人）用来腐蚀俄罗斯民族灵魂的一种计谋。然而，这些情绪在老一代中是盛行的，而年轻一代更宽容，因为他们在右翼摇滚明星和他们的追随者中间看到了类似的精神。在今天仍搞不清楚的环境里被杀害的吟游诗人伊格·塔尔可夫是纪念党的支持者。来自莫斯科西部工人阶级卫星城留伯里的重音炮歌迷，在一段时期（1987—1990年）中起了一种类似于西方的光头党的作用。在俄罗斯的某些青年集团中，纳粹的符号、遗物和仪式成了时髦的东西——这些人的动机和社会根源非常类似于西方的光头党。

光头党和其他类似的集团，在德国以及较小的程度上也在欧洲其他国家攻击（有时具有不幸的后果）外籍人之后，引起了广泛注意。光头党摇滚歌星从布达佩斯到斯德哥尔摩一路唱着对纳粹主义和阿道夫·希特勒的赞美歌。光头党的杂志以各种语言声称，纳粹主义是拯救德国、欧洲和白色人种的惟一手段——“毁灭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在布莱克普尔成立的疯狂车手组织举行了白色力量摇滚音乐会，在德国举办年度游行以纪念鲁道夫·赫斯的逝世。有些集团打着纳粹党徽，其他集团则打着美国南部联邦的旗帜。有些人强烈地反对爱尔兰人，但其他人又和IRA保持一致，认为他们是民族自由的战友。

许多朋克式的光头党（在德国叫做秃头党）使用纳粹的象征和仪式，一般主要是为了烦扰他们的家庭、老师和当局。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信奉法西斯主义呢？当采访者问及他们的政治观念时，他们说不清楚却又大声叫喊。他们想让他们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保持纯洁，但不夸张地说，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不很了解。他们告诉每一个听众，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挫折。他们仇恨每一个不和他们有同感的人，暴力行

动是减轻他们的紧张并使他们的敌人处在他们的位置的惟一方式。他们酗酒抽烟，但反对吸毒。相比之下，他们美国的同类却抢劫和吸毒都干。

具有各种变种的光头党的出现，在外部观察者中间引起了许多人进行心理研究。社会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很难理解这种预料不到的和令人惊奇的现象。其结果，关于实际上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永远是可教育的信念，受到了严格的检验。的确，人们可以认为，这种奇怪的亚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抵制资本主义对年轻人施加生活影响的方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社会造成挫折，挫折进而又导致攻击行为。此外，欧洲社会的深层是种族主义的，因此必定导致过激。

这种挫折—攻击的假说再次受到了注意，因为它曾被用来解释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左翼恐怖主义和一般的犯罪。但它的现实根据一直是脆弱的：刑事的和政治的暴力在没有重大压抑的情况下也能存在。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总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挫折，但并没有屈服于他们所有的倾向和本能。

此外，如果我们所说的种族主义是指对各种族和民族之间差别的意识的话，那么，欧洲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是种族主义的。欧洲人不是自觉友好地对待其他有不同看法、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与价值的民族。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社会都是不宽容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都有种族主义，后者决不是不怎么危险的或道德上优越的。

那种认为可以通过人道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和反种族主义的灌输来控制光头党之流观念，是过于乐观了。不论是在古代的还是在现代的专制中，像光头党这种人都会受到警察的打击和逮捕，因而至少吓唬住一段时期。在民主制度中，特别是那些相信宽容的民主制度中，光头党很少能找到使他们娱乐和

快乐或使他们忙活起来的事情，但也用不着以暴力来反对他们，除非在极端情况下。

那些研究光头党的人，面对这些没有实际理由的造反茫然不知所措。人类总是天生倾向于暴力的，认为这种倾向并不存在或能很容易地使之合理化，是无用的。

像光头党及其后继者这样的集团，或许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它们对新法西斯主义的传播的重要性如何呢？出于我们已经讨论的理由，光头党是靠不住的联盟，是不可依靠的招安的源泉。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团结起来，他们既缺乏连续性，也缺乏一致性。光头党组织很少多于30人，新的街头匪帮就像流行的音乐一样来去匆匆。尽管他们可被动员来从事某种反外籍人的行动，但他们缺乏一致行动的动机、纪律和耐力。此外，他们与之对抗的同胞要比他们吸引的同胞更多，而新法西斯主义者主张法律和秩序，而不是混乱。

光头党的影响仅限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某种年龄组（15岁至21岁）。关于他们的存在，没有任何特定的民族性，更不用说爱国主义了。他们的观念、他们的服饰和他们的音乐是国际因素的混合，主要是非洲、英国、美国的混合。这些帮派吸引的年轻人不是对新法西斯主义者可能有大用处的材料。此外，他们在数量上很少，是少数中的少数。1992年德国光头党的总数估计有6000人，其中半数是在东德。其中大约2/3是和极右派一致的，其他人则是不关心政治的。一句话，他们对警察和教育者来说，而不是对政治家来说，是一个问题。

根据某些估计，德国年轻一代的相当大一部分——15%至20%——同情极端的右翼集团。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仍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回答。这个年轻人的小集团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注意？死硬的新纳粹的光头党的一些录音带、录像带和迪斯科舞曲销得不错，但他们的人数是很少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 1975 年更多的关于一些恐怖主义者的情况。虽然这些恐怖主义者的数量不过几十人，但他们故意残暴的行为却使他们有了很大的知名度，当然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最终关于每一个积极的欧洲恐怖主义者都出版了一本关于恐怖主义的书籍和发表了几篇文章，关于他们的心理、社会根源和一般的动机也写过研究论文。然而，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事业，因为社会科学也许会去论证大众运动，但肯定不会去论证小集团的行为。的确，极右派的光头党人比恐怖主义者更多。他们同恐怖主义者和早期法西斯主义者有共同之处，都想以不合常规的行为震动公众。归根到底，这是他们广为人知的原因。

但为什么光头党采取极右派的观点，而不采取左派的观点？为什么他们不像他们起初那样居于政治之外呢？大约在 1970 年，大专院校动荡的时期，这种运动会倾向于极左派或无政府主义，倾向于暴力主义分子或自发主义分子。但 90 年代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极左派对于不满的运动和自由漂浮的暴力几乎没有什么诱惑力。对受教育不多的人来说，它是太意识形态了，它不适合攻击明显的、流行的靶子——如外籍人。“没有未来”的一代（和继其之后的人）也不可能转向绿党，因为绿党太知识化、太驯服了。因此，自然而然在许多国家里，新纳粹的象征和观念会在摇滚舞台上得到支持。光头党的政治意义不可高估：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在 20 世纪后期的风俗习惯的而不是政治的历史中，为他们写下一个有趣的脚注。

对移民的恐惧

民族主义的激情和少数民族的冤苦，在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战后重新划定边界和种族清理（也就是排挤），欧洲更整齐划一了。^①纳粹主义从德国人对法国（德国的头号宿敌）和波兰的仇恨中吸取了它大部分力量。现在这种感觉不再那么强烈，已经被 20 年代和 30 年代预想不到的新的紧张状况所取代。

在 70 年代，西欧的政治社会学家发现了“新的社会运动”，他们认为这些运动在未来会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但很少人注意到新的少数民族的出现，这些少数民族在几年之内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在那些导致欧洲新法西斯主义复活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害怕移民泛滥。移民在意大利或俄罗斯新法西斯主义的复兴中没有起关键性作用。但甚至在这些国家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移民问题，在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移民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所说的移民，主要是指西印度人和亚洲人向英国的移民，北非人向法国的移民，土耳其人、摩洛哥

^① 不言而喻，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前苏联、巴尔干、中东和第三世界的地区，那里种族集团的冲突是持久的，并且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式的运动的潜在力量源泉。

人和其他人向德国的移民，南斯拉夫人向瑞士和瑞典的移民，但也有“高加索人”向莫斯科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其他主要城市的移民，以及吉卜赛人的流动。

在60年代以前，欧洲的移民主要是欧洲内部的，基本上是从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向北部和西部移民。在70年代，土耳其和北非成了主要的移民国家，继之是来自外撒哈拉非洲和南亚的移民。后来，随着失业的增多，西欧政府采取措施阻止这种移民。然而，出于各种原因（如家庭的团聚和高出生率），这些措施只取得了有限的效果。例如，尽管德国主动就业的外籍人数目从1972年到1992年是下降的，但他们的总数增加了1倍，从大约350万人增长到700万人。法国（大约有400万人）和英国（也许有300万人）移民的发展，广义地说是与之类似的。除了这些官方数字之外，还有一些不知道的非法的外籍居民。只要有看起来对劳动力的无限需求，欧洲人就很少抱怨移民的存在。但随着土生的欧洲人失业增多，当大多数客籍工人看起来不想回自己祖国时，这个问题就成了在政治上具有核心重要性的问题。到1989年，79%的德国人和75%的意大利人开始认为他们中间的外籍人太多了；持此种看法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大概占80%至90%。甚至在宽容的荷兰，大多数公民也认为国家没有从这么多的外籍人中得到好处，认为这些外籍人中只有1/4在干活，其余的则靠社会保障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维持生活。

对外籍人的愤懑决不限于极右派。撒切尔首相1978年声明，英国“被外国文化吞没了”；密特朗总统宣布，法国已经达到了“宽容的临界点”。在欧洲每一个国家，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地方和中央都投票支持采取限制移民的措施。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右翼极端主义者同其他政党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两

个集团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清除所有外籍人，而其他集团不管多么勉强，都愿意接受那些已经生活在他们之中的外籍人。但如果移民不想回自己的祖国，他们就要做出更大的努力进行文化上的适应，以符合当地的习惯和传统。

许多欧洲人愤怒的是，从不曾问问他们是否想要这么多外国人生活在他们中间，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是投票支持还是反对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就把一个既成事实摆到了他们面前。

通过把新移民集中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某些区，是难以对新移民进行社会和文化同化的。这导致了对社会服务（如住宅和入学）的不成比例的压力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定居在法国的波兰人或定居在德国、英国或法国的东欧犹太人，极力去吸收他们的东道国的文化。但70年代和80年代来到欧洲的北非的、中东的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经常不想被一体化，而是想保留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习惯和价值，但这些东西同东道国的传统相冲突。而且，这些新来者在其肤色、有时是打扮方面，一般更容易被识别出来。

到1980年，许多欧洲的内陆城市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巴尔干—中东的、北非的和第三世界的特点。尽管这种多样性对那些喜欢外来烹饪的人有吸引力，但地方居民的反应一般是不怎么赞同的。他们不仅讨厌这些景物、风味和相对不干净，而且还抱怨法律和秩序遭到了破坏，公众的大量的钱花在了这些起初不邀而来的外籍人身上。这种缺乏宽宏大量也许是令人惭愧的，但也不是特别令人奇怪的。法国、德国或英国的公民定居在北非、中东或任何其他国家并没有受到欢迎。在某些地方，如阿尔及利亚，他们很可能被杀害。无论如何，都不能指

望他们适应他们东道国的宗教风俗和地方传统。

对外国人的敌意，在整个西欧、北欧和南欧都能找到，不仅是在大城市，而且也在荷兰和英国的小城镇，在阿尔萨斯以及在外籍人较少的东德。有些反种族主义观察家认为，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移民的出现很少或根本没有联系。但对选举结果的分析表明，一般说来并非如此。维也纳的例子是有启发性的：所有奥地利的政党都同意把移民限制在很低的水平（每年2.7万人）。然而，从1981年到1991年移民的数字增长了75%。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海德尔的政党及其反移民的论坛甚至在社会党的维也纳都取得了最大的进展：一旦达到了某种限度，同外籍人的对抗就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外籍人的存在——特别是来自海外的，在不大的程度上来自东欧和巴尔干的——和反对移民的政党的力量之间有一种直接联系。^①“寻求避难者”——多半是用词不当——甚至在挪威也导致出现了一个阻止移民的政党，甚至在遥远的芬兰竟导致一场反索马里的歇斯底里。

勒蓬的国民阵线之所以能在80年代和90年代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不是因为新右派的哲学家的功劳，而是由于相当多的人的愤慨和恐惧——勒蓬发明的办法有助于堵住主要来自北非的外来侵入者潮流。

移民和感觉到的外籍人存在的危险的问题，比起1945年后感觉到的共产党人或犹太人的危险来，成了一个更核心更有

^① 自相矛盾的是，关于德国犹太人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却不存在这种联系。如果有的话，是一种相反的比率：纳粹分子强大的地区恰恰是德国北部和东北部，在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最少。纳粹分子在大选成功之前，他们在德国的大学选举中已名列前茅。但他们最强大的大学是很少有犹太人的大学，他们最强大的机构是几乎没有犹太人代表的机构。

力的因素。极右派的反共主义一直是多少可疑的，因为他们承认同样仇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议会制度。此外，他们和其他大多数政党一起都同共产党对立。在战后，在欧洲留下的犹太人很少，已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

控制不住的移民，甚至对那些并不害怕多元文化社会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关心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福利国家的衰退甚至可能崩溃。有人认为，西方富裕国家有道德义务让第三世界的穷国分享它们的财富，给那些要求避难的人提供政治避难所。他们还推论，出于纯粹自私的理由，西方社会在继续接收移民方面有至关重要的利益。按他们对这些国家的人口统计结构（劳动力日趋萎缩和人口日渐老龄化）的看法，需要外籍工人来维持工厂开工。因此，需要反种族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立法，教育年轻人和老年人知道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益处。

这些论点的确包含着真理的因素，因为如果客籍工人都离开的话，很少有欧洲工人愿意在工业和服务业从事低下而收入菲薄的工作。极右派的文化沙文主义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最激进者通常都是年轻人（妇女也有一些）。他们的文化兴趣都限于足球、光头党和右翼摇滚乐。反种族主义者抗议对外籍人的暴力攻击是正确的。然而，同样他们又是在反对根深蒂固的情感。寻求避难的绝大多数人去欧洲，不是因为苛刻的政治迫害，而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渴望。如果欧洲人拥有无限的资源的话，也许没有什么有效的理由反对移民。但欧洲人并没有拥有无限的资源，这必然导致要确立优先权。向德国人、法国人和其他人宣扬宽容是值得称赞的，但既然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没有大的宽容——只引证最显眼的例子——这些论点也就完全失效了。种族的冲突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如果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

徒、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不能一起和平生活，在所有大陆中单让欧洲成为例外是不现实的。

在欧洲对外籍人的攻击在 90 年代达到了高潮，这些攻击当然是罪恶的。排外的歇斯底里是非理性的。但在社会的最不体面的分子犯下的这些暴行之外，有一些真正的问题是不能靠反种族主义的口号、立法和灌输解决的。认为被极右派利用的排外情绪仅仅是一种由经济的衰退和高失业率引起的过渡性现象，在适当的时候必定消失，这是善意的“反种族主义者”的一种错误判断。众所周知，高失业率是结构性的，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消失的。

移民问题是否在未来就像目前在欧洲政治中那样起核心作用呢？欧洲任何政党都不主张无限地移民，几乎所有政党都采纳或支持严格的控制：极右派在这一领域没有专利权。尽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坚持政治的和文化的种族隔离，保护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但至少欧洲移民年轻一代的一部分将在文化上被吸收进现代的世俗的欧洲文明的主流中去。

但经验表明，这种一体化——在语言、方式和习惯上表现出来——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带来更大的种族和谐。恰恰相反，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比起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来经常更多地面临一种身份危机。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没有了根子，但又觉得在他们出生的国家里仿佛没有受到平等对待。因此，他们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就造成了更严重的种族冲突。

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促成了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潜在性增长。如果在最好的情况下，移民受到了限制或阻止，如果是建立在善意和互相宽容的基础上的，某种类似于多元文

化社会的东西就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就从这个新社会出生的一帮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尽管某种多元文化主义长远看来会盛行，但在漫长的过渡时期它仍然会引起紧张关系。此外，由于亚洲和非洲，特别是北非和中东的高出生率（相对），繁荣的欧洲将受到强烈的人口统计上的压力。伊斯兰激进主义加剧着这种压力，因为他们掌握的社会中的那部分现代的人遭到大批屠杀，那些受影响的人会逃跑。如果原教旨主义者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类似的出逃似乎在阿尔及利亚、埃及甚至土耳其也是可能的。但潜在的更多的是非现代的人在出逃——因为有失业，伊斯兰主义者未能建立一种可靠的经济。

最糟糕的场景是形成一种欧洲堡垒的气候，新法西斯主义和类似的运动蔓延起来。欧洲的极右派目前的最好的——也许是惟一的——真正希望是种族冲突，而不是经济危机。

反犹主义和否认大屠杀

反犹主义是纳粹主义的一个关键成分，也是中欧和东欧的某些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关键成分。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那里，它是不太重要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犹太人不多。尽管对犹太人的仇视在法国根深蒂固，但它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法西斯主义那里也不是突出的因素。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这些情感也许在法国就像在德国一样普遍。根据反犹主义学说，犹太人是全球密谋的先驱，策划这种密谋的还有共济会成员和其他破坏因素，如自由主义者、金融资本家和革命社会主义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在东欧和俄罗斯，反犹主义都失去了它作为一种政治因素的恰当性。法西斯主义需要一种敌人的形象，但犹太人的数量已经由于大屠杀而减少了。据说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也有反犹主义。但在政治实践中，因为需要最低限度的关键性群众，实际上不可能用戏法变出一种十分有力的敌人的形象，为了反对他们而使所有真正的爱国者团结起来。

然而，甚至在 1945 年后，反犹主义仍然存在。据报道，在许多国家都有敌视犹太人社会的活动。同样，对反犹太人的派别来说，犹太人问题仍然是突出的问题。但即使基本态度没

有重大变化，极右派（偏执者除外）出于战略的以及策略的考虑，都会减弱了他们的节奏。当然，原因之一是纳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反犹主义者要么否认大屠杀，要么极力“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它”，也就是说，把它仅仅解释成 20 世纪历史的一个脚注，勒蓬就是这样做的。尽管他们在内心欢迎对犹太人的清除，但他们不公开这么说，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渴望得到尊敬，证明大屠杀合理不会改善他们的形象。

犹太人的数量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大大减少了，其他外籍人已经取代了他们的地位：来自土耳其和北非的客籍工人，来自第三世界各国的寻求避难者和吉卜赛人等。因此，犹太人现在仅仅是几种替罪羊中的一种，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如德国和别的地方的舆论测验所表明的，不再是最重要的替罪羊。只有大约 30% 的人承认有强烈的或相当强烈的反犹偏见，但他们对其他外籍人的情绪甚至更是攻击性的。

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公开化之下出现的俄罗斯极右派的态度是这方面的典型。那些主张把清除犹太人当作主要的和最迫切的事情的人，起初在公众的眼里是非常杰出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极右派最有远见的领导人认识到，即使反犹主义是他们的意识形态遗产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如若使它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却会把他们定在一种最不重要的角色上。

犹太人很少出现在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抱怨的黑手党队伍里，或股票市场的投机者中间。他们不属于那些在高加索或中亚抢劫或枪击俄罗斯人的人，或在乌克兰辱骂俄罗斯人的人。前苏联的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在 1988 年到 1992 年间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让那些留下来的人为俄罗斯人民蒙受的所有不幸承担责任是缺乏说服力的；甚至俄罗斯人中最不复杂的人也知

道，人们应该到其他地方寻找真正的罪犯。极端的反犹主义者还包括处在各种矛盾中的俄罗斯新法西斯主义者：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专门的反犹主义者曾指责“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最积极的反苏因素。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新法西斯主义者不假思索地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犹太人是热烈的布尔什维克，是1917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和后来维持政权的工具。正如他们现在声称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很大程度上曾是一个犹太人的党。

然而，在1991年后出现了另一种变化，俄罗斯极右派和新法西斯主义者认识到，（新）共产党是他们的天然盟友。他们都讨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极右派的这些人不得不对他们的同伴做出政治上的和学说上的让步。按照新的说法，共产党不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影响只是到了现在才能被纯洁化。因此，出现的“红—褐联盟”非常不喜欢犹太人，但又不能使反犹主义成为它的纲领的核心要点。

欧洲和美国的传统的死硬的新法西斯主义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企图驳斥“奥斯威辛的谎言”，即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实。简要地说，他们的论点是：没有发现任何书面的证据证明纳粹发出过屠杀几百万人的命令，也没有物质的证据证明有过毒气室。犹太人被运送到东方，是因为认为他们有安全上的危险。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缺乏食物以及瘟疫的传播，其中一些人的确死掉了，也许多达10万人甚至30万人，也许他们受到了严厉的对峙，但后来西方盟国也犯了战争罪，所以单挑出希特勒是不公平的。

有一些稍有不同的说法，例如：俄罗斯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更坦率地承认有过大屠杀，因为几百万俄罗斯人也被杀害了。但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过错。他们曾制造过

大屠杀，所以他们能在战后有了自己的国家，这是通向统治世界的道路的第一步，所以他们也能勒索德国和其他国家给他们赔偿。一些德国人认为，也许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来对付战时的犹太人，但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犹太民族已经向德国宣战了。也就是说，他们是“国家的敌人”，不得不要受到相应的对待。

一个加拿大工程师在一份长达 132 页的报告中断言，像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样的情况，一天焚烧几千具尸体，在技术上是不可可能的。然而，1993 年人们发现这个工程师并不是工程师，并且在莫斯科最新得到的档案中，找到了由托普夫公司提供的技术草图和说明书，证明奥斯威辛的火炉一天能够处理 4700 具尸体。

这些否认大屠杀的人故意把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同东欧的死亡集中营混同起来。德国的集中营，如达豪、布痕瓦尔德、茅特豪森、诺因加默和贝尔根—贝尔森，即使进去的人大部分都出不来，也主要不是死亡营：在茅特豪森集中营，19.7 万人中死掉 10.2 万人；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2.5 万人死掉 5 万人；在诺因加默集中营，10.6 万人死掉 5.5 万人。东欧的集中营没有别的职能，就是以最少的时间处理最多的人。1943 年至 1944 年在东欧，专门的党卫军用一年多的时间来清理屠杀的痕迹。的确，不曾找到希特勒签署过的有关毁灭欧洲犹太人的总命令，但这对历史学家来说并不特别奇怪。他们知道，在整个历史上罪行越大，越不大可能找到书面证据。

然而，还是有来自 1945 年后的各种战犯审判的足够的证据。德国的“奥斯威辛审判”开始于 1960 年，结束于 1981 年。那些指挥和管理死亡集中营的人做出了供词，幸存者也提供了证据。不管是阿道夫·埃希曼还是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

夫·赫斯都对大屠杀的基本事实供认不讳，但这对大屠杀的否认者却没有什麼印象。他们认为，集中营的指挥官做出了这些虚假的供词，因为他们受到了严刑拷打，目击者发生了错觉或者是在撒谎。至于书面证据——例如，关于在俄罗斯的突击部队的报告，提出了被杀害者数目——也是伪造的。在这些否认者看来，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都表明大屠杀不曾发生过。其实，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都没有说过此类事情，甚至与此断言稍微相似的事情。

但是，同这些否认者争论是无用的，因为只要一种辩解被否决，他们又会进行另一种辩解。如果不是用红十字会，也许就会用其他某种国际组织。他们会说：即使希特勒在1939年的帝国议会讲演中声称，如果世界犹太人成功地发动了另一场战争，欧洲犹太人就要被毁灭，这也没有什麼实际意思。进一步说，如果有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话，肯定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就会把它公布于众。既然他们急于从事反德国的宣传，如果他们听说了大屠杀，他们就会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照此看来，这一事实——只是在战争已经结束后关于大屠杀的消息才传播开来——证明，大屠杀从未发生过。

然而，犹太人组织还要继续面对这些否认者。可以假定，即使这些否认者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他们的作品也能够对许多并不非常了解事情真相的人有某种影响。精神分析学家知道，人们倾向于认为，真理是在两个“极端”的中间的地方，无风不起浪。因此，有这样的危险，这些否认者的论点不管多么不合逻辑，都会钻进敞开的耳朵里。

同这些否认者的这些交战，不应同1986年后的“修正主义的争论”混同起来，这场争论既涉及到德国的历史学家，也涉及到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争论的各方关心的不是

事实：几百万犹太人和其他人遭到灭绝。毋宁说，这场论战的要害问题是：纳粹的犹太人政策是从一开始就是故意的并且持续下去，还是机会主义的？意思是说，它想清除犹太人，但考虑可以用各种方式，流血的或不流血的，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进行大屠杀的决定是1940年或1941年初做出的，还是在后来的6到9个月内做出的？是希特勒亲自做出这个决定，还是他的下属（或官僚）对他来了个先斩后奏？不管修正主义者的论点有什么样的长处，他们都不否认大屠杀，而仅仅是想降低它的严重性。

修正主义者哀叹：“不厌其烦地重复”对犹太人的屠杀，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罪恶的说法。他们认为，德国是外国人和决心使德国的罪责永久化的左翼知识分子发动的全面运动的牺牲品。他们论证，这场大屠杀决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同波斯尼亚那样的内战相类似的。在他们看来，“奥斯威辛”是被用来阻止在这件事情上自由表达意见。^① 很难辨别“奥斯威辛的相对主义者”是否真的相信这场大屠杀是和历史上政府和个人经常犯下的罪恶相似的又一次罪恶，或者他们是否承认这场大屠杀的独特性，但又认为宽慰德国人悔恨的惟一方式是降低这一问题的历史重要性。

谁是大屠杀的否认者呢？其中大多数是老纳粹分子或新法西斯主义者。较为成功的极右派政党即使偶尔利用了这些否认者的论点，他们也不想与之太密切地统一起来。他们知道大屠

^① 见 R. 莫勒：《债务与富裕》，载 H. 施威尔克和 W. 沙赫特编：《自我意识的民族》（柏林 1994 年），第 73 页。在同一文本中，作者认为，1945 年后挪威监狱中对待著名作家克努特·哈姆森的医生同集中营里的纳粹医生没有原则上的区别。纳粹主义的赞美者哈姆森在自己的祖国同德国当局合作，像吉斯林党的领导人一样在解放后被拘押了。但也有一个区别，哈姆森被释放了并且活了下来。

杀发生过，他们想得到尊敬——同时他们又想成为公众关心的最热点问题的主角。因此，对新法西斯主义者来说，大屠杀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德国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是个例外，因为在德国有一种特别的渴望，想改写历史记录，或至少表明这场大屠杀决不是独一无二的，而仅仅是战争中犯下的许多罪行中的一种。德国极右派的这些人坚定地相信，一劳永逸地焚毁这具骷髅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些建议颇为流行。

一些大屠杀的否认者是专门老唱反调的人，这种人在每一个集团里都能找到，哪怕是面对着无可辩驳、证据确凿的事实，他们也会说不。他们的信仰是不会被动摇的。法律能否治愈这种邪恶的愚蠢，是值得怀疑的。总的说来，这些信仰仅限于宗派主义者；他们的论点太稀奇古怪，以致他们难以被正常的人所接受。但总是有这样一种危险：在一场大的危机中，边缘性集团的观点也许会超越他们正常的栖息地而传播开来。《天堂长老们的礼仪》今天仍在新纳粹运动的边缘出版，关于国际的犹太人的一共济会的一共产党的一大金融家的密谋的信念迟迟不消失。对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从神学的观点来看，犹太人问题是根本的问题。犹太人是他们宣传和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靶子。极右派的宗派主义继续信仰老式的反犹主义，博勒斯拉夫·泰杰克夫斯基的（波兰的）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波兰的天主教会（他声称）已经“犹太化了”；团结工会被说成是“犹太人的团结工会”；红衣主教格莱姆普和马查斯基据说是犹太人或犹太人的仆从，像李奇·瓦勒萨、塔丢兹·马佐维基一样，实际上波兰的每一位总理或内阁部长、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这些集团的宣传沿循着波兰以及别的地方的战前极端主义者的传统。但这些是个人的观点。极右派的

更明智的代言人批评它们奴隶般地听从于一种过了时的战前的政党路线。他们认识到，某种反犹太主义也许是基本的，但固执地专注于它就是走上了通向政治野蛮的道路。

较成功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政策已经受到了更多的约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和对法律后果的畏惧。意大利后法西斯主义者的领袖费尼，已经忍住不做反犹太人的评论。尽管勒蓬从不声称是犹太人的朋友，但他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早就认识到在犹太人问题上费劲没有多大的政治好处。德国的共和党人只有在他们衰退时，在他们似乎已经一无所有之时，才是公开的反犹分子。海德尔的奥地利的自由党，小心地不把犹太人列为应对奥地利的不幸承担主要责任的集团。反犹太主义在日里诺夫斯基的宣传中起了相对不起眼的的作用。在出现大的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动荡的情况下，反犹太主义有可能重新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但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尽管政治的反犹太主义决没有消失，但它的重要性已经减弱了，也许那些把反犹太主义作为自己宗教信条的人是个例外。

国际法西斯主义

在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各国之间的合作是常见的，但从未建立起法西斯主义国际。德国和意大利给较弱的法西斯主义组织，特别是巴尔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组织，提供金钱、后勤上的支持，偶尔也提供武器。但不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不对这些恐怖主义的或非恐怖主义的集团抱很大的指望。法西斯主义是国际主义运动的反面，没有任何理由说，例如，匈牙利的和罗马尼亚的法西斯主义者会把其他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者当作亲密同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进行了合作，帮助战犯逃到拉丁美洲和中东。甚至后来，他们也交流信息和宣传材料，帮助在瑞典的马尔默和比利时的迪克斯缪登召开小型国际集会。1962 年英国老牌法西斯主义领袖瓦尔德·莫斯利会见了他的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极右派的同党，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威尼斯宣言），向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党发出号召，但这是没有结果的。后来 70 年代和 80 年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集团之间没有进行交流，也没有举行其他国际会议。

美国的新纳粹分子认为，德国是他们的更有前景的宣传基

地，并经常访问欧洲。法国和比利时的新右派给俄罗斯的新法西斯主义集团提供资料，显然也提供一些金钱。德·本诺伊斯特、罗伯特·斯陶克等人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极右派的主要思想家亚历克山德·普罗克汉诺夫和阿历克山德·杜金使他们的看法流行开来。俄罗斯的名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期刊得以创办，模仿新右派的机关报《要素》，这不是偶然的（还有一份佛兰芒文的《要素》）。法国极右派的意识形态期刊之一叫做《一致》（奥地利也有一个《一致》）。日里诺夫斯基同勒蓬建立了联系，也同德国共和党、慕尼黑的弗莱的党和奥地利的极端右翼分子建立了联系。但他还极力想进入世界自由党联盟。弗莱也曾访问莫斯科，向日里诺夫斯基的党致意。

在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会议上，可以找到来自国外的客人，他们代表着各种“民族主义政党”。这些尊贵的客人侃侃而谈，既是激进的，又是特别冗长的。人们经常弄不清楚这些宗派是不是只代表他们自身，他们是病态的疯狂还是些当局的内奸。

还存在着一种阿拉伯—中东的联系。莫斯科一家日报叫做《耶路撒冷》，成了俄罗斯极右派的一份报纸，它的资助者是一个居住在俄罗斯首都的“阿拉伯”商人。俄罗斯和德国的右翼分子高唱歌颂某位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的赞歌，也许不是没有某种相互吹捧的意思。

在德国非常积极的林顿·拉罗切的组织，是极右派的一个最稀奇古怪的派别。它起初有托洛茨基的精神，在莫斯科建立了分支，同苏丹和其他阿拉伯北非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并且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集团哈马斯的代言人。然而，诸如此类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结果。

更重要的是欧洲议会中的技术派，它形成于1989年，由

勒蓬党的 10 名议员、6 名德国共和党人和一名来自佛兰芒集团的比利时人构成。这个技术派由法国控制，因为在它形成时法国代表是最强大的集团。它采纳国民阵线的纲领作为所有极端右翼集团的共同政纲。同时技术派又是建立欧洲民族青年联盟的工具。这个青年集团主要以勒蓬的国民阵线和意大利的 MSI 为基础，在西班牙的“夏季大学”集会，在温西德尔游行纪念鲁道夫·赫斯逝世（他葬于此地），在奥地利的乌尔里希伯格开会纪念佛朗哥逝世——在会议上奥地利第二大党的领袖尤根·海德向奥地利的党卫军老兵及其拥护者致词。

但这个技术派仍然没有达到行动的统一。在布鲁塞尔，4 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愤然离会，因为他们认为南蒂罗尔是意大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德国共和党人则要求给予它自治的权利。甚至德国共和党也在宣传前纳粹思想的问题上发生分裂。其领袖弗兰兹·舍恩胡伯声明激进派的纲领是“反人类的、新纳粹的、种族主义的和极端主义的”。因此，舍恩胡伯 1994 年 9 月被他的党开除出去。

新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俄罗斯大多数右翼极端分子都拒绝埃奥拉和法国新右派的尼采式的精英主义学说，认为这些学说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是不合适的，甚至是有害的。此外，它们的异教主义也大大冒犯了俄罗斯的东正教，而右翼极端分子却想和东正教保持良好关系。莫斯科的爱国者不是没有道理地主张，俄罗斯人有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西方的形而上学家最新流行的学说同他们的国家是根本不相干的。

在英国（历来在意识形态上是薄弱的）和德国一段时间也表现出了对法国新右派思想的兴趣。在 80 年代，英国和德国极右派的杂志定期发表法国作家的文章，并报导巴黎的新思

潮。但这种同情只持续了几年，后来就逐渐萎缩了。只有一些知识分子对这些论题感兴趣。过一段时间，这一主题枯竭了，每一个人也就转回到他们传统的偏爱——（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保守的革命”和反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

如果新法西斯主义者之间有国际合作的话，那也将属于非法的恐怖主义。如同卡洛斯、巴德—梅因霍夫和 70 年代的左派恐怖主义者的合作只能靠一种国际的同情者（和思想机构）的网络一样，极右派的恐怖主义者可以利用他们的国际联系。

主要在欧洲积极活动的一个美国小集团 NSDAP/AO（国外组织），自 1993 年以来出版了一个个人电脑杂志（封面地址在内布拉斯加），为国内生产可塑炸药、凝固汽油物质和雷管提供指导。既然这些集团并不打算把他们的活动用于采矿、建筑或石油勘探，这些指导的目的也就一清二楚了。即使极右派的恐怖将不会比它的前辈更有效，过去的失败的教训也吓不住它。如果外部战争是过去时代的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本质部分的话，那么使用大规模破坏武器的恐怖主义就能够在未来扮演一个核心角色。

下 篇

后法西斯主义



教权法西斯主义与第三世界

一种在过去显赫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最近已经复活，也许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会再度荣耀起来。这就是教权法西斯主义。它能采取多种形式，如法西斯主义与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合流。

原教旨主义一词不像今天政治争论和一般争论中使用的大多数词汇那样完美。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谁发明出一个更适合的并被更广泛接受的概念。如果原教旨主义被理解为正统性，复归于初始，意味着神圣的教义，那么目前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合法性便是可疑的。他们经常提出自己的对教义的新的解释，这些解释决不等同于传统。把原教旨主义解释成反现代主义更确切些，但既然现代性有各种含义，所以这种解释并不总能说明问题。因此，归根到底，原教旨主义已经代表着一种激进的、好战的、狂热的运动，极力通过武力把它的信仰强加于别人，所以它是一种政治运动。

早在 20 年代，在希特勒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之前，人们就注意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美国最早一篇论述原教旨主义的文章就叫做《美国的法西斯主义

与原教旨主义》。^① 作者详细说明政治上的狂热如何助长了宗教的不宽容，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如何同激进宗教携手并进，三K党如何同原教旨主义者合作。两者的基础是同一个社会阶层，即受教育不多者和渴望用原始暴力解决问题的对社会不满的人们。

教权法西斯主义一词的出现甚至更早，是在1922年。它指的是罗马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天主教信徒集团，他们主张把天主教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综合起来。30年代人们观察到了伊斯兰兄弟会同法西斯主义的密切联系，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端的伊斯兰组织支持轴心国。

纳粹主义包含一种异教的因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一种反教权的倾向为特点，但这些东西只是在这些运动的边缘出现的。一旦掌权，法西斯主义国家并不急于危害它们同教会的关系。而且教士在法西斯主义或亲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和运动中扮演了一种关键的角色。拉丁美洲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和类法西斯主义政党以及各种“一体主义”运动，拒绝纳粹主义中的异教因素，主张需要一种基督教的精神革命（美国的神父查尔斯·库格林）。英国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在回顾时写道：英国法西斯主义的弱点在于，它在精神上没有更多的基督教色彩。不论是奥地利的恩格尔伯特·多尔福斯和库特·冯·舒斯尼格，还是斯洛伐克的蒙西格诺·蒂索（当时经常被视为教权法西斯主义者）的运动，都不是由狂热的宗教虔诚激励起来的。他们不是极权主义者，而是权威主义者。而乌斯达莎的克罗地亚国家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宗教和法西斯主义的双重影响导致了按巴尔干的标准看是史无前例的国家恐怖主义。

^① 《基督教世界》1924年，第235~243页。

有人认为，仅仅因为法西斯主义和宗教都是一神论的世界观，都想在各个领域控制全人类，二者之间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理解。《圣经》说“在我面前汝不得有别的神”，但它还要求“使恺撒的东西服从恺撒，使上帝的东西服从上帝”。犹太教法典毫不含糊地主张“(世俗)王国的法律是法律”。但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伊斯兰是政教合一，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政治—社会制度。伊斯兰并不要求穆斯林不服从非穆斯林的统治者。但这意味着，只要不信教者的统治持续下去，他们就应该服从。

还有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宗教的综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各种各样的法西斯主义在深层都是民族主义的，而现代世俗的民族主义，即使不是宗教诅咒的，也是同世界的主要宗教不相干的。但在什叶派中，在以色列的犹太狂热分子中间，在印度的锡克教徒中间以及在亚洲其他地方，好斗的宗教和民族主义是共存的。俄罗斯的东正教一直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主要支柱，像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保加利亚国家的教会一样。

另一种更有效的论点是，在历史上有些宗教比其他宗教更少狂热，更多宽容。因此，这些宗教不可能是任何形式的教教法西斯主义的候选人。并非所有宗教都力图建立一种神权政治。例如，印度过去是典型的宽容国家，阿育王尊敬所有（其他的）宗教，阿克巴皇帝宣扬宗教宽容。

13世纪在弗里德里希·冯·霍亨斯陶芬统治下，欧洲也实行过类似的宽容，但这只是个例外。自中世纪早期以来基督教的历史，是一部迫害异教徒、烧死女巫、十字军东征和大屠杀、宗教法庭和其他形式的不宽容的历史。教会和统治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只是随着现代初期国家的世俗

化，这种权力斗争才失去了它的意义。例如在俄罗斯，随着把沙皇（伊万六世）的意志强加于教会，这种权力斗争才失去了它的意义。

在伊斯兰世界，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宗教不宽容的例子。可以肯定，这种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代，表现为对土耳其人和乌兹别克人的迫害。最近则是对各种伊斯兰教派、巴哈教派、基督教徒、犹太人的迫害，实际上是对所有其他宗教的迫害。执行反对非伊斯兰世界的神圣战斗的命令，是集体的至关重要的义务。神圣战斗是一场持久的革命，也许有暂时的停战，但没有真正的和平。这是法律，但在实践中经常必须做出让步。

当然，原教旨主义不是伊斯兰的专利，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以及其他宗教中也可以找到。它的极端形式表现为政治恐怖主义。如美国的反对废除黑奴制度的谋杀，以色列的卡赫主义^①，印度的对印度穆斯林的攻击。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原教旨主义者对世俗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但激进分子只是在有些国家才取得了掌权地位，并且有可能在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孟加拉国甚至其他国家取得进一步的成功。相反，在西方和东方大部分地区，世俗主义已经有了如此大的进展，以致原教旨主义者掌权是不可能的。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思想先驱宣扬，共同体应当高于个人的个性。他们鼓吹为神圣的事业献身。他们把民主当作卑鄙的异端邪说并相信，世界严格划分为朋友和敌人——

^① 卡赫主义，以色列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由拉比·迈尔·卡哈纳所创立。该运动反对从1967年以色列占领的任何土地上撤走，反对同阿拉伯人的任何妥协，用激进的甚至暴力的手段反对政府并恫吓阿拉伯人，主张把阿拉伯人从西岸赶出去——译者注。

在1990年俄罗斯极右派词汇中是“我们的”和“非我们的”。他们把领袖的统治写到他们的旗帜上，盲目服从和近乎绝对相信男性的优越性。他们宣布，他们的信条是同堕落的西方的信条根本冲突的。这些就是路德维希·克拉格斯和卡尔·施密特的，汉斯·弗莱耶和弗里德里希·沃尔特斯的，魏玛共和国的右翼新教神学家的以及其他现已被忘记的人的信仰。

原教旨主义本身不能和法西斯主义相等同。在许多国家，原教旨主义主要是向后看的和保守的。在某些情况下，原教旨主义主要是文化上的，在其他情况下它是防卫性的——少数人面对世俗的多数人或其他多数人宗教作出的反应。例如，以色列的极端正统的犹太人，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原教旨主义的少数派集团在思想上也许是极端的，他们也许使用暴力甚至恐怖主义。但他们不可能梦想建立一种神权政治。他们能追求的至多是更多的自主权。

在其他地方，如在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文化传统排除了建立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可能性，或者说世俗化已经进展到了不可能转回去的程度。虽然原教旨主义在某些国家的胜利为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提供了新的动力，但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在学说和实践上，并不同于巴基斯坦和埃及所宣扬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大多数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都把什叶派统治者看作是宗派主义者。

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如果激进化在一些地区继续下去的话，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将会更强烈。许多西方人害怕法西斯主义这个词，但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和北美之外并非总是具有这样的否定性含义：对许多好战者来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士，他们出于某些原因而失败决不是不光彩的。

这种炸弹神学和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

主义特点有共同之处：原教旨主义者在某些方面是传统主义者，但他们并不想完全按现在的样子来保留社会和个人，而是要改进它们。他们想要全盘控制和同情支持，不仅仅是消极的服从。这种原教旨主义是非常不民主的和反自由的。没有不同政见，只有异端邪说。个人的人权和思想自由并不存在。

像法西斯主义一样，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是一种民粹主义运动，立足于社会的紧张关系和一个底层阶级的不幸和愤恨。这个底层阶级没有从现代化中得到好处，而是感觉到被抛弃了或被边缘化了。它具有一种公开的平均主义色彩，矛头针对着那些过得更好的人。

阿尔及尔和埃及的暴徒，砸毁新轿车，擅自占用新大楼，既是出于深厚的宗教感情，也是出于不满和嫉妒。在“神怒”背后存在的是挫折和老式的阶级斗争。德国 1932 年至 1933 年暴乱的冲锋队的新成员，在动机和精神上同作为原教旨主义运动之柱石的恶棍，有许多共同之处。

伊斯兰革命得到了它的对社会不满者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老中产阶级或集市商人、小生意人和工匠。他们觉得被现代影响和发展所遗弃或拒绝。他们不能从银行获得信贷，觉得受到了现代商场和高技术进口的威胁。一个新的现代的中产阶级是存在的，但国王政权害怕独立的创造性，不允许它组织起来。这些导致欧洲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革命的运动，是由一些根本不同的有着冲突的阶级利益的集团所组成的。但阶级利益不是决定性的，特别是在后来的阶段。相反，新政权是综合的，打算以更高价值的名义调解阶级利益。集市商人被要求回到他们传统的职业，革命不是建立在发横财的高代价基础上的。

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国家党是统治的主要工具，而在原

教旨主义者那里，宗教组织是突出的。这些组织有一些有魅力的领袖，但通常他们实行集体领导。在什叶派制度中，教士扮演着核心的政治角色，而在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那里却很少是这样。然而，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教士都不会远离权力岗位。这也适用于以色列的犹太教士，斯里兰卡的僧伽罗僧侣以及别的地方的教士。像法西斯主义一样，激进的政治宗教一般对许多学生和年轻一代有吸引力。这关系到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的失败、对西方方式的不满、失业的挫折和学生缺乏学有所用的机会。

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和教权的法西斯主义共同具有一种经济学说，或更确切地说，缺乏一种经济学说。它们都反对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拥护“公正的社会秩序”。它们反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但不反对私有制。由于它们不信任市场，它们就尝试一下国家资本主义。在纳粹德国，党卫军和纳粹领导人个人建立了一些大公司，如赫尔曼·戈林工厂。

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是宽容问题。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的人性观是严厉的：除非让人们感到害怕，否则他们就会成为罪犯。在他们看来，单靠灌输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强制——这既适用于敌人，也适用于追随者。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普遍使用恐怖。尽管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在和平时期也极力在海外暗杀他们的敌人，但相对来说是很少的，他们总是极力掩盖他们的行径。但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公开进行这样的事情。背教者和叛徒必须受到惩罚，否则他们就成了效仿的榜样。人们可以指望，会有几百个狂热的信仰者热衷于执行这一神圣的任务，因为在天堂已经为每一个烈士留下了位置。对人性的不信任使得这种诱惑变得甚至更有吸引力，许诺杀掉一个背教者奖励数额可观的美元。

原教旨主义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以教徒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这些教徒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就是向西方和现代性进行大造反。原教旨主义根基于对西方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以及对现社会停滞状态的不满。西方的价值观遭到拒绝，因为它们破坏和颠覆传统的秩序和生活方式，因为它们导致宗教和教士逐渐被边缘化。在原则上，这种意识形态既反对西方，也反对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但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主要是同西方接触和冲突，大部分怒火也就指向了世界的这个地区，而非其他恶魔。

这种意识形态的“反西方主义”和欧洲思想史上的极右派的传统态度有许多共同之处，后者曾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并且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①

在某些分析家看来，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是因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失败，是因为穆斯林国家之间任意划分边界，但这只是部分真实的。边界的划分也许是任意的，但它们不可能改变。无论如何，阿拉伯世俗的民族主义者也反对以前划分的边界。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冲突不是绝对的：中东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支持，但他们也镇压穆斯林兄弟派、什叶派和其他种族集团。

反对自由—世俗的价值，用一种新的秩序取而代之，这是用不着详细说明的。一些西方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提倡者断言，在这种对立中存在的不是冲突，而仅仅是以基督教的反“好战的伊斯兰”的传统偏见为基础的误解。其中有些人认为，在东方，用语并不一定贴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思（例如“圣战”），

^① 例见奥莱尔·科尔奈：《向西方造反》（伦敦1938年）。

无论如何穆斯林的教义和穆斯林的做法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些论点不是完全错的，因为所有意识形态必须对现实、人的不完善性和脆弱让步。它们必须适应经济的和技术的变化。阿拉伯的语言倾向于夸张法，这也是事实。但这些辩解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使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看起来比它实际上更温和。穆斯林激进分子不仅仅是着迷于经文和良好行为的虔诚信仰者，他们的主要偏见是惩罚无信仰者。

关于原教旨主义政权的精英主义特点和对专制的需要，什叶派伊斯兰和逊尼派伊斯兰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什叶派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期望之上的，即很早以前神秘地消失的第十二世伊玛目^①将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只有到那时才有合法的（国家）权威。同时，穆斯林信徒需要指导，既然信徒大众不具有必要的知识，就必须由职位高的宗教人士来解释《古兰经》，最高的宗教领袖是阿亚图拉。

埃及和别的地方的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一方面更自由一些。它的主要领袖是赛义德·库特勃，1966年在纳赛尔统治下被处死。他声称，一个穆斯林国家的领导权不一定要掌握在戴着穆斯林头巾的人手中。如果国家承认《古兰经》的法律作为国家的法律，以取代世俗的宪法和法典，也就足够了。

但伊斯兰并没有广泛的法律体制。正像穆罕默德没有给继承他的人留下任何指示一样，《古兰经》只有一小部分涉及法律和社会。社会的许多方面在《古兰经》中根本没有讨论，或者只是不清楚地或矛盾地提到过。简言之，仍然需要有《古兰经》的解释者；这些指导不能出自国王或总统，不管他们多么

^① 伊玛目，指伊斯兰教国家元首哈利发、什叶派宗教领袖或声称继承穆罕默德的任何政教领袖——译者注。

虔诚地信教。但是，阿拉伯的一些领袖坚决反对教士的这些要求，认为自己有解释的权利。他们像对待动物一样把极端分子当作“骗子和异教徒”清除掉，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毁灭伊斯兰，分裂民族。

在教权的法西斯主义中，填补群众党角色的是被动员来进行大规模示威的信徒的共同体，如民兵以及精英机构。人们受到了居民监视者体制的密切监视，这种监视体制有点类似于纳粹封闭看守体制。

当教权法西斯主义者在一些国家中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们的恐怖主义组织便进行破坏国家权力机构的活动，谋杀重要的政府官员、外籍居民和旅游者，以及本国少数民族的成员。北非和中东的教权法西斯主义者迄今进行的个人恐怖主义活动要比掌权前的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更多。在德国纳粹分子掌权前的3年，大约有300起政治谋杀案，而且并非都是由纳粹分子干的；而在阿尔及利亚从1992年到1994年期间，竟有几千人被杀害。

暴力是法西斯主义和教权法西斯主义共有的，包括对政权的所有敌人实行的严厉惩罚。真主也许是仁慈的，但他在尘世上的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却不仁慈。同过去的专制相比较，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要求民众完全屈服。它不止是控制公民的政治活动，而且是控制公民的全部活动，包括他们的休闲时间。私人领域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在许多方面比法西斯主义所渴望的更极权。政权的反对者被消灭、关押或被迫流亡。教权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政权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是两种社会之间的冲突，即现代社会和另一个反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有如此之多的人被迫逃亡。

政治原教旨主义也是进攻性的。它是作为一种反对现代性

和西方世界的防卫性反应而兴起的。但在它发展的初期，它就打赌谋求世界的领导权：西方不仅在道德，而且也在政治上破产了；它的末日已经来临；惟一能够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力量是政治原教旨主义；西方陷入了深刻的道德和文化危机之中，是罪人，因为它已经抛弃了作为指导原则的宗教。

上述要求不是独创性的，因为在 50 年代像弗兰兹·法农那样的左翼激进分子已经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法农曾强烈主张使用暴力来反对腐烂的西方。但法农和他的朋友所能提供的一切是某种神秘的（和人为的）第三世界意识形态，而原教旨主义者反映的是几百万被同样的不满和畏惧所驱使的信徒的感情。原教旨主义是一个有传统的世界使命感的运动。

转向进攻性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如果不破坏西方的文明，那么，西方的理性主义、西方的科学以及西方的渎神和娱乐就将压倒伊斯兰，把它打入地狱。既然不可能建立一座长城挡住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停止堕落的惟一方式就是破坏邪恶的来源，因此就需要使西班牙和法国伊斯兰化，接着使欧洲其他地区，最终使整个世界伊斯兰化。

支持原教旨主义者的源泉是什么？他们的弱点是什么呢？原教旨主义的号召首先根基于西方政治的 and 文化的兴起与统治。伊斯兰一度在世界上有一种高级的文化和最强大的力量，现在却贫穷和虚弱。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它想模仿西方制度和习俗的尝试失败了。这导致它在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旗帜下向西方造反，但这也不成功。接下来的就是作为一种传统上的政治宗教的伊斯兰，它已经进入了向西方造反的第二阶段。早先在 30 年代后期，法西斯主义在穆斯林世界就有某种追随者。

我们已经提到了成千上万人民的社会经济灾难与穆斯林激进主义兴起之间的联系。面临最大的政治挑战的国家是有最严

重经济问题的国家。苏丹和孟加拉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苏丹多年来已经显示出负经济增长，孟加拉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阿尔及利亚经济多年没有增长，它的人均收入已经下降，它的失业率高达 50%，甚至在年轻人中更高，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前苏联的穆斯林各共和国的经济急剧衰退（例外的是哈萨克斯坦，然而那里 1993 年的通货膨胀高达 150%）。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实际上崩溃了。同时阿尔及利亚和苏丹这样的国家的出生增长率超过了 3%。苏丹的人口增加了近一倍，从 1800 万人增长到 3500 万人——尽管从后门引入了控制生育，但为时已晚，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阿尔及尔城市有 30 万人，今天多达 200 万人。

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这些观察，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穆斯林国家，惟一例外的是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石油出口国和人口稀少的富裕的海湾酋长国，甚至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是这样。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在产出和人均收入方面稍微有增长，但伴随有高通货膨胀率（土耳其）和各种非生产性义务，如高防御开支。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几乎没有希望得到实质性改善。在这种情况下，许诺通过宣传信仰而获得拯救的民粹主义运动，便可以动员起庞大的失业后备军。然而，有理由断定，群众将不会无动于衷地忍受许诺如此之多而实现如此之少的政权——最初是消极地抵抗，然后是积极地反对。

在重大危机的时期，政治伊斯兰是穆斯林世界严肃的竞争对手者，但激进分子的目的甚至更高。他们相信他们有一种最终让每一个人都接受的世界使命。他们的全球使命的梦想也许不会实现；然而，一个贫穷的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获得了现代武器的话，也能对它的邻国构成重大危险。

西方批评家很清楚地认识到了伊斯兰社会的弱点：什叶派伊斯兰和其他激进宗派的单调，连同他们诸如连续 5 天的祈祷、沐浴、迅速的斋月和朝觐，都不可能在西方人中找到同情者。西方人渴望精神的启示，而不是遵守礼仪。

激进伊斯兰的力量是一种民粹主义体系的力量，这种体系诉诸的不是有教养的人，而是简单的人。它在一个危险和不确定的世界里提供了确定性，不管这些确定性是多么地原始。但政治宗教的弱点是，它的主张和许诺主要是现世的。因此，当发生错误时，它不能靠情有可原来辩护。它必须显示出独特的成就。但是，脱离了现代文明，激进的伊斯兰也就使自己脱离了现代科学这一目前的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伊斯兰显赫人物相信，如果现代科学被妥当地伊斯兰化，它就能安全地用于伊斯兰的秩序。这意味着落后于他人，而且也不能肯定，它在一种神学政治的制度里能否被有效地应用。

随着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不危及它的生存，它就不会自己解放自己，所以它有可能变得更激进。即使伊斯兰主义者在一个或更多的国家掌了权，他们也不会给统治者带来多少好处。他们不可能提供大量的财政帮助。他们的领导权会受到挑战。他们至多能希望的是，一个很小的“原教旨主义国际”暂时地一致行动，协调政治行动和恐怖主义。

有人相信，原教旨主义者提出过许多自杀性任务，而我们对这些任务却没有任何防卫。一度关于日本的神风队飞行员也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自杀性任务，没有任何理由假定未来会有一些人这样做。在过去，原教旨主义者认真反驳关于国家恐怖主义的指控，认为是根本找不到的。但如果他们濒临绝境，神学政治论者也不会不加斗争地就放弃权力，在过去盛行的相对的限制（和掩饰）也许就撕破了。

激进伊斯兰的弱点是明显的。它没有提出可靠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以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制度竞争。统治者的目的和风格以及原教旨主义社会毫无乐趣的生活——黑色什叶派主义的送葬队伍和自我鞭打——是同绝大多数人的情绪、希望和激情相冲突的。狂热主义也许暂时地受到欢迎，但它不能充饥或减轻无聊。

法西斯主义者比原教旨主义者更懂得群众应该得到娱乐。原教旨主义者既不提供戏曲，也不提供竞技。像法西斯主义一样，他们能动员群众，但他们能动员群众多长时间呢？应该提一下其他两个基本的错误：激进的伊斯兰应该认识到，为了他们事业的成功和成长壮大，他们需要中产阶级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社会的这部分人比群众更难操纵，但没有他们的合作，激进的伊斯兰政权就必定失败。最后，激进分子抱有偏见地认为西方是大恶魔，同时忽视了另外的全球的权力中心已经出现。例如，他们不去领情印度的善意，而是威胁它。简言之，教权法西斯主义者已经不仅仅是向美国和欧洲进行挑战，他们被世界上所有其他政治力量视为潜在的敌人。即使伊斯兰是团结的，这种行为也是莽撞的。由于它能依靠的只是少数人的支持，它便是自杀性的。

激进的伊斯兰主要向中非、西非和东非扩张，在那里最近一代穆斯林的人数增长了一倍。这些落后国家奉行的战略是类似的，甚至是一致的：在第一阶段，创办清真寺，建立伊斯兰学校和中心；开办报纸和广播电视站，目的是争取皈依者；还试图用阿拉伯语来取代法语和英语。在下一个阶段，一旦有了一定规模的群体，就成立政党，训练游击队战士；接下来是进行战斗，把国家变成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共和国。他们认为，武装集团是夺取权力的主要工具。起初他们的

主要目的是清除像基督教传教士这样的对手，如果当局不愿意对激进伊斯兰做出让步，就使国家陷入动乱。这种宗教帝国主义从国家的经济落后和人口的文化水平低中得到了很大好处。在撒哈拉的非洲南部——萨赫勒国家——伊斯兰成了最穷的和最落后的人的宗教。

然而，激进伊斯兰的进展因它的宗教战士中间缺乏团结而受到阻碍。他们的最积极而且最慷慨的雇主沙特阿拉伯，并不同伊朗人及其苏丹盟友——把他们的努力集中在东非上——协调活动，也不同卡扎菲协调活动。卡扎菲甚至宣扬一种与正统教士不同的伊斯兰。此外，激进的伊斯兰必须对付特别是非洲伊斯兰特有的老问题，对付它对圣徒和图腾因素的崇拜。这些因素在最重要的非洲穆斯林国家，如塞内加尔和（北部的）尼日利亚特别明显。北部的原教旨主义者可以宽容一种“通向伊斯兰的非洲道路”，但不论是伊朗人还是沙特阿拉伯人都不能接受其他因素，如非洲伊斯兰比阿拉伯世界和伊朗承认妇女有更大的作用。这些内部分歧，即使很大，也不影响我们已经提到的最为重要的趋势，即激进伊斯兰对非洲的入侵。

今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是伊斯兰本身）是世界上惟一公开主张扩张和输出革命的重要力量。它号召进行一场反对内部和外部敌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在反对其他文化的斗争中——是不能有任何妥协的。

有些人极力把这种战争解释成一种纯粹精神的概念，只要激进的伊斯兰不认为已经准备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它就是纯粹精神的概念。显然，它不能同时攻击整个世界和它的内部敌人。因此，“伊斯兰的威胁”有时在西方被夸大了，不是因为它被描绘成比实际上更狂热和更有侵略性，而是因为它具有内在的弱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论是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

国家还是斯洛伐克的教权法西斯主义者，都不曾接触到导弹和核装置。人类现已面临的狂热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手段的结合，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以外的法西斯主义通常都被当作“假法西斯主义”不予考虑，不是没有道理。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发展，一种经济基础，以及有效统治的能力。没有这些，法西斯主义的专政就是不可能的。自那时以来，条件已经改变了，欧洲以外的法西斯主义成了一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了一种现实。

迄今为止关于激进伊斯兰的大部分评论指的是什叶派伊斯兰。但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运动，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在其他方面是不同的。好战的逊尼派伊斯兰运动从事宣传和群众运动，也从事恐怖主义。这些运动也包含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它们的目的是建立专制的和侵略的政权。同时它们必然包含现代的特点——在电视、计算机和传真机的时代是必不可少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埃及和印度出现的，是一种寻求宗教复兴或文化革命的运动。在中东和北非，只是到了60年代原教旨主义才做出转向政治的决策。在巴基斯坦，伊斯兰的政治化必然更早地出现，是在获得独立后南亚次大陆分裂之时。绝大多数穆斯林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而不是想要一种神学政治。相应地巴基斯坦立国的主要提倡者和它的早期领袖，如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利亚加特·阿里·汗，都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

在阿尔及利亚，随着公众生活阿拉伯化，伊斯兰主义者成了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伊斯兰主义者在埃及所做的那样，他们转而反对没有给他们的活动以大力支持的权力当局。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1981年被杀害，阿尔及利亚的总统穆罕默德·博

迪亚夫 1992 年被谋杀。在这些国家的激进化过程中，以色列问题（也就是说，穆斯林国家没有能力根除犹太人国家）并没有起关键性作用。在政治伊斯兰取得最大进展的两个国家，即伊朗和阿尔及利亚，以色列是一个附带的问题。

当收入和生活水平越来越不平等时，这种激进化是和经济的自由化相一致的。这种激进化发生之时，正是对西方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老精英分子越来越显示出智穷力竭之时。

这种发展在阿尔及利亚最为明显，在那里曾在反对法国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阵线（FLN）的旧的领导权，在统治 30 年之后已经显示不出它的可信。它导致占很大比例的年轻人识点字但没有教养，失业而毫无希望。几百万人从乡村流向城市，但找不到工作和住所。在 80 年代，激进的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它包括一个更自由的派别，这个派别自认是 50 年代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早期领导人的继承者，主张“阿尔及利亚优先”，而不是泛伊斯兰的政策。但它也包括一个更激进的派别（由什叶派阿里·本·加领导的沙拉菲亚），为神圣的伊斯兰而战斗。

阿尔及利亚政府对伊斯兰主义者做出了重大让步，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却没有做出真正的努力同 FIS 较温和的派别达成一致。此外，政府在承受不起时许诺进行自由选举，后来当选举潮流转而反对它时又宣布选举无效。阿尔及利亚政府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是解决不了的。如果伊斯兰主义者通过自由投票的胜利掌握了权力，以后就再也不会会有自由的选举了。根据激进伊斯兰主义者（什叶派和逊尼派都一样）的教义，民主是反对真主和宗教的滔天大罪。因此，激进分子取得胜利，政治规则都会改变。

FIS 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网，起初接受了沙特阿拉伯和其

他海湾国家相当多的金融支持。其根据是一个错误的假定，即富裕的阿拉伯统治者会领会他们的善意，至少免遭攻击。阿尔及利亚权威人士，也对激进分子提供了帮助。由于害怕大学的极端左派取得强大地位，他们把伊斯兰主义者当作一种政治反冲力给予了很大帮助。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处于防御地位，最终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排挤出去。伊斯兰激进分子转而反对使他们的成功成为可能的人。然而，正是政府的组织支持和财政支持，起了关键的作用。

阿尔及利亚统治者的根本失误在于他们解决不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1988年阿尔及利亚生产的粮食相当于30年前，但它的人口增加了一倍。错误地反对错误的敌人的战略又加剧了这种困难。在FIS的政治领袖被逮捕后，这一运动被削弱了，失去了它的一些选举支持者。其结果，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后来逃到摩洛哥的阿伯戴尔·哈克·拉雅达领导的伊斯兰武装集团（GIA）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对外国人，也对政权的支持者和不支持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暗杀运动。另一个主要的靶子是教育体制，爆炸学校建筑和暗杀教师。这些攻击导致几千人丧生，当局镇压恐怖主义不力使得政权威信扫地。

阿尔及利亚的抗议运动在表现上肯定是宗教性的。它一直激烈地反对现代性，狂热地反对当局。大部分领导岗位被俗人所占据，群众转向伊斯兰主义者——主要是因为觉得被旧的领导层所背叛，还因为贫困和不满。

在埃及，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但它的政治影响是有限的。埃及像阿尔及利亚一样有着相同的社会紧张关系，但埃及还有一种更大的宽容的传统，不利于狂热主义的传播者。埃及的民族主义也更早而且更根深蒂固。各种

恐怖主义集团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积极活动，在学生、低级官员和一些职业人士中有追随者。但基本上伊斯兰激进主义起源于特殊的地区，如上埃及的亚西乌特和宁亚地区以及开罗的贫民区。激进分子在选举中的情况并不好，对外国人的袭击是小规模地进行的，大众的反应是不支持的。激进分子杀害了受讨厌的政权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但没有对政权构成严重破坏。

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逊尼派激进分子中间，教士的直接干预并不常见。埃及的塞克·基思是原教旨主义的最有影响的宣传家（通过国家的广播电视）。这些激进的逊尼派运动并不力求一劳永逸地建立一种神学政治。在国家中他们打算让神职人员（“伊斯兰法律博士”）成为领导人的顾问、最终的仲裁者，而不是掌握政权者。这样一来，神职人员就不会对任何挫折负直接的责任。尽管逊尼派运动的进展遇到了一些障碍，但逊尼派激进主义还是具有什叶派的某些法西斯主义色彩，特别是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和不妥协地把民主和一般自由制度当作一种宗教原则的事情来反对。逊尼派比什叶派较少极权主义，但逊尼派对暴力的狂热信仰并不比什叶派逊色。

西方的一些维护激进伊斯兰的人认为，这种反西方主义仅仅波及到色情文学和其他的过分的言论自由，而没有波及到政治自由本身。伊斯兰激进主义反对民主，是因为民主极力使理应属于真主的东西脱离真主（和真主的惟一合适的解释者乌理玛^①），并给那些不能理解和实行自由的人以自由。这种不宽容是同任何形式的政治自由不相容的。激进的伊斯兰必须规定和监督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这种不宽容涉及到少数民族（如埃及的科普特人）和一般的外国人。它导致相信存在着由基督

① 乌理玛，指穆斯林国家有名望的神学家或宗教法学家——译者注。

教、其他宗教和不信教的政治力量指导的巨大的反伊斯兰的密谋，它还导致仇恨作为一个种族而不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激进的伊斯兰是一种新的宗教，特点是缺乏爱和虔诚，代之以严格遵守宗教礼仪。

这种思潮并不真的就是伊斯兰教的，就像中世纪的狂热教派并不真的就是基督教的，或犹太狂热分子并不真的就是犹太教的一样。但激进的伊斯兰分子比起现代的任何激进分子，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政治重要性。伊斯兰尽管是最严格和正统的世界性大宗教，但就其历史长期的延伸而言，也曾是最宽容的和最能适应的。这种对它重新进行激进解释的企图和宗教的真实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同许多穆斯林国家盛行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紧张状态，同神学政治论者的政治野心有关。它是一种像政治动荡一样的宗教复兴，利用了宗教的语言和动机，依据于根深蒂固的传统。

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必须认识到，阿拉伯7世纪的荒漠不能再是一个榜样。尽管它也许还能激发起至少一阵子狂热，但它不能为城市环境的生活提供指导，而且它肯定不能创造劳动和工作的场所。阿亚图拉^①需要精英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军警官员、科学家、医生和其他许多必须具有同等地位和至少某种自由程度的人。因此，伊斯兰激进主义包含有它毁灭的种子。它的表现越极端，它的垮台也就越彻底。尽管教权法西斯主义的种子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都存在，但除非在中东和北非，他们最终繁荣的前景是暗淡的。这些前景甚至在南亚也很少得到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大思想家毛杜迪一直强调，巴基斯坦不应由乌理玛来统治。阿富汗血腥的内战更多的涉及到的是

^① 阿亚图拉，对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译者注。

权力、民族和部落斗争，而不是宗教。^① 前苏联的各中亚共和国的重新伊斯兰化，也是如此。

激进伊斯兰作为一种统治因素在中亚出现，是苏联解体后许多人期望的，迄今为止它并没有变为现实。在所有中亚共和国，过去的在共产党政权中占据领导地位的精英人物仍然掌握着权力。描绘这种精英人物是不容易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在肯定也不是。相反，在世界观上他们是世俗的和民族主义的，实行着一种权威主义的统治、一种混合经济，特别是保留着他们的特权。这种精英人物受到了各种反对派的反对，其中一些精英人物在世界观上是自由主义的（主要是地方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比政府职员有更多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和反俄罗斯）倾向，另外一些是伊斯兰主义者。但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不那么激进，在塔吉克斯坦对他们的反对最为强烈，那里自1989年以来一直进行着内战。中亚的伊斯兰主义者一直认为，他们不想把一个伊斯兰社会强加于一个国家。这些说法是表明真正的节制还是因为感觉到虚弱和缺乏人民的共识，尚不清楚。中亚和高加索的宗教复活不如俄罗斯那么强烈。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告诫要警惕重大的“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是夸大其词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莫斯科特别是西方对他们的统治的支持。

在未来中亚各共和国将面临重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也许要么导致同俄罗斯形成新的友好关系，要么导致进一步的解体和混乱。我们不能排除教权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出现，但似乎更有

^① 但同样真实的是，阿富汗战争的混乱后果和无休止的破坏性的军阀主义产生了原教旨主义的塔里班运动。塔里班的年轻的乌理玛的激进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他们在1994年至1995年冬季阿富汗南部的战斗中取得了突然的意料不到的成功。

可能的是，民族主义的权威主义政权仍然占上风。

俄罗斯极右派在对待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态度上是有分歧的。一些人认为它对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和俄罗斯在中亚（那里俄罗斯人被全面驱逐了）、高加索和巴尔干的民族利益是一个重大威胁。但其他人梦想建立俄罗斯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联盟。用俄罗斯类法西斯主义者的杰出发言人亚历山大·杜金的话说：“欧亚人相信，原教旨的伊斯兰，连同其反唯物主义、它对银行制度和国际高利贷的反对、它对整个国际经济体制的反对，是他们的盟友……俄罗斯和穆斯林唯一的地缘政治敌人是美国，连同它的自由的、世界主义的、反宗教的和反传统的制度。”^①

然而，我们认为，这些离奇的观点表明这两种极端主义运动的思想在大部分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想要的是俄罗斯内部的鞑靼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完全自由（包括分裂主义），而不仅仅是废除“高利贷”或银行制度。俄罗斯的那些支持“伊斯兰倾向”的右派极端分子，也支持他们的塞尔维亚兄弟努力灭绝穆斯林波斯尼亚，这是他们政策中诸多矛盾中的一个矛盾。

^① 《洞穴》1992年，第26页。

政治宗教

在各种地缘政治的冲突中，政治宗教起了一种扰乱作用。它肯定不属于南斯拉夫的和平因素。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支持为大塞尔维亚而斗争，把天主教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当作它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天主教会也从来没有因为克罗地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成千上万东正教塞尔维亚人而道歉，而是全力支持克罗地亚领导人不让步的要求。用中立观察家的话说：“纳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偶像像邪恶的妖怪一样逃脱了控制，现在教会面临着偶像崇拜。”^①

前南斯拉夫的教会无保留地支持民族主义情绪，促成了分裂和战争的爆发。尽管他们并不赞同法西斯主义的学说和做法，但他们为专制和灭绝种族的行为铺平了道路，从而造成了把法西斯主义政策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来接收的政治气候。

在全球的许多地区，世俗国家受到了攻击，那些攻击它的人在方向和动机上是不同的。正像没有法西斯主义国际一样，也没有“原教旨主义的国际”。美国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反对世俗的人道主义，疯狂的派别对实行流产的医生从事恐怖主义

^① 保罗·莫杰兹：《南斯拉夫地狱》（纽约 1994 年），第 134 页。

活动。但甚至最狂热的福音派教徒也不梦想建立法西斯主义组织。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绝望之上的，是假定最后的审判已经临近，一场巨大的灾难将发生，基督将选择上帝的选民，把他们带走，然后回头建立天堂王国。这种世界观，没有为冲锋队和黑衫党徒留下任何地盘。

在俄罗斯东正教中一直有一道深深的原教旨主义条纹，因为教会从来不进行改革，直到今天都是原教旨主义的。但甚至沙文主义、狂热主义、最极端地宣扬迫害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的人——甚至那些自认是极右派的人，如后来的彼得堡和拉多加的大都市主义者伊奥安——也不公开主张法西斯主义。伊奥安和他的追随者也许赐福于那些为建立一种侵略性的专制政权而工作的人。但他们的理想是 1906 年的黑色百人团，而不是现代的法西斯主义国家。

俄罗斯教会中最好战的原教旨主义集团是东正教兄弟联盟。它的一个领导人是瓦勒利·斯库拉托夫，一个有着丰富的政治经历的人物。他后来成了异教的发言人，一个使前基督教的异本神秘著作流行起来的人。在 60 年代，他写了一篇《道德行为法典》的文章，在当地普遍被视为吸引人的。他的宗教皈依是真诚的。他开始把教会看作是一个政治天堂和招兵买马的基础。

总的说来，教会领导层在政治谨慎的限度内支持极右派甚至法西斯主义集团。它曾剥夺了民主神父的教权，但即使是在喧闹的种族动荡的情况下，也没有谴责大都市主义者伊奥安之类的人。俄罗斯东正教一直尊重权力，它早就得出结论说：把所有意识形态的考虑撇在一边，“爱国者”比民主派更强大。

原教旨主义坚持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接受新秩序。这种参与涉及到敌视西方民主和启蒙运动，个人服从“共同体”，信

仰神圣的使命，广泛而频繁地使用暴力和宣传。它涉及到强制性的审查制度和妇女在公共生活中被贬低到下等的或边缘的地位。激进的原教旨主义不给宗教的和民族的少数派提供任何自由。

这一系列的共同的或类似的特点还可以继续列下去。显然战前的法西斯主义和当代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和文化的差异。但是，甚至在 30 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中间也存在着大量的差异。

灌输、社会控制和压迫手段现在甚至比在中世纪都多得多。但同时世俗世界的诱惑更是无限地大得多。无论如何，原教旨主义都要服从于相当强大的常规化，必然做出妥协，使信仰受到侵蚀，正视宗教教义和现实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同时，它无能力对付现代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使得曾经促成这一运动兴起的危机长期存在下去。如果政治宗教失败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几乎可以说有极其多样的可能性，从反教权的反弹力到新的甚至更激进的政治宗教的出现。

在当代世界，绝对专制者手中的压制手段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它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崩溃明显可见，只要它不发动战争和不丧失它的自信心，它仍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掌权。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将会有法西斯主义新变种的培养基。

但为什么说这是法西斯主义，不是宗教狂热或民粹主义、激进的政治宗教、好战的原教旨主义呢？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现象都是联系着的，有些比其他的更紧密。在现代世界，激进政治的所有极端表现都必定按法西斯主义的运行轨道在某种程度上告终。世俗的政治宗教如法西斯主义和非世俗的宗教如激

进伊斯兰，当然是有差别的。它们也许互相斗争，但政治学研究者知道，在同样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可以转向左也可以转向右，这取决于经济和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和总的政治气候。

政治宗教的命运好转的基础性原因是什么呢？伟大宗教的教义可以用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原教旨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目的从《圣经》中挑出来的东西，更多的是同目前的状况和情绪有关的，而较少同神圣著作有关的。宗教渴望、超验的信仰、乌托邦主义——世俗的和宗教的——和对秩序的需要，就像暴力、妒忌和攻击一样，都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所有宗教都涉及到暴力，但除了人类发展的某个阶段之外，暴力也的确需要政治的或世俗的宗教来证明合理性。剥夺、挫折和神怒都曾被用来解释暴力，但它们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些宗教比其他宗教更少暴力，为什么法西斯主义（或恐怖主义、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在有些地方而不是别的地方盛行。为什么有挫折和愤怒呢？是由于一个社会是压迫的牺牲品，还是由于其成员没有什么天赋、工作不努力、缺乏诚意或者无能理家？社会条件起着一些作用，但1933年的德国并不是最穷困和最无优势的国家。野心、不满和优越感是必要的组成因素，但难以予以说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仇恨”在所有大动荡中的作用所说的话，本能地承认了一个苦涩的真理。

影响许多社会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总的文化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导致出现各种灵丹妙药，从新时代理论到宗教原教旨主义。它们起了代用的宗教的作用，因为真正的、自发的、精神的信仰的时代似乎已经随着古代的和中世纪的世界消失了：现代世界的邪恶的诱惑充斥一切，人造的技术奇迹太多了。尽管当代的原教旨主义宗教意味着退出这个世界，但这并

不是可靠的选择。

政治宗教显然满足了某些需要和渴望，有些是肯定的，有些是破坏性的。如果它没有满足，它的号召力就更有限了。政治宗教也推行秩序和纪律，提供一种共同的粘合剂。但原教旨主义仍然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能被毁灭，教育也不可能限于宗教领域。因此，它需要采取过去法西斯主义使用过的统治技术。政治宗教、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这种融合能够使群众狂热起来，但能否长时期如此，我们拭目以待。

在 俄 罗 斯

在俄罗斯，如同在 1918 年后的德国一样，在失去了几百年来一直是俄罗斯组成部分的领土之后，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不满情绪。

纳粹 1941 年对俄罗斯的进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没有任何理由感激纳粹分子和他们的东方下等人理论。其结果，在俄罗斯和东欧很少有直率的纳粹分子。极右派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承认，在当今时代应使用不同的方式和新的观念。绝大多数人回避激进的运动，他们想要和平、秩序和繁荣，这些甚于民族的荣耀。

俄罗斯有一种前革命的、前法西斯主义的传统，即黑色百人团传统，这种传统大约是在世纪之交形成的。它的一些基本观念持续到了今天。黑色百人团确切地说不是法西斯主义政党，因为它极大地依赖于教会，把对君主政治的支持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但俄罗斯人民联盟（它的正式名称）同它之前的极右派小精英集团相比较，是俄罗斯最早的群众政治运动之一。它的宣传是民粹主义的，既谴责自由的一犹太人的资本主义，也谴责阻碍沙皇与其臣民直接交流的腐败政府。它是排外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相信有一种全球的共济会—犹太人的密

谋。它主要由城市下层阶级所构成，点缀一些贵族政治论者。这个联盟在俄罗斯南部和西部比在北部和东部更强大，并且从政府那里得到财政津贴。黑色百人团既仇恨自由主义者，也仇恨社会主义革命者和所有少数民族。决非偶然的是，现代反犹太主义的圣经《天堂长老的礼仪》尽管只是在革命后才得到广泛流传，但却是由 19 世纪 90 年代持这种信仰的俄罗斯人编造的。

弗拉迪米尔·普鲁斯科维奇，一个浮夸的煽动者和黑色百人团最有天赋的领袖，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视为俄罗斯的第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绝非只有黑色百人团传播后来被现代式的法西斯主义者所接受的思想。俄罗斯东正教的某些领袖人物，广为赞同他们的思想，并在布道和写作中宣传它们，强调的是撒旦的邪恶行为，而不是上帝的福祉。随着俄国 1917 年革命，黑色百人团不复存在，但极右派的传统却在俄罗斯的流亡者中间存活下来。

许多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领袖都是犹太人和外国人，这在反共主义者中间助长了关于反俄罗斯的密谋的看法，以及用暴力手段与之斗争的需要。到 1935 年大多数曾参加革命的“外来因素”都被解除了共产党的领导职务，一些新的本国的精英取而代之。这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俄罗斯极右派的论据。但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却由于整个欧洲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得以更新。法西斯主义似乎是未来的潮流，因此俄罗斯流亡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同情这些政党。

所有这一切使得俄罗斯流亡者法西斯主义者的任务复杂起来毫不奇怪，他们的一些领袖最终宣布放弃信仰，甚至选择回到前苏联。现在看来，20 年代和以后的俄罗斯流亡者法西斯主义者提出的观点不如前苏联国内的一些战后的思潮重要，如

苏联（俄罗斯）爱国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最终是“俄罗斯党”的兴起。这种俄罗斯党有自己的文学杂志和文化协会，尽管当局不时地要求它服从命令，不要背离官方的党的路线太远，但它在党的领导层、克格勃和军队将领中有有力的保护人。

这种发展被政治公开化和改革所中断。没有米哈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种新意识形态也会逐步地取代旧的政权。前苏联会在理论上成为它在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东西——一种民族社会主义的专政。当然，1987年前的苏联和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是有不同的：经济掌握在国家手中，实际上没有合法的私有成分。宗教很少受到宽容。由于前苏联是多民族的构成，不管共产党领导人私下如何考虑这一主题，也不可能公开有公开的种族主义学说。

所以，最宽泛地概括一下，这就是1985年到1986年引入改革时的情况。最早出现的最明确主张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集团是纪念党，它实际上几年前是作为一个文化俱乐部成立起来的。在风行的气候下，它不可能显示出它真实的目的，而是把它的活动限于演讲文化问题和恢复历史纪念碑。它的领导人是一个前演员和传记作家，叫做迪米特里·瓦西里夫。他在公众会议上的戏剧性表演很快使当地的和国外的媒体注意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运动已经出现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瓦西里夫自称是一个“无党派的布尔什维克”，猛烈攻击“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成员，认为这些人应对俄罗斯的所有不幸负有责任。他经常援引《礼仪》一书，另外他还攻击美国式的迪斯科舞厅、酗酒和撒旦主义。他的追随者——不过几百人——穿黑色制服、长统靴，戴各种徽章，有的可追溯到沙皇时代，有些是新造的。

瓦西里夫没有公开攻击共产党当局，共产党的机关也宁愿不提纪念党。右翼知识分子没有加入纪念党，但他们也不与之脱离联系。正如他们认为的，纪念党的一些活动是建设性的，值得支持。

瓦西里夫的出现经常遭到嘲弄，尽管他作为演员受到过职业训练，但他演员的成就要比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逊色得多。日里诺夫斯基是几年后出现的。瓦西里夫没有大的激情，缺乏教育和组织才能。他做了怪诞的讲演，震动了不复杂的人，但却受到了有教养的人的嘲笑，尽管他们也许同情纪念党。由于没有任何政治本能，瓦西里夫从没有考虑他是想领导一个文化联合会、一个政党，还是想领导一场群众运动。此外，他的表演老是重复性的：如果一个人参加了纪念党的一两次集会，就不需要参加第三次了。在1989年至1990年，随着苏维埃的统治被削弱，纪念党逐渐偏离了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加入了教会和君主主义者的阵营。

瓦西里夫经常被问及他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看法，但他的回答总是矛盾的和模糊的。是的，他认可了法西斯主义政策的各个方面，但认为它们不适用于当代俄罗斯。他对于这一主题消息也不灵通。因此，如果说纪念党和一些战前的法西斯主义集团有相似之处的话，这也不是瓦西里夫有意模仿的结果。

甚至很早，纪念党就发生了一系列内部分化，以致最终有6个纪念党并肩存在。对某些人来说，瓦西里夫不够激进，似乎只是叶利钦的一个忠诚的反对派。其他人则怀疑他作为一个领袖的素质。其他纪念党派别的日子也不好过。尽管其中一些继续存在，也只是敲敲边鼓而已。最终纪念党被各种右翼组织所接管。尽管瓦西里夫继续不被邀请地出席其他爱国者集团的会议，但对他想把握的那些人来说，他却成了一个累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纪念党的作用是先驱者的作用：它最早出现在后来很快拥挤不堪的领域。在 90 年代出现的许多类法西斯主义集团的未来的领袖，是在这个组织中开始其政治生涯的。但当瓦西里夫没有成功地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受尊敬的领袖并把他的集团改造成可接受的政治运动时，他们都离开了这个组织。纪念党在内容上是太过时的，极右派的后共产党集团需要某种比重弹黑色百人团和《礼仪》老调更好的东西来推进他们的事业。尽管那些东西在 1910 年是足够的，但 80 年后它们只有有限的号召力。在新的形势下纪念党似乎成了完全不管用的东西。

在政治公开化时期，亲法西斯主义的感情的早期表现限于像纪念党这样的小集团。他们强调反犹主义、军事训练，仇恨知识分子，主张沙文主义，奉承旧沙皇政权及其象征和关键人物。此外，有一帮年轻人起着“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作用，而不是抢劫者和侦探的作用。所有这一切自然不等于十足的法西斯主义。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许多种杂志，黑色百人团的传统复活了。像希特勒、戈培尔和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的著作和讲演一样，关于犹太人—共济会反俄罗斯民族的密谋的流亡者文学在俄罗斯找到了读者。

对大多数观察家来说，这即使不是反常的，也是令人费解的：纳粹分子毕竟不仅是共产党人的敌人，也是俄罗斯民族的敌人。所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如何会在第三帝国中找到他们的新偶像呢？但这种反应决不是独一无二的。希特勒鄙视美国黑人，但黑人种族主义者路易斯·法拉汉却不止一次地称赞希特勒的某些政策。甚至一些法国的和荷兰的新纳粹分子也敬仰第三帝国——疯子并非不能吸引至少一部分人，包括侵略的牺牲品。此外，只有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希特勒的崇拜者才提

出不折不扣地模仿法西斯主义。使他们感兴趣并受到吸引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说到做到的专制，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和其他“健康本能”的概念。使他们着迷的是穿着制服列队行进，反犹主义，相信有密谋的理论。对纳粹主义的其他方面，他们则根本不管。

此外，俄罗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既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那里，也从（法国）新右派那里找到了暗示，他们还从俄罗斯本国的传统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最后，一种所谓的本能的法西斯主义吸引了一些对历史或纳粹分子学说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人，这些人也不特别关心黑色百人团，但自然地倾向于极端的民族主义、一党专政、宣传和暴力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民主是一种似乎在俄罗斯不起作用的发明。因此，尽管局内人完全意识不到，新的具有法西斯主义特点的政治集团还是在俄罗斯出现了。像莫里哀的小资产者总是谈论诗歌却没有诗歌的意识一样，俄罗斯的极右派人物总是相信某种类似于法西斯主义的东西，却又不了解它，主要差别是，现在他们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和渴望。

对后共产党的俄罗斯的新法西斯主义和类法西斯主义学说及运动做出评价是困难的，因为不一定总能清楚地区别开保守的“受尊敬的”右派和极端主义者，极右派和新共产党人。在1989年至1990年之后，俄罗斯的政治家转向了右派。同时日渐增长的两极分化在1991年反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中，后来又在1993年10月的冲击白宫中找到了最惊人的表现。尽管主流保守派和“爱国者”（如巴布林和阿克修奇兹）同极右派的粗野人之间有明显的差别，但他们也进行合作——为了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是相互需要的。

在新共产党人和右派之间甚至有更多的不一致之处。像伊

格·沙法莱维奇院士，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谴责社会主义。他不赞同列宁主义在他的爱国者盟友中的复活以及十月革命的赞歌和苏维埃政权 70 年的成就。

然而，在学说的层次上，并且出于实践的理由，反共的右派和新共产党人之间也出现了友好关系。极右派尽管有点勉强，但还是承认，如果它反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话，它就不得不拥护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控制的经济甚至是国有制。而共产党人也很快认识到，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意识形态的国际主义的特点，适应民族社会主义的需要。极右派和新共产党人都想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国家。尤其在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敌人的情形下，懂得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强盛起来，他们就必须联合力量。许多差别仍然存在，但在 1991 年到 1995 年间，右派成了更社会主义的（或至少是集体主义的），左派成了更民族主义的。分界线开始模糊了。

至于随着开始政治公开化出现的许多右翼极端主义集团，大多数都是短命的，仅限于一个或一些地区。它们分裂、合并、更名、消失，并且在不同的名称下重新出现。它们也许在这个或那个时期出版 200 多份报纸，是不定期地间歇性地出版的。但其中一些，如《青年近卫军》《我们现代人》，特别是普罗汉诺夫的《洞穴》，在 1993 年 10 月事件后被查禁，后以《明天》的名字重新出现，有一定规模的读者群。然而，极右翼由于其领袖互相冲突的野心而在意识形态上毫无希望地分裂了。但总和起来说，它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其成员加入更大的组织，这些集团的数目逐渐减少了。

极右派的最重要的政党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它的迅速成功是惊人的。该党的历史就是它的领袖的传记，如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情况。日里诺夫斯基 1946

年生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是6个孩子中的一个。他的母亲是白俄罗斯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来自利沃夫的犹太人律师。他的早年——他18岁时离开阿拉木图——经受了挫折并且缺乏爱。日里诺夫斯基在1993年出版的自传《俄罗斯的命运》中公开地描述了这段时期，并且非常详细。日里诺夫斯基曾在莫斯科学习近东语言，在高加索军队中服过役。后来他还研究过法律，供职于莫斯科一家出版公司。

日里诺夫斯基在政治公开化时期最早在政界的冒险是尝试性的，他想成立一个新党并成为其领袖。他出现在各种民主的和机会主义的集团的边缘——甚至一段时期属于犹太人行动主义者——他参与了各种自发行动和联盟。1989年他在莫斯科市政议会选举中失败。当他的党在1991年初注册时，他在8个共和国很难找到500个签名者。他的突破到来的很晚，是在俄罗斯总统选举那一年，当时有600万俄罗斯人投票支持他。日里诺夫斯基最大的成功是在1993年12月的大选中，投票支持他的人比支持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人都多。

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其他国家如果有，也是很少的。它主要是个人的成功。的确，他有一个“影子内阁”和“最高委员会”，其中一些人是军官，有几个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两个律师，一个医生，两名记者和几个商人。然而，这些副手在全国是不知名的，只有日里诺夫斯基吸引着群众。日里诺夫斯基主张旧苏维埃帝国重新统一，包括巴尔干共和国甚至波兰和芬兰（“我们必须迫使我们的共和国回来”）。他考虑，如果俄罗斯停止和它们进行贸易，它们就会崩溃，乞求重新被接纳进帝国。但在未来，它们只能是俄罗斯的省。他愿意放弃高加索和中亚各共和国，因为他觉得留住它们没有好处。他声明，摩尔多瓦和巴尔干各共和国会缩小到列支敦士登

的规模，乌克兰将不得不放弃它所有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如果经济措施不够的话，可以沿着巴尔干各共和国的边界埋核废料，以致所有人都将死于辐射和疾病。假如日里诺夫斯基成为俄罗斯总统，两周后巴尔干各共和国就将不存在——他们的灯光就被关闭了。在俄罗斯人到达之前，高加索是一个荒芜之地，如果俄罗斯人离开了，它又会成为一个荒漠，因为当地人会互相残杀，就像他们在中亚那样。幸存者将争取、乞求在新俄罗斯帝国中获得区域性的地位。

按日里诺夫斯基的设想，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概括如下：波兰将分割给德国和俄罗斯；捷克共和国将成为德国的一部分；斯洛伐克将被并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保加利亚将接管马其顿和希腊的几部分；俄罗斯将在印度洋沿岸建立基地，并吞并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以便把世界从伊斯兰危险中拯救出来。日里诺夫斯基特别讨厌土耳其，因他曾在那里被关押过一段时期，他希望看到它消失。

日里诺夫斯基不喜欢美国（“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预言：美国将被黑人和拉丁人所主宰，美国的工厂将关闭，药品和食物将短缺，美国人将向欧洲、日本和俄罗斯迁移。但不容易弄明白的是，为什么美国人会向欧洲迁移，因为日里诺夫斯基还预言，在10年到20年时间内，“法国和德国的一切都将结束”，土耳其人将是那里的主管。此外，如果英国和日本敢窥视的话，他会用核武器摧毁它们。

我们应该公正地补充一句，日里诺夫斯基偶尔也表达了稍微不同的观点。例如，当他在波兰时，他声称波兰的边界是不可侵犯的。尽管提出了伊斯兰的威胁问题，但他还是称赞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在日里诺夫斯基看来，俄罗斯拥有比核装置

更有效的武器，能在顷刻之间毁灭全世界。为了解决俄罗斯的食品短缺，他会命令 150 万俄罗斯士兵入侵德国，挥舞核武器。在 24 小时之内，俄罗斯就会有足够的食物。

日里诺夫斯基认为，执行的权力必须加强，为了使俄罗斯生存，所有政党，包括他自己的党都必须解散，至少两年时间内需要一个铁拳。但他一直强调，他决不会发动政变，而只是合法地掌握政权：因此，在 1993 年 10 月，他的确没有参加反对叶利钦的右派起义，而是走了“第三条道路”。如果时机有利的话，他为什么不冒险进行军事对抗呢？

许多俄罗斯人投票支持日里诺夫斯基，不可能是因为他的对外政治观点。在国内和经济问题上他是更为谨慎的。他从没有说清楚：他是主张国家控制的经济还是主张混合经济，他是反对共产主义还是想恢复共产主义。但他毫无疑问地想要一支强大的军队（许诺每一个军官都会得到一辆汽车），他会吊死或枪毙歹徒，摧毁黑手党和他的大部分敌人（“也许其中的 10 万人”）。

日里诺夫斯基的讲演是能够使人感兴趣的，但它们只是显示了他的党成功的一部分原因。他似乎对群众想听什么有一种神奇的理解力——特别是那些受教育不多和不富裕的人，他们买不起现在已自由提供的奢侈品，他们由于改革而失去了职业。还有靠养老金生活的人，觉得自己在旧政权下生活得更好，以及俄罗斯爱国者，对帝国和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感到不满。尽管反酗酒是俄罗斯极右派的一个神圣原则——如果不总是在实际上，也是在理论上——但它从不得人心，所以日里诺夫斯基敏锐地抛弃了它，向群众许诺可以以低得多的价格得到伏特加。

日里诺夫斯基作为一个人权战士开始了他的生涯，但不久

他认识到他想取悦的大众对这些问题没有多少兴趣。所以，他把它们从议事日程上划掉了，成了一个争取秩序和法律的战士。自由主义的媒体把他当作一个小丑，民族主义者和新共产党人极力无视他。但几年后他们不可能阻止他迅速地升上政治的天空。尽管右派中还有其他的妄想者，但只有日里诺夫斯基成功地吸引了几百万人。他似乎在生活中早就认识到，即使大众反对也比没有大众强，因此他提出了滑稽的夸大的许诺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不管日里诺夫斯基在俄罗斯或海外走到哪里，他都要制造一个丑闻，因而引起媒体注意。

我们也许不会知道传播他的丑闻的人有多少，真正的自发的感情爆发者有多少。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后来开了小差，声称日里诺夫斯基一直是一个克格勃的代理人，其他人则认为他在气质上不适合长期充当任何人的代理人。然而，也有人把他同加彭神父相比较。加彭曾在1905年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起初是沙皇政治警察的创造物，同时奉行他自己的政策，以致最终没有人、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确切知道他代表着谁的利益。

日里诺夫斯基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良好的组织来解释。他经常地到处旅行，接触支持者，极力在整个俄罗斯寻找新的支持者。地理上的突破表明，他在俄罗斯的某些地区做得不如在其他地区好，但差别不是太大。除新共产党人以外，同其他反对党相比较，他的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运动。他有足够的基金，但其他极右派人物，如前克格勃将军亚历山大·斯德利格夫起初能任意支配的基金更多，但做的要差多了。实际上俄罗斯极右派的所有领导人都被他们的敌人和对手指责为克格勃的代理人。这样不加区别的指责在俄罗斯的全部历史上是经常有的，但它们仍然需要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的确沙皇的秘

密警察像克格勃一样，在政坛的每一派别中都资助代理人。我们在简单的考察中提到的大多数集团或许都得到了克格勃、老共产党或者它的阵线组织的支持。但这是否使他们成了资助人的俯首帖耳的仆从，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有许多信息可以用来证明极右派的所有较有实力的集团都曾得到过俄罗斯大银行、投资和控股公司以及其他商业利益的资助。有些爱国的商业领袖资助它们，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外国银行进入俄罗斯。其他人这样做是作为一种再保险的手段。尽管他们也给叶利钦政府的关键人物以金钱，但他们不想让他们所有的鸡蛋都在这一个篮子里。这些爱国的商人害怕外国竞争，并且习惯于在垄断的框架里运作。

然而，日里诺夫斯基是很容易遭到攻击的。他的运动的一切都依赖于他，没有一个人物（更不用说委员会了）能取代他。他的很大成功是在右派四分五裂和许多领导人都蹲监狱之时取得的。但一旦条件发生变化，他不可能再取得成功。

“受尊敬的”俄罗斯右派和其他极端主义者对日里诺夫斯基的态度是混合性的。他们在他的胜利中联合起来，因为这种胜利削弱并吓住了自由主义者，迫使叶利钦和他的同事向右转。俄罗斯右派不时地用自己的刊物采访日里诺夫斯基，但很少是同情性的。他们或许不会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会议和“统一行动”。日里诺夫斯基对右派来说是一个不可取的领袖，不仅是因为他的混合的种族出身。但很少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敢公开反对他（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是少有的例外）。人们不容易和一个得到那么多俄罗斯人投票支持的人发生口角。但在私下里他们会说：他显然不是国务活动家，而是一个庸俗的朦胧的蛊惑人心者，缺乏尊贵和严肃性。他似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一个主人公，不是正面的，而是讽刺性的。

日里诺夫斯基本人极力无视来自极右派的对手。他们缺乏共同的接触。他们是没有群众追随的显贵，如亚历山大·鲁兹科伊，是前政权的一部分。他们的号召力比他本人的要有限得多。

日里诺夫斯基从来没有澄清他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当同希特勒比较时，他提到希特勒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下士，而他日里诺夫斯基是一个预备役军官，有两个大学的学位，能够用外语同世界的国务活动家交谈。像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日里诺夫斯基对希特勒不是特别了解，对墨索里尼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所知道的似乎是对他有吸引力的：纳粹主义的活力，它诉诸于强烈情绪，它的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它的军国主义倾向。同时日里诺夫斯基似乎意识到，纯粹模仿纳粹主义捞不到大量的政治资本。不同于极右派的其他一些集团，日里诺夫斯基的出版物不提希特勒，因为他觉得他不可能从德国人那里学到太多的东西。他同德国、奥地利、巴尔干的新纳粹集团和个人以及法国的极右派建立了联系。他的一些新朋友来到俄罗斯为“自由民主党”大会致词，但这些“外国联系”似乎在他的日程上不居突出位置。

与纳粹模式更接近的是亚历山大·巴卡晓夫的“俄罗斯民族统一集团”（RNE 是其俄语的首写字母）。“我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我是一个纳粹分子”——巴卡晓夫在一次对他的采访中如是说。RNE 是一个很小的经过军事训练的积极分子的组织，以纳粹党徽作为他们的标志，喊“希特勒万岁”——在致礼时抬起右臂。RNE 成立于 1990 年，声称在 250 个城市有成员，但不能得到证实。大量的 RNE 分子出现在西伯利亚的一些主要城市。该集团自认是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的先锋队，认为主要的极右派组织（包括日里诺夫斯基的组织）太驯服。

它出版了几份报刊（其中一种杂志声称有 15 万份的发行量），但在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它只有有限的野心。它把这个领域留给了其他极右派集团。它自豪的是，在众多的空谈家中它是惟一的实干家。

巴卡晓夫生于 1953 年。他的祖父在 30 年代的恐怖浪潮中是一个“清除别人者”。然而，他的父母却不属于这个专名，他是在工人阶级家庭长大的。巴卡晓夫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电工，是俄罗斯右派中惟一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军队中当过柔道教练。RNE 的全部成员都被叫做战友，巴卡晓夫是首长战友。他们在莫斯科附近的地方接受格斗训练，许多人靠当保安军官和武装卫士谋生。他们的社会背景显然是工人阶级，相应地 RNE 和某些新工会保持密切联系。

巴卡晓夫自己的著作和讲演（很少）没有显示出独特的东西，或者说和类似集团的学说没有根本的不同。他相信有一种反对俄罗斯民族的巨大的阴谋（“全部灭绝”），企图摧毁它的“种族核心”。因此，需要给未来的俄罗斯国家引入卫生学原则，实际上是禁止混合婚姻。他认为，将有两类公民，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后者只是居住者，不能享受公民权。宣传民主、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价值是一种罪恶。

RNE 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批判俄罗斯东正教，只有其最激进的代表除外。它断言，虽然宗教起初在俄罗斯民族的发展中起过积极作用，但它后来转向了“国际主义”。RNE 把教会现任领导看作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成员。它反对恢复君主政治，因为这种制度接触不到时代精神。RNE 自认是革命力量，而不是复辟力量，有很多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传统。巴卡晓夫的思想中有一种强烈的神秘因素，声称“利用民众的神秘主义”，“灵魂的意义”和“天堂的精神胜利”，其意思却不清

楚。

在 1993 年 10 月大摊牌之前，鉴于巴卡晓夫的思想缺点和盲动主义，这个前柔道教练和他的追随者并没有受到俄罗斯右翼组织的严肃对待。但当在白宫附近的战斗到了关键时刻，巴卡晓夫成了惟一能够至少动员几十个追随者的领导人。他的名气迅速上升了。自那时起，他得到了《明天》主编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的称赞。两个极右派的主要宣传家埃德华·里莫诺夫和亚历山大·杜金加入了他的队伍。在 1993 年 10 月的奔波中，巴卡晓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也许是两个敌对的匪帮间的一次枪击中受伤。这使他成为一名勇士，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名望。

巴卡晓夫的一些追随者在高加索和南斯拉夫采取了军事行动，警察和军队中的同情者给他的组织提供了武器和后勤上的支持。巴卡晓夫奉行一种双轨战略：他向当局为 RNE 注册，使其成为一个合法的、守法的政治组织。同时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有自己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武器库和通讯网。然而，尽管进行了所有这些活动，巴卡晓夫并不具备政治领袖的素质。他的运动仅仅对特定的年龄组和社会背景的男性有号召力。

尽管 RNE 比其他任何亲纳粹组织有更大的广泛性，但它没有达到垄断地步。在其他组织中，类似的集团有维克多·雅库舍夫的民族—社会联盟（NSS）。它想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一种强调雅利安人价值的经济，为避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全世界建立霸权而战斗。在雅库舍夫看来，所有共济会成员过去和现在都是同性恋者，所有低等种族的染色体都比高等种族少，犹太人是被用来自杀的“有生命的机器人”。

巴卡晓夫的右边（或左边）是尼古拉·李森科的民族共和

党，该党以圣彼得堡为基地，声称有一万名成员。像日里诺夫斯基和纪念党一样，李森科是一个生于西伯利亚的年轻生物学教师，没有参与1993年10月的武装起义，而是力图使他的党带有温和的形象。他后来被选入了俄罗斯的议会杜马。该党甚至放弃了它一度主张的种族主义纲领，即限制（或者排除）所有非俄罗斯公民参与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生活。它选择了比例代表制作为政策。这种政策或多或少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不容易被指责为种族主义。不同于RNE，民族共和党同君主主义者和宗教界建立了密切联系。尽管它一直是一个武装的组织，但这一点在它的政治日程上并不具有突出位置。尽管如此，李森科分子还是有一个隐秘的计划，并没有抛弃党卫军式的徽章。

另外还有大约20个非法集团，其中最突出的是“狼人”，当他们的主要成员在1994年7月被俄罗斯联邦情报机构逮捕后，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恐怖主义袭击活动。它的头子是一个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叫做安德烈·阿诺金，他——像李森科和巴卡晓夫一样——在纪念党中当过学徒，在他的领导下狼人被公认是纳粹分子。然而，他们不信任群众行动，而是认为恐怖主义是摧毁社会并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例如，当狼人们进行一系列谋杀时，牺牲品就是他们队伍中的逃兵。狼人的一些成员被派到南斯拉夫参加战斗，但不是和他们的塞族“兄弟”一起，而是和克罗地亚人一起，显然是承认可追溯到30年代的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传统。狼人们拼命攻击巴卡晓夫及其追随者，巴卡晓夫则反唇相讥，把他们叫做“内奸”。在1994年其成员被逮捕后，狼人组织不再存在。

除了这些宗派集团以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组织，如民族民主党、人民社会党（都是以圣彼得堡为基地）和俄罗斯民族抵

抗中心（叶卡捷琳堡）。还有一个较大的阵营，信奉法西斯主义的一些（而不是全部）基本信条。这个阵营包括由经商的克格勃将军亚历山大·斯德利格夫领导的俄罗斯民族戒酒协会，由俄罗斯右翼政治老兵瓦勒利·斯库拉托夫领导的复兴集团。斯库拉托夫起初是宣传异教，后来转向在东正教俗人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多少不同的程度上，所有这些政党都属于民族拯救阵线（一个成立于1992年的保护伞组织）。

民族拯救阵线声称，他们首先是俄罗斯爱国者，打算恢复强大的俄罗斯国家。如果只能靠采取法西斯主义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的话，那就采取法西斯主义手段。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力量和伟大是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自由和人权则不是。甚至叶利钦政府的成员也属于有这种反应的人。

这些观点反映了对帝国丧失和根绝了250年俄罗斯历史的政治的和心理的反应，以及对前苏联的分裂主义者和逃兵的愤恨。它们还反映了对西方不平等对待俄罗斯的气愤。的确，忽视这些感情，就会低估支持冲向民族主义专制的运动的力量源泉。它们具有一种几乎无限的对“秩序”的要求，要求政权能够消除危机、稳定俄罗斯经济并恢复俄罗斯过去的力量和强盛。这种专制肯定是反民主的。它是属于佛朗哥或皮诺切特（俄罗斯右派心目中的英雄）的权威主义模式，还是更极端的和公开的法西斯主义模式，是难以预言的。有关的人并不急于说出这些细节。

有人极力寻找共同的基础，其中最积极的莫过于极右派的非官方的宣传部长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他是有最广泛读者的周刊《明天》的主编，不屈不挠地极力把法西斯主义者、君主主义者、教士、异教宗派和单纯的爱国者团结起来，只要他们愿意反对现行的自由主义的“占领”政权。

普罗汉诺夫作为民主作家和记者的门徒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他显示出对浪漫的（或外来的）帝国主义的倾向，从而得到了他的绰号“总参谋部的夜莺”。《明天》的风格类似于日里诺夫斯基的演讲，具有同样极端的言语攻击、荒谬的夸张、公开的煽动，完全缺乏宽容，而且是全盘否定一切。《明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对现实的和想象的敌人的攻击，充满了妄想狂——到处都是阴谋诡计。尽管乞求伟大的民族观念和“精神”（《明天》自称是“精神反对派”的机关报），但它实际上从没有说清楚这些精神价值是什么。

这种民族社会主义从过去时代的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大量的启示。它结合的更多的是对共同敌人的仇恨，而不是对未来俄罗斯的共同看法。

极端分子在宣传他们的观点方面享受了宣传的自由，甚至包括鼓动谋杀——更不用说诽谤罪了——这在其他国家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事实上，现在俄罗斯的情况经常被比作魏玛时期的德国。这些比较经常是脆弱的，但在某些方面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包括国家无力（或者不愿意）抵制它的贬损者，甚至在他们违犯法律时。

作为回答，俄罗斯当局解释说，现行的关于煽动或诽谤的法律，像其他所有法律一样，可追溯到苏维埃时期，因而是不能用的。这不是有道理的借口，因为其他法律仍在执行。毋宁说，俄罗斯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可依的国家，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受惩罚地宣传自己的观点。

极右派有一种多少一致的对外政策：通过吞并已经分离出的各共和国重新建立苏联，或至少建立一个有影响的俄罗斯领域，一种类似于俄罗斯门罗主义的东西。他们假定，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基本目标是削弱和毁灭俄罗斯，使它处于完全的依附

地位。西方天生就敌视俄罗斯的一切，因此普遍是仇俄心理。大多数右翼分子相信一种欧亚倾向，背弃欧洲，把它的政策转向亚洲。20年代俄罗斯流亡者最早提出的这一概念的缺陷是，它脱离了政治现实。不仅日本，而且穆斯林世界或印度、阿富汗，都不愿意同俄罗斯结成紧密的联盟。或感觉不到和俄罗斯有共同利益。一些极右派梦想有一个“从都柏林到海参崴”的欧洲的（反美的）轴心，而其他一些人则想同新德国建立密切联盟。他们断言新德国像俄罗斯一样，内心是反对民主和西方其他价值的。还有人打算复活泛斯拉夫主义。

极右派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只是模糊的观念。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呵斥极少数在群众挨饿时大发横财的剥削者。许多右翼极端分子起初是狂热的反社会主义者，但后来在旧苏维埃制度中找到了偿还性的特点。所有人都想粉碎黑手党（在当代俄罗斯，这是一个完全不加区别地使用的名词）和外国生意人，不管他们是美国银行家还是莫斯科市场上的阿塞拜疆蔬菜商。但大多数人也认识到，回到旧制度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农业方面。所以，他们勉强地承认了“民族资产阶级”、民族银行和混合经济。

关于君主政治和东正教，右派分子的观点是尖锐分歧的。极右派的大多数人出于各种理由不想加入君主主义阵营。一些人脱离了东正教，而另一些人公开主张回到前基督教的斯拉夫的神，或者半印度的宗教（吠陀教）。绝大多数人喜欢宗教事务上保持中立，就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

各种神秘的科学，特别是星占学，在极右派的思维中起了核心作用。这包括对神奇数字、善和恶、恶魔和精灵以及各种时尚和迷信的信仰。如果说德国和奥地利的星占术士出现于纳粹主义的早期的话（在希特勒清除他们之前），那么，神秘主

义的食物供应商则在俄罗斯法西斯主义和极右派的产生中甚至起了更大的作用。

俄罗斯极右派分子的典型是坚定不移地相信，所有俄罗斯的不幸都能归罪于外国人。所有错事都和俄罗斯民族做或没做的事情无关。没有外国人的机器，俄罗斯会是伟大的、繁荣的和强大的。在他们的队伍中完全没有诚实的自我批评精神。

这种学说可能对什么样的男人或女人有号召力呢？它们特别吸引那些从正发生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得到好处的人；同样，也吸引那些已经失去职位的党和国家政府的下级成员，那些在旧政权中有哪怕低级职务的人，其中有军队和保安力量的成员（或前成员）。在许多军区，日里诺夫斯基取得了压倒性胜利。那些在军事工业综合企业工作的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数目有几百万人。在旧政权下，他们收入较多，是社会中受尊敬的成员。但随着战争的危險消失，武装力量被裁减了，军事生产减少或停止了，一些内部保安力量被解散了。

自身的物质利益决不是人们加入极右派队伍的惟一理由。他们还有一种对未来的强烈的担心，对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降低的愤懑，另外是对挥金如土的新富人的气愤。尤其是他们渴望确定性。在旧政权下，国家多少关心着每一个人。即使人们经常过着凄惨的生活，但他们不操心头上的屋顶（不管多么小）、食物和其他常用品。在旧政权下犯罪也较少，或者确切地说，犯罪没有公开化。一句话，现在是极其不稳定。几十年来，俄罗斯人已经不习惯没有安全的生活，他们习惯于掌权的人为他们进行决策。

但是，民主显然是非常不稳定的。因此，俄罗斯人愿意放弃新的自由，用强有力的领导取而代之。在最基本的方面，目前俄罗斯极右派的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重现了俄罗斯沙皇后期

类似的集团的学说。当然不同的是，共产主义的 70 多年已经使某些适应成了必需的。因此，右派和民族布尔什维克能够形成一种友好关系。

极右派的先锋派思想家，如亚历山大·杜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地缘政治家和形而上学家”），试图使他们的学说现代化。俄罗斯的法西斯主义者和类法西斯主义者赶不上欧洲的所有前法西斯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所以现在把他们连同法国新右派一起介绍给俄罗斯公众。他们中间有豪斯霍夫和他的地缘政治学派，朱里奥·埃奥拉，中欧的保守主义者，如斯潘、斯宾格勒和桑巴特，德国的“民族革命派”，以及各种专制和“敌人—朋友两分法”的倡导者，如卡尔·施密特。甚至世界主义概念在俄罗斯也短命地流行过一阵子（金融资本和犹太人、共济会员策划的全球阴谋只起了一种辅助的作用）。

法国新右派曾在一段时间是莫斯科的尊贵客人，但不久就看出他们提供的东西不适用于俄罗斯的条件。例如，法国新右派从不梦想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刊出希姆莱和其他纳粹偶像的画像。的确，他们小心地把他们的种族观点隐藏在“种族多元主义”的烟幕背后。法国新右派的“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他们的反美主义和其他此类的特点，曾使得法国人受到俄罗斯极右派的喜爱。但他们的论点却是不必要地太哲学化和复杂化，是只有一小撮俄罗斯知识分子能理解的。有些东西需要更多的智力和更复杂一些。墨索里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德·本诺伊斯特和列昂迪也夫的混合是难理解的。为了给药丸加糖，杜金极力介绍这些外国人是俄罗斯和“俄罗斯思想”的伟大崇敬者，但这一结论是根本不真实的，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差别。

埃奥拉和法国新右派不掩饰他们对基督教的敌视，这也无

济于事；这是对东正教不必要的挑衅。最终剩下的是“阴谋论”的共同基础，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东正教中公开的反犹主义者和宣扬异教的人、自由经济的提倡者和拥护集体主义的人之间是完全一致的。

相信有恶魔诡计的人在所有时代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不仅仅是极右派。但在俄罗斯最近几年为这种幻想所强烈吸引的人比其他地方都多：只要有一个主要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反犹主义者死去，就不可避免地认为他是被撒旦势力杀害的（也许借助敌对的凶手之手）。这不仅是指目前，也是指过去。例如，所谓的1925年对诗人谢尔盖·叶赛宁（以及亚历山大·布洛克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暗杀，一直是狂热的极右派世界喜爱谈论的话题，即使这些怀疑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

除了右翼极端分子和类法西斯主义集团，还有很多较大的“爱国者”和国家主义阵营。他们主张强大的国家权力，广泛同情极端主义者的基本观点，但批评某些夸大之词和明显荒谬的说法。这一阵营的人数或许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外数量更多。对这个“受尊敬的”右派来说，极端主义者是反对自由主义者斗争中有用的盟友。但他们也知道，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人数不多，缺乏影响。此外，极端主义者的言辞过分和暴力行动使得民族主义和右派有了一个坏名声和同外界的复杂关系。如果可能的话，受尊敬的右派宁愿疏远极端主义者。但右翼组织没有它需要的步兵。它的成员是社会的支柱，不能指望把他们派到大街上形成街垒。为此理由，需要有穿黑制服的军事人员。但是，一旦神怪出了瓶子，它就倾向于提出它自己的意志，正如德国右派从和希特勒从事共同的事业而受损中所学到的一样。法西斯主义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走狗，俄罗斯法西

斯主义不是右翼组织手中的容易操纵任意进行生产的工具，当不需要时就可以从流通中把它抛掉。

俄罗斯目前的条件对于权威主义运动的兴起是有利的。政治形势不可能很快稳定下来，在不远的将来也不会有繁荣和社会和谐。但一些关键的因素也阻止着一个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增长。其中之一是民族布尔什维克同极端民族主义者之间、激进民粹主义者同君主主义者和教会之间、保守派同右翼革命派之间、代表着旧的专权的国家主义同利用工人阶级不满情绪浪潮的人之间的内部分歧。弥补这些各种学说、利益和个别领袖的野心之间的裂缝是极其困难的，除非形势急剧并严重恶化，旧的领导退位，新的领导尚未准备取而代之——只有在这种历史的结合点上，法西斯主义才有了或许能或许不能利用的机会。然而，甚至在尖锐危机的时刻，民族布尔什维克和“国家主义者”的前景似乎要比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好得多。

在 东 欧

战前的东欧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有一种混合的经历：在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尼亚和克罗地亚，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运动是强大的。在其他地方，如波兰、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各国，它是弱小的，但盛行权威主义的一军事的统治。

1989年的东欧自由化持续时间不长，因为人们认识到，民主的根基仍然是脆弱的，由于经济的困难和社会的紧张，东欧大部分国家是右派和左派激进的民粹主义运动的肥沃土壤。的确，不同于俄罗斯的情形，东欧国家没有患丧失帝国的综合症，但曾折磨东欧很长时间的旧的民族紧张关系重新浮现出来，帮助极端民族主义集团扩展开来。最后，政治上不成熟的人们有不合理的期望，当这些期望得不到实现时，他们就转向抗议和绝望。因此，在波兰1990年总统选举中，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叫做斯坦尼斯拉夫·蒂明斯基的人物进入第二名，得到22%的选票。据说他曾在拉丁美洲的丛林中有过好运。无论如何，他的讲演是不连贯的。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脖子上缠着一条蟒蛇。他的恰当地叫做X党的臂膀同样是使人弄不清楚的。后来有证据表明，他曾接触过极左派和右派的阴暗人物以及政治警察。他还呼喊反犹太人的口号。他的政党在一年内就垮台

了，但蒂明斯基现象决不是孤立的。倾向于极端形式的民族主义——反西方的、反民主的和反犹太人的——民粹主义运动，在东欧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它们通常是由一个政治冒险家领导的。这些政党的目标，像它们的资金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一样，是神秘的。

在 波 兰

在苏维埃时期，波兰的天主教会对其人民的控制是强有力的，80年代团结工会的兴起使得共产党人感觉到成了被围困的少数派，尽管此时波兰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但一旦共产党被推翻，它的反对者就证明没有能力实行有效的领导。事实上，莱赫·瓦文萨主持了团结工会的解体，他曾创造了这一运动，这一运动也造就了他。天主教会通过它支持的保守党即基督教民族联盟（CNU）介入各种对话冒险。它主张宗教审查和禁止堕胎，从而加剧了政治的两极分化。

同东欧的其他国家相比较，波兰的经济状况很好，但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仍然很大。大部分人民受苦，导致两个政党即前共产党的SLD和农民的UD的选举胜利。把这两个政党界定为在精神上属于新共产党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是由愿意接受民主的基本规则的年轻人领导的。但同样清楚的是，它们的当选得益于大部分人对自由民主派的抗议，因为自由民主派想在波兰建立一种西方式的制度。

在最广泛的意思上说，这就是我们有根据地看待极端右翼集团出现的背景。它是一个有着十几个派别竞争的混乱的舞台。最积极和极端的是博勒斯拉夫·泰杰可夫斯基的波兰民族

共同体—波兰民族党，它也是最小的竞争者之一。它的领导人是一个前共产党官员，据说同秘密警察有联系。加努兹·布里奇可夫斯基领导的集团也是如此，他曾退出了 X 党，并于 1994 年 3 月组织了日里诺夫斯基对波兰的访问。泰杰可夫斯基不仅反对犹太人，也反对梵蒂冈，实际上反对除纪念党、勒蓬和北美的纳粹组织、利比亚和北朝鲜之外的所有的人和事。他 1992 年受到了审判，精神病学家对他进行了检查，证明他是正常的。他的候选人无一当选。

基督教民族联盟（CNU）是一支更重要的力量，尽管它涉足了民粹主义领域，但它显然属于保守的阵营。“基督教、教会、祖国、荣誉”是它的口号。另一个反共的民族政党是 KPN，勒斯采克·莫祖尔斯基领导的独立波兰同盟。初期它同教会有密切联系，但后来转而反对教会。它自认是一个爱国的运动，而不是一个右派政党，并拒绝在波兰议会中坐在极右派的席位上。KPN 的观点是恢复历史上的波兰联邦，不仅包括波兰，也包括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甚至巴尔干国家的一部分。这个集团将会成为俄罗斯以及欧盟的抗衡力量。

莫祖尔斯基是一个真正的反共分子，在旧政权下不知被捕过多少次，而其他极右派政党的反共记录至少说是可疑的。KPN 自认是约采夫·毕苏斯基的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继承人。它承认 1935 年（毕苏斯基的）宪法是惟一有效的宪法。一度它在总选民中得票 10%，后来下降到 6%。

更极端的是安德烈·勒珀的自卫农民联盟，曾从事惊人的超议会活动，如袭击市政厅和堵塞道路。勒珀以前是一个拳击手，相信阴谋理论，反对议会政权。尽管他的党在高失业率地区有一些追随者，但在大选中的情况并不好。

波兰倾向于新法西斯主义的集团是由形迹可疑的人物领导的。实际上他们都曾是格伦沃尔德民族共产党集团——反西方的、反德国的，当然也是反犹太人的——成员。民族党（“波兰是波兰人的”、“打倒犹太人团结工会”）是由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生和林业教授领导的。这是为数不多的吸引年轻人主要是光头党人的集团之一。的确，光头党介入了对新胡塔的一名德国卡车司机的暗杀。这一事件有制造国际纠纷的威胁，是当局对犯罪者实施严厉惩罚的为数不多的事例之一。一般说来，波兰极右派享有大量的行动自由，但仍然未能在波兰政治生活中有重大进展。

在匈牙利

匈牙利在 30 年代有非常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德国的盟友，并在德国占领下的一段时期中有一个本国的纳粹政府。匈牙利在共产党不再执政后的政治发展非常类似于波兰的情况：以民主论坛为首的中右政府 1994 年 5 月被匈牙利社会党所取代。匈牙利社会党由以前的共产党领导人物领导，如 1989 年曾任总理的盖尤拉·霍恩。

然而，前共产党人似乎真诚地皈依了社会民主，主张一种混合经济。他们不反对私有化和农业改革，并同外国投资者合作。极端右翼的思想在民主论坛的队伍中确实出现了，其最著名的代表是伊斯特万·塞苏尔卡，一个戏剧作家和它的主席团成员。最终塞苏尔卡离开了论坛，成立了匈牙利真理党（正义和生命党），该党一度在议会中有 11 个席位（总数是 386 席）。塞苏尔卡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自称是民族激进主义的拥护者。他的敌人是自由主义者（主要是传媒）、前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但他小心不挑出犹太人作为主要罪犯。塞苏尔卡要求有一个新宪法，并攻击政府向外国人出卖利益，在它的政策中没有优先考虑匈牙利的利益。他是在匈牙利之外生活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的坚定维护者，反对斯拉夫人（在斯洛伐尼亚）和罗马尼

亚。

塞苏尔卡的党属于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的传统，而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传统。约瑟夫·托格扬的党（ISCP）也是这样，该党的根基主要在乡村。它是匈牙利主要的历史政党小地主党的后继者之一。托格扬的党声称有6万多人，使得它成了匈牙利最大的党。但事实上它在1994年的选举中的情况一点也不好。塞苏尔卡和托格扬都得到了一些工人和农民支持，因为他们代表着基督教匈牙利和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然而，请注意，“第三条道路”也一直是民主论坛的官方口号。如果塞苏尔卡要求匈牙利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并提到“丧失的领土”的话，我们应该记住，匈牙利的大部分政党关于匈牙利目前的边界的说法都是模糊的。

塞苏尔卡和托格扬发动的民族大运动现在还没有过去。在1994年选举中，他们的政党得到了1.5%的选票，他们没有一个人被选入国会。在受尊敬的右派之外，出现了各种极端集团，有一些是公开的新纳粹分子，自封的1944年到1945年统治匈牙利的箭十字党的信徒。它们的名称有匈牙利民族社会主义行动、民族民众统治党、匈牙利合作协会和民众意志协会，其中每一个至多不过几百人。行动集团后来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行动集团，以杰尔市为基地。它的领导人伊斯特万·吉约科斯因种族煽动罪被判处一年徒刑。民族民众统治党由阿尔伯特·斯扎伯领导，他曾作为流亡者在澳大利亚生活了7年。这些新纳粹集团同海外的匈牙利流亡者中间有类似思想的小派别以及其他特别是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新法西斯主义集团，保持着密切联系。另一个新法西斯主义派别的领袖是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流亡者。

伊莎贝拉·基拉里起初是民主论坛的国会议员，后被驱逐

出去，甚至塞苏尔卡都觉得她的观点太激进。后来她成为匈牙利光头党的保护人。光头党有几千名，穿黑制服和长统靴。他们并非都是极右派的好战分子，但他们到 30 年代的箭十字党中寻找他们的偶像。他们的杂志叫做《不屈不挠》，这也是箭十字党的敬礼口号。基拉里成立了一个叫做匈牙利利益党的政治集团，专门负责政治教育和维护光头党的利益。她否认她的集团具有法西斯主义特点，但他们的出版物的内容却明白无误：为大匈牙利而战斗，“纯粹的匈牙利主义”，清除所有的外来的和外国的利益。

光头党的主要靶子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国人，特别是吉卜赛人，正如他们的一首歌所唱的：“光头党想用喷火器摧毁吉卜赛人。”他们有一支喜爱的足球队，布达佩斯的费伦克瓦洛斯，在国内比赛时通常要喊口号并打出标志。但同样真实的是，对外国人的攻击绝不限于光头党，在某些场合光头党曾为其他“非政治的”集团进行的攻击承担了罪名。

吉卜赛人占匈牙利人口的 5% 至 6%，其中 1/3 被认为是具有文化的。如果说匈牙利的犹太人是因太富裕和太聪明而受到极右派攻击的话，那么吉卜赛人则被认为是“下等人”和主要的罪犯。犹太人被攻击为共产党人，尽管吉卜赛人同旧政权没有什么干系，却也无助于他们和极右派相处。共产党当局力图以郊区的新住宅计划来安置吉卜赛人，但他们很快又进了贫民窟。他们和邻居之间又出现新的紧张关系。只有很小比例的匈牙利的吉卜赛人受到纳粹灭绝政策的影响，他们现在的人数或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更多。

吉卜赛人由于在社会中地位低，他们成了光头党攻击的靶子，但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政党存在的理由。在匈牙利，极右派只得到了有限的支持，较负责任的右翼政治家曾努力摆脱极

端分子。然而，仍然有大量的不满情绪：工人失业率相对较高——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也许高达 3/4，还没有从经济改革中得到好处。这种全国性的不满可以追溯到特里亚农条约，按这个条约匈牙利失去了它以前的帝国，其中一部分是匈牙利人居住的。大多数匈牙利人觉得，他们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前南斯拉夫的同胞被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相应地，尽管民族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运动不可能属于箭十字党的模式，但它也有支持的源泉。

在罗马尼亚

扬·伊利埃斯库总统是一个前共产党领导人（中央委员会的负责宣传和教育的书记），政权——民族救国阵线更名为社会民主党——中的其他主要人物属于同一范畴。经济改革非常有限，政府精英中间的政治斗争，以及政府精英同更偏右的力量，如罗马尼亚民族统一党（PRNU）和大罗马尼亚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是非常突出的。极右派主张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分子的盟友扬·安东尼斯库将军的政策，更极端的因素是同情铁卫军——30年代和40年代的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安东尼斯库最终镇压了铁卫军，军事专制转而反对欧洲最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出于两个理由，罗马尼亚的极右派在最近几年未能有更大的表现。首先，自推翻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以来，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但是，既然甚至以前也不好，右翼反对派就无法提“过去的好日子”。其次，由于执政政党更多地倾向于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改革，就很难从右边来围攻它。

然而，民族统一党（PRNU）在最近几年有进展，由于执政党在国会中不占多数，它就得依赖 PRNU 的支持。PRNU 是 1990 年在一个文化联合会的基础上创立的。它的中心起初在

特朗西尔瓦尼亚。因为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曾在那里感觉到来自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压力，因此要为平等的文化和教育权利而斗争。尽管该党在 1990 年的全国选举中表现不佳，但它在特朗西尔瓦尼亚的情况很好，在那里它的基础是在工业化浪潮中最近迁移来的下层农民。

PRNU 把自己打扮成（像 30 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所做的那样）广泛的民族运动，而不是一个寻求党派利益的集团。它在社会和经济专门问题是模糊的，一直强调民族利益和团结。它反对共产主义（这是由外国人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但观点上赞成齐奥塞斯库的遗产。

特朗西尔瓦尼亚的最大城镇克卢日的 PRNU 市长格奥尔吉·富纳成了该运动的领袖。他的运动得到了特朗西尔瓦尼亚商业和政府精英的资助。在他的领导下，该党继续进行反对外国的斗争：主张应该剥夺匈牙利人的文化权利，不能让外国资本在罗马尼亚经济中找到立足之地。在罗马尼亚目前的经济状况下，过多的外国投资的危险是不大的。这样的态度作为罗马尼亚所有极端右翼政党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东欧所有政党共有的）一个共同特点，仍然是有趣的：对“外国统治”不太害怕，害怕的是整个现代化，不管多么无效率，也要维护“民族资产阶级”。PRNU 开始介入一个叫做卡里塔斯的控股公司的值得怀疑的交易中，该公司向投资者许诺在投资后 3 个月内有 8 倍的回报。300 多万罗马尼亚人参与了投资，但该公司毫不奇怪地破产了。

PRNU 反对过分的自由民主和媒介，主张一个“铁拳政府”，军人占据领导职位。它想通过行政的和其他手段清除吉卜赛人，并且从事反犹太人宣传。但反匈牙利问题比起其他偏见来更是这个党关心的核心。与这个党形成对照的是甚至更右

的右派，如科奈留·图多领导的大罗马尼亚党人（GRP）。

这个集团起初像 PRNU 一样来自同样的马厩，有理由假定它的成立得到了前共产党人和秘密警察的帮助。因为他们认为保护它的右侧是有用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集团都做到了这一点，但 PRNU 的举止更受限制，而大罗马尼亚党人在方式上更激进、更公开。这使得他们成了一个不可靠的盟友，对执政党来说不时地是个麻烦。执政党指责 GRP “不宽容、排外主义和反犹主义”。GRP 在最近的选举中得到 3.5% 至 4% 的选票后，该党的民意就下降了。它的通俗周刊《罗马尼亚海》的发行量从（也许）40 万份减少到 10 万份。^① GRP 日渐同社会主义劳动党（SLP）合作，这是齐奥塞斯库晚年忠实信徒的集团。SLP 的领导人是伊·维尔德茨，他在共产党政权中曾是总理。罗马尼亚提供了比东欧其他国家更惊人的“红一褐联盟”的例子。

然而，更为右倾的是几个小集团，如马利安·蒙迪努领导的 MFR 和拉杜·索莱斯库领导的 PNR。其中一些是走议会道路的，而其他的则主张武装起义。它们都想回到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如果说它们有差别的话，这些差别根源于现在的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者中间的冲突。

由于来自温和的右翼政党和罗马尼亚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因战争罪被处死的军事专制者安东尼斯库，或多或少被恢复了名誉。总统伊利埃斯库反对恢复名誉，但在他自己的队伍里出现了不同意见。布加勒斯特的一位法官最终在一件诽谤案中裁决：安东尼斯库是罗马尼亚的一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

^① 然而，鉴于统治联盟不稳定的地位，它已经越来越依赖于极右派的支持。PRNU 在 1994 年 8 月进入内阁，甚至大罗马尼亚党人也在 1995 年 1 月进入统治联盟。

袖，反对恢复其名誉的人缺乏对人民和民族的感情。

然而，安东尼斯库反对法西斯主义铁卫军，在 1941 年的清洗中杀掉了它的许多领导人和追随者。因此，弥合安东尼斯库和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差别是不容易的，但激进法西斯主义者今天的赞美者找到了一种方式。根据他们的观点，真正的铁卫军随着它的历史的领袖科奈留·科德莱努在 1938 年被杀害也就终止了。他的后继者、1993 年死于流亡中的霍利亚·西马，是一个路线偏差分子，从事恐怖主义、集体屠杀，无法无天，最终导致了他的运动的毁灭。这一事件甚至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并非所有新法西斯主义者都承认对这一事件的这种看法，否认 1938 年后有任何偏差，从而铁卫军阵线今天的赞美者分化为“科德莱努主义者”和“西马主义者”。

极端主义者想使某些经济部门受到军事控制，当众鞭打罪犯，建立一个“民族民主”合作国家，把未同化的少数民族驱逐出去。他们奉行一种反匈牙利人和吉卜赛人的侵略路线。极端主义者反对欧洲联盟，梦想恢复同德国和日本的战时同盟。

如同匈牙利的情况一样，罗马尼亚流亡者中间的极端右翼的派别，对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以铁卫军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康斯坦丁·德拉冈，在共产党掌权后流亡国外，在国外交了好运，支持民族的共产党政权，最终成了罗马尼亚一个文化联合会的名誉总裁和极右派的出版社以及几家广播电台的所有者。

这些政党以及其他一些甚至更小的政党，在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工人中有些进展。但它们总的影响是有限的。

罗马尼亚极右派的意识形态是复杂的和矛盾的。因此，安东尼斯库将军被恢复名誉，是因为他是罗马尼亚历史上最大的反共分子。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铁卫军的后继者绝不

把共产党作为他们的主要敌人；事实上，他们非常愿意同前共产党人合作。他们欣赏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前任乔治乌—德治的优点，只是在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这一点上反对共产党。如同俄罗斯的极右派所做的那样，他们相信存在着实际上每一个人——俄罗斯人、美国人、罗马尼亚的邻居和它的“内部敌人”——反对罗马尼亚民族及其合法利益的巨大阴谋。

尽管在罗马尼亚几乎没有留下犹太人，但反犹太主义的攻击仍然在新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中有地盘，总是极力证明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据可靠的估计，大约 30 万罗马尼亚犹太人在战争期间死掉了，仅罗马尼亚的雅西的一次屠杀就杀掉了几千人。罗马尼亚民族主义一直坚持对民族混合地区的领土要求，其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按巴尔干的标准，它有了一个小帝国，大部分是由少数民族构成的。罗马尼亚想控制这些地区，要么同化少数民族，要么进行种族清洗，这种欲望导致出现了一种强烈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带有各种神话的和神秘的对罗马尼亚民族永恒使命的信仰。这也是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原则，它在民众的各个阶级中都得到了一些支持。

罗马尼亚的情况表明，把侵略性的权威主义的民族主义归类为“极右派”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安东尼斯库将军、民族共党政权（在 60 年代初以后）和许多目前的政治家之间，在政府和反对派两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差别。他们都想要一个更大的罗马尼亚，甚至这些政权的大多数都是专制的或至少有很不完善的民主。他们对民众的号召力是相当大的。自身和平以及与邻居和平相处的真正民主的罗马尼亚的机会并不大。然而，既然政治和经济现实限制了一个小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野心，军事侵略也就被排除了。由于贫穷，罗马尼亚在

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善意。罗马尼亚激进法西斯主义的前景不是那么光明。尽管小的机会主义的集团可以——不害怕惩罚——不受约束地攻击外界世界，在国内舞台向他们的敌人发出可怕的威胁，但政府却不能这么做。因此，如同安东尼斯库战胜铁卫军一样，保守力量有可能击败他们激进的挑战者。

在前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联盟以前的各组成部分是由民族主义政党和领导人统治的，民族主义的强度在共和国之间是不同的。斯洛文尼亚较少侵略性，但民族主义的冲动在每一个地方都出现了，并且导致战争和内战。这种民族主义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新法西斯主义者制造了明显的困难。很难从右的或左的方面围攻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或（克罗地亚的）弗拉尼奥·图季曼，尽管也有过这方面的企图。奥吉兹拉夫·塞塞利季领导的塞尔维亚激进党（SRS）在塞尔维亚议会中有 29 个席位（总共 250 席），向米洛舍维奇提出挑战，主张更积极的种族清洗，建立更大的塞尔维亚。这一立场使得塞族同西方发生了冲突，并迫使他们成为日里诺夫斯基的臂膀。日里诺夫斯基在贝尔格莱德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建立大塞尔维亚。SRS 攻击国内的民主政治家，但由于米洛舍维奇紧紧掌握着军队和警察，它不可能有太大的进展。该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大城市之外和波斯尼亚。它用更多的精力来建立它的军事组织，而不是组织成一个政党。如同在其他内战中一样，极右派的各种武装集团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独立性，塞塞利季（指挥游击队）和得到塞族军队支持的极右派（“猛虎”）另一指挥官阿尔坎之间出现

了争吵。

克罗地亚有一种法西斯主义的传统，可追溯到 60 年前。弗拉尼奥·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政府曾做出相当大的努力否认它。如果说塞族力图建立一个塞尔维亚的话，那么克罗地亚人在传统上则想有一个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家，这引起了同贝尔格莱德的冲突。铁托军队的前将军图季曼，曾是历史学家，被当作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遭到清洗。最终他成了一个保守的政治家。在他的 1988 年出版的题为《荒漠》的书中，他论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著名的亚塞诺维克残废集中营，乌斯达莎杀害的只有 4 万囚徒，而不是塞族所说的 70 万人。真实数字可能介于这两种估计之间。按照图季曼的说法，事实上塞族人和吉卜赛人是被“杀戮成性的”犹太人杀掉的（或者说被挑出来杀掉的）。后来，图季曼收回了他的许多（而不是全部）反犹太人的攻击，主要原因也许是在国外的反应是不受欢迎的，当时克罗地亚还非常多地依赖于西方的帮助。

对图季曼和他的政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或 HDZ）的政治观点是无可怀疑的。它们被克罗地亚流亡者，主要是在加拿大的流亡者推向了右边——也就是说，转向了更多的扩张的政策。但黑塞哥维那的游说集团对一个有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国家很少有同感，宁愿把波斯尼亚分成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或者给它以某些自主权。

图季曼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还没有激进到取悦一些极端因素的程度，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一致的和矛盾的，因为有突然的转折。极端主义者（克罗地亚历史正义党或 HSP）主要是由多布罗斯拉夫·帕拉加领导的年轻好战分子，自认是历史上的成立于 1861 年的 HSP 的继承人。历史上的 HSP 是克罗地亚民

族主义的源泉，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统治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主义者，即安特·帕维里克的乌斯达莎的源泉。极端主义者有自己的准军事组织，该组织逐渐被吸收进克罗地亚的军队中。HSP 的反民主的特点几乎是无可怀疑的，HSP 在合理的自由选举中的情况并不好，但鉴于其成员的好战性，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图季曼和他的同志属于保守的一民族主义的一权威主义的传统，而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传统。他们的政党已经分裂了，温和派成立了自己的运动。温和派也许对图季曼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克罗地亚在国外的形象，担心在未来同塞尔维亚的冲突中，克罗地亚也许需要它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

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一种法西斯主义运动 NOF（民族法西斯主义共同体），但它没有太大的价值。这个党是由前将军鲁道夫·加杰达领导的。1935年它在全国得到了2%的选票，但在1939年它解散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地区是德国占领下的受保护国。斯洛伐尼亚得到了勉强的独立，并被一个教权法西斯主义政权所统治。在这个政权中，教会、老斯洛伐尼亚民族主义者和死硬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多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199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分解后，布拉格又看到了极右派新党的出现，能够从这个新党中察觉出某些法西斯主义的学说，但该党声称它的精神之父是第一共和国的民主奠基人托马斯·马萨里克^①。这个新党就是共和党，成立于1989年底，领导人是米洛斯拉夫·斯拉戴克。他在共产党政权下是个监察官，后来披上了极端反共的外衣。共和党在议会中有8名议

^① 马萨里克（1850—1937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哲学家，1900年创立捷克人民党（1905年改名为捷克进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积极从事捷克复国运动。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后，他4次当选总统，执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靠拢西方列强的政策——译者注。

员。它对捷克民主来说主要是一种奇物，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危险。它从事反政府的宣传，攻击民主领导人有共产党思想、腐败、反犯罪不力。共和党想驱逐外籍工人，在捷克政党中只有它不承认斯洛伐克退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它的风格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日里诺夫斯基。它同欧洲其他国家的极右派政党保持联系，但在对美国的访问上，斯拉戴克像是捷克民主的支柱。对他的政党的支持来自年轻工人集团，主要是光头党以及北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高失业率的不景气的地区，在那里它的得分要好于在布拉格的得分。

大多数观察家都把共和党看作是一个自由漂浮的抗议社会状况和犯罪的党，而不是看作极右派的党。党员中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只有一半人是右派的同情者。共和党想废除义务兵役制，但斯拉戴克偶尔在会议和游行中也号召他的追随者拿起枪杆。共和党人不是到战前捷克的法西斯主义者中，而是到农民党中寻找他们的偶像。农民党起初是一个民主运动，后来转向权威主义。

斯洛伐克最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是斯洛伐克民族党(SNP)。它是历史上的一个运动的后继者，该运动成立于1870年，追求斯洛伐克的独立，在1989年恢复活动。该党的特点之所以难以确定，部分地是因为共产党人在它的领导层中有强大的代表，是并肩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也是因为它在最近几年经历了几次政策上的变化。它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政党，而是包括温和派、保守派以至日里诺夫斯基的敬慕者的党。它曾和弗拉基米尔·梅西亚总理的执政党合作，但又反对他。在斯洛伐克独立的第一年，它的言辞是刺耳的——攻击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犹太人。SNP的集会经常伴有暴力行动，它从成立于1938年的并在战争期间积极活动的法西斯主义军事组织

希林卡卫队中获得它的大部分激情，这已不是什么秘密。然而，后来该党为了得到尊重，变得更温和了。它的选票介于7%至11%之间。随着它的领袖日利纳市长简·斯洛塔——一个比他的前辈更有魅力的人物当选，它又转向了激进的路线。该党的纲领一直是故意模糊的。然而，斯洛塔和梅西亚之间的差别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别——用一个政治对手的话说，是“有人道面孔的法西斯主义”。

除了 SNP 之外，还有一些小的集团，如斯洛伐尼亚人民联盟，从蒂索政权中得到启示，争取为其恢复名誉。（蒂索作为战犯被处死）。然而，不同于罗马尼亚的情况，当局抵制他们的行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同捷克分离的经济后果成了不愉快的惊恐。因此，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低，而不是蒂索和希林卡的思想，这些思想在目前是不管用的。指责捷克人对斯洛伐尼亚的所有缺点和贫穷负责，是民族主义集团采取的路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论点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在东德和保加利亚

出于各种原因，东德和保加利亚是两个在旧政权垮台后作为政治因素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兴起的国家。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保加利亚不比其他巴尔干国家更民主。它有政党，但君主统治、军队和其他非选举出来的力量在它的政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除捷克斯洛伐克而外，保加利亚也具有比其他东欧国家相对更多的宽容。这个国家同它的相当大的土耳其少数民族（约占人口 10%）的关系有一些紧张，曾给这些少数民族施加压力，使他们的名字重新保加利亚化，但不存在土耳其分裂主义运动。犹太人很好地结合进了保加利亚社会，尽管吉卜赛人（约占人口的 3.5%）的情况不是同样好，但他们没有受到迫害。在保加利亚有一个传统的“德国”政党，但它并没有发展到信奉法西斯主义的程度，如同“俄罗斯”政党不想模仿斯大林主义一样。在 1989 年后，保加利亚又显示出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多的政治稳定，即使它的经济困难像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一样严峻。

保加利亚是 IMRO（国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故乡，该组织一百年来一直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斗争。在南斯拉夫解体后，这个国家开始形成了，但一些马其顿激进分子仍然想扩

张它的领土。一段时期，保加利亚支持 IMRO，但马其顿人的目标现在不是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目标。

有几年，很小的保加利亚民族激进党（BNRP）存在过，最接近极右派的政党。它同通常的国外伙伴（日里诺夫斯基和勒蓬的国民阵线）建立了联系。但在 1992 年的大选中它吸引的选票不过 1%，它的侵略性观点限于对国外的领土收复主义要求和国内的民粹主义口号。它在原则上不反对民主制度。

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相当多的政治暴力，尽管东德的外籍人数同西德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是相当少的，但对外籍工人的攻击还是引起了全国的注意。80 年代右翼光头党在东德大街上重新出现，这经常是根据德国纳粹的过去来解释的。但既然绝大多数新法西斯主义者（如果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话）是非常年轻的，没有明显受到前纳粹分子的影响，我们就必须到别的地方寻找解释。

共产党的东德从没有做出实际的努力对待它的纳粹的过去。官方的路线是，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同共和国没有关系，它是西德的金融资本家和复仇主义者发起的。因此，新一代是在对纳粹时代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无论如何，实难肯定，反纳粹的灌输会从大街上游荡和统治足球场的年轻小流氓中产生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如果纳粹主义在他们中间找到了赞赏者和模仿者，这可以归因于社会内在的紧张关系：广大工人青年中间的厌烦，无目的的精力转向暴力、玩世不恭，并且缺乏价值和信心。

只要该党在掌权，这些暴行就能得到控制。但一旦警察国家解体，不安定也就公开化了，排外情绪是其主要表现。统一后的东德的一般情绪是感觉到失望：东德人曾对迅速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抱有不合理的期望。尽管他们的经济的确

有所改善，但用得时间要比大多数人假定的长得多，因此出现了抗议运动。

在统一的德国的政治条件下和有严格的反新纳粹组织的法律情况下，对右派极端主义运动的潜在支持不会变成一种政治力量。这些失望者加入了旧共产党的后继者 PDS（民主社会主义党），PDS 在选举中的情况出奇的好，特别是在旧政权的受益者中间。这使得光头党受到冷落，所以他们转向了打黑人，在犹太人的墓地上涂上纳粹党徽，砸窗户。但他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领导人和明确的方向以及成为一个政党的野心。

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

前苏联的后继国家缺乏民主的传统，而且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所以对激进力量的出现的前景是有利的。中亚各共和国仍然处在民族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就像它们多年来在勃列日涅夫及其后继者统治之下一样。在乌兹别克斯坦，在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副总理）统治下，很难有任何变化。土库曼斯坦的塞帕·穆拉德·尼加索夫在1990年8月禁止了过去的共产党，他本人被99.5%的绝大多数人选举出来任期10年。旧政权时期的反共主义者和吉尔吉斯科学院的院长阿斯卡·阿卡耶夫，靠96%的选票当选。哈萨克斯坦的努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曾是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或许是最愿意进行改革的中亚领袖——反对地方旧共产党人的愿望。阿塞拜疆是由盖达·阿里夫统治的，他是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政治局的成员。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政府官员和更激进的共产党或右翼集团之间出现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但由于许多以前的主要共产党人在政府官员中都能找到，对他们进行概括便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但真正的法西斯主义集团却不能够组织起来。贝拉鲁斯的权力还掌握在老共

产党精英手中，鉴于民众的冷漠，它的控制还没有受到严肃的挑战。

我们现在来看看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罗的海各国尝试过民主，但试验持续不长时间。在立陶宛，它结束于1926年，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结束于1934年。在军队和安全力量的基础上（在立陶宛也是在天主教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威主义、一党统治，在卡利斯·乌尔曼尼斯（拉脱维亚）、安塔那斯·斯梅托那和奥古斯迪那斯·沃尔德马拉斯（立陶宛）统治下是非常苛刻的，但在爱沙尼亚的康斯坦丁·帕特统治下却不怎么苛刻。在1938年，波罗的海各国中只有爱沙尼亚恢复了民主措施。其他国家把墨索里尼但不是希特勒当作它们的榜样。

在纳粹占领时期，当地人同德国人合作，德国人被错误地当作摆脱俄罗斯枷锁的解放者受到了欢迎，所以波罗的海国家一直不敢正视历史上这棘手的一章。考虑到波罗的海国家曾经经历过几年民主，它们在重新从俄罗斯独立出来后的表现比预想的要好。所有这些共和国都不愿给这些国家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以充分的公民权，但在来自俄罗斯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联盟的压力下，他们的确做出了一些让步。立陶宛只有10%的俄罗斯人，“俄罗斯”问题不如其他两个国家那么尖锐。立陶宛国会有一帮右翼极端主义者，但前共产党（现在是民主工人党）在1993年赢得了大选。阿列克山德·布拉佐斯卡斯（前共产党第一书记）在1993年成了立陶宛的总统，但甚至他的反对者也不怀疑他和他的党已经经历了真正的皈依。

极右翼集团在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存在，得到了在西方的流亡者的支持，但只是在拉脱维亚他们才构成一种严肃的政治力量。在俄罗斯少数民族中，许多人投票支持日里诺夫斯基

和俄罗斯新共产党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知道，他们的生存取决于西方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支持，右翼极端主义必定同向他们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相对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乌克兰在波兰和德国的流亡者中间的主要力量 OUN，受到了纳粹主义的强烈影响，但在德国人显示出失败的迹象时它改变了它的倾向。他们在乌克兰的后继者（“一体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利沃夫）一直比在主要是俄罗斯人的工业东部地区强大得多。首都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共产党官员的手中。共产党官员面对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困难实行了某些适度的改革。同时在乌克兰西部出现了向法西斯主义的摇摆。这指的是 UNA（OUN 的后继者之一）和它的准军事臂膀 UNSO。这一运动自称是国家的惟一不会腐败的力量，成了对俄罗斯的好战路线的拥护者，出版反美的、反自由的、反民主的和反犹的宣传品：主张把少数民族驱逐出乌克兰。乌克兰的军队（装备有核武器）应该加强。NUA—NUSO 也有一些代表被选进了国会，包括基辅的 4 人。

尽管政府法令禁止准军事的组织，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UNSO 的年仅 30 岁的指挥官迪米特罗·科钦斯基声称有 8000 成员。他的杂志据说销售 1 万份。UNSO 的旗帜是黑色和红色。它的口号是“我们的未来就是战争”和“挑衅、造反、革命”。然而，据可靠的估计，法西斯主义右派，包括像东方十字兄弟会和新秩序军团这样的更小的组织，甚至还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党，得到民众的支持率不多于 3%。

在乌克兰，不论是在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中间，右翼的情绪都是普遍的，但亲法西斯主义因素只是一种微弱的因素，即使经济危机加深，这种状况或许也不会改变。由于存在着任何一届乌克兰政府都可能面临的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极端主

义的对抗力量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内战，可能导致国家的解体。大多数乌克兰人意识到了他们国家的危险形势，所以他们不可能选择一种注定最终导致灾难的政策。

在本书中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到使得后共产党的东欧成为具有法西斯主义传统的政治运动的培养基的原因：缺乏或缺少民主制度的传统（以及宽容和其他民主品质）。而没有这种传统，民主制度就不能成功。这些国家在未来将长时期面临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关系，矛头既对外也对内的极端民族主义盛行。

同时新法西斯主义运动也面临许多障碍，不单单是靠一个有魅力领袖能够克服的内部分化问题。这些障碍还包括，难以找到右派和左派民粹主义运动所需要的敌人：犹太人已经消失了，甚至消息不灵通的东欧人也不可能相信吉卜赛人对他们的民族生存构成威胁。极右派的一些知识分子极力想象出西方的威胁，特别是美国的威胁。但不可能使东欧人相信他们必须仇恨美国，因为对他们许多人来说，美国是一个天堂，至少是一个物质的天堂。

然而，还有一个障碍没有提到：东欧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主义和类法西斯主义的军事专制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除法国而外，所有大陆的主要国家在 30 年代都放弃了民主，法国模式没有受到广泛的称赞。

今天尽管民族主义又成了可接收的，但专制和法西斯主义已经名誉扫地。但如果一个东欧国家蔑视时代精神，它就不为之付出代价。

即使困难加剧，权威主义统治的倾向将增长，法西斯主义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也许还是难以克服的。当然，规则总会有例外，即使法西斯主义时代在欧洲已经结束，个别的反常也总是可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死去 50 年了，所以对法西斯

主义的讨论不应集中于一个现已属于历史的特殊种类：任何保留或复活它的企图都将失败。因此，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幽灵不会再纠缠我们，但其他幽灵也许会取而代之。

结论：法西斯主义的前景



20 世纪文明受到过法西斯主义的严重威胁，打败法西斯主义竟需要进行一场世界大战。今天，使得极权主义政权有可能兴起的条件继续存在，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而且是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所以，临近世纪结束，在打算看到伟大的胜利和短暂的宽慰之时，极权主义运动第二次到来的问题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民主从来没有很好地起作用。它从没有像现代专制那样产生那么大的共鸣。随着 20 世纪行将结束，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显示出了比以前更大的弱点。在欧洲和北美之外，它的根基无论如何是浅薄的。

这种危机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缺乏有力的民主领导，精英分子自信心薄弱和缺失，绝大多数人对国家应做什么和能做什么抱有不合理的期望，社会变革产生了骚动和不稳定。随着中央的削弱，民族分裂主义、个人和集团利益强化到了高于共同利益的地步，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崩溃，这种感觉也许是错的，但它为各种取代民主的东西打开了大门。

关于当代极右派对民主制度的态度，他们的战略已不再是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战略。公开传播粉碎民主的思想被认为是不可取的，除非在较落后的国家，民主从一开始就几乎不存在。右翼民粹主义领袖，如奥地利的尤尔根·海德尔，由于罗斯·佩洛特的技术，在今天的影晌就像阿道夫·希特勒一样大。海德尔的未来国家将具有“直接的”而不是代议制的民主。政党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公民的自发行动所取代，也许是偶尔的公民投票，特别是强有力的总统权力。对现代技术的和社会的趋势的利用，如电子统治，加上民众对政治的兴趣的下降以及政治问题的个人化，使得有可能产生“参与性民主”的幻想，这是一个关于操纵对政党表现不满意的人民的委婉词。

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策略上的；毋宁说，它们反映着世界政治的更深刻的变化。甚至西欧的最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不再梦想发动对他们的邻国的侵略战争。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主要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因为甚至极端民族主义者也需要盟友才能存在。在意识形态上，大多数极右派集团都成了欧洲团结的有力支持者，反对共同的危险，如地位的丧失、外国的影响和移民的流动。这是欧洲堡垒，一个雅利安种族的欧洲的观念。这一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这一潮流转而反对纳粹分子时第一次提出来的。但这种新“欧洲主义”是极其模糊的。德国新纳粹分子想囊括整个现代欧洲，包括英国和法国。法国人想把英国排队在外，重心向南移，并且他们对德国人有所怀疑。意大利人不信任北方人，俄罗斯人关注巴尔干，并不觉得同欧洲人关系密切，把他们视为像美国人一样堕落。

关于堕落的西方的观念，甚至更是中东和北非伊斯兰主义者的核心；但这些伊斯兰主义者本身像欧洲极右派一样也是分

化的。德黑兰提供帮助，主张从喀士穆到阿尔及尔的合作。然而，民族的和宗教的对抗继续恶化，对共同敌人的感觉并不是一个真正密切团结的非常可靠的基础。

所有新法西斯主义的和右翼极端主义的政党都是民族主义的。国际法西斯主义是不可思议的，在名称上是自相矛盾的。但随着欧洲在世界事务上的作用缩小，民族主义的特点也变化了。纳粹分子甚至在欧洲内部也设想了严格的种族等级，但这在今天是不可行的，或至少是不能公开宣扬的。

剩下的是对自由的观念，对个人权利和一般的西方价值的敌视，反美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对西方的敌视，是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冷战时期被淹没了。共产党毕竟也是极右派和新法西斯主义者的敌人，肯定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是这样的。

二

尽管关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它的起源、特点和后果——的讨论并没有结束，但关于欧洲和欧洲之外的新法西斯主义、教权法西斯主义和极右派民粹主义运动的未来的争论却已经开始了。这些争论围绕着右派和左派的修正主义进行，还有种种定义和澄清法西斯主义的尝试——一直假定存在着专家们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一般法西斯主义”的东西。

这两种修正主义的方式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但得出的结论却非常相似。右派修正主义认为，说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邪恶的，这是无关紧要的。理由是，希特勒使德国摆脱了经济危机。他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化者，使德国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不是出于某些错误和过分，他原本可以作为一个

伟大的领袖而载入史册。无论如何，对历史家的评价是要去理解而不是去评判。不同于新纳粹分子，这些修正主义者并不认为应把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偶像化。他们仅仅是坚持认为，他们的罪恶决不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应该客观地和超然地对待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中得到了同情。它的许多最热情的追随者是理想主义者，所以把他们描绘为纯粹的匪帮是错误的。一个人如果不是犹太人或政治上的反对者，不对政治有积极的兴趣，不与个别纳粹显贵发生冲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对政权做出必要的让步，他是能够在第三帝国舒服地相对不受打扰地生活的。附带地说，在法西斯主义时期的意大利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从这些论点中得出什么结论呢？比修正主义者所相信的要少，因为即使在希特勒青年的夏令营中不缺乏真正的同情心，但法西斯主义——特别是纳粹主义——所信奉的野蛮学说，的确造成了几百万人死亡和更多人的难以启齿的痛苦，即使不是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这些政权的持久成就也是微不足道的，为此不得不付出破坏和毁灭的沉重代价。德国民族主义者也许难以承认纳粹主义的罪行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专制者也的确曾在自己的民族或其他民族中造成了甚至更大的浩劫。但是罪行也必须根据时间和地点来审判，纳粹主义不是在遥远的时代——或者在柬埔寨——兴起的，而是在 20 世纪的欧洲兴起的。很可能，法西斯主义将随着受害者的记忆开始消失，痛苦和意识开始模糊而被“历史化”，其他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更被关心的问题。但这决不意味着更超然和客观，它仅仅意味着对过去的兴趣更少了。历史学家更难以理解在一个反常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它完全不同于 2000 年的体验，更

不用说 2010 年了。移情作用和本能的理解将越来越困难。

也许除了纳粹运动有助于使德国的过时的社会结构现代化而外，右派修正主义者在纳粹运动中看不出有什么优点。关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也提出过同样的论点。这些修正主义者并不看重个别领袖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信仰。他们认为，如果犯的是大规模的罪恶的话，那就主要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罪过，而是资本主义和官僚的罪过。所以，他们决定不去过多注意希特勒的动机和思想，而是集中注意使得法西斯主义成为可能的结构，不去关注它的众所周知的独特特点，毕竟这些特点也许不是那么重要的。如果说右派修正主义者想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纳粹主义的话，那么，左派修正主义者则想把它摆在社会学的背景来看待。在大部分方面，他们看不出纳粹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的和官僚的政权有什么性质上的差别。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政权在特点上不是真正极权主义的，因为在严格秩序的薄薄的外皮背后是混乱。照此看来，希特勒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而是一个软弱的独裁者，难以作出决策，并不知道他周围发生的事情用了多少时间，因为官僚是按自己的程序办事的。

在这两种情形中，他们不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也不是我们这里关心的。但是，假如希特勒在 1938 年命令停止侵略，不去入侵更多的国家，不去发动世界大战，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又如何呢？尽管多少是有缺陷的，他和他的政权不会作为伟大的和有效的东西载入史册吗？墨索里尼本人也许从事某种殖民冒险，但肯定不会进行世界大战。但一个能适可而止的希特勒，就不会是希特勒了。

希特勒为了恢复德国以前的显赫而想要战争，如果可能的话，使它更强大，他至少暂时地是成功的。自然他没有详细的

蓝图，因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如果他在 1939 年至 1940 年遇到了有力的军事抵制，他也许就会满足于稍微修改一下德国的边界。但当波兰、法国和其他国家一触即溃时，他得出了结论，他的敌人是纸老虎，他能打败所有其他人，因此他决定发动世界大战。

不管是靠杀害一些犹太人并把其他犹太人流放到遥远的海岛上去，还是靠把他们全杀掉，或者饿死他们、枪毙他们、毒死他们，反正希特勒都想毁灭犹太人。这些细节只是在战争爆发后才确定下来。纳粹德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希特勒只有 5 年的和平。肯定第三帝国的每一个决策并非都是他做的，他手下的领导人之间的阴谋诡计和激烈竞争继续存在，在意大利也是这样。在各种大问题上希特勒都有强烈的信念，他的确有某些制约因素，毕竟他仍然做出了所有重要的决策。

三

我们曾经提到过精确地定义法西斯主义的不可能性。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曾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如用于佛朗哥政权或战前的日本。但甚至更谨慎地使用这个词也留下了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如关于战前时期，甚至关于新法西斯主义的问题。MSI 和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者是由一个敬佩晚期领袖墨索里尼的集团创立的，他们想在 1945 年后继续法西斯主义的传统。但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一直是激进的、民粹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和其他倾向于极右派的因素之间的联盟。在战后时期，MSI 内部继续有同样的激烈竞争。有时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占上风，也有时极右翼居支配地位，直到 1994 年该党改变名称，以便摆脱它的法西斯主义的过去。因此，对于 MSI 的纯粹

派历史学家来说，该党在某些年代是法西斯主义的（在皮尼领导下），但在其他年代又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在费尼领导下）。在它的多年的总书记吉奥吉诺·阿尔米兰特的领导下，它有时是法西斯主义的，有时是新法西斯主义的，还有时是后法西斯主义的。这种无益而琐细的分析是行不通的，只会引起混乱。用另一个名称来包括任何相近的东西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最近的两种最重要的发展是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的驯化和法西斯主义式的运动的出现，通常都打着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帜，或者在它们以前并不存在的欧洲之外打着原教旨主义宗教的旗帜。把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驯化当作一种已完成的和不可倒转的事实，为时尚早。尽管欧洲的主要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仍然坚持他们的民粹主义特点，在方式和世界观上继续是权威主义的，但有可能它们已经皈依民主。然而，这决不是肯定的。正如对教权法西斯主义来说，特别是在北非和中东，同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相似性在某些方面是明显的，但在其他方面又是不明显的。对伊朗政治制度的描述不一定适用于穆斯林世界的其他此类运动和政权，只能作出一种暂时性的分类。简言之，在未来的某一天，法西斯主义的标签将不得不再被一个或几个其他的标签所取代，但在提出它们之前，宁可还坚持旧的标签。

然而，有一些很好的理由，我们不应被一些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理论 and 定义的研究长时期弄得糊里糊涂，这些研究打算提出一种企图把握迄今我们没有把握一切的神奇公式。无论如何，这种公式是不存在的。现实总是比理论更为复杂，它关系到的总会少于广泛想到的。亚历山大·波普写道：“自然和自然规律藏在夜幕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存在！所有一切都光明了。”这样的牛顿在法西斯主义研究领域将不会出现。

四

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北美的极端右翼的思想和行动。历史的先驱是众所周知的——三 K 党和约翰·伯奇协会^①、库格林神父和杰拉尔德·K. 史密斯、银衫党、麦卡锡主义、雅利安人国民大会、雅利安抵抗组织、身份教会，以及一些活命主义者。这些集团以及其他集团曾是众多的，不是没有影响的。在混乱的美国政党制度的条件下，有决心的人的小集团相对容易渗透进主要政党，并当选——例如，三 K 党成员和最近的林登·拉罗奇的追随者。

这些集团中有一些公开主张并使用暴力。他们和纳粹分子一样对少数民族非常仇恨，持反犹主义立场，并坚定地相信存在着巨大的阴谋。但实际上没有一个转向系统的政治行动，也没有决心努力靠武装暴力夺取政权。不管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有什么样的错误行为，他从不梦想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美国，亲自充当领袖。大多数美国的极端主义集团具有防御的性质。他们认为自己被围攻，受到了外国集团的无情攻击，外国集团想破坏美国的传统。他们向后看，属于警戒会和地方武装的传统。作为选择目标，他们相信末日审判即将到来，城市将被烧毁，但他们将幸存下来，建立一个新美国。1995 年 4 月俄克拉何马城的办公楼爆炸案就是一些妄想狂干的，他们自认为受到一个权力巨大的国家的围攻。这些罪犯想象他们是在从事一种报复行动。他们甚至不是像奥姆教那样的伪宗教派别的成员。

^① 美国一极右政治组织，成立于 1958 年——译者注。

奥姆教曾在日本进行了难以觉察的毒气袭击。恐怖主义的主要武器是暴力，法西斯主义是暴力的坚定信仰者。同样，法西斯主义运动偶尔也从事个别恐怖主义活动，而不是大规模的暴力。但恐怖主义仍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词，而仅仅是达到一种目的的工具、手段，目的经常有不同的特点。

自70年代中期以来，像美国黑人组织路易斯·法拉汉的“伊斯兰民族”这样的集团，已经崛起，比起他们社会的白人极端分子来，他们更成功地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并吸引了追随者。

关于有一种犹太人的世界阴谋的信念是无处不在的：犹太人是奴隶主，他们剥削黑人。他们发明了艾滋病来杀害黑人。这一运动的精神领袖否认发生过大屠杀，而且认为基督教发明出来是为了制服黑人。他们还认为，妇女比男人低下，没有平等权利，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是邪恶的，UFO是存在的，应该引起注意。在他们看来，美国是黑人的主要敌人。伊斯兰民族还告诫年轻人要自我改进，努力工作，不要吸毒，不要互相残杀。但这些要求比起仇恨性宣传来是居第二位的。仇恨性宣传有更大的号召力。比起号召自我批评和努力工作来，把目前的不景气的状态归罪于外人总是更容易的。

除了一些像乔治·罗克韦尔这样的宗派分子而外，没有人声称是纳粹分子或新纳粹分子。事实上纳粹的和法西斯主义的理想在美国没有吸引力，除非是在大衰退的高峰期。美国在种族问题上，尽管对新移民有一些不满，但迄今为止这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纲领。

美国的情绪最近几年有所变化，但如同欧洲一样，不能严肃地断定，关于限制移民和驱逐非法移民的主张具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1994年在加利福尼亚有1/3的拉丁美洲人和几乎一

半的黑人和亚裔美国人投票支持这样的主张，不能认为这种动议是种族主义的。

像“伊斯兰民族”这样的黑人组织的宣传，不管多么刺耳，在情绪上和言辞上多么类似于法西斯主义，都只是抓住了有限的听众。如果它是法西斯主义，那也只是少数人的法西斯主义，至多只能指望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危害。但它不可能指望征服整个国家。然而，少数集团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是一个迷惑人的话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① 正如 1995 年 10 月华盛顿的百万人游行所表明的，这些集团的一些主张在他们正常的组织之外是有号召力的。在某些方面它使人想起了欧洲 60 年前对像罗马尼亚铁卫军阵线这样的组织的理想主义口号的感觉，该组织号召民族复兴、团结、更新、真诚、慈善、友爱，以及一般说来的道德的新生和政治的新生。

五

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和新法西斯主义的不成功，几乎不能归功于反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反法西斯主义的成效如此之少呢？就 20 年代和 30 年代来说，答案是明确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反对派非常理解民族主义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者很快就垄断了这种力量，而民主派却成了“西方的献媚者”或者就是“叛徒”。但老的民主政党能否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① 第一个重要的黑人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组织 UNIA 的领袖马库斯·加维在 30 年代声称，他是第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是从他那里复制法西斯主义的，但只是在最模糊的意义上才是如此。也许 1917 年在哈莱姆有一种初始的欲望，法西斯主义式的第一次骚动，但没有能力把它变为现实。关于 1950 年的第三世界也是如此。关于加维和不发达国家的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讨论，见 A. 詹姆士·格雷戈尔：《激进政治学上的法西斯主义信念》（普林斯顿 1974 年）。

的不受约束的沙文主义的蛊惑人心的政客集团相竞争呢？一种更坚决的“爱国”路线会使得纳粹分子难以赢得中立的群众，1945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如库尔特·舒马赫才自由地承认了这一事实。西方的共产党人要么不加区别地攻击（“只要碰到法西斯主义分子就打”），这意味着对普通纳粹分子的肉体攻击，要么与纳粹分子合作。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任何战斗精神，拒绝任何超议会的行动。按当时实行的德国宪法，他们有权利使用武力来反对这些企图推翻民主政权的人，但他们不敢使用武力。所以，法西斯主义政党被右翼独裁者，如扬·安东尼斯库、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和菲利普海军上将战胜或击败了，而大党的民主领袖却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地面对这种似乎不可战胜的新力量。

在1945年后，反法西斯主义失去了信誉，因为它经常被误导和滥用。此外，人们对反法西斯主义意识的需要也不迫切，因为欧洲没有任何大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反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误导，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一词被那些想谴责自己政敌的人过分自由地运用。特别是在东德，他们连续不断的宣传谴责保守分子、自由主义者甚至社会民主党人是法西斯主义者，但对真正的新法西斯主义却很少甚至没有兴趣。事实上，当秘密警察的档案公开后，证明国家安全组织是在西德组织新纳粹和反犹事件的工具，目的是使他们的敌人名誉扫地。

这种反法西斯主义的确害大于利。这一名称的滥用造成了关于识别真正的新纳粹分子和新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混乱；如果德国的康纳德·阿登纳和法国的查理·戴高乐是法西斯主义者，那么就不会顾及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了。随着反法西斯主义失去信誉，越来越少的民主派倾向于参加真正的反法西斯主义活动。然而，欺骗性的反法西斯主义帮助了法西斯主义者，有时

是给小宗教以过分的公开性，有时是把那些和法西斯主义没有关系的人和事叫做“法西斯主义的”。在当代政治中，有与格雷欣法则^①相似的东西。

但反法西斯主义还有另一个弱点：善良的男女们假定他们的同胞中有一种国际主义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指的是这样的观念，欧洲会毫无保留地欢迎来自海外的非政治的移民，即使是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每月输出大约一万非法黑人移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假定表明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意识不到人们对街头犯罪和类似问题的普遍关心。它是重复了20年代的一个老错误，使侵略性的蛊惑人心的政客有了爱国主义的借口。80年代和9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觉得他们代表着更高级的民主，有责任迫使大多数人接受他们奉行的生活方式，这给了右翼极端分子以把柄。

甚至在最宽容的社会里人们也普遍感觉到，拥抱政策已经走得太远了，出现了政治的以及道德的和文化的无政府状态，至少应恢复某种秩序和某些传统价值。各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了解这种情绪，相应地努力进行调整。但一些知识分子并不同意，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反法西斯主义是没有成果的。

六

在当代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如何呢？70多年的历史

^① 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法则，指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金属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必被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排挤掉——译者注。

显示出通常的类型：法西斯主义产生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时期，旧的秩序不再能够应付眼前的问题。这些是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成长的先决条件，但法西斯主义者能否利用这种条件却取决于各种环境，如危机的强度，任职者抵制挑战的决心。大有前途的形势（也就是说从法西斯主义的观点看是大有前途的）也许得不到利用就会过去，由于法西斯主义者缺乏有效的领导而分裂。

法西斯主义一直是一种抗议和不满的运动，当代世界包含着巨大的抗议后备军。比起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来，新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成了更是平民的（在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明显）和更是激进民粹主义的。在欧洲之外，它在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同西方并驾齐驱甚至想超过西方的社会，如亚太国家的做法，是最为强大的。

为了评价法西斯主义和类似的运动的总的前景，我们必须考虑到几种因素。如果冷战以作为战场上惟一剩存的竞争者的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像每一个人——或几乎每一个人——渴望的理想那样，那么法西斯主义的未来就是暗淡的。但自由民主的前景不是这么光明，因为有可能出现对许多人认为日渐混乱的国际和国内舞台状况的反冲。显然，并非每一个非民主的政权都必定属于法西斯主义的模子。如果一个社会达到了相对高的发展水平，并且它面临的危机是短暂的，有一个相对野蛮的权威主义政权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客观上”，面对当前的（或未来的）挑战，也许不需要一种刺耳的极权主义政权。但“客观上”，1923年和1933年也不需要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但它们的确兴起了，因为非民主的运动趋向于越来越猛烈。危机愈深，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想象中，对一种有效的专制的欲望也就愈强烈。这种专制能够使它的统治者不屈服

于来自下面的压力和反对而推行他们的政治。这种专制必须是坚定的和无情的。它不能容忍反对派，因而需要镇压。它还需要大众的广泛支持，因而需要宣传。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已经出现了重大的经济进步。但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增长将以同样的速度继续上升。实际上这种增长自 70 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已下降，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已停滞。失业——在 60 年代实际上是不知道的——现在成了地方流行病，失业率在各个国家都超过了 10%，在某些国家如日本，高达 20%。据预测，劳动力的相当一部分，在未来的 20 年里将是非全日劳动。^①

新的投资越来越多地转向生产率更高的亚洲和某些第三世界国家。自由贸易很少找到支持者，的确许多人认为它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亚洲的经济增长在未来的几十年将是尽可能快速的。相应地，西方的这种相对的下降就会引起不满和畏惧。有人认为，民主和激进的经济改革不可兼得。的确，如果同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形势相比的话，在繁荣的时期会出现这种相对的下降。工业就业机会减少的速度快于新增的速度，但社会保障安全网现在照顾着这些受影响的人。为需要者提供住宅、食物和医疗帮助。

但难以肯定，富裕的欧洲能否负担起越来越多的下层阶级的福利上如此庞大的开支。甚至大陆的一些最富裕的城市也被发现处在了破产的边缘。即使这些国家能承受得起，对福利的依赖性的社会后果也是阴沉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它意味着

^① B. 克罗齐：《意大利史：1871—1915》（牛津 1929 年），第 242、261、268 页。法西斯主义的世纪末的起源值得详细考察。除了历史的兴趣而外，这是在后现代主义时代非常贴切的话题。见 W. 拉克：《世纪末——再一次感受》，载《当代历史杂志》1996 年 1 月。

几百万人被边缘化了，不再能就业。在欧洲主要城市形成了腐败和暴力犯罪的区域，在美国它们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自 70 年代以来，贫富之间的差距严重加大，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和前苏联。根据预测，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尽管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这种日渐加剧的不平等表现出宽容，但在其他地方它将引起社会的和政治的不稳定。

下层阶级仍然是个少数，但绝大多数就业者对他们工厂的未来的不稳定的感觉越发突出起来。用技术的语言说，这被叫做经济上的**累积的结构性变化**。它既影响体力劳动者，也影响白领工人。如果相当多的人产生了这些不安全感，它们就将变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因素。如果不是每一个人（或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职业，如果一开始就找不到职业的年轻人中间加进来了失去工作而又不可能再就业的中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工作分配计划，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也许是严重的。这种形势可能导致民粹主义的或极端主义的运动，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在所有导致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因素中，不安全是一个最关键的、肯定最难以理解和考察的因素。

新的下层阶级的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另一部分是出生于外国的：例如在荷兰，有 40% 的土耳其和摩洛哥移民失业，但只有 7% 的荷兰人没有工作。这样的不成比例在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种不平等滋长了客籍工人对他们每天接触的“富裕的”本地人的敌意。它还意味着本地出生的人对“寄生虫”的不满，越来越不愿意每年拿出几十亿元为不工作的这部分人提供社会服务、食物和住宅。上述情况给人的印象是，形势失去了控制。民族冲突和阶级冲突越来越多，对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七

就欧洲而言，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方面是议会民主的危机。在欧洲，凡是法西斯主义强大的地方，它都是建立在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的基础上的。在某种程度上，它都和断言腐败有关。但这些断言只是一个方面，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在1933年的德国很少有腐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获得政权，首先不是因为许诺清除腐败的政权，而是许诺取代软弱的政府。过去和现在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府，但在当代世界这是可能的吗？甚至在民主有深厚根基的地方，民主也从没有受到爱戴。它至多引起一种信仰，即尽管民主制度有各种弊端，但民主制度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最好的东西。

在70年代如同在20年代后期一样，盛行的感觉是，这种制度已经不起作用了，国家是无法治理的。在80年代这种感觉被淹没了，只是到90年代才又重新露面。它涉及到这样一种信念，即政府已经成了软弱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政府不是按民族利益来行事，而是为了保证再当选而行事。它们不是做出困难的决策，而是力图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所有人。它涉及到为各种投资利益而斗争的游说集团和只对自己的所有者负责的传媒的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传媒确定全国的节目不是根据实际的深刻的需要，而是根据娱乐的迅速变化的迫切要求。

这些感觉并没有夸大，但是不完全。民主领袖和制度的弱点是同社会的不负责任和冷漠相平行的：相信国家无所不能，普遍地并且越来越多地感觉到，没有人民做出相应的努力，国家几乎就能提供一切。国家和社会类似于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关心的是盈利、特权和名称，公民义务限于最低限度的纳税。因此，这种倾向越来越支持一种能在民主制度之外快速做出决策的新的领导。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民主政权会解体呢？政府之所以失去它们对武力的垄断，是因为宪法给它们的权力很小，因为它们有这样的权力但不愿意使用这样的权力，或者因为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不再忠诚于民主制度。不能带来稳定的选举制度，曾被用来说明民主制度垮台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政府的经常变化（和甚至没有一个政府延期）并不一定导致极端主义力量的胜利。合法性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反对派乐意接受民主制度并据之行动。如果没有建立在共同价值和目标上的社会的广泛民主的一致，民主的前景就是暗淡的。如果封闭了政治变革，对民主的支持也就将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和奥地利就是这种情况。主要政党（或各政党）掌权而不腐败，没有任何民主的东西能取而代之。但一旦冷战结束，旧的制度也就瓦解了。

八

民主的危机，说明了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但它没有解释 30 年代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些国家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民主。它也没有解释最近在东欧和前苏联强大的极右派政党的出现。民主的危机是同伊朗、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或者同伊拉克这样的世俗极权主义专制不相干的。

正是在第三世界较发达的国家，具有法西斯主义传统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在当前有了最好的机会。不管西欧的、中欧

的和南欧的议会民主有什么样的缺点，都难以想象向法西斯主义那样的暴力的和狂热的运动的权力的复归处在了鼎盛时期。新纳粹、新法西斯主义派别将仍然是没有影响的。实力更大的民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有更好的机会，但甚至它们如果掌权的话，也根本不可能比权威主义走得更远。它们可以摆脱一部分民主制度，但它们不能建立十足的极权主义政权。欧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免疫力，欧洲人和美国人太富裕、太冷淡，不可能起来为这样的制度而战斗，除非面临着一种比目前所能设想的更深刻得多的危机。

俄罗斯和东欧的形势是难以预言的。目前留下了一个空缺，有人希望由民主派来填补。然而，引入民主制度的尝试是不怎么成功的，所以意识形态的空缺是由某种民族社会主义来填补的。它会有什么不同吗？也许，但时机不是很好，因为没有立足其上的民主基础，过渡一定是困难的和漫长的。

这种政权的第一个表现是不难想象的，因为存在着许多先兆：腐败的和无效率的政治家将受到谴责；公共秩序崩溃、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衰退、日益增长的无政府状态和分裂将被利用——一句话，要阻止总的灾难。在这样的环境里，按民族的利益，将选择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拯救国家。紧急状态（或戒严状态）的国家将声称只存在有限的一段时期。这种专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得人心的。在最近的战争中军事手段是不成功的，但这一事实不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因为总有人论证，如果不是因为腐败的政治家的话，他们是可以赢得战争的（当军队在摩洛哥蒙耻之后不久，普里莫·德·里维拉^①就在西班牙

^① 里维拉（1870—1930年），西班牙军人和独裁者。1923年解散国会，宣布戒严法，成为军事首领。1924年在摩洛哥镇压克里姆领导的独立战争；1925年至1930年任总理，独揽大权，成为实际的独裁者——译者注。

掌了权；当埃及在同以色列的战争中失败后，纳吉布^①和纳赛尔就把国王赶走了)。即使其他国家机构都瘫痪了，重要的是军队和保安力量仍在起作用。

因为各种黑手党有强有力的表现，普遍认为只有铁的手段才能消灭他们。所以，俄罗斯对这种政权还会有额外的支持。既然最高的军事领导被认为牵扯进了普遍的腐败之中，政变的动议就更可能是由上校们、而不是将军们提出来的。

这将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专制吗？在传统的意义上说不是。但它有可能变成一种法西斯主义的专制，因为军队没有能力执行这种清洗，它也不能充当恐怖和宣传的工具。为了破坏现代社会和经济，军人至少需要和某些文职领导人之间进行联盟。军队需要一个政治运动作为传送带。

欧洲之外的形势是不同的。中东、北非和第三世界其他较发达的国家的严重危机已经因蛊惑人心的政客的压力而加重了。人们还听命于在富裕而懒散的西方已经不再存在的信仰、狂热和战斗愿望。世界的这一部分没有对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体验，没有对杀戮的反感，也很少有对从事大规模暴力的限制。在这些国家积累起来了不满，想找回辉煌过去，法西斯主义式的运动和政权的潜力在这些国家特别强大。其中一些国家很容易从权威主义的政权转向更压迫性的和侵略性的政权。

解释一下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话。我们可以说，环太平洋的生意是生意。中国、日本和南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

^① 纳吉布（1901—1984年），埃及总统。1948年巴基斯坦战争中为准将，战后升为中将；后参加反对国王法鲁克一世的活动，被选为“自由军官组织主席”；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统治后，任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1953年6月，任埃及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兼内阁总理；因与政府中的实权派矛盾，翌年被迫辞职，并被软禁17年——译者注。

经济进步，有理由设想它们将最终赶上西方。其结果，它们的政治权力——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将增长。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大陆自 70 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显示出较高的年均增长率。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不是很落后的。这种经济“奇迹”的原因不是什么秘密：它得益于老式的努力工作和高储蓄率的美德。其结果，这些国家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现在只是 60 年代初期的一小部分。

相反，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国民收入已经停滞或下降，由于人口急剧上升，非常贫困的失业者的人数已经增多。在过去的 10 年，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下降了 20% 多，在整个世界上是表现最差的。这已经引起了更多的挫折感和仇恨，这种情绪可以转向内部，但也可能转向恐怖主义和像教权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政治制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有民主的解决办法。这些国家已经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挫折越多，他们的愤怒和重新表现自己的欲望就越强烈。

九

20 世纪初的欧洲思想家专注于对社会的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在这个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衰的世纪结束时，我们吃惊地注意到，这些思想家的观念是和形势的发展相符合的。法西斯主义的出现，靠的是许诺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新的综合，但也许许诺阻止堕落，更新和康复社会，恢复信仰和价值。它还发誓要提供一个比民主更有效的政府，使民族的利益优先于个人的利己主义。

欧洲法西斯主义既是 1900 年的世纪末的产物，也是对它的反应。甚至现在看来，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百年前，文学

的崇拜人物如莫里斯·巴雷斯和加布里勒·丹农齐诺，竟然在有记录的时间里从自我崇拜和感觉过敏的厌世的花花公子，转变为超级爱国主义和反自由的战争和专制（接近于法西斯主义）观念的提倡者。朱里奥·埃奥拉从达达主义到极端法西斯主义的一生，也沿着着类似的路线。虚无主义的先知马丁·海德格尔成了后来一代虚无主义者的精神领袖。

意大利舞台上伟大的哲学家和敏锐的观察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曾在墨索里尼手下写作，30年后他写道：法西斯主义是新的非理性主义和堕落，“包括神秘学和神哲学，逻辑的限制被消除了，批判的功能衰弱了，理性的赞同的责任心被扫到了一边。”克罗齐的评论现在听起来也是非常中肯的。单独看来，世纪末的观念不过是娱乐，知识分子的爱好。除非为其确定了政治舞台，它们是不会存活下来的。

新法西斯主义者认为，政治舞台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思想会被承认是西方文化和政治危机的结果，是西方的漂浮不定的普遍弱点的结果。几十年的完善民主和削弱权威的尝试经常导致喧闹。关于领导的弱点和缺失，关于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以及社会肢解的情绪，正蔓延开来。特殊利益集团和少数民族要求的不仅仅是平等权利，甚至还有优惠待遇。其结果，钟摆以奇怪的方式正摆回到一种早期时代的情绪，强调的是集体的福利，而不是个人的福利，从强调宽容转到强调纪律、秩序和权威。

在许多国家，法西斯主义既不是这种反弹的惟一形式，也不是最可能的形式。在某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在倒退的社会，新的说法不绝于耳。但这些对着迷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西欧第二次到来的人来说，面对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90年代的风尚、象征和言辞不是30年代的东西，那些最可能顺从

非民主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既不是德国，也不是意大利。这些新的运动将是民粹主义的，在某些方面有一种强烈的宗教因素。法西斯主义也许不会有一千种面孔，但肯定也许有十几种面孔，有些是过去的或熟悉的，有些却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细菌和害虫过去曾经能够抵挡住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魔术子弹和神奇的杀虫剂的话，那么今天法西斯主义已经使用了进化的技术使自己适应于新的条件并智胜于人类。既然民主社会总是过早地庆祝自己的胜利，丢弃了在过去有某些用处的工具，出于忽视或习惯而解除武装，打算实行某些错误的短视的经济，那么，法西斯主义就像葡萄球菌一样，正在卷土重来。在这两种情况下，也许都没有灵丹妙药，但至少应该意识到，威胁仍然存在，靠《圣经》中要求节制和警戒的禁令来对付，也许是天真的。